

项英传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项英传

王辅一 著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一 贫寒家庭	1
二 学徒生涯	3
三 办工人俱乐部	6
四 入党前后	17
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24
一 发展武汉工会	24
二 推动铁路工运	32
三 在二七大罢工中	40
四 沪西二月罢工	60
五 转战上海、武汉	73

六	参加“六大”前后	88
七	全总领导岗位	106
八	准备武汉暴动	124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141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141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154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173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190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的建设	210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233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	257
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69
一	掩护主力转移	269
二	转变斗争方式	288
三	突出重围	300
四	分兵游击	316
五	反“清剿”	328
六	巩固内部	352
七	游击新特点	368

八	新的考验	381
九	实行谈判改编	407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432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	445
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461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461
二	编组前后	476
三	向敌后挺进	492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515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528
六	到苏南敌后巡视	548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557
八	加强政治领导	580
九	治军抓重点	601
十	发扬优良传统	617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632
十二	项、叶之间	648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664
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	686

一	局势的逆转	686
二	北移的变化	694
三	北移路线的波折	713
四	北移的准备	724
五	北移途中	739
六	最后两个月	758
七	沉痛的教训	776
八	仓促的决定	797
九	殉难之后	813
后 记		828

前 言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

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 1941 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抑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 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

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的几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作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艰苦卓绝地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

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 贫寒家庭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飞龙，化名江钧、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的家庭里。

项德隆的祖籍是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祖父因会种花、植盆景，就由乡下搬到武昌城涵三宫落户，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父亲项天卫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能干。项德隆有二兄一妹，自己排行老三。

项德隆七岁那年，开始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还很注意练习小楷毛笔字。几年后，当他看到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利用课外和晚上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

册。这就减轻了他父亲的劳动负担，很得他父亲的欢心。由于那时常写常练，使他逐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字。同时从这早期的劳动实践中，学到了办事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

项德隆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父亲不幸早亡，家境迅速恶化，仅靠母亲纺织、刺绣和帮人洗衣等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糊口。他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读书，寻找职业，先是想进商店当学徒，后又想进工厂当学徒，但三年却找不到工作。

家庭的困难生活，恶人的作威作福，善良劳苦大众累死饿死的悲惨遭遇，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给少年的项德隆思想上以很大的刺激，也促使他早熟。

当时，项德隆的叔父项仰之任武昌慈善会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很有骨气，人穷志不短，不和他叔父家来往。

有一天，项德隆的亲友看他家的日子过得艰难，劝他找项仰之求情，给些帮助。这也是好意。而坚强的项德隆却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去找项仰之求情。他联系到叔父的日常为人，对劝他的亲友说，项仰之是个吃人的恶棍，欺压老百姓的魔王，不能和这种人打交道。

项德隆这段话，项仰之听说后很是恼火，骂项德

隆是个“不孝之子”。

项德隆却理直气壮地对人们说：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欺压人民的人，不仅不能孝，而且还要打倒他们。

这表明，年少的项德隆对旧社会、对有钱有势人家的仇恨之心是很深的。

1911年，也就是项德隆十三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发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场革命，给项德隆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个人只不过是剪掉了一条辫子，但“革命”二字的观念对他却是有一定影响的。

少年时期的项德隆，给他的乡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和他同桌读书三年的黄凤梧老人，在七十年后回忆项德隆少年的情景时，形容他是：“读书很聪明，外表文秀，内怀大志。”^①

二 学徒生涯

1913年，已经十五岁的项德隆费了很大周折，才

^① 中共武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武昌党史资料》第6期，1984年9月26日。

考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学徒。当时，学徒收入十分微薄，生活很苦，还经常挨打受虐待，受到不少折磨。项德隆为了生活，只好将苦水暂时吞咽下去。三年满师后，他年已十八岁，留在厂里当工人。

这时，项德隆的妹妹项德芬也成为一名纱厂工人。后来，项德芬在项德隆的影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去。

1917年冬，项德隆从《汉口新闻报》上得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联系自己和工友们身受中外资本家盘剥和工头欺凌的情景，心想：俄国工人阶级能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和能够起来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从此，他心中便开始向往着革命了。

1919年5月初，报纸上刊登消息，披露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向日本索回胶州湾权利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情景。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高举“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字样的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深表同情，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这对项德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当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

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德隆在这所工人夜校学习，提高了革命觉悟，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开始懂得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待遇，就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去争取。他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出力，参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从那时起，项德隆便在自己所在的模范大工厂中，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他只在少数工人中秘密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

1920年4月，项德隆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选择有利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当时，棉布在市场上畅销。工人們的罢工停产，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利益。停产愈久，影响就会愈大。资本家对工人的罢工感到震惊，怕罢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生意，被迫很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将工人痛恨的工头开除出厂，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还答应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项德隆领导的模范大工厂工人的罢工要求得到了满足，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它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工头再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这次罢工的胜利，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压迫是一次沉重打击。它使工人们扬眉吐气，激励起反抗剥削、压迫的热情，看到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纷纷参加工会。于是，在项德隆的领导下，模范大工厂迅速组织起全厂性的工会。

项德隆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的胜利尝试，使他大大提高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增强了同资本家作斗争的勇气。

三 办工人俱乐部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它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强调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合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①根据“一大”决议的精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神，中共中央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并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①。

同年10月，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返回武汉，奉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改为武汉分部），并兼分部主任，以便在武汉地区开展劳动组合的工作。同时，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以广泛宣传劳动组合的主张。项德隆作为《劳动周刊》的热情读者，时常到那里去阅读进步书刊，增长了知识。

同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影响到京汉铁路（按：新中国建立前曾称平汉铁路）工人，他们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江岸铁路机车工人还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人去领导他们。为了推动江岸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包惠僧和李汉俊（上海党组织成员，此时来汉口任市政府督办公署总工程师）、陈潭秋（武汉党组织成员）等商量，确定尽快派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们经过物色，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就在包惠僧着急的时候，项德隆写去了信，说他从《劳动周刊》上得到消息，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这使包惠僧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复信，约项德隆在本星期天下午一点到武昌黄土坡十六号寓所面谈。项如约按时前往，两人热情交谈起来。

通过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包惠僧对项德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很不平凡，有思想，有抱负，特别对工人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非常高兴^①，心想：如果各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那工作就好做了。临别前，包惠僧送给项德隆新出版的《两个工人谈话》等小册子，并约他下一个星期天下午再专门来谈一谈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包惠僧刚吃过午饭，项德隆就来到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对包惠僧说：您给我的书，我都看过了。接着，详细地介绍了模范大工厂工人的情形，并简单地说明了其他纺织厂的情况后，直爽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 385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跟你们共同努力，怎样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①

包惠僧第一次同项德隆谈话以后，就想吸收他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派他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出于慎重起见，再次进行考察，并派别人同他接触和考察。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包惠僧认定项德隆是一个纯洁天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包惠僧把要吸收项德隆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并派他到江岸工作的打算正式告诉了他，还说明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

项德隆听说要吸收他参加工会工作，非常高兴，心想这正符合他为工人谋福利的愿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包惠僧考虑项德隆是个经过三年学徒的工人，抛弃熟练的职业是件大事，要他最好回家和母亲商量一下。

项德隆豪爽地表示：“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 386 页。

我没有把纺织工作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党相信我，需要我出来工作，我很高兴，完全听从组织分配。”^①

项德隆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的态度，使包惠僧感到高兴。

江岸位于长江北岸，是京汉铁路南段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和长辛店、郑州一样同为总段。这里居住着三千多名工人，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甚为不满。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当时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几天后，包惠僧邀请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等座谈，商量筹建工人俱乐部的事宜，并将要派项德隆来工作的事告诉他们，他们都表示欢迎。经过商量确定，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处设在江岸龙王庙，项德隆为筹备处文书。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21年12月，项德隆离开模范大工厂，前往江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386—387页。

岸龙王庙，担当起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从此，他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没过几天，项德隆迅速挂起“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这是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挂出后，引起各方面的注视。

一天，林祥谦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告诉车辆厂法国厂长杜拉克，以探听他的态度。这个厂长说：工人俱乐部在法国是极平常、极普遍的事，俱乐部的活动是合法的。这样，俱乐部的牌子就很顺利地挂起来了。

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中，积极地进行发动，广泛地进行联系，深入地宣传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原则》等主张，包括：保障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保护女工、童工的合法权益，等等，深得工人的信任和拥护，许多工人称他为“项先生”。

那时，铁路工人中帮口很多，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这些帮口是进行劳动组合工作的很大障碍，选择筹备人员不得不照顾帮口

的关系。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人员，经过反复协商才产生出来。筹备处干事杨德甫，管庶务的周天元，是湖北帮的；干事林祥谦，管财务的张连光，是福建帮的；干事黄桂荣，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帮的。项德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把调整各帮口的关系，用阶级教育来消灭帮口的成见，当作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反复向大家说明，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联合在一起才有力量的道理。这样，逐步消除了帮与帮的矛盾，为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项德隆和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等相处得很好，通过他们作骨干进行宣传和串连，使工人逐步了解到俱乐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知道成立俱乐部的好处。工人们通过和项德隆的交往，知道他的情况后，普遍愿意接近他，要求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也越来越多，报名非常踊跃。

项德隆把工人俱乐部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有象棋、围棋、有演唱，有讲演，有打乒乓球、篮球等活动。这些形式，工人喜闻乐见，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很有吸引力，成为广大工人晚上常去聚会的场所。他在组织俱乐部活动的过程中，常和工人一起下棋、交谈，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的关系，了解到工人

的情绪和要求。

项德隆还办起一所工余夜校，自己担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讲工人的悲惨遭遇，讲帝国主义、军阀的剥削压迫是造成工人生活贫困的根源，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意义，使广大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逐步懂得受压迫的原因，从内心里发出“要当家作主，不再当牛马”的呼声，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争取改善工人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项德隆在开展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中，很重视做小工的工作。当时在产业工人中，翻砂匠、打磨匠之类的工匠地位比较高，一般被称为师傅，工资也较多；最苦的要算是小工，他们工资少，劳动活重，还要听工头、工匠的差使，时常挨打挨骂，生活最没有保障。自从工人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都坐在一起开会，或一起下棋、唱戏、打球，无形中提高了小工的地位，因而小工对工人俱乐部信仰很高，参加工人俱乐部最积极，办理登记手续、缴纳会费最踊跃。项德隆通过工余夜校，对小工进行阶级友爱的宣传教育，把小工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把工人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

那一天细雨蒙蒙，天气很冷，然而老君殿却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非凡，各厂的工人除值班者外几乎都到了，郑州、信阳、驻马店等站的工人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粤汉铁路徐家棚段的工人代表，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都应邀参加。许多工人还把他们的厂长也邀请来参加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对联，右面是“机器巧夺天工”，左面是“劳动创造世界”，横幅是“劳工神圣”^①。这副对联吸引着到会的工人群众。

这天上午10时，会议主席杨德甫宣布会议开始；项德隆报告了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筹备经过，讲述了成立工人俱乐部的重要意义和工人俱乐部的性质、任务；包惠僧作了《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报告，热烈祝贺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正式成立，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合的情况；李汉俊作了《日本劳动组合情况和中国工人组合的步骤》的报告，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工人基本权利而斗争。会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95页。

议通过了组织公约，宣告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项德隆、林祥谦、曾玉良等当选为干事，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

在会议过程中，会议主席还邀请车辆厂的法国厂长作为来宾讲演。这位身材不高、年约四十岁的厂长杜拉克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讲演，除对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表示祝贺外，着重介绍了欧洲各国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的情况。这个讲话尽管没有什么新鲜内容，然而在客观上表明厂方支持办工人俱乐部，对当时发展工人运动有着良好的影响。车辆厂的中国厂长吴国梁本来是反对工人组织俱乐部的，但见洋厂长完全支持，于是也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的大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它是项德隆周密计划、精心安排的结果，初步展现出他的组织才能。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动员和推动作用。

经过项德隆和俱乐部骨干的积极工作，江岸广大铁路工人被工人俱乐部吸引着，他们称赞“俱乐部是工人的家。”许多工人在俱乐部和工余夜校的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原来一些工人沾染的赌博、酗

酒和吸鸦片等不良习气得到了纠正，从而使他们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一些工人家属高兴地说：“俱乐部好，赌钱鬼没有了，吃酒人少了！”

对项德隆当时在江岸办工人俱乐部的情况，包惠僧在回忆《一个青年工人》一文中有几段是这样叙述的：

“项德隆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①

“小工在工人中是多数，通过工余夜校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为最坚强的一个力量，项德隆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项德隆在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③

包惠僧的几段叙述，实际上是当时中共武汉党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 94 页。

② 同上书，第 95 页。

③ 同上书，第 96 页。

组织对项德隆在江岸办工人俱乐部一段工作的高度评价。

四 入党前后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后，项德隆和俱乐部成员一起，代表广大工人的利益，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

原来工人病假时不发工资，后来改为十四天以内的仍发工资；

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

原来工人出厂要搜身，后来被废除了；

原来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工人俱乐部派代表提出抗议，迫使厂方不得不取消一些罚款的规定。

这些都扩大了工人俱乐部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对于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正式建立，把广大工人团结在俱乐部的周围，对能为广大工人办些实事，项德隆感到莫大的欣慰。下一步怎样把俱乐部变为工会，成为他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关心的问题。

当时，组织工会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工人没有

集会、结社的自由。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不论是工人俱乐部还是工会，反动军警可以随时出动武力干涉或解散；二是工人的政治觉悟比较低，封建式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团结。当时的江岸铁路工人是这样，京汉铁路全路以至其他铁路的工人也是这样。项德隆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

于是，项德隆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研究后，首先着眼于解决工会组织的合法化问题。他们抓住直系军阀吴佩孚 1921 年通电中讲到的“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小辫子，秘密地进行工会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项德隆注意同工人各帮口的领袖人物密切联系，不断调解各帮口的冲突，并以“工人无祖国”的思想来进行团结教育，使工人的帮口观念逐渐淡化。

项德隆在繁忙的工作中，以很高的求知欲抓紧读书，碰到新的书报，总是先读为快。他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愈来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是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

当时，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时常到项德隆那里检查了解情况。他除了汇报工作情况外，还将读了哪些书及心

得收获也都作了汇报，加深了组织上对他的了解。

项德隆在政治上的进步很快，办俱乐部和工会的成绩显著，在工人中间树立起很高的威信。这一些，中共武汉党组织很注视。

1922年4月，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德隆入党的问题，由他本人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对党的认识及入党后的态度，他的入党介绍人包惠僧着重介绍了他参加革命后的主要表现。经过讨论，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①。

这时，武汉地区共产党员的人数，总共不过十多人^②。

项德隆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很认真，对大家的发言全神贯注地倾听，并作了详细的记录。他在会上表示：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干一辈子^③。

这次会议后，项德隆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好久也没有回家去看一看。他母亲感到很不放心，有一天找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来，对包惠僧说：“德隆的父亲死得早，因为家里穷，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39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没能叫他多读书，他的世故浅，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亲戚家门来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没有人帮助他。听说你们介绍他到江岸教书，他教得了吗？我不放心，他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叫他回趟家好吗？”

包惠僧向项德隆的母亲介绍了他的情况，说他聪明能干，书教得不错，想给老人一些安慰。项德隆的母亲听了很高兴。

包惠僧根据项德隆母亲的要求，三番五次地催项德隆回家去看望母亲。而他却说：“我在家时，是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不需要我赡养，我出来了，她还省些事，我也忙，所以没有回去看看。”项德隆就是这样一个人，只顾革命工作而不顾家、不顾个人的人。

项德隆对于工作和学习，又是那样认真。参加讨论问题，他总是争先发表意见；对于工作任务，他总是勇于承担；对于学习，他总是抓得很紧，稍微有一点空暇时间，他就要拿起书本来，一页一页地阅读。而在生活上，他却是非常随便和简单，头发常常蓬松零乱，很久也不去理个发，衣服扣子总是扣的不完全，吃穿很俭朴。他爱吸香烟，常常是手不离烟。

项德隆入党后，和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一起，带领工人同资本家、监工、把头作斗争，比以前更勇

敢了。这就吸引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到工人俱乐部里来。到4月底，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部员发展到三千余人。5月1日，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成为京汉铁路当时最大的工人团体。

同年6月1日下午，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乘上下班的交通车回家时，被总查票程炎和铁路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以查票为名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关进大智门车站警务段。程炎还扬言：“什么俱乐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这是蓄意向工人俱乐部挑起事端，气焰嚣张。

黄宝成的妻子跑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找到项德隆，哭诉了黄宝成被打的经过。

项德隆义愤填膺，立即和俱乐部几个干事商量对付措施。他指出，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工人黄宝成的事件，是关系到工人俱乐部能否存在下去的政治事件，必须坚决斗争。一来可以打击资本家狗腿子程炎、姜道生的嚣张气焰，教训那些敌视工人俱乐部的家伙；二来提高工人的觉悟和地位，为工人俱乐部撑腰。项德隆的主张，得到俱乐部骨干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支持。

项德隆连夜亲自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黄宝成的罪行，提出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条件，表示：“倘或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誓不罢休，即全体停止工作，牺牲一切，和程、姜拚个死活，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上午，工人俱乐部将《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并寄往各铁路工会。

接着，项德隆将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工人黄宝成的经过写成报道，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揭露了程炎、姜道生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

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决心，使江岸车辆厂法国厂长杜拉克大为吃惊，怕工人罢工事态扩大，急忙打电话给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沅，要他马上解决。冯沅打电话给车务处长汪奎龙，要他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

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门前召开欢庆大会，有数百名工人参加。会上，车务处长汪奎龙秉承法国厂长杜拉克和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沅的旨意，向工人们赔礼道歉，鞠躬作揖，表示答应工人俱乐部

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向为非作歹的“活阎王”程炎和姜道生，低头弯腰，连声认罪。

这次反击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工人黄宝成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既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又大大提高了工人俱乐部的威信。

工人们面对斗争的胜利成果，个个喜笑颜开，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工人们激动地说：“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的靠山，今后谁再敢欺负我们，就要像对‘活阎王’一样来对待他。”

不久，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德隆为书记。

当时，项德隆经常化名“夏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入党后便把化名与本名合起来为“项英”。从那时起直到他牺牲时止，都叫项英这个名字^①。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 391 页。

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一 发展武汉工会

1922年6月，项英在江岸建立起铁路工会后，中共武汉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调他到谡家矶扬子机器厂去帮助组织机械工人工会，接着又调他到汉阳钢铁厂去帮助筹建钢铁工人工会。由于项英热心为工人阶级服务，密切同广大工人的联系，努力贯彻党组织的指示，所以他调到哪里，那里工人的活动就容易开展起来，工会就很快组织起来。

同年夏季，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改为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项英为区委委员^①。

项英在领导一些工厂建立起工会后，接着便发

^①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第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动工人开展斗争，争取改善劳动条件。

当时，武汉地区资本家对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非常恐惧，便勾结军阀、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兵镇压，武力封闭工会，逮捕工会领导人，妄图扼杀刚兴起不久的工会组织。

正在汉阳钢铁厂筹建工会的项英清楚地知道，对军阀和资本家如不展开积极的斗争，起码的劳动条件也难以保持，工会组织更难以建立起来，即使成立了也无法存在下去。于是，他和武汉地区党组织、工会的负责人许白昊、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一起，紧紧依靠钢铁厂的七千名工人，同军阀和资本家坚决地进行斗争^①。他领导工会筹备机构开展多种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识破军阀和资本家勾结镇压工会的阴谋；同时，他和工人骨干商量寻找有利的时机进行反击。

在钢铁厂，炼钢炉、炼铁炉是昼夜不停地冶炼的，如果工人一个星期不生火，钢水、铁水就会冷却在炉子里，炼钢炉、炼铁炉就有报废的危险。项英便抓住这个关键，突然领导汉阳钢铁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并且提出：要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给工人增加

^① 《武汉市志·工会》初稿第36页。

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刹时间，炼钢的巨大熔炉停火了，炼铁的巨大熔炉也停火了。沸腾的钢水、铁水迅速降温了，不能再向外流了。

这一来可把汉阳钢铁厂的资本家吓坏了，他们担心冷却的钢水、铁水会使溶炉报废。

这时，资本家表面上仍装得很硬，勾结军阀调来军警威胁工人，要工人快点复工。

可是，钢铁厂的工人在以项英为首的工会领导下，坚持罢工，表示：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于是，工人和厂方资本家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资本家支撑不住了。为了保住炼钢炉、炼铁炉，厂方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允许工会存在，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汉阳钢铁厂工人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后才开始复工。

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获胜后，项英随即将厂工会正式建立起来。

汉阳钢铁厂的罢工斗争，不仅打击了这个厂的资本家，而且使武汉的军阀和其他资本家受到震惊。

汉阳钢铁厂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项英

和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使工人参加工会的人数飞速增加，武汉地区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在这以后，武汉地区建立的工人团体，都直接打出了工会的牌子。

同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党不久的项英，作为武汉区党组织的代表，和其他地区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等代表一起，代表着全党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光荣地参加党的“二大”^①。

在会上，项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听取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问题理论的传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的制定，讨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等决议案，选举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项英参加制定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在分析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8、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建的性质，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的基础上，不仅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确定了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最低纲领^①。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项英参加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会工作第一个较为全面的纲领性文件，规定了发展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首先，明确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团体，其主要活动是同资本家和反动政府作斗争。其次，明确了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再次，明确了工会随时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但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②。项英通过参与对这个决议案的讨论，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对他尔后在从事工人运动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党的指示去加强工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77—7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8页。

项英还参加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决议案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作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项英从参加这个决议案的讨论中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当时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由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后来，项英对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执行得那样坚决、认真，同参与这个决议案的讨论有着密切关系。

项英虽然是第一次到上海，但此时他顾不上在黄浦江畔、南京路上观看风光，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工人组织起来，如何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如何改良工人的生活待遇，为此，一定要斗争，一定要胜利，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8页。

而且坚信能取得胜利。于是，他立即乘轮船回武汉。

项英的入党介绍人包惠僧，后在 1954 年的《回忆建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一文中，专门讲到项英参加党的“二大”的情况：

“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份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①

项英从上海返回武汉后，迅速将“二大”的精神向中共武汉区委作了传达，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

同年 7 月底，中共武汉区委为使各工会组织相互配合和支援，推动武汉工会运动的发展，决定将武汉的二十多个工会组织，包括汉阳钢铁厂、扬子机器厂和江岸铁路工会及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等，共三万名会员联合起来，正式建立起武汉工团联合会。它是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是在武汉工人运动高潮中诞生的，是全国建立最早、最大的一个地方总工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 391 页。

会^①。此时，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正值高温季节，项英每天汗流浹背，积极与各工会团体联系，参与重要问题的研究，为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出了大力。

同年10月10日，武汉工团联合会改称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杨德甫任主席，陈天任总干事，项英当选为组织主任。他和宣传主任林育南、秘书长许白昊、法律顾问施洋等一起，担当起组织宣传工人群众、培养工人骨干的重任，把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推向前进^②。

项英当选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的情况表明，他在湖北工人群众中是有很高威信의。

在这以后，项英又参与领导了武汉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几乎所有的罢工斗争都取得了成功，从而推动湖北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到当年12月底，加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有二十七个工会，会员达四万八千名。这样，就使湖北及武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③。

① 《武汉市志·工会》（初稿）第39—4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二 推动铁路工运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铁路工会发展很快，其中京汉铁路工会的发展又走在陇海、津浦、京奉、京绥等铁路的前列。

京汉铁路是 1898 年开始修建的，和项德隆同龄，1906 年建成通车，北起北京，南至武汉，全长一千余公里，为中国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①。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很重视京汉铁路，他每月军饷八十万元大部来自京汉铁路的收入，因而京汉铁路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京汉铁路，许多重要干部如李大钊、邓中夏、陈潭秋、项德隆、罗章龙、包惠僧、许白昊等，都被派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武汉、北方分部，去直接或间接领导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那时，京汉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铁路工人劳动强度大，干活的时间长，每天至少是十个小时，多的每天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且成年累月，没有节假日，遇有事

^① 《辞海》1979 年版第 35 页。

情请假要扣工资，对生病和工伤致残的一概不管。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元，仅及京汉铁路局长月工资的百分之一，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们为了生存，迫切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他们从1921年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受挫的教训中，深感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团结战斗。

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首先发起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全路广大铁路工人的欢迎，在有各站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确定对全路的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的整理。

同年8月10日，中共党组织召集京汉铁路各基层工会负责人开会，第二次讨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事宜。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派项英、包惠僧、张国焘等出席，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这次会议，经过三天讨论，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武汉的杨德甫任主任委员，长辛店的史文彬、郑州的凌楚藩分别任副主任委员，项英任总干事，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过程中，把建立、扩大基层工会当作筹备的主要工作来抓。他深入到

京汉铁路南段的广水、信阳、驻马店等站进行宣传教育，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道路，帮助他们组织起基层工会。

项英在巩固、发展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共产党员。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向党组织积极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

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项英认为施洋的本质是好的，思想是进步的，就和许白昊共同介绍施洋入党。但在中共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没能被通过。在这次会后，项英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另一方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的分析。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终于批准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的进行和沿线基层工会的发展，项英的信誉已经由江岸飞速传到京

汉铁路沿线各段、各站、各厂了。

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期间，沿线一些基层工会为提高工人的生活和待遇，要求增加工资等，与厂主、军阀、洋监工、绅士作斗争不下十余次，每次均获得相当的胜利。项英运用这些事例，采取多种形式广为宣传，扩大了工会的影响，激发了工人们参加工会的热情。

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在项英和各地工会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到1922年年底，全线的工会组织就绪，建立起十六处分会，会员达二万多人^①。从而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工会组织已经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议确定抓紧起草会议文件。项英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和组织大纲、办事细则等文件的起草。

项英参加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第二条写明该会的“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584页。

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的争端；（3）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4）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①这个章程表明了工会的政治主张，它是为全体工人谋利益的，是要与全国各业工人以至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因而得到广大铁路工人的拥护。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报纸都刊登报道和广告，向全国有关团体、新闻单位发出邀请函电。筹委会主任杨德甫和筹委会副主任、郑州分会委员长凌楚藩，专门向郑州地方当局办理申报手续。

同年1月下旬，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一些社团代表和新闻记者也先后到达；项英和武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工会负责人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李求实、林祥谦、施洋以及武汉地区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带着他们献给大会的礼品，乘专车赴郑州，受到沿途各车站工人的热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584页。

烈欢迎。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从北京到达郑州^①。

军阀官僚对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异常恐惧，蓄意破坏捣乱。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诡计多端，表面上同意成立总工会，并赠送锦旗以示支持，暗地里却在1月25日密电吴佩孚，诬蔑即将举行成立大会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是“聚众招摇”、“荒谬绝伦”^②。

吴佩孚时任北洋政府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拥有十多万人马，老巢设在古都洛阳，对工人成立工会是不赞成的，特别是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的罢工使他很恼怒。因为那次工人罢工，使吴佩孚在京汉铁路的收入每月损失六万元（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条件，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路局每月要多开支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十二万元，因此他反对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很自然的^③。当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将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时，大为震惊，于1月29日电令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要对京汉铁路总工会开

① 《张国焘回忆录》（一）第265页。

②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6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①。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拿着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到花地岗玉庆里四号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吴大帅（指吴佩孚）有命令，禁止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项英和筹委会工作人员非常气愤，据理相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

1月30日，吴佩孚来电要工人派代表去洛阳。工会方面立即派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等五名代表前往，与吴佩孚交涉。项英等留在郑州为开会继续准备。

骄横的吴佩孚在接见工会代表时，派头十足、盛气凌人，说来说去，就是不同意开会。代表们与之激烈争论，仍无结果，只好从洛阳回郑州再作商量^②。

就在这时，吴佩孚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汉口等地增兵，为武力镇压工会运动作了准备。

1月31日晚，杨德甫等五名代表从洛阳返回郑州，中共党团立即同各地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杨德甫等代表向大家报告了同吴佩孚谈判的经过以及军警将要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信息，共同商议对策。项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16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49年版第95页。

英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紧急会议上，到会代表议论纷纷，形成了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杨德甫为首的一部分人，为了息事宁人，照顾吴佩孚的面子，主张将总工会成立的方式加以改变，项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尽可能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

另一种意见，以凌楚藩为主的一部分人，认为可以改期开会，先派代表赴各地请愿，再派代表同吴佩孚交涉。

还有一种意见，以项英为代表，认为不能让步，因为会期已向全国公布，如果改变会期，必将损害工会的声誉，挫伤工人的积极性。因此，会议应如期举行。

项英在阐述不赞成让步的做法时，激动地说：“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吴佩孚、赵继贤是压迫工人的人，如果成立工会要得到他们的批准，那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项英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项英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大声疾呼：“我以为今天是考验我们决心和力量的时候了。如果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已经成立

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讲得非常激动，热泪盈眶，代表们很受感动。

项英讲话后，施洋、林育南和许白昊等也接着讲了话。

这次紧急会议最后决定，仍按照预定计划，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三 在二七大罢工中

1923年2月1日清早，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各地来宾，在郑州的五洲、福昌、第一宾馆等旅舍早早地起了床，准备吃过饭去参加大会。然而此时郑州风云突变，根据吴佩孚的命令，郑州驻军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已经实行全城紧急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排列沿街，阻拦工人去参加会议，商店关门，行人断绝^①。项英看到这种情景，又气又恨。气的是军警对工人开个会如此大惊小怪，恨的是军阀干涉人民的自由太过分，坚定认为会议必须开，决不能为武力所屈服。

这天上午8时，各地代表在五洲大旅社门前集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31页。

合，手持红旗，各社会团体来宾携带着赠给大会的匾额，以军乐为先导，整队向设在郑州市中心钱塘里（现为钱塘路）中段的会址普乐园戏院进发。项英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的总干事，在队伍前面指挥着，边走边带领高呼“劳工神圣”、“争集会结社自由”、“工人们联合起来，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郑州铁路工人早已齐集在普乐园戏院附近，欢迎各地的工人代表和来宾。当代表们快到会场时，被军警举枪拦住，会场大门已被贴上封条。

走在队伍前面的项英，在与军警论理但仍不允许以后，便和林祥谦、施洋等一起，率领工人代表和各地来宾冒着生命危险，突然冲破拦阻线，一齐冲向会场，项英等人砸开会场大门，撕去门上的封条，代表和来宾一齐涌进会场^①。

当时在现场的武汉工会负责人包惠僧，在1926年所写《二七惨案略史》一文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龙同志，领率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631页。

者达五六千人”^①。

这时，大批军警在外面层层包围，鸣枪威胁；从后门溜进会场内的黄殿辰百般威胁，叫嚣“不准开会”，限令大家五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将以“军法从事”。但是，代表和来宾们谁都不理会这种威胁，群情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继续坚持开会。在“劳工万岁！”“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声中，主席紧急宣布开会，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宗旨、筹备经过及与吴佩孚谈判的情形，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接着，施洋、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等相继致词祝贺。会议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在整个会场里，欢呼声、口号声、叫骂声混作一团^②。

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京汉铁路总工会终于胜利地诞生了！

项英在那空气紧张、斗争激烈的会场里，密切地注视着会场内外反动军警的动静，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为反动军警破坏大会的行径所激怒；另一方面，他又为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胜利举行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 601 页。

②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 601 页。

而感到庆幸和安慰。

当天下午，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来宾返回五洲大旅馆等住处时，情况进一步恶化：旅店早被军警占领，不许他们走动和交谈；在旅馆所订的饭菜不准食用，他们只好饿肚子。与此同时，郑州铁路工会也被军警占领，禁止工人出入，文件、杂物被洗劫一空，向大会所赠的匾额、礼品全被砸毁。工人代表和来宾们十分气愤，纷纷质问军警：“你们为什么如此强暴？”军警盛气凌人地回答说：“是奉吴大帅的命令！”

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来宾对吴佩孚的反动命令和军警的罪恶行径，个个无比愤怒。各地来宾在当晚离开郑州时，致函京汉铁路总工会，称：“京汉铁路总工会之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①

当天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由史文彬、项英分头通知代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出席紧急会议的各地代表，对军警的压迫、破坏义愤填膺，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页。

以反对吴佩孚的武力压迫，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并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改为罢工委员会，杨德甫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任副委员长，项英任总干事。同时，会议决定将罢工指挥机关移至武汉江岸，进行罢工前的准备工作。来自武汉方面的代表，欢迎将罢工指挥机关移至江岸，并保证武汉各工会以罢工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和支持。

项英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的研究和起草，提出复工的五个最低条件，包括要求撤革赵继贤和冯沅，查办黄殿辰，赔偿大会损失六千元，送还一切牌匾礼物，并由郑州地方官赔礼道歉。《罢工宣言》还明确指出，不达到上述条件，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工人将一律罢工^①。

这次紧急会议后，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郑州，武汉方面的代表于当晚11时乘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张国焘、包惠僧、陈潭秋、施洋等一起，紧张地研究罢工有关事宜；并在沿途各站，将总工会成立受阻的情况及决定罢工的事项通知各站工会，以便协调行动。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7页。

将罢工指挥机关移至江岸，是紧急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下来的。其根据是：（1）武汉的工会团体力量大，有三十多个组织健全的工会团体，上面有声望颇高的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拥有正式会员六万多人，而且得到各界的支持，有较好的群众基础。（2）有项英、林育南、陈潭秋、包惠赠、林祥谦、施祥、许白昊等一批出色的工人运动骨干。（3）江岸铁路单位多，工人集中，便于指挥。

项英等回到武汉以后，立即向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工会组织通报了军警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情况，初步安排了声援事宜。

从2月2日起，武汉地区的一些工会团体陆续举行集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湖北十八个工团在致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电报中，对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痛心切齿，愤恨万分”，表示：“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拚一死命，亦在所不惜！”^①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在江岸正式办公，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指挥中心。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连日来紧张地进行各项工作，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他还根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376页。

据斗争的需要，组织纠察团和调查队。纠察团，由身材魁梧又会武术的罗海澄任团长、曾玉良任副团长，负责在罢工期间维持社会秩序；调查队，负责探听消息及向四周放哨和夜间巡逻之责。除此，他还将工人组织起来，每组十人，推举一人为组长，可在很短时间内，将数千名工人召集起来。这些，对罢工的胜利进行起到重要作用。这再次显示出项英的组织才能。

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提出的要求未得到满足，遂举行全线罢工。先从郑州开始，接着是长辛店、江岸，到中午12时止，京汉路全线客车、货车一律停驶，工厂一律停工。随着汽笛的鸣叫声，机车不叫了，车轮不转了，机器不动了，烟囱不冒烟了，车头、车厢被甩在铁路线上。顿时，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停止了跳动，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权利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和团结一致的战斗精神。

在罢工开始举行的同时，由项英参加起草和印制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员》、《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等文告，迅速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张贴和流传。

在《敬告旅客》的文告中写道：军阀官僚的摧残，工人忍无可忍，工人罢工是军阀逼出来的，希望旅客对工人的罢工给予同情，和工人一起同军阀官僚作斗争^①。

在《敬告本路司员》的文告中写道：司员与工人，名称虽然不同，有劳心与劳力之分，但都是受封建官僚和资本家压迫的，要免除痛苦和压迫，必须起来奋斗，联合一致，打倒共同的敌人^②。

《京汉铁路总工会紧要通告》在写明罢工的原因和理由后，号召工友们要顾及光明的罢工，保全神圣的名誉，遵守秩序和规约，表现工人真正的精神^③。

这些文告，反映出项英和罢工其他领导者斗争的坚定和领导的才能。它在揭露军阀摧残的同时，争取旅客的同情和支持，争取司员和工人一起参加罢工，使罢工工人明确必须遵守的规约，因而赢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北京、上海、湖南、安徽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等地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援京汉铁路罢工员工，武汉各界人士还慰问罢工员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通电中指出：“盖军阀今日可能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通电表示：“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同时希望全国各工团“切实援助”^①。这些，对于项英和罢工的工人都是很大的鼓舞。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吴佩孚为此大发雷霆，下令军队开进各车站，并包围了在江岸的罢工指挥机关。反动军警镇压罢工工人的活动，愈加严重起来。

罢工的第二天，即2月5日中午，湖北省督军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木阶又率兵到江岸，抓去两名司机，强令其开车。在罢工指挥机关的领导下，两千余名罢工工人冲破军警的阻拦，将两名工友抢回。

这天下午，反动军警又将纠察团三名工友抓去。项英、张濂光、罗海臣等四人作为工人代表前往军政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30页。

府衙门，同张木阶谈判，要求释放无辜被拘留的三名工友。

当项英等走进军政府衙门大门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在营门内外窜来窜去。项英毫不顾及，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

谈判一开始，张木阶恶狠狠地说：“京汉铁路乃吴大帅全军的经济命脉，你胆敢唆使京汉全线两万多名工人罢工！”

项英义正辞严地驳斥说：“铁路工人日夜不停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工人要活命，不得不罢工，这是你们逼出来的，你们必须迅速答复工人的要求！”^①

张木阶十分恼怒，命令军警把项英等关押起来。

反动军警知道项英等是罢工的重要人物，就以枪毙、斩首来威胁，企图让项英下令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地说：“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②他的坚强有力的回答，使反动军警的威吓归于失败。

项英等工人谈判代表被反动军警关押起来的消息传开后，罢工工人义愤填膺，数千名罢工工人包围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 588 页；斯诺：《项英访问记》。

② 同上。

了汉口军政府，高呼“反对关押我们的谈判代表，立即释放我们的谈判代表！”等口号，来援救自己的代表。

张木阶见工人人多势众，被迫于6日晨将项英等四名谈判代表释放。

对于这一段经历，项英后来在1938年所写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述的：

军阀“以商谈之名诱引我到军队，……用枪毙来威胁我答应复工。这时，我以最坚决的态度来反抗。同时，全体工人为援救自己的代表，把军队包围，发生武装冲突，使军阀不得不将我释放。”^①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已过去了两日，还未得到相应的结果。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于2月5日发表宣言，为援助京汉铁路工友，决定一致行动，宣告举行总同盟罢工。粤汉、陇海铁路工人也决定举行全路同盟罢工。

2月6日上午，中共武汉区委负责人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林育南等率领武汉各界代表，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先举行大会，后游行示威。项英、施洋、林祥谦等罢工领导人，同

① 项英自传。

陈潭秋、林育南等一起，走在数千名游行队伍的前列，边走边带领高呼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游行队伍高呼的口号，鼓舞着广大罢工工人和沿途群众，也使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为提高。

罢工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使帝国主义、军阀十分恐慌。各帝国主义驻北京的使馆连忙开会，要北京军阀政府用武力干涉工人罢工；英国驻汉口的领事召集洋资本家及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代表在租界开会，筹划大屠杀事宜。吴佩孚见威胁、利诱等阴谋均告失败，便根据洋主子的旨意，于6日致电萧耀南及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命令军警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行动，屠杀罢工工人，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

2月7日下午，张木阶率大批军警开到江岸。开始，张木阶派一警官到总工会办事处，声称：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

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来。项英见军警态度由强硬变得如此和缓，感到行迹可疑，心想这很可能是军警以谈判为名，妄图将工会领袖一网打尽的毒辣阴谋，于是警惕起来。他先让警官坐下来休息，自己立即开了一张假名单应付。这个警官接到名单后装模作样地说：“请代表们5点钟在工会里等着，我们准时来。”项英表示：好吧，我们等着你们。

待警官离开总工会办事处后，项英立即要工人火速将军警的最新动向去通知工会负责人，要他们到工人住宅中隐蔽。

项英作为总工会谈判的全权代表，与其他数人在工会等候，准备同军警展开面对面的谈判斗争。可是，还不到下午5点，军警假谈判、真屠杀的阴谋就完全暴露了！

这时，张木阶率领的两营军队占领了工会机关，开始屠杀工人。项英和工人纠察团员同仇敌忾，赤手空拳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曾玉良等三十二人在敌人枪林弹雨之下壮烈牺牲，受伤的有几百人，还有大批工人被捕。此时，军警发现林祥谦在被绑工人之列，就将他拉出来，要他下令复工。共产党员林祥谦

英勇不屈，拒不答应。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项英率纠察团员试图营救林祥谦，由于寡不敌众，未能如愿。林祥谦死于军警屠刀之下，共产党员施洋也在被捕几天后英勇就义。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项英死里逃生。他在反动军警乱枪射击时，潜伏在长江边上，直到夜晚才搭小船到汉口。

在江岸发生惨案的同时，郑州、长辛店等地也相继发生惨案。

“二七”惨案后，萧耀南宣布武汉全市戒严，断绝交通，通缉项飞龙、林育南等中共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人，封闭了工会会所。这样，项英就随时有被反动军警杀害的危险了。

项英脱险后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仍留在武汉从事罢工后的善后处理工作，并秘密指导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勇士。

就在“二七”惨案发生的当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历数军阀在长辛店、江岸等地制造惨案的详细情形，指明了工人遭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号召工人阶级：“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

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①

在“二七”惨案发生的这天夜里，项英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家中，出席了包括有张国焘、林育南、杨德甫、陈天等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讨论应该采取的步骤。

张国焘在会上首先提出，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举，现在应该退却，迅速下令复工。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项英和在场的多数人都坚决反对立即复工，认为应坚持继续罢工，直到取得胜利为止。他无法压抑心中的愤慨，当面批评张国焘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为何屈服^②？

张国焘看到继续讨论下去无法统一思想，便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的一致遵行^③。

张国焘还谈到，他对吴佩孚的残暴本质没有充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316—317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271—273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271—273页。

分估计到，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①。

项英和其他原来持反对复工的多数人，见是党中央的决定，只好按照组织原则，表示服从^②。

会后，他们便按照分工，分头迅速传达撤销原有罢工命令，要求工人立即忍痛复工。

2月9日，项英等人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复工命令，劝工人忍痛复工，准备再举。命令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复工。本会深知昨日各业工友因敌人袭击，痛哭流泪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会极希望我亲爱的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271—273页。

② 同上。

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①

在这以后，项英在熊晋槐家中建立联络处，调查工人的死难情况，拟定善后救济工作，秘密恢复工会组织，整顿队伍。

“二七”惨案使全国受到震动，军阀的罪恶完全暴露在全国民众面前，打倒军阀的声浪遍及全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文告，指出：“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文告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和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按：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②！

“二七”大罢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告中国铁路工人书中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罢工斗争，“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你们的行动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的斗争，实在是恰当的”，希望中国无产阶级加强团结，增强自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06页。

②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314—315页。

身的战斗力，以达到中国人民的解放^①。全俄铁路工会也专门致函中国铁路工人，声援中国铁路工人的斗争。

“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了，然而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项英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更加赢得广大工人的信赖。

稍过一段时间，项英赴湖南，就“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李维汉1980年在回忆时曾经谈到：“二七”惨案发生不久，党中央派他任湘区书记，路过武汉，要他将中央的指示和钱带给项英。当时武汉正处于白色恐怖，《真报》和施洋律师事务所等联络地点均遭到破坏，未能找到项英。他知道罢工已经失败，随即将信毁掉，将钱带到长沙。当他去毛泽东住处时，正碰到项英和毛泽东谈话，他随即将钱交给了项英，并向项英说明了带信的经过^②。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①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314—315页。

②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314—315页。

三十多位代表，代表当时全党四百二十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①。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总结“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项英在发言中，根据亲自参与领导的“二七”大罢工斗争的实践，阐述了“二七”大罢工的重大意义，赞扬了京汉铁路工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多数代表赞同项英的看法，认为“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受到一些损失，但意义重大而深远。

出席“三大”的代表罗章龙，在《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的回忆中，专门叙述了会议讨论“二七”大罢工的情况，称：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②

中共“三大”在讨论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等认为参加有好处，极力主张参加；项英等认为，从

①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第43页；《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3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4—275页。

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如都加入国民党，无形中会在工人群众中抬高国民党的地位，不利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开展工作。他的这个正确立场，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许。会议最后决定，凡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央委员及各地重要工运干部，如罗章龙、王荷波、项英、邓培及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余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成、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崧等，均不加入国民党^①。

在“三大”选举中央委员前，共产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会议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等九名中央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濂光等五名中央候补委员，

① 罗章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第19页。

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①。

年仅二十五岁的项英，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个光荣而艰巨的重任，标志着党组织对项英的信任和器重，实际上也是对他革命斗争中，在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二七”大罢工中的表现所作的充分肯定和崇高评价。

同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项英作为驻鄂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到会同志听取了中央局关于“三大”后党的政治、宣传及党务等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以及工人运动的状况，项英向会议报告了湖北地区党和青年团、工会等方面的情况，会议分析了“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确定对各重要的产业工人组织，要集中力量加以切实整顿^②。项英对武汉地区和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正在进行的恢复整顿工作，正是符合这次会议精神的。

四 沪西二月罢工

“二七”惨案后，武汉地区和京汉铁路的工人运

①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第45页，《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第1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9—32页。

动，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暂时遭到挫折。项英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4年春，中共武汉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时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的项英和原武汉区委书记李立三虽然脱险，但难以继续在武汉工作了。党中央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调他们到上海工作，项英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共同领导发展上海工人运动的工作。

项英到达上海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李立三作了分工。李立三以沪东杨树浦地区为工作重点，他以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地区作为工作重点。

小沙渡是上海工厂集中的地区之一，日本“内外棉”十五个厂中的十一个厂就设在这里。当时日本在中国开办纱厂，旨在实行经济侵略。其原因：一是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产品就地卖给中国人，不要纳付关税；三是中国军阀禁止工人有政治自由，又有外国租界，可以用对付牛马的办法来对待工人。而这些工人由于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容易激发起斗争热情，因而项英把工作重点选择在这里。

同年3月，项英到日商同兴纱厂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他趁日本监工或工头不在时深入到车间里，亲

切地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多年的纺织工人苦难经历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使他很快和工人们熟悉起来。他还到工人居住的茅棚里，同工人拉家常、交朋友，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介绍“二七”大罢工中工人英勇斗争的业绩，帮助工人提高政治觉悟。透彻的革命道理和生动的斗争事例，给工人们以很大鼓舞，使工人们心里更亮堂了。当工人们得知“项先生”原先就是纺织工人时，对项英更加崇敬了。

同年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项英和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瞿秋白等出席。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工人运动。项英向会议汇报了武汉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会议经过讨论，强调指出：“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①。项英完全赞成这个决议，并在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37页。

同年8月，项英和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孙良惠等在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沪西工友俱乐部。

同年9月1日，在小沙渡路、安远路拐角处由孙良惠出面租来的三间平房里，沪西工友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①。到会的有三十余人。会议确定成立俱乐部委员会，推举项英为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嵇直为秘书（不久由刘华接任），刘贯之等为干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上海纺织工人中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工人团体。

项英在主持召开的沪西工友俱乐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流知识，互相帮助，共谋幸福。第二，参加俱乐部的部员，要有两个人介绍。部员保密，不对外公开。第三，俱乐部举办工人识字班、补习班，凡是工人都可以入学，不收学费。会议要求参加俱乐部的部员，不分男女，不分地域，都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不得彼此争斗、排斥、倾轧。会议还研究了部员的具体编组等问题^②。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② 《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第87—90页。

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始时设备简陋，只有一块黑板、几张课桌和几条凳子，但墙上张贴着由项英书写的“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八个大字的横幅，却深深地吸引着工人们的心。这个俱乐部最初只办识字班和补习班，用学文化的形式来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由于工人参加这种学习不缴学费，项英和其他教员的讲解善于联系工人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参加学习的工人愈来愈多。

项英针对工人要求学习的迫切心情，除继续教大家学文化外，还举办讲演会，讲爱国故事，讲工人争人权、争生活福利的斗争史实，讲工人为什么被剥削、受压迫的革命道理，很受工人的欢迎。随着俱乐部在工人中影响的日益扩大和深入，参加俱乐部活动的工人人数越来越多，新办的俱乐部数量也越来越多，不仅日商纱厂的很多工人参加了，而且连中国资本家开办的纱厂中一些工人也参加了。

项英等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到1924年底，沪西地区就有十九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起俱乐部的组织，部员近两千人^①。中国共产党依靠这批积极分子，与广大工人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党在沪西地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13页。

区工人中扎下了根，为尔后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准备了力量。

项英在举办工友俱乐部的过程中，很重视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不足百人，工人中的党员人数更少。他从斗争中体会到，没有党组织去团结工人、发动工人，斗争就难以开展，即使开展了也难以坚持下去。于是，他对俱乐部活动中的积极分子重视加以培养，向他们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讲如何团结工人、组织工人的办法，启发他们认清工人只有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才有出路，才能取得胜利。在他的教育和培养下，顾正红、陶静轩等工人骨干，先后被发展为共产党员。这是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和其他十九位代表一起，代表当时全党九百九十四名党员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①。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强调在开展职工运动时，要注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3页。

意斗争策略，在力争工会公开和统一时，一方面要注意当地群众的需要和情绪；另一方面要注意统一战线内的阶级斗争，特别要警惕国民党右派势力。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②。这为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职工运动进一步开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党的“四大”还修改了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是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③。

项英通过参加党的“四大”，对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如何取得民族革命运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274、284页。

② 同上。

③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46—47页。

动的领导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在“四大”以后，他根据会议决议的精神，紧密地联系沪西地区工人运动的实际，努力地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

同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受到工人们的责问和制止。日本资本家恼羞成怒，无理开除了一批工人。这时，工人们很久郁积在心头的强烈愤怒顿时迸发出来，纷纷要求俱乐部替工人能出好主意，带领大家反抗日本资本家。

项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俱乐部委员会成员开会，认真分析形势，商量对付办法。一致认为：当时纱价低落，而美棉暴涨，日本纱厂自恃实力雄厚，正企图趁此排挤打击中国纱厂，日本纱厂绝不会因罢工而关厂；同时，广大工人对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反应极为强烈，必须领导和支持工人进行斗争。因此，会议决定抓住这个事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举行一次大罢工，来打击日本资本家，借以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推动群众性工会组织的发展。

项英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日商内外棉八厂发生的殴打和开除工人事件的情况、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准备用罢工来反击的打算。党中央批准了用罢

工来反击的办法。

接着，项英又召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骨干开会，具体研究和部署罢工反击的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工人们积压在心头的怒火迸发出来，诉说日本资本家虐待工人們的残暴罪行，热烈拥护用罢工来反击的主张。项英代表俱乐部热情支持工人们的要求，向大家指出：要狠狠打击日本资本家，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一定要把这次罢工扩大到整个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们在项英的热情鼓励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准备大干一场！会议最后议定：劝说工人暂且忍耐数日，待2月9日下午各厂工人领到工资后，再同时举行罢工。

项英所以确定2月9日下午才罢工，是根据小纱渡地区日本纱厂都是在每月8、9两日发工资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因为当时工人生活很苦，领不到工资，生活就会恐慌，罢工就无法进行，就是搞起来也难以坚持下去。

党中央对这次罢工很重视，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来领导，指定李立三、邓中夏、项英、刘华等负责，并动员全上海的共产党员站到斗争的第一线。

由于这次罢工是由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出面组织的，所以罢工前的大量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筹划，实

际上落到项英的身上。他四处寻找罢工集会的合适场所，到工人中间进行深入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和工人骨干一起反复研究复工条件，主持起草罢工的传单，对尔后成立工会的工作也着手考虑。这一切都表明，项英把全部身心都用于罢工的准备工作上了。

2月9日，日商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的工人，怀着对日本资本家残酷欺压工人的强烈愤恨，在党的领导下，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组织下，在下午4时交接班时，趁日本资本家毫无准备的机会，在一片“摇班呀！”“摇班啦！”的喊声中，纷纷关闭机器，涌出厂门。工友们一面跑着，一面高呼“不许东洋老板打人！”“不准东洋老板无故开除工人！”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向苏州河北岸荒凉的潭子湾汇集。

在会场的半空中悬挂着白布大旗，写有“反对东洋人打人”七个大字特别醒目。这是项英根据“哀兵必胜”的道理，运用哀兵战术，与俱乐部领导成员一起商定的。它生动地描绘出广大工人身受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工人们的心，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成为动员和组织这次工人罢工的有力口号。

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的刘华首先宣布罢工开始，接着由项英代表沪西工友俱乐部讲话。他完全同

情日商纱厂工友们的遭遇，完全赞成工友们的罢工行动。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有力地鼓舞着全场工人的斗志。顿时，全场响起一阵阵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李立三、邓中夏等也相继发表讲话。

会上，根据党的指示，并经过俱乐部骨干的酝酿，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正式成立，由刘华任委员长。

会场上随即发出“拥护工会！”“听工会的命令！”“我们要同东洋老板斗争到底！”的口号声，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

一次声势浩大的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了！到2月12日，内外棉十一个厂一万五千多名工人全部参加了罢工^①。

这是上海日商纱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大罢工。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对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是很大的威慑，振奋了民族精神。

罢工既然已经发动起来，向哪里引导？如何坚持到胜利？这是一个大问题。项英为此作了反复的考虑。他通过骨干，说明罢工是对帝国主义分子暴行进

① 《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第95页。

行反击的有效措施，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随着罢工斗争的扩大，到2月18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二十二家日本纱厂、三万五千多名工人^①。项英为罢工的初步胜利而感到庆幸，对如何将罢工引向胜利发展而深深思索着。

这次罢工，每天使日本内外棉厂损失达二十五万元，给日商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开始，日商资本家想用金钱诱骗工人停止罢工，然而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勾结军阀政府，派军警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封闭一些纱厂工会，并将罢工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逮捕起来，妄图用武力胁迫工人停止罢工。

项英面对敌人破坏的严峻形势，在和罢工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研究后确定，在内外棉各厂建立工人纠察队，并派一部分骨干到上海的一些大学动员学生组成演讲队，开展宣传活动。纠察队负责在工厂传递消息，散发传单，维持秩序，防止坏人对罢工进行破坏活动。讲演队一部分到一些车间，向工人们宣传宣传团结一致、行动一致的重要性，鼓励工人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一部分到上海各学校和社会团体，宣传工人为什么要罢工，揭露洋人虐待工人的暴行，

^① 上海《文史资料选编》1981年第1辑第38页。

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募集救济金，以支持罢工工人取得最后胜利。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绪的高涨，社会各界对罢工斗争的支持，使日本资本家心惊胆寒，耽心罢工会发展成为全上海的反日运动，被迫于3月1日答应工人提出的包括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等主要条件，淞沪警察厅也被迫释放邓中夏。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声势浩大的二月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斗争的胜利实践，使工人们更加信赖工会，拥护工会，纷纷要求加入工会。几天之内，小沙渡地区的工会会员由一千人增加到六千人。

中国共产党根据工会迅速发展的形势，及时加强了纱厂方面工会组织的活动。在罢工胜利后的第三天，李立三、项英、刘华等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集工会干部开会，商讨如何巩固和健全工会组织的问题。会上，一致推选项英负责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并开始担负实际领导工作。会后，在项英等积极工作下，上海各纱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并在各工作部门组成工会支部，有些支部下面还建立了小组。至4月份，上海日商纱厂（除浦东外）全部以及麻纱厂、丝

厂的绝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工会。广大工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组织——工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威信大为提高，为尔后的“五卅”反帝斗争浪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历史上具有光辉的一页。它是中国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潮走向复兴期的重要标志。

不久，项英奉命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

五 转战上海、武汉

1925年4月，随着吴佩孚在军阀争斗中失败，湖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项英奉党中央的指示，返回一年前离开的武汉，参与领导恢复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

同年5月1日至9日，项英赴广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和当时工作的具体方针。他从参与讨论并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工人运动，与争取民族解放是有密切关系的；工人阶级只有在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

动中，才能取得领导权；实现民族解放，是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够实现的。

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桥梁，以代替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这是对他多年来从事工人运动，特别是肯定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和沪西工人二月罢工业绩的体现。

项英到达武汉后，和中共湖北地委成员一起，运用他在武汉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把一部分基层工会很快地恢复和建立起来。

项英为了振奋武汉地区工人的士气，推动工人运动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先在香烟厂、火柴厂等处发动工人罢工，均获相当的胜利。其中，英美烟厂四千多工人罢工，声势比较大，使外国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工人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这些工厂罢工的胜利，使工人们再次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的重要性，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威力。这标志着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经历了“二七”惨案的挫折以后进到复兴期，构成了当时全国反帝爱国群众斗争的组成部分。

这时，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有重大发展。5月中旬，发生了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的严重事件；5月30日，帝国主义分子又悍然开枪屠杀示威的群众，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群众十分愤怒，迅速举行以罢工、罢课、罢市为内容的“三罢”斗争，全国人民也纷纷同情和支持，导致各地民众出现普遍地、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

项英在武汉，立即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来进行声援、响应。武汉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的高涨，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帝斗争高潮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党中央调项英速去上海，以便参与领导上海的罢工斗争。

项英接到通知后，迅即离开武汉，乘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奔他离开只有两个月的上海。

此时，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市总工会，已经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拥有一百多个工会，二十余万人之众。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业较集中、工人数量较多的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南市等六个地区设立了具有派出机关性质的工会办事处，挂出了公开的牌子，以

便贯彻执行上海市总工会的政策和决议，领导和组织各该地区的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项英到达上海后，除参与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外，具体担负第四办事处（地址在小沙渡弹子湾）主任的工作。

项英为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很快在小沙渡地区组织起八百多人的纠察队，用木棒武装起来。这支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很有威慑作用，使工人壮胆，使坏人胆怯，就是当时盛气凌人的警察见了他们也得毕恭毕敬，有的还主动向纠察队打敬礼。项英和纠察队员们经常生活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尽管他们生活很苦，但大家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这对罢工的持续进行起到很好的作用。

不久，上海的大流氓顾雪桥和日本人暗中勾结，冒充顾正红的族长，想以一万元抚恤费为代价来结束顾正红事件，破坏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项英得知这个消息后，意识到这是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阴谋，就要第四办事处秘书主任张维桢带领纠察队去惩办顾雪桥。一天早晨，张维桢带领四十多名纠察队员来到顾家，将顾雪桥从梦中揪起来，带到第四办事处，项英他们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家伙一顿，让他写了悔过书，找了铺保，然后才释放了他。这件事，对当时那些形形色色从事破坏罢工的人是个最实际、最有

力的警告^①。

到当年8月下旬，项英和上海市总工会其他领导人一起，鉴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威胁利诱，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爱国斗争上出现的动摇、妥协，坚持两个多月的罢工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为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已得的胜利，报经党中央批准，陆续组织各业工人复工。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提出的给顾正红家属抚恤费、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缩短工时、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同年9月18日，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指使北洋军阀张宗昌，以武力封闭了上海市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等。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使上海市总工会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和半公开活动，李立三被迫离开上海。

这时，项英和汪寿华（即何松林）共同担起了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之责^②。他参与研究了以上海市总工会名义发表的宣言和通电，揭露反动军警的罪行，鼓励工人继续团结战斗，呼吁全国人民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同时表明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为保卫工

① 《革命史资料》（一）第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出版（张维桢的回忆）。

② 项英自传。

人阶级的自身利益而斗争。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项英在上海继续参与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建立武装纠察队，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项英和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十二人出席。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局，确定了党的主要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指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的胜利。这些决策，对于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的经验，提出巩固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与革命军队和学、商各界结成革命的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等项任务。项英在这次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57页。

同年6月，上海市总工会设常务委员会作为领导核心，项英担任常委兼组织部主任^①。

同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项英和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罗章龙、张太雷等十四人出席。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关于职工运动、关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的决议案，提出在国民党内联合左派、中派，反对新、老右派。

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伐军进到汉口的前夕，决定将中共湖北地委改为湖北区委。接着，中央陆续调项英、林育南、李硕勋等到湖北工作。于是，项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9月上旬又秘密返回武汉，会同董必武、刘伯垂等，参与领导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

此时，从广东兴师的北伐军，在株洲、长沙、汀泗桥、贺胜桥等地歼灭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以后，于9月6日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项英立即抓住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进行基层党组织和

^① 《中共上海组织史资料》第75页。

基层工会组织的恢复、建立工作。

同年9月14日，即距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一个星期，项英和许白昊等一百多个工会的代表，同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单位的代表一起举行恳谈会。项英与工会方面着重就惩办工贼、恢复工会组织和工厂开工生产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北伐军方面着重就恢复生产、振兴经济、解决军需供应等方面发表了意见^①。

项英在会上发言时认为，工厂长期不开工，经济就不会景气，商业就无法复苏，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而对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如不加惩办，则不足以平民愤，基层工会组织也就难以恢复^②。

这次恳谈会决定了三项议案：一是惩办工贼；二是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是组织湖北全省总工会。其中，第一、二两项，由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由各工会负责进行^③。

会后不久，经项英和工会方面的力争，北伐军总政治部终将向吴佩孚军阀部队告密，导致若干工人领袖惨遭杀害的工贼郭聘帛捉拿归案，并迅速判处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156—15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死刑，广大工人拍手称快^①。

项英所以坚持要惩办工贼，这涉及到争夺工会领导权的问题。像工贼郭聘帛，既有国民党的党籍，又为军阀吴佩孚服务，作恶多端，予以严惩，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大长了革命工会的志气，大灭了黄色工会和反动工会的威风。

当时，北伐军对武昌久攻不下。守武昌城的刘玉春部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坚守孤城，搜刮市民粮食和钱财，捕捉革命党人，作垂死挣扎，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前后达四十余日。项英到达武汉后，和党组织、工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把配合北伐军作战作为党组织和工会的首要任务。积极寻找关系，通过他们向守城的北洋军阀军队开展宣传攻势，晓以利害，扰乱其军心，瓦解其斗志；组织兵工厂的工人进行反对吴佩孚的罢工，使军阀军队缺枪少弹；组织铁路工人罢工，使敌军需运输瘫痪；还组织工人挖坑道，开辟通路，将火车车辆交给北伐军使用。这些都对北伐军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反动军队起着有力的配合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湖北和武汉地区革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156—157页。

命形势的好转，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湖北省总工会在攻克武昌的当天，即1926年10月10日正式建立起来，由向忠发任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任副委员长，许白昊任秘书长；项英还兼任总工会的中共党团书记。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迅速地把湖北全省的基层工会恢复与建立起来，把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组织在工会的范围内，全省达五十万之众，仅在武汉地区的工会会员就有二十八万，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政治力量。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连同汉口、汉阳在内的武汉三镇，都披上了革命的新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到处可见，革命的标语到处张贴，革命团体纷纷涌现，工人、学生经常在街头宣传，商店陆续开业，工厂陆续开工，人们为北伐的胜利而兴高采烈。项英和陈潭秋、许白昊、林育南、李立三等一起，为支持北伐军，同时也为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动员各工厂工人迅速恢复生产，恢复和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尽管很辛苦，但确有说不出的高兴。此时，他为革命日夜操劳，顾不上访亲问友，也顾不上回家去看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亲人。

1926年12月，项英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

任，负责湖北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同时仍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①。

同年冬，为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北省总工会决定在武汉组织武装工人纠察总队，由项英任总队长^②。这支革命武装多时达四千余人，配备着一千多支枪。这些武器，一部分是发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担负武汉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以叶挺为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发给的。项英指挥这支武装，和叶挺的部队密切配合，在武汉的重要地区巡逻，保卫重要目标，大长了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的志气，大灭了军阀残余势力、社会黑势力的歪风，对稳定当时武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在这过程中，项英与叶挺接触较多，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那时，北伐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仍在，江面上经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多时达三十多艘。这些军舰的炮口对准武汉市中心区，军舰上的水兵暗自戒备。至于租界的殖民当局，更凭借他们的特权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力，不断制造借口进行破坏干涉。当时，英帝国主义在汉口设

①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第 37 页。

② 同上书，第 44 页。

立的租界当局蓄意与革命为敌，策动各国领事向武汉政府“抗议”，英国水兵多次上岸制造事端。这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友好的行径，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项英和李立三、刘少奇、许白昊、林育南等工会领导人都认为对帝国主义势力必须进行反击。于是，由湖北省总工会发起，于12月26日在武汉举行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强烈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1927年1月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使武汉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汉口英租界是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签订的中英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它设有巡捕房和工部局等机构，实行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成为英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独立王国”。

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举行大会，庆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和北伐取得胜利，扩大反英、反奉系军阀的运动。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时，英租界当局竟命令水兵登陆，驱赶群众，当场打死打伤群众三十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就在“一·三”惨案发生的当天，正在汉口举行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立三、刘少

奇、项英、许白昊等的领导下，立即发出反对英国水兵惨杀中国同胞的通电，提请国民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立即撤退在华的外国军队和租界内的外国武装以及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等项要求。这些要求，社会各界完全赞同，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并与英方交涉。英方被迫于4日晨将水兵撤到军舰上，巡捕撤回巡捕房，并通知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4日下午，国民政府派兵三个连进入英租界，武装工人纠察队三百名也随之进入，拆除作战设施、张贴标语。

1月5日上午，英巡捕又结队冲出，手持棍棒袭击群众，群众集结数万人包围了巡捕房。这天下午，武汉工人、学生、市民约三十万人，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等指挥下，举行反英大示威，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收回英租界。在游行时，群众队伍高呼“收回英租界”、“收回海关”、“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租界内的巡捕和其他公务人员逃避。武装工人纠察队占领了租界。国民政府于当晚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对英租界实行管理，随即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汉工人和各界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激烈斗争，英国政府代表被迫于2月19日

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同意将汉口英租界交还给中国。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收回汉口英租界。紧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武汉国民政府收回。

收回被英帝国主义霸占六十六年的汉口英租界，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伟大胜利，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在这场斗争中，项英领导的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为广大群众撑了腰、壮了胆，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右派感到恐惧，于是指使他们控制的军队直接镇压。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捣毁并封闭了上海市总工会，曾经和项英一起战斗过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惨遭杀害。消息传到武汉，项英十分悲痛，决心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斗争到底。

同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和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向忠发、罗章龙等八十位代表，代表五万七千

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职工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但对革命最紧迫的问题未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三十一名中央委员、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在这次大会上，项英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①。

同年5月17日，武汉革命政府所辖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一带发动叛乱，东进攻打武汉，妄图趁革命军大部此时正在河南与奉军苦战、武汉空虚之机，捣乱革命军后方，推翻武汉革命政府。负责武汉卫戍事宜的叶挺，指挥第七十二团、七十五团等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等迎击敌人。项英带领武汉武装工人纠察队也参加了战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挽救了武汉的危局^②。

同年6月上旬，项英在参加湖北省总工会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华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号召湖北工人阶级要与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完成国民革命，求得中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74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239—243页。

华民族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

同年6月中旬，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分析了革命的危急形势，揭露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声讨其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项英参加了这次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此时，项英由于劳累过度，突患重病，两个多月起不来床^①。但他那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驱使他当时的政治风云极为关注；对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于6月底决定解散武装工人纠察队，把枪支弹药交给国民党的错误行为无比愤慨；对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制造分裂、背叛革命的行径无比仇恨；对工会被镇压、许多革命志士被捕被杀痛心万分；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一再深思。然而，他病魔缠身，无法直接参与斗争，连党的“八七”会议也未能参加，度过了他一生中心情十分痛苦的一段时间。

六 参加“六大”前后

1927年秋，项英在经过一场大病之后，身体逐渐

^① 项英自传。

恢复健康。此时，国民党在武汉的白色恐怖正在疯狂地进行，中共中央鉴于项英在武汉难以立足，确定他到上海工作。于是，他便由武汉秘密转赴上海^①。

一向习惯于在斗争第一线为党、为工人运动而操劳的项英，那时是多么渴望着早日恢复工作啊！

此时，白色恐怖也笼罩着上海，在“四·一二”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工会组织被破坏。项英到达上海后，和党中央新派往上海的许白昊等一起，领导上海工人与反动的政府工会——国民党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作斗争，帮助上海总工会恢复组织，开展经济斗争，反抗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使上海革命的工会组织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②。

同年11月1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项英（化名韩应）为江苏省委常委^③。

1928年2月初，中共中央对江苏省委进行组织调整，由项英担任省委书记^④。此时江苏省委管辖的范围，包括有上海、南京两个市委，无锡、苏州等十

① 项英自传。

② 同上。

③ 《中共上海组织史资料》第93页。

④ 《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第71—7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个县委，泰县、扬州等十个县特别支部，并在南汇、盐城等十四个县设有特派员，全省党员共有三千一百二十八名，其中上海市为一千七百九十九名^①。由于江苏省委所处的位置重要，项英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

同年2月13日，党中央决定，项英参加中央常委会^②。这表明，党中央对项英的革命实践是满意的，对发挥他的作用是重视的。

同年2月16日，由于叛徒的告密，江苏的党组织和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省委常委、分管组织的陈乔年，省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郑覆他，省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等被捕，后均被杀害。在这期间，项英也几次遇到危险，然而由于他的机智，均得以脱险^③。

同年2月29日，项英在江苏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讲话时，强调各级组织要严格保持秘密状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要整顿地方组织，在产业系

① 《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第71—7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共上海组织史资料》第94页。

③ 《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第72页。

统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①。

由于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从这时起，项英参加党中央的领导活动，特别是参加研究党的“六大”准备工作活动也就多起来了。

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八七”会议上决定的。在那以后，党中央就着手酝酿选举产生代表；对会议地点，鉴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而党又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来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中国党的请求，大会可在苏联境内举行^②。

同年4月2日，项英参加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他和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等一起，就任弼时转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决定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召开党的“六大”意义重大，指定了重要省份的出席人，项英是江苏的代表之一。会后，中央发出了召开“六大”的通告，规定了代表名额，并具体安排了各省代表启程的

① 《中共上海组织史资料》第88页。

②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0—51页。

时间^①。

项英按照党中央的规定，主持召开江苏省委会议研究确定，江苏出席“六大”的代表除他本人外，还有王若飞（省委常委）、徐锡根（省委委员）、温裕成（团省委书记）、蔡畅（女，妇委委员）和县委、区委、支部的代表等，共十二名^②。

同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就刚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进行讨论，项英和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等出席了会议^③。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决议要求工会竭力做群众工作，“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只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1—52页。

② 《上海组织史资料》第88页，《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第75页。

③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共产国际这一决议是一个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着重要作用的文件，表示接受这一决议。

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出了第四十四号通告，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革命性质的分析及策略方针的决定，指出过去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存在着盲动主义倾向，它“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烧杀主义”等等。号召全党切实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精神，纠正盲动主义^②。

项英通过对这个决议案的学习领会以及如何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5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彻的讨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及纠正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认识，都有很大的提高。他随即向中共江苏省委传达了上述精神，联系江苏党组织的实际情况，研究了贯彻措施。

同年5月初，项英按照党中央的规定，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大连，转乘火车去哈尔滨。在项英离开上海去参加“六大”期间，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代理江苏省委书记。

项英在哈尔滨稍事休息后，按照当地党组织交通站关于“六大”代表过境的安排，拿到出境去苏联乘坐的马车号码，就继续乘火车去胪滨府（1934年改为满洲里）。

满洲里，位于中国东北边陲，是中国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之一，是中俄边界的连接点。项英在满洲里下火车后，先在白天去边境上寻找共产国际交通站在那里安排的马车，很快找到他要乘坐编号的马车，当晚便上了车灯号码与自己手持号码牌相一致的一辆马车。那辆俄国的马车夫，在核对了项英手持的号码牌与其车灯号码相一致时，便扬起鞭子，偷偷取道把马车赶过边境到达后贝加尔斯克。然后，项英按照苏联方面的安排，乘火

车去苏联首都莫斯科^①。

项英到达莫斯科以后，被带到郊区一座别墅里居住。共产国际选择在这里作为中共“六大”的会址，看来主要是为了保密。那里的设备比较简陋，但专门设了医务室，为代表们检查身体和治疗。那里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这在当时苏联经济恢复时期能这样已经是不容易了^②。对此，项英和其他代表们感到是满意的。

这是项英第一次出国，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他虽在异国他乡，但并不感到寂寞。当他踏上由俄共（布）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后，长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和工会工作的那种不安全感消失了，早年就想到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的故乡去看一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同年6月12日左右，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部分代表和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进行谈话。项英和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邓中

① 《哈尔滨日报》1986年7月9日第4版：《护送“六大”代表的交通站》。

②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3页。

夏、张国焘、向忠发都参加了^①。

在会上，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不断革命”，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作了说明；二是中国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现在的形势是低潮，而不是高潮^②。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对中国革命当时处于低潮还是高潮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李立三认为，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指出，在低潮时，有时也有几个浪花^③。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使大会明确了指导方向，项英以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而感到荣幸，并和各地代表一样受到很大的教育。

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项英在会上发了言。他对党的错误的发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2页；《周恩来传》第169页。

② 《周恩来传》第172页。

③ 同上。

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其教训；对“八七”会议后党的路线、政策的评价；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与估量；党的组织改造与建设问题；职工运动；等等，都表明了自己的看法^①。

6月17日下午，党的“六大”筹备处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项英作为江苏代表团书记出席。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包括国际代表在内的十九人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的名单。会议决定委托项英代表各省代表团提交大会预备会议审议^②。

6月17日晚，党的“六大”举行预备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项英和其他有表决权的代表共六十人出席会议，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名单、大会议程和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会议同意项英代表各省代表团书记会议提交预备会议审议的名单。其中主席团由十九人增至二十一人^③。

在预备会上，大会筹备处发出通知：参加会议的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2页。

②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2—53页。

③ 《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52—53页。

代表和人员均已编定号码，以后在大会上发言及领取文件、物品时，均用号码，不用真实姓名。项英出席证的号码为 31 号^①。

6 月 18 日下午，党的“六大”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表决权的代表）八十四人，五届中央委员、特约代表和其他指定参加会议的代表五十八人，共一百四十二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会议由向忠发主持，在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后，由瞿秋白致开会词，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和意大利、苏联共产党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致祝词。项英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②。

6 月 18 日晚，党的“六大”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细则和大会会场规则。确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五个组，项英和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王凤飞（江西代表）被分在第一组。这次会议还确定成立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宣传、青年、妇

① 《党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52—53 页。

② 同上刊，第 53、56 页。

女运动、财政审查等十个委员会。项英参加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会，并担任财政审查委员会的召集人^①。

6月19日，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项英和苏兆征、王凤飞一起主持了上午的会议（斯大林因事未能出席）^②。

6月20日，项英和其他代表一起，听取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③。

在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项英于6月23日和26日作了两次发言，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④。

在会议期间，为统一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主席团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先后组成了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广州暴动问题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1—24页。

② 同上刊，第23—2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委员会，项英又参加了这四个委员会。由于会议议程排得很紧，各委员会多在晚上活动，所以项英格外忙碌，每晚都忙到深更半夜^①。

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回顾了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党的组织变化等情况，提出了今后党组织的任务。在大会讨论时，项英连续作了两次发言，指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广大共产党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许多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起来，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在遭到摧残后又重新组织起来，正在向国民党新军阀和资产阶级、地主豪绅进行英勇的斗争^②。

7月1日，大会开始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议程。首先在由李立三作土地问题的报告后，主席团值日主席宣读了由项英等二十九人签名提交大会讨论的提案：“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的政治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央政治局应完全根据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决定一切工作方针。（二）在全国范围内，变立即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切实制止盲动倾向，但对群众自发的暴动或乡村游击式的暴动仍应积极领导。（三）目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1—24页。

② 《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49页。

前工作重心是挽救党与群众脱离的现状，在反帝运动、城市与乡村的日常斗争中，艰苦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①。

项英等签名提案的提出，特别是强调制止盲动主义的倾向，不要脱离群众，这表明项英在参加“六大”学习，冷静地分析革命形势、总结经验之后，政治水平有了提高，提案是正确的。

大会在讨论时，多数代表赞成对国内给以政治路线的指示，将项英等提案交政治委员会一并研究。稍后，提案的基本精神均被吸收到大会于7月9日《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中^②。

7月4日，向忠发向大会作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格勒尔向大会作题为《中国职工运动之最近的任务》的报告。项英听取了这两个报告。

在7月4日晚上举行的大会主席团第十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团的选举问题，按照共产国际规定的人数，确定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组成代表团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事宜。在这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还讨论了党的第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第235页。

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成立了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及国际代表一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先提出名单^①。

7月5日，在大会讨论职工运动时，项英首先发言。他高度赞颂了工人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和一切反动势力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强调要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②。

7月6日，大会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提名，选举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选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中包括苏兆征、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怀、关向应等二十人，有发言权的代表王若飞等九人^③。

7月8日至9日，大会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进行了反复酝酿，人数最后确定为正式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会议为了使政治决议草案更完善，选出修改政治决议草案的委员会，项英是十位成员之一^④。

7月10日上午，大会进行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选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6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刊，第62、68页。

④ 同上。

举。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确定的正式候选名单全部当选。项英当选为中央委员^①。

7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这次大会共举行了二十四天，比第二至第五各次代表大会的时间都要长，7月19日，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一人。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在国内的十名中央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和在莫斯科的一名中央委员因病请假，未能出席会议。会议选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七人为政治局委员，选出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选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②。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项英和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政治局委员和李立三、杨殷、徐锡根等候补委员出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61页。

②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69—70页。

席了会议。会议研究和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及人事分工，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第一批回国，项英、周恩来、杨殷、苏兆征等第二批回国。会议还确定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项英、周恩来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代表团的主席团，委托主席团办理党的“六大”未了事宜^①。

项英从一个在基层的工会工作者，到成为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积累了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在党内、在工人中有较高的威望。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他担任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就是肯定他从事党和工人运动业绩的体现。

“六大”以后，党中央决定项英调离江苏省委，由徐锡根任江苏省委书记^②。

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五十七个国家的六十五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五百三十二名代表。其主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69—70页。

② 《上海组织史资料》第97页。

要议程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运动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章程的报告，等等^①。

项英化名张成，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以能出席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联合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感到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难得机会。大会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时的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②。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项英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③。

项英在莫斯科期间，按照党中央的布置，和其他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一起，利用间隙，以对革命、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他们最熟悉的烈士撰写传记。项英先后为原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郑覆他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际共运室 1983 年提供的资料。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 65 页。

③ 项英自传。

原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委员长、后任上海市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的许白昊两位烈士写了传略，缅怀了曾和他并肩战斗的两位烈士的业绩，充分反映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过程中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成为后人进行革命史研究和传统教育的宝贵史料。

同年10月初，项英从莫斯科动身返国^①。

七 全总领导岗位

1928年11月上旬，项英从莫斯科回到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②。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项英主要分管职工运动和妇委的工作；同时，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活动^③。

由于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当时在苏联准备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会议，直到第二年2月才回国，并在当月因病去世^④，这就使项英负责的职工运动方面工作的担子更重了。

项英在回国途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在职工运

① 《周恩来传》第177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147页。

④ 《周恩来传》第179页。

动中贯彻“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他参与研究并通过的这个决议案，总结了大革命高潮中右的和大革命失败后“左”的错误经验教训，强调指出：工会应当在领导工人进行日常经济斗争中去团结群众，再转变为政治斗争；要有“正确的罢工策略”；要采取争取群众的政策。^①项英认为，决议案的这些精神，在职工运动中都应当很好加以贯彻。

同年11月9日，项英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提议就贯彻“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发两个文件：一个是着重讲清在职工运动中如何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一个是讲清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与党团组织的关系，得到了到会同志的赞同。会议确定由项英组织办理。

三天以后，即11月12日，中共中央就职工运动的策略发出了通告。这个由项英主持制发的通告，明确地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是征得群众的最好方法。“切合于工人的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有计划的发动，是最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发动广大的斗争”。第二，要运用正确的罢工策略。这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罢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第220、221页。

策略，斗争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要求党领导“每一罢工时对于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与适宜，主观力量是否具备，罢工条件是否切合于群众要求，罢工时间的决定，罢工组织与群众关系都要有正确的估定”，“如在敌人严厉进攻与群众斗争情绪下降，这种情势之下，微小的胜利也应当结束”，这就是要适可而止。第三，正确的斗争口号是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条件。“口号的选定，必定是群众最主要最迫切的要求”。第四，要选择时机。“不会利用时机，就是发动起来也要失败”^①。

以上各点，是项英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当时和后来看都是正确的。但通告对群众的组织形式，强调要建立工厂委员会和赤色工会，并提出“赤色工会力求公开”，则又是脱离当时实际的，是“左”的影响的反映。

同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项英主持制发的关于职工运动问题的第十九号通告。它对职工运动的意义，对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以及与各级党、团组织的关系，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个通告强调指出：“职工运动是党的最主要的群众运动，

^① 《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36—137页。

是党的基本的群众工作，党必须以全力来发展这种工作，只有这种工作的发展，才能坚强党的阶级基础，才能树立无产阶级在一切劳苦群众中的领导地位”^①。

上述对贯彻“六大”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的两个文件，是项英根据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个人的实践经验和参与决议案反复研究的体会而形成的，因而它是基本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在那个时候也难于摆脱一些“左”的影响。

同年11月，项英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理论的指导，交流实践经验，经党中央批准，恢复《中国工人》刊物的出版，由他与沧海（罗章龙笔名）、石溪（即林育南）一起组成编委会^②。

当项英返回上海后，得知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的工人吴同根惨遭法国兵刺死，法电工人正在酝酿举行罢工的情况后，建议抓住这个时机，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为死难的工友申冤，反对开除工人，提高工人的待遇，以此来推动江苏和上海的工作。党中央及职工运动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第454页。

②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56页。

委员会对此都非常重视，作了专门研究^①。

同年11月20日，项英在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上宣布，要集中中央及江苏的党、团、工会的力量来指挥这次斗争，成立了由李富春为主席的江苏省行动委员会。12月3日，上海法电工人举行罢工，要求为死难工友申冤、承认工会合法、改善工人待遇、缩短工时。随后，党中央为加强法电罢工的领导，派项英指导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

就在这时，党内发生了江苏省委的问题。项英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还在当年10月，项英正从苏联回国途中，党中央领导在研究江苏省委的组成时，考虑到江苏位置重要，确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委同意中央的工作路线，但反对中央派人去担任省委书记，认为江苏也有工人同志，也有新的精神，而罗登贤是广东人，对江苏情况不熟悉，语言不通，工作难以开展。江苏省委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要求江苏省委再作讨论，在最后决定前，由徐锡根担任书记。江苏省委开会讨论时，表示接受罗登贤到江苏工作；同时希望中央不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3期第19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

要将此事扩大，不要说他们拒绝。为了加强对江苏工作的指导，中央政治局于11月20日决定成立两个巡视委员会：一个由周恩来、罗迈（即李维汉）、赵容（即康生）、李子芬组成，巡视上海党的工作；另一个由项英、罗登贤、王灼、王克全组成，巡视上海工运^①。

项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迅速作了研究安排，着手对上海工运进行巡视工作。他在后来谈起这次巡视时曾讲道：“在1928年12月间，曾举行上海工作的下级巡视，由全总分派工作人员到市政、交通、运输、纱厂、丝厂、重要手工业及店员工会中，实际考察工会及群众情形，参加讨论问题和决定，随时予以指导和纠正其错误，使工作路线更能正确，工作更能发展。”^②看来，项英当时对这次巡视是满意的。

1929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正式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向忠发认为，江苏过去同志是很努力的，但不够，工作仍未建立起来，中央兼省委后，有些同志可分配到重要区域工作，加强区委的力量，使上海成为一个很好的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3期第19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

②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58页。

模范来指导全国工作。向忠发的意见，与会的多数政治局委员表示赞同，唯项英不赞成。他认为，中央本身的工作尚不能很好的应付，如果中央只注意江苏的工作，便不能更好地注意其他各省的工作，就会顾此失彼，因此，他建议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问题应慎重考虑^①。

项英所以能大胆提出与总书记向忠发的不同意见，一是他有在江苏省委、上海市总工会和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实践，有切身的感受；二是他在武汉搞工人运动时，曾同向忠发共过事，知道此人的底细。项英这种敢于提出与总书记相反意见的精神，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由向忠发、项英、李立三、徐锡根、赵容、罗迈、李子芬等七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向忠发任主席，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问题，制订一个执行的精密计划^②。

中央兼江苏省委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于1月6日讨论后函告中央，要求中央将决定兼

①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58页。

② 同上。

省委及组织特别委员会的理由正式书面通知省委^①。

同年1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项英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办法不妥。他强调指出，省委的工作很实际，与各方面接触面广量大，会直接影响到保密工作，如果中央机关被破坏，那就会影响到全党；同时，中央用很大的力量对江苏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就会影响对全党工作的指导。但向忠发、李立三等其他与会者，还是认为由中央兼省委是较好的办法^②。

就在这时，赴天津解决顺直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回到上海，在听到中央兼江苏省委的消息后，也认为应慎重考虑，表示不同意，要求向忠发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在1月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江苏的工作状况，说明了中央不宜兼江苏省委的理由，提出解决江苏问题可以用改组省委的方法进行。随着情况的变化，在14日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李立三也同意中央不兼江苏省委，要改组江苏省委，并正式通过了中央不兼江苏省委的决议^③。

同年1月16日，项英与向忠发、周恩来一起出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3期第1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席江苏省委会议，耐心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随后，项英还和周恩来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进行耐心的教育，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要很好地接受教训。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后，江苏省委于19日开会通过决议，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至此，江苏省委的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①。

项英参与解决江苏省委问题的过程，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对全局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内部矛盾问题的能力。

同年2月17日至20日，项英在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听取了苏兆征关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会议的报告，文虎关于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三次会议的报告，项英作了关于《过去一年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的报告^②。

项英在报告中，用大量史料分析了自1928年2月第一次扩大会议以来一年间工人运动的形势。首先，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工人阶级生活悲惨的状况。指出：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与帝

① 同上，第20页；《周恩来传》第187页。

②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53页。

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联合，继续向工人阶级进攻，屠杀、拘捕工人领袖和骨干，仅1928年1月至8月被屠杀的工农就达十万人，革命工会被封闭殆尽。工人阶级的生活一天一天恶化，例如：工资普遍减低，武汉十分之九的工人工资较“四·一二”事变前降低了；劳动时间加长，一般产业工人在十小时以上，店员达十二小时；待遇恶化，女工原来争到的产前产后一个月的休息被取消了，童工和成人一样要求，包工头的盘剥加重了；失业增多，失业恐慌加剧^①。

项英在报告中指出：“全国工人阶级，在过去虽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对于反动势力进攻的反抗，还是不断的发生。在最近一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形，已逐渐向前发展，表现复兴的形势。”他列举了当时全国有影响的罢工斗争，如上海两千五百名邮务工人于1928年10月举行的大罢工；上海法商水电公司职工于12月举行的大罢工；汉口八千名工人于1929年1月举行的反日大罢工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的罢工，都是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排除了国民党及反动工贼的干扰破坏后胜利举行的。他还指出，赤色工会的组织基础薄弱，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9—16页。

团结联系工人群众少，注意工人切身经济利益的争取不够，在斗争中不能正确的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斗争口号过高过多，都应当很好地加以改进^①。

项英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其他报告、决议，均刊登在复刊后的《中国工人》第八期上。

中华全国总工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接受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会议作出的《关于中国黄色工会的决议案》，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然而，把黄色工会同国民党的反动工会不加区别，一律看作是敌人，这就使工人运动从实践中摸索到的正确方向又逆转了^②。

同年6月25日至30日，党中央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着重检查“六大”后一年来的工作。项英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③。《职工运动决议案》指出：从1928年5月至1929年6月，全国工人罢工的斗争就有两百次以上，“斗争的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85页。

② 《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第139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第152页。

内容已由经济的斗争逐渐进到政治斗争，争自由的斗争为工人斗争中的中心问题。”决议提出要做好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在一个政治的群众运动中，必须注意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动，使之互相联系，才能增加群众斗争的力量，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决议要求多做争取群众的工作，“积极的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下层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斗争，夺取广大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之下，驱逐黄色领袖，逐渐转变到赤色工会领导的工会。”^①这些都是正确的。但这个决议案在形势分析中也出现了“左”的苗头，对形势估计得不准，对“左”的做法过于肯定。其实，机械地借纪念周年搞游行示威或政治罢工，导致敌人镇压的教训，应当很好记取，而不应作为成功的经验来肯定和推广的。

同年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原有干部的素质，培养大批新干部，开始举办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军事干部训练班，每期学员三十多人，时间三个月左右；政治干部训练班，每期学员二十人左右，时间一个月左右。项英曾给这两个班的学员讲过革命形势和任务等方面内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五）第274、285、287、275页。

的课。经过培训的军事干部大部派往苏区担任领导工作，政治干部派往各地开展革命斗争。后来担任红军高级将领的许光达、蔡申熙等，在军事干部训练班第一、第二期学习时都听过项英的讲课^①。

同年8月29日，项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李立三、周恩来、关向应等一起，听取陈毅关于红军历史及其现状的汇报。项英在讨论发言时，称赞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领导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赞同周恩来提出的对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②。这是项英同陈毅的第一次接触，他对陈毅爽朗的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作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开头说：“我们在分析了最近一年来的中国罢工运动以后，认为有完全的根据，来说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是正在增长起来。”这就对刚恢复起来的中国工人运动，错误地估计为新高潮的到来^③。这个“决议”对中国

① 《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第43—45页。

② 《周恩来传》第195页；《陈毅传》第107页。

③ 《中国职工运动史教材简编》第141页。

工人运动作出如下几点指示：第一，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必须立刻实行一个转变”，“现在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发展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同时，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应坚决地开展斗争，“来反对党内那些轻视党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作的轻视态度”；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加入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是去争取这些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以便消灭这些工会。”第三，“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使赤色工会公开起来的问题”^①。

项英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拥护的，对当时职工运动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与“决议”基本是一致的。这个“决议”和随后的贯彻，对中国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再次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②。

同年11月7日至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区的海员、铁路等产业工人代表共二十九人。项英在大会上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

① 《中国职工运动史教材简编》第141页。

② 同上。

《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和工会组织问题、黄色工会问题等文件，对当时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贯彻了共产国际“左”的各项要求。

项英在大会总结中，强调：第一，要加强工人斗争的领导，“在斗争中积极扩大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第二，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立，“有组织才有力量，有健全广大的组织才能表现斗争的力量，斗争才有胜利的可能。”第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揭破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欺骗阴谋。为此，要把复刊的《中国工人》和《劳动周刊》办好，还准备编印一些小册子。第四，要贯彻深入基层的工作路线，“到工厂、作坊去”，全总要经常派人下去巡视指导^①。项英所强调的上述问题，作为一般工作要求，看来还是对头的。

这次大会产生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在第一次执委会上，化名为“江俊”的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②。

项英从学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共产党的创造。

①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 254、255、256、258 页。

② 同上。

同年11月，项英参与了中央对陈独秀反党活动的处理。鉴于陈独秀坚持错误，攻击党的“六大”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成立托派小组进行反党活动，中央政治局于15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①。项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明朗，认为：只有把反对党的路线的党员清除出去，党的组织才能巩固统一，也才能有战斗力。

同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李维汉、李富春、陈云、何孟雄、李硕勋等开会，听取通海特委负责人李超时、石钧（即刘瑞龙）关于通海如泰地区游击运动情况的汇报，周恩来、项英、李立三等中央常委应邀出席指导。他们称赞通海如泰地区人民开展的革命斗争，同意将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组为工农红军，确定调一批干部去加强领导。会后，将该地区改编的红军番号排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②。

同年12月14日，项英参与制定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正式发出。通告认为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五）第465页。

② 刘瑞龙：《回忆红十四军》。

来，要求赤色工会争取公开活动，反对黄色工会，表明“左”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然而尽管这样，共产国际远东局仍认为中共中央做得不够，仍不满意。当年12月初，远东局在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的情况下，就在通过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中央犯了右倾的错误。其中在赤色工会问题上有动摇是表现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开会讨论时，不同意远东局这个决议案，希望他们再作一个决议案加以纠正。项英在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发言时，认为“远东局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远东局对项英这句话非常恼火，要求中共中央解除项英的职务。中共中央考虑到同远东局的争执难以解决，于是派周恩来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①。

同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决议还指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的最严重的问题。必须依据国际第十次全

^① 《周恩来传》第212—213页。

体会议的精神与路线，继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①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议，是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尖锐批评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样，愈反右就愈助长“左”倾思想的发展。项英参与了这个决议的研究，表示同意。

到1930年，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党中央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举行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5月22日，党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文件中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震动全世界，引起全世界革命运动爆发，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可能。中国革命，将要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中取得完全的胜利。”^②党中央上述贯彻“左”倾观点和“左”倾政策的文件，项英都是参与研究，并表示赞成的。

项英对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左”倾思想、“左”倾政策，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中积极加以贯彻。同年2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给各级工会的信中，要求各地工会在巴黎公社纪念日——3月18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纪念日——3月21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五）第523、528—529页。

② 同上书（六），第68页。

日，要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以鼓起群众之革命热情，促进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3月1日，总工会在安排红五月的工作时，提出要准备“五一”在全国举行总罢工和广大群众示威运动。结果，上海工人、学生在4月和“五一”举行集会、罢工和示威时遭到了镇压，有一些工人和学生被捕。武汉、天津等城市也在“五一”举行示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

问题在于，此时项英由于政治水平所限，经验不足，长期受共产国际“左”倾路线和“左”的政策的影响，看不清“左”倾思想和行动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八 准备武汉暴动

1930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有党员十二万多人，青年群众组织、赤色工会会员、农民群众组织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工农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约十万人，建立了包括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湘赣、左右江、苏北等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于当年5月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三方动用的兵力达一百多万，用于对付红军的兵力自然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

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错误地估量了形势，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使党内原来就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同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当时中国形势，“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决议指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决议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① 这就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第87页。

的“立三路线”。

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由于受“左”的影响，对6月11日的决议和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计划的实施，认为是没有疑义的，投了赞成票。

同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长江办事处，由项英任书记^①。当月20日，中央和军委制定并发出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它根据党中央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地红军的任务是：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湘鄂赣边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②。

项英在参与制定这个计划时，对各地红军情况的了解是很少的，对他们完成任务的主观条件估计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过高，而对他们的客观困难则估计不足。

同年7月27日，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迅速占领长沙（十天后被迫退出）。这是工农红军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举行武汉的武装暴动与红军汇合夺取武汉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要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为全国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项英参加这次会议，参与了这个问题的决策。接着，“总行委”于6日正式成立。这个“总行委”，开始由14人、后扩大到22人组成，项英是成员之一^①。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重新组成长江局，由项英任书记，管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党的工作；成立长江局军事委员会，由刘伯承任书记，过去由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的湘、鄂、赣、川等地红军及士兵运动，均归长江局军委指挥^②。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52—153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8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派项英、刘伯承到武汉，项英担任长江总行委书记，由刘伯承协助项英策动武汉暴动；决定曾中生任南京暴动总指挥，要聂荣臻到镇江组织暴动，成功后进攻南京，尔后和攻打南昌、长沙的红军会师武汉。

8月6日，项英肩负着“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的重任到达武汉。

第二天，项英召开长江局第一次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分析形势，研究贯彻措施。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成立长江总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有关各部红军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各有关省区的武装暴动以及所属各省市党的工作。这次会议决定，湖北省委合并于长江总行委，湖北省和武汉三镇的工作归长江总行委直接领导^①。

在这次会议后，项英以湖北省总行委名义于8月13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写道：“最近中央更正确的指出，在目前形势之下，组织武汉武装暴动，是目前党的总路线。这是完全正确的。”“组织武汉武装暴动，成为目前湖北党的最迫切的任务”。通告要求湖

^① 《中共湖北组织史资料》第61页。

北党、团、工会组织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这一路线之下来个转变”，“坚决执行党的任务，争取武装暴动的胜利。”^①

8月8日夜，项英在到达武汉后的第三天，和关向应联名向党中央写了第一个长达六千多字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开始写道：

“我于6号抵此，次日即召集长江局会议，由我报告中央一切决议，经过详细讨论之后，全体一致认为中央对于全国革命总形势估量非常正确，完全同意中央组织武汉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并根据这一总路线来布置全部工作，成立总行委组织。”^②

项英报告中对当时武汉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叙述：红军占领长沙后，武汉统治阶级非常恐慌，晚上实行戒严；商人、苦力对此叫苦连天，气愤填膺；工人兴奋异常，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大干一下”；国民党军士兵在长沙事变后表示，一是红军来了大家跑；二是把枪交给他们好了。这些事例，“说明武汉工人

① 《中共湖北组织史资料》第61页。

② 报告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群众要求坚决斗争的情绪，的确武汉工人在目前对于经济斗争的要求反不如要求大干来得迫切。一般工人都认为，现在还谈什么加工价，要干就大干一下。这完全证明，中央对于革命形势发展的估量以及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十分正确，现在武汉工人群众毫无疑义的要求暴动的意识与坚决斗争的决心，表示十分明显，如果党有坚决的路线与策略，就能获得广大群众实行最坚决的阶级战争。”^①

项英在这个报告中写道：“武汉在目前形势之下，暴动条件在客观上更加成熟，尤其是事变的发展都有随时实现武装暴动的可能，中央决定目前在武汉坚决的组织武装暴动是万分正确，只有在这一坚决路线之下，才能抓住一切机会，才能获得广大工人及劳苦群众有武装暴动胜利。”^②这可看出，此时项英对武汉形势的了解多是表面的，对组织武汉暴动是过于乐观的。

当然，项英在这个报告中，也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了武汉当时所存在的严重困难：“武汉三镇迭经破坏，目前党员数量不过百余人，团员八十余人，……赤色工会组织更加严重，总共会员百余人（还包括一

① 报告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项英 1930 年 8 月 8 日报告抄件。

大半是党员)，支部生活极不健全，不能完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动员工作很不充分，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的决议至今还未发到下级组织，更谈不上讨论和贯彻；领导机构很不健全，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等等^①。

项英在报告中还写道：长江局已与湖北省委合并成立总行委，由江钧（项英）、西一（关向应）、诗圃（任弼时）、作霖（顾作霖）等组成，由江钧任书记并兼军委书记^②。

项英在到达武汉的最初几天，除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是听取汇报，了解熟悉情况，但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少。对此，他十分着急，认为是严重的问题”。^③

8月10日项英在第二次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对武汉的敌情及工作中的困难又继续作了反映，白色恐怖愈加厉害，从8月7日至10日的四天里，国民党当局就杀了四十一个人，而且在汉口六码头、武昌、汉阳门等地砍头示众；将川军陆续调到武汉，使驻武汉的部队增加到七个团、一个旅，加上保安队，

① 报告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同上。

③ 项英1930年8月10日报告抄件。

共约一万人；外县土豪劣绅聚集武汉，组织一个扭捆团，专门在街上抓人，从赤色区域调到武汉的干部很难存身，使长江局缺乏干部的困难更加突出，影响到许多工作无法落实^①。

然而，当时党中央并未接到项英的报告，对武汉是否存在首先胜利的条件不真正了解，就于8月10日指示长江局：“极猛烈的扩大组织，大批的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至少每个党员每日须介绍一个同志，同时每人须组织一个赤色先锋队，加紧工人群众的组织，特别加紧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罢工”，以加速武装暴动的成熟条件^②。

8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奔袭湖南省浏阳县东南文家市地区的国民党军，歼灭其第四路军第三纵队戴斗垣部三个团又一个营。胜利的消息传到武汉，项英受到很大鼓舞，准备在8月27日下午召开长江局会议讨论形势及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当天上午就把个人的考虑和想法向党中央写了报告。

项英在报告中提出，红二、六军主力应即向武汉

① 项英 1930 年 8 月 10 日报告抄件。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1985 年印，第 14 册第 479 页。

急进，以一部进攻岳州，将鄂西红军游击队编成红军，占领宜昌、沙市等地，使红二、六军主力减少西顾；常德红军应与红八、五军汇合，消灭何键全部反动势力；红三、四军转攻九江、南昌；鄂东北红一军第一、第二师立即扩大，向武汉进迫；汉川的游击队立即编成红军独立师，向汉口、汉阳进攻。要求各部迅速与武汉工人汇合，取得武汉暴动的胜利^①。

项英在这次报告中提到：最严重的是“目前武汉党的工作非常微弱”；工人武装的武器成问题，经费困难，缺军事人才，并催刘伯承速去^②。

就在这时，党中央对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计划正在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莫斯科于8月19日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全国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在22日和24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讨论，并已说服了李立三和向忠发，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认识了错误，遂即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的暴动计划^③。

① 江钧 1930 年 8 月 27 日报告抄件。

② 同上。

③ 《周恩来传》第 219—220 页。

刘伯承带着党中央关于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的精神，于9月2日抵达武汉。当天夜里，长江局举行会议，听取刘伯承传达中央新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在湘、鄂、赣、豫四省，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尤其是武汉党的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全武汉只有党员一百五十余人），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要求第一步应当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刘伯承在传达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后，还谈了自己对计划调整的意见。

项英在归纳会议讨论的看法时认为：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武汉的情况还不可能立即实行暴动，表示接受中央新的指示，按中央新的指示精神改变和调整工作部署。

刘伯承的到来，使项英感到欣慰，因为刘伯承的军事素养很高，他早有所闻，并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刘伯承来到武汉以后，在军事上就有了依靠，长江局军委书记就可以不再要他兼任了。然而，又给他带来新的不安。因为刘伯承

长期在川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任国民党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时曾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中许多人认识刘，武汉政界的许多人同刘打过交道，这给刘在长江局从事秘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项英考虑到刘伯承的实际情况，从关心刘的安全着想，只要刘在参谋部搞运筹决策，不让刘到外面活动，以防发生意外。

9月5日，项英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关向应调走后，长江局的组织领导更不健全，全盘工作更难兼顾了；干部缺乏，经费困难，对工作的开展影响很大；武汉党的工作恢复很差，许多支部没有建立起来，有些支部有其名而无其实，说明武汉暴动的力量离客观需要还相差很远^①。

项英在这次报告中还提到，听说中央最近要召开会议，请求中央允许他去参加。

9月上旬和中旬，项英和长江局连续接到党中央的三次指示。

在党中央9月1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指

^① 江钧 1930 年 9 月 5 日给中央报告复印件。

示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①

在党中央 9 月 4 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中，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指示》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的错误观念，“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②

在党中央 9 月 9 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中，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

① 《周恩来传》第 221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第 53、52 页。

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①

项英和长江局接到党中央的三次指示后，都及时召开会议，组织学习领会，联系武汉的实际情况，感到中央新的指示一针见血，十分正确，表示完全拥护，立即停止了原定武汉暴动的工作部署，把各项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项英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多次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作，以这一次的环境最险恶。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武汉叛徒满布，几乎不能外出，但为执行立三路线，只有冒险而行，最后因各种条件不够而未能举行暴动”。^②

项英在对中央关于停止武汉暴动的指示作了贯彻，安排长江局的工作后，按照党中央的通知，赴上海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项英这次奉命组织武汉暴动而到长江局工作，从抵达到离开，在武汉约四十天左右。

9月24日至28日，项英出席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上，传达学习了共产国际1930年7、8月间有

① 《周恩来传》第221页。

② 项英自传。

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决议案，检查并总结了六届二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确定了党的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批评了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李立三作了检讨，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①。

在会议期间，项英通过参加学习讨论，联系在武汉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指示是很正确的，他原来认为“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②的看法是错误的，并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完全拥护《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项英作了职工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职工运动议决案》，强调要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在全国重要产业中巩固和扩大赤色工会组织；同时，应加强对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运动的领导，要使工人斗争和农民战争汇合起来，从而推动苏维埃事业的发展。由于全会没有能从思想上、理论上对以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32—137页。

② 《周恩来传》第217页。

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彻底清理，因此项英本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观点的影响。

会议期间，项英根据在武汉亲身的感受，提请全会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领导机构的安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9月28日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敌人统治区域的中央局，长江局是最关重要的一个，中央政治局应尽可能使之得到安全的保障”。^①

这次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牺牲、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温裕成、罗迈（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等七名中央委员，补选了袁炳辉、朱德、林仲丹（林育英）、廖程云（陈云）、王克全、黄平、恽代英、陈潭秋等八名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十四人组成，其中正式委员七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七人：罗奕（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罗迈、顾顺章、毛泽东^②。

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项英去中央苏区工作。有关长江局对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由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第311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37页。

其他人去负责进行。

项英从1921年12月起,到1930年的九年间,在党的领导下,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情况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顽强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称赞项英是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①。当然,说他是英雄人物,并非讲他就是完美无缺,他也有缺点和不足。他由于受“左”的影响,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常常看到有利的方面多,看到困难的方面少;他有时情绪急躁,要求往往过高过急。还要看到,项英那时年轻,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只有三十岁,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时只有三十一岁,经验不足,加之受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以至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他当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就不奇怪了。

^①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65页。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和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农军，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会师后，以武装割据的形式，经过艰苦奋斗，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大革命实践中的产物，是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是工农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大搏斗的重要战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项英到中央苏区工作，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从推动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出发，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下来的。

早在1930年2月4日，党中央根据革命斗争胜利进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不断扩大的情况，发布第六十八号通告，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最早提出筹建全国苏维埃的任务^①。项英参与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决策。

同年5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项英参与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的组织和苏区的建设等问题，通过了《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政治任务》的决议等文件，指出：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会议确定由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来领导会议的准备工作^②。

同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总行委主席团在开会讨论全国工作部署时，周恩来提议：在苏区党中必须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群众的工作^③。

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5期第16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40—141页。

③ 《周恩来传》第220页。

广大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围，但在有些区域还没打通以前，暂仍归省委或长江局、南方局管，一俟打通，即立归苏维埃区中央局管。”^①

同年9月12日，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上海正式开幕。会议确定将中央准备委员会移至赤色区域内。会议选出正式的中央准备委员会委员二十五人。项英当时正在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和向忠发、毛泽东等九人一起，被推举为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②。

同年9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时，说明全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由二中全会时的约七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其中大多数在苏维埃区域等内容以后，强调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③周恩来对建立革命政府的问题，还讲道：以前“中央有过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

①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期第482—483页。

②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5期第18页。

③ 《周恩来传》第222页。

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①

项英参加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意见有所体会，就是说：要加强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机构，统一军事指挥，以便尽快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项英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认为这些确实都是需要的。

同年9月28日，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要特别注意苏维埃区域之党的工作”，“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②项英完全同意这些意见，投了赞成票。

① 《周恩来传》第2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第307、第311页，《六大以来》（下）第30、32页。

同年9月29日，项英参加了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说：“关于全国工作布置，在组织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①项英从参与讨论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加强苏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同年9月30日，项英出席了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根据红军的发展状况，需要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②。项英意识到，根据红军发展和苏维埃运动开展的形势，在苏维埃区域建立统一的军事领导已经为期不远了。

同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

① 《周恩来传》第223页。

② 同上。

英先去^①。

这就是说，从这时起，党中央就正式确定项英去中央苏区工作了。这使他想到，他将不再从事他所熟悉的白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工作，而将去学习和从事他不熟悉的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了；他将不再在中央领导机关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而将去一个地区主持全面工作了；特别是周恩来短期内难以到职工作，这就加重了他到苏区工作的艰巨性。

同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确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成立苏区军委，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周恩来、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③。这次会议，对项英到中央苏区的领导责任进一步明确了。

同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中指

① 《周恩来传》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191页。

出：六届三中全会已于9月底开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全会的决议，均将抄送你们；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等文件，望接到后切实讨论，迅速执行；“苏区中央局的组织，中央已派江钧同志前往主持，他到后对中央的一切决定当能有极详细的传达。”“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同志代书记。……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同志到达后再成立，目前一切军事政治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①这就是说，中央把派项英到中央苏区去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苏区中央局的主要职责等问题，均已正式通知了红一、红三军团的前委了。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关于苏维埃区域工作的指示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制定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项英通过参与这个计划的研究和制定，了解到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要求。其中规定，全国目前要发展和建立六大苏区：（一）“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二）湘西、鄂西；（三）鄂东北；（四）赣东北；（五）闽粤赣；（六）广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第399、403页。

西。这个计划还规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①

为什么要强调发展中央苏区呢？在稍后由项英主持制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对此作了具体说明：

1、土地革命的发展，加上已有广大群众基础或是已有这个条件能很快的发展起来的区域；

2、这个地方有强大的红军组织；

3、这个区域便利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②。

所有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加强中央苏区党的领导和军事工作领导，是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经过很久酝酿才定下来的；派项英到中央苏区工作，是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

项英在作赴中央苏区的准备过程中，对怀孕数月的夫人张亮作了安排。在那四个月后，即1931年3月，他的女儿在上海出生，取名苏云。

同年11月下旬，项英由中央机关的交通护送，从上海动身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69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21页。

此时，中央苏区包括赣西南、赣南、闽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由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辖红一、三两个军团，已发展到四万人，占当时全国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当年10月攻克赣西重镇吉安城以后，形成了以赣江中段、南段联成一片的广大赤色区域，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党中央派赴中央苏区工作的。

同年12月中旬，项英到达闽西苏区。他听取了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闽西特委军委书记张鼎丞等闽西领导人关于闽西苏区形成和发展状况以及当前情况的汇报，高度评价了闽西地区党组织和红军配合由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创建闽西苏区的业绩，赞扬了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加强中央苏区工作的措施。随后，项英在闽西苏区所派武装的护送下，去赣南同朱德、毛泽东会合。

这时，朱德、毛泽东正率领红一方面军在赣南宁都地区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当项英于12月底到达宁都地区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朱德、毛泽东会

合时，正是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向朱德、毛泽东祝贺胜利，称赞红军指战员打得好，对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有重要意义，并转达了党中央领导人对他们的问候。

在这之前，项英同毛泽东早有接触，多次一起参加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同朱德虽未见过面，但对朱德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曾留学德国和苏联早有所闻。他对毛泽东、朱德分别率领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后的情况，特别是通过听取陈毅1929年8、9月间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汇报，阅看陈毅所写的朱、毛红军情况的材料，参与中央政治局讨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朱德的领导艺术、革命胆略、革命精神有深刻的印象，对他们都很敬佩，并且为能和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而感到高兴。

1931年1月初，项英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结束后，同毛泽东、朱德交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特别是根据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发展的形势，确定建立苏区中央局以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军事指挥，并一起商量了如何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军委的问题。

对这一段情况，项英本人在《自传》中是这样记述的：

三中全会后，“中央派我到江西苏区，去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苏维埃中央，首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我为主席，并代理党的中央局书记。于是，于1930年11月入苏区，到12月底经福建苏区到江西，与朱、毛会合。这时，正是红军取得冲破第一次“围剿”，获得大胜利，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活捉。从此，我放弃了多年来的工会工作和白区秘密斗争，开始学习军事和苏维埃政府工作”^①。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国际代表米夫在讲话中批评三中全会“接受立三路线”，“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②。项英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在选举时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四中全会上不仅被补为

① 项英自传 1938 年 6 月。

② 《周恩来传》第 231 页。

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为政治局委员。

项英对立三路线开始是积极支持者，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没有从思想上认真纠正，他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自然是有一定责任的。后来，他也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信联络困难，中央苏区和党中央尚未建立电讯联系，所以项英不知道四中全会的召开和情况的变化，还继续按三中全会的决定办事。

同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建立。当天，项英签发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宣布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区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组成。对其职权范围和作用，《通告》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将来苏维埃区扩大的区域，仍归苏区中

央局管理”^①。中共红一方面军前委随即撤销。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②。

至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赋予项英组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在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就已经完成。然而，机构很不健全。当年7月8日《苏区中央局报告》上写道：对“中央局所指定的名单，除已在苏区的泽东、朱德二同志外，只有项英一人，……这个时候，河西（按：指赣江以西）交通未通，在总前委会上，决定赣西南曾山参加，又不在一起，连会都不能参加，朱德同志负责总司令部工作，只能参加会议，泽东同志后因总政治部建立，同时不能担任中央局的工作，事实上中央局做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组织、宣传在名义上都成立了，可是无人负责，也等于空名，因此，中央局虽成立了，但在组织上极不健全。”^③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22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79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1987年第4期第3页。

这些情况表明，项英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工作繁忙和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江西地方和红军中存在着肃反扩大化，还发生了富田事变的问题，认为需要尽快地加以处理。

项英当时除听取口头汇报外，最先接触到的材料之一，是1930年12月2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这封信中讲道：富田事变，“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其性质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①。项英认为这事关重大，对如此严重的“敌情”既感到惊讶，似乎又觉得不敢相信，有进一步搞清的必要。

项英通过调查研究，逐步搞清了富田事变的来龙去脉是：

在1930年10月攻克吉安后，红一方面军内部开始肃反、抓AB团。先是轻信敌人有关AB团的材料，于11月间将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扣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

押；接着又相信逼出来的供词，将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省行动委员会代理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均列为“AB团要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红十二军的一个连，于12月7日来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搞肃反，先将段良弼、李白芳和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等抓起来，接着进行审讯，边审边抓（至12月12日晚，共抓一百二十余人，并于11日处决了二十四人）^①。

同年12月9日，李韶九率领红十二军的一个排，捆绑着谢汉倡，前往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由于谢汉倡乱供，招出红军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敌去东固。刘敌接到通知，率该团第一营于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找刘敌谈话，点出刘敌有AB团的问题，刘敌在态度上故意软化李韶九，加之他们又是同乡关系，谈话后李韶九放刘敌回第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用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第4页。

日晨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貽商量对付办法。他们看到自己的战友惨遭不幸，自己也难以幸免，不满与恐慌情绪积聚，反抗情绪急增，于是紧急集合全营队伍，包围军部，捆绑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 AB 团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营救省行动委员会那些被诬为 AB 团的人员，谢汉倡、刘敌率第一营于当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 12 月 7 日至 12 日被捕的段良弼、李白芳等近百名人员^①。

随后，谢汉倡、刘敌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互相残杀的冲突，带着红二十军的部队西渡赣江，拉到湘赣边区永新一带去活动（该军部队随即缩编称第一七五团），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②。

这就是富田事变的大致过程。实际上，富田事变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第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领导红二十军一部反抗乱抓乱杀肃反扩大化的事件。它是被逼出来的。

项英在调查研究中，对不到四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中，竟抓了四千四百多个 AB 团分子，也就是说，在每九个红军指战员中，便有一个 AB 团分子，感到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7—8 页。

② 同上。

非常吃惊和痛心。他认为，我们搞革命，注意出身、成分是对的，但不能只讲出身、成分，而不问其斗争经历和表现；战争的频繁，斗争的复杂，保持革命警惕是应该的，重视肃清反革命，清除内奸，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哪有这么多的敌人呢？！肃反不能搞简单化，更不能搞扩大化。

项英对被扣押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的情况作了分析。李文林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是赣西南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①，怎么就随意将他怀疑为“重要 AB 团犯”而抓起来呢？！

项英从对抓 AB 团的情况分析中，意识到这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如不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会使许多经受革命战争严峻考验、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优秀干部遭到不幸，会把我们的工农红军搞垮，会把我们的苏维埃事业断送。

1931 年 1 月 16 日，即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二天，项英在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严肃地批评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同时，强调要“纠正过去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册第 91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反取消派 AB 团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没有从各方面考察，只有‘一打’的办法”，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对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无原则派别的纠纷，党是坚决与之斗争，从思想上及组织上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党日益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这个通告，为当时江西地方和红军中打 AB 团的问题讲了一些公道话，实际上是对总前委领导肃反扩大化的批评。

苏区中央局第二号公告的发布，使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有所震动，使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在这以后，项英围绕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对谢汉倡、刘敌将红二十军的队伍西渡赣江，拉到湘赣苏区永新一带的情况作了了解。他认为，谢汉倡、刘敌他们用兵变方式解决内部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拉到赣江以西也是不对的，但他们将误抓的中央特派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9—642 页。

员易尔士释放回总前委，派段良弼去党中央报告情况，还避免了红军互相残杀的可能；特别是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扩大人民武装，准备攻打吉安，这些做法都是对头的。还应看到，他们西渡赣江后没有任何一部分投降敌人，也没有和敌人任何一部分取得联系，而是向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介绍了富田事变的由来和经过。王怀认为，红二十军的行动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路线分歧。从此，红二十军便在中共赣西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①。这说明，红二十军仍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队伍。项英认为这是正确解决富田事变问题的很好的政治基础。

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通知中共赣西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要求他们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

同年2月19日，项英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中，明确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第8—9页。

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这个通告,既肯定了富田事变不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又批评了总前委反富田事变的过火斗争。

项英在对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以后,认为:总前委说李白芳等是 AB 团分子的证据不足,加上李韶九带兵到红二十军扣人,怎么不引起反抗呢?谢汉倡、刘敌带兵围攻省委,后又把队伍拉到赣江以西,提出反对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是错误的,但他们到湘赣苏区后还是同敌人作斗争的。错误双方都有。项英还认为,从有利于团结对敌的大局出发,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如果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次事件是可以解决好的^②。

同年 3 月 18 日,项英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作《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报告》中,又指出:“对富田事变的解决是中央局成立以来的一件大的工作,到底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② 同上。

解决得对不对呢？我说总的解决路线是正确的。……我认为用教育同志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认识清楚，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 AB 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①

基于上述认识，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后回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到赣江西把红二十军部队带到河东中央苏区来；另一方面，通知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和参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来开会，用党的会议的方法，分清是非，解决纠纷^②。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谢汉倡、刘敌、李白芳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王怀，相信项英和苏区中央局对解决党内纠纷的指示的正确性，完全按照苏区中央局指示的要求，于 4 月回到苏区中央局参加会议，作检查，接受党的教育^③。

这样，从苏区中央局于 1 月成立到中央代表团在 4 月到达中央苏区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由于项英对江西地方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批评和处理，使赣西南地区地方和红军中肃 AB 团的活动停顿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6 期第 7 页。

② 同上刊，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

③ 同上。

了下来^①。这是项英长期被埋没的一个历史功绩。

哪知，风云突变。王明上台以后的党中央，对富田事变不作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便不同意项英关于富田事变的看法及处理意见。2月23日，《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中说：“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就这样，王明上台以后的党中央，根本不承认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也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和正确的处理意见，同时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坚持按敌我矛盾处理^②。

① 同①。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74—75页。

项英此时尽管思想不通，但他参与通过的“六大”党章中规定的组织原则，在他耳边回荡，使他在组织上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

王明上台以后的党中央，从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出发，向各地派出大批中央代表。其中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①于4月16日到达江西宁都的青塘^②。代表团成员定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同年4月17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这次会议是3月18日至21日由项英主持的前一段会议的继续，当时讨论了接受共产国际来信、土地问题、富田事变、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问题，但因等待中央指示，没有形成决议，暂时休会。在继续召开的会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及代表团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会议只开了一天，没有展开讨论，就按中央代表团的意见，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 《黎明与晚霞》第1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

决议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共青团工作的决议》等五项决议，表示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及全会后中央的一切工作。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①。

在《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指出：“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他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这个决议，从政治上、组织上否定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自然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也被认为是错误的^②。

在会议通过的中央代表团早已写好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地说：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一部分拥护

① 《江西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第 87 页。

② 《江西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第 87 页。

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批评项英“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这个决议凭苦打成招的口供，把段良弼、金万邦、李白芳、谢汉倡等，一律定为“AB 团要犯”^①。

在会上，具有“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使命的中央代表团，拒不采纳项英对处理富田事变的正确意见，认为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和用解决党内矛盾方法的主张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②。这样，项英关于正确处理富田事变的愿望就成为泡影了。

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苏区重大问题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手中，项英已不能再履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责了。

接着，按照中央代表团的决定，把回中央局参加会议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的谢汉倡、刘敌、李白芳等，不分青红皂白，就以“AB 团头子”的罪名重新抓了起来，把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作为 AB 团暴动的“同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

② 《任弼时传》第 210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伙”也抓了起来，刑讯逼供，举行公审，宣布他们的“罪行”，先后予以杀害^①。

随着中央代表团对项英的所谓“右倾错误”的批判，赣西南地方和红军中肃 AB 团的斗争又急剧升温。后来，1932 年 5 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说：那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 AB 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 AB 团”，“所有 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②

原来在永新一带活动的红二十军，由于其政委曾炳春根据项英和中央局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加之不知道情况的变化，于 1931 年 5 月间仍按原计划渡赣江东返中央苏区，途经南康县的唐江镇时，还消灭了南康县的靖卫团。然而，当红二十军于 7 月到达于都县平头寨时，新的苏区中央局将他们改编了，把士兵分到红四军和红三军团，把连 AB 团是何物都不了解的该部副排长以上干部均作为 AB 团骨干分子缴械关押，并大部杀害，就连为教育红二十军做了大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

② 同上刊，1990 年第 6 期第 11 页。

量工作的政委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萧太朋均未能幸免。在浴血奋斗中成长起来的红二十军领导人和各级的骨干，就这样被消灭了^①。这在红军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悲剧。

项英对富田事变的结局十分痛心，对中央代表团的处理不服。表示：在组织上，我服从，但保留我的意见；把赣西南党的领导人之一，对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创建有重要贡献的李文林等说成是 AB 团的要犯，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苏区中央局原来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慎重的，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做出的。

遗憾的是，项英这些正确意见，中央代表团成员当时听不进去，使打 AB 团的错误活动得以继续蔓延。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以后，打 AB 团发生乱打乱杀现象愈来愈严重，赣西南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处决、或被监禁、或被停止工作，在红军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②。

1931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听取欧阳钦关于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26 页，《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江西社会科学》1980 年第 1 期第 83 页。

② 《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

中央苏区的情况汇报后，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反 AB 团斗争中的错误，指出：“你们对 AB 团的斗争，一方面是将它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将 AB 团扩大化了”^①。根据中央上述指示精神，苏区中央局于 12 月 5 日在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承认把 AB 团的斗争简单化，形成了肃反中心论^②。

1932 年 1 月 7 日，在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就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指出：“因为过去对 AB 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 AB 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 AB 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 AB 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人，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 AB 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去乱打 AB 团”^③。

这个决议又指出，“党内对 AB 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实有它思想的来源。主要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 370 页。

② 《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5 期第 9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 16 页。

是没有对于自己阶级的坚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而相信 AB 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密，还要扩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 AB 团是肃清不了的。……这是基本认识上的错误。”肃反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们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①

这个决议还指出，“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②

项英参加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的研究和通过，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决议

① 《中共中央文选集》（七），第 17—18 页。

② 同上书，第 19 页。

案》采纳了他的许多正确意见，说出了一年多来他在这方面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

同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专门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指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严重问题，同时指出其个人品德上的错误，决定给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①。对李韶九的处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呼声，是正确战胜错误的一种表现。项英参与了对李韶九错误处理的研究。对决议表示完全赞同。

1982年，在那五十年以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当年肃反的亲历者、曾任红四军师长的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一文中，讲到富田事变的处理过程，说：

“富田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红一方面总前委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7期第3页。

认为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当时总前委的文件、布告，几乎都是这样讲的。第二阶段，是项英到苏区，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建立苏区中央局，逐步采取党内解决的办法。当时中央局认为：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中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够肯定说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暴动，更不能有事实来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 AB 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已是自觉的与 AB 团、取消派取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另一方面，中央局也严厉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说他们的作法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行为，是‘反党的行为’。我看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局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也接受了项英同志的批评，遵照中央局的指示，到河东来开会，作检查，请党教育。但是，到了第三阶段，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了中央苏区，他们根据四中全会所组成的政治局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是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把遵命到

中央局开会的人抓起来，先后杀害。7月间，又在于都平头寨将遵命东调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的干部抓了，部队解散了，据原红二十军副官长谢向晃同志回忆，这一次抓AB团是相当厉害的，他是幸存者，是杨至诚把他保下来的。”^①

萧克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到对项英正确处理富田事变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

在那六十年以后，即199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及打AB团的处理问题作了专门叙述，写道：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将红二十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项英的苏区中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第5页。

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也被撤销。”^{3①}

以上叙述，讲清了历史真相，澄清了是非，证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的。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项英进入中央苏区，肩负着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重任。正如他签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所说的：“有第一等的重要的意义，是对于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建立全国苏维埃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真正在政治上、军事上最坚强的铁的红军”^②。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

当时，国民党军接连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军的反“围剿”作战紧张、频繁。项英便以主要的精力，参与领导反“围剿”作战上。这也是为“一苏大”的召开进行最实际的准备。

1931年2月，面对国民党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的严峻形势，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多次召开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经过充分讨论，逐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306—307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20页。

步统一了思想，确定继续采取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来领导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

同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在项英的主持和领导下，把中央苏区划分为十个游击区，并规定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红军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①。

同年3月，在第二次反“围剿”前，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动员广大群众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紧急通告，指出：在敌人的进攻快要到来前，我们要动员党内外群众，一致行动，加强反“围剿”的准备，全力对付敌人的进攻，使敌人的企图完全归于失败。通告要求地方武装加强警戒，袭扰敌人，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通告对坚壁清野、宣传、交通、侦察等问题，提出了要求^②。它对于动员群众配合红军作战，起着积极作用。

同年4月1日起，国民党二十万大军，运用“稳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战史分册第57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77页。

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从江西省吉安到福建省建宁东西八百里的战线上，开始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围剿”。红军主力按预定计划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准备将敌引到苏区内，各个击破，并求歼其一部。对于朱德、毛泽东这一作战部署，项英是支持的。

同年4月17日，项英同朱德、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通令，指出：在反“围剿”作战中，地方武装、赤卫队、少先队等，要作群众斗争的核心，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和“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活动方法，坚持原地斗争。由于各地方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等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阻击、袭扰进犯的国民党军，打击豪绅地主政权和其反动武装，使国民党军的进展迟缓，被搞得疲惫不堪，保证了红军主力的隐蔽集结，为反击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①。

同年5月中旬，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大举反击，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等地大量歼敌，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范围进一步扩大。

中共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提出“以

^①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条目。

毛代项”的意见^①，调整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领导成员。项英很快改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②。毛泽东先于当年6月任军委主席^③，后于10月被中央正式批准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④。

同年5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留在龙冈，负责地方工作；另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红军作战。从这时起，项英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为“一苏大”的召开全力进行准备。

同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表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宣言，确定在当年8月1日召开“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劳动群众积极拥护全苏大会，认真选出代表参加会议^⑤。

所以确定在8月1日召开“一苏大”，主要是为了纪念南昌武装起义。因为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① 《任弼时传》第220页。

② 1990年6月12日，郭化若同志谈话记录（回答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的问题，笔者在场）。

③ 《六大以来》（上）第141页。

④ 《任弼时传》第221页。

⑤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5期第19页。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当时苏区中央局对召开“一苏大”的安排，和党中央的要求是相符合的。6月16日，《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明确要求：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①。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要求“江西中央苏区至迟在八一以前必须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②。这可看出，党中央当时对尽快召开“一苏大”催促甚紧。然而，由于各苏区地处战争环境，联络困难，交通不便，工作进行需要时间，加之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又即将进行，因此，召开“一苏大”的日期不得不再推迟。

同年6月20日，项英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与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一起，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311、313、327、335页。

② 同上。

通令。指出：原定8月1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现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之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俄国十月革命节（11月7日）举行，各地代表应在10月15日前选举完毕，听候通知出席^①。

“一苏大”的准备是在上海和中央苏区同时进行的。在上海，党中央对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提出原则要点或决议草案，确定临时中央政府及军委领导人名单，还对中央苏区报去的草案进行审查批示”；在中央苏区，具体负责会议筹备，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会议文件和有关法令，研究机构设置和会议安排，以及接待有关事宜。项英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把当时对他的批判抛在一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全力以赴地忙碌着。在他的心目中，要通过把会议筹备好，开好，以鼓舞来自全国各苏维埃地区的代表，推动苏维埃运动更快更好地开展。

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

^① 《六大以来》（上）第141页。

紧急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在11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① 党中央的指示，给项英领导“一苏大”的准备带来一些“压力”。

这时，红一方面军于7—9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接着，红军又乘胜发展，巩固和扩大苏区。至当年年底，中央苏区已发展到二十一个县，其中包括赣南十一个县，闽西十个县，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成为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②。“一苏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形势下召开的。

项英为保证“一苏大”的胜利召开，领导会务的筹备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为选定会址就费了一番周折。当时确定在瑞金城，这个有数千人居住的小城镇固然有不少房子，但却找不到能容纳坐上千人的会场，同时还耽心国民党军派飞机轰炸破坏，故另选在瑞金以北约五公里的较为隐蔽的叶坪村。这个村有个祠堂，安放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438页。

② 《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60页。

叶氏祖先的灵位，是叶氏家族的祭坛，地方大、宽敞，如能腾出来，稍加修缮，作为上千人坐的会场倒很合适。项英和筹备人员，为了不伤害叶姓群众的感情，就和他们商量另建一所房子，作为安置叶氏祖先灵位和叶氏家族祭坛之用，叶姓群众通情达理，觉得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均表示同意。随后，红军指战员和叶姓群众一起，将灵位和祭坛细心地移到新建的房子里。这样，叶氏祠堂在修缮后就成为“一苏大”的会址，并成为尔后苏维埃中央党政军机关集会的重要场所^①。

其次，对出席会议的代表进行详细登记。到会的六百多位代表，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遍布全国苏维埃区域，还有不少是来自白色恐怖的地区，甚至来自朝鲜；有工人、农民、妇女、红军指战员，有教授、医生、演员等各业劳动者的代表；”年龄多数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年人，还有十多岁的少先队员；他们通过多道封锁线，翻山越岭，有的步行三十多天，才来到瑞金。项英和筹备人员，为了弄清代表的情况，便于相互介绍和认识，同时防止

① 史沫特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87年6月第55—56页。

敌人的奸细混入，对代表进行了认真的登记^①。

第三，安排代表的食宿。他们被分散安排住在叶坪附近的村庄，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就餐。鉴于当时气候渐凉，有些代表所带衣服少，经项英提议，会议给每位代表制做了一套棉衣、一顶绿色的缀着一颗红星的帽子、两双短袜和一双布鞋。^②

第四，拟订会议的安排。项英考虑到，会议要讨论的内容很多，需要加以区分、排列；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单位的代表，以及重要地区的代表，需要安排在大会上发言；为了振奋来自全国各苏区代表的精神，展示红军的英姿，要组织红军部队检阅；苏区文艺团体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排练了不少节目，许多基层单位和群众表示要隆重庆祝大会的召开，都需要作出具体的筹划和安排。

项英认为，这些会务的准备是具体的，却是开好“一苏大”不可缺少的。因而，他和具体筹备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安排，或到现地察看。中华苏维埃共

① 史沫特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载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87年6月第55—56页。

② 同上。

和国的即将诞生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即将建立，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

在“一苏大”开幕前，即11月1日至5日，项英出席了在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中央局作的政治报告，就贯彻中央8月30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在根据地、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会议通过了由王稼祥、任弼时起草的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等决议案。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对红军的领导^①。但尽管如此，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仍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

在赣南会议期间，项英将“一苏大”会议的准备情况向苏区中央局和各地代表作了汇报。大家对会议的准备都表示满意，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准备得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85页；《任弼时传》第222—225页；《毛泽东年谱》（上）第359页。

这样好，是不容易的。项英还建议，对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发展苏维埃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红军部队及其领袖，应授予特制的旗帜和徽章，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和奖励^①。他的提议，得到中央局成员和到会同志的热烈赞同。

同年11月7日，项英盼望已久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纪念日。把“一苏大”放在这一天召开，一方面是对苏联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表示庆祝和纪念；另一方面是表示中国要以苏联为榜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苏大”的会场被装饰一新，布置得隆重、庄严、醒目，墙上悬挂着绣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标，在两边的柱子上挂着“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条幅，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大幅标语^②。

大会由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开幕，代表们首先齐唱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31页。

② 史沫特莱文章。

人！”的《国际歌》，红军指战员又唱起了红军中最流行的“同志们，扛起枪！同志们，炮上膛！……为自由而战，为苏维埃而战，反对反革命，打倒国民党！”的战斗歌曲。会场的情绪活跃，气氛热烈。大会选出了三十七名主席团成员，项英是成员之一。他还和周以栗、曾山、朱德、张鼎丞、陈正人、邓发当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在大会上，项英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他对来自各苏区和各地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赞颂了当时的大好革命形势，指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他祝贺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胜利召开。毛泽东、朱德等也在大会上致词祝贺。

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阅兵典礼。红军警卫分队向空中鸣枪致敬，祝贺“一苏大”的胜利召开，并对各地代表表示欢迎之意。红军指战员排列着整齐的队列，迈着矫健的步伐，接受站在山坡上的代表们的检阅。项英和来自各地的代表一样，为红军的发展壮大而感到自豪，增强了加速苏维埃事业发展的信心。

在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项英和代表们一起，观看提灯晚会。从瑞金到叶坪，以及代表住地，到处张灯结彩，一队又一队的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兴高

采烈，燃放鞭炮，提着灯笼游行，庆祝“一苏大”的胜利召开，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等口号。文艺团体演出的革命戏剧，吸引了许多观众。

这次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的《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查处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这是中国工农代表最早通过的管理国家的一批法规性的文件^①。

这次会议通过的由中共临时中央起草的劳动法，在实践中发现其中许多条文，如规定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和节假日休息时间过多等，都脱离实际。项英后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讨论决定，作了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226页。

修改。

同年11月18日，项英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一起，鉴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对“一苏大”的召开情况很关注，就用大会主席团名义，向党中央报告了会议的初步情况。原文是：

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

苏大会已于十月革命节开幕，黎明举行阅兵典礼，晚间举行提灯庆祝。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于万众欢呼之中，正式开幕。计到会代表六百一十人。中央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各苏区均有代表出席。红军方面军一、三军团，二、六军，十六军，及各独立师，均选派代表出席。全总，海员，韩国均有代表到会。大会圆满的召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大会已热烈讨论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现正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知你们关心大会，特此电闻。

苏大会主席团^①

同年11月19日，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张鼎丞、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六十三人当选为委员。

同年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共历时十四天。项英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和新选出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分别致了闭幕词。项英说，经过到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已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希望各地区、各单位认真贯彻大会的各项决议，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运动而努力奋斗。

在大会闭幕式上，还举行了授旗、授章典礼。大会对工农红军第一、二、三、四、六、十、十二、十六军和第三军团，各授予特制旗帜一面；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各授予特制的徽章一枚。^②

大会为什么要向他们授旗、授章呢？《全苏大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七）第463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31页。。

的总结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一文中讲得好：“这是因为红军在革命战斗中艰苦作战、勇敢杀敌，各红军领袖也能正确的领导红军坚决的和国民党军阀作战，特别是最近打败了六十万白军的包围，巩固了赤色区域，保障苏维埃政权，这种功绩，是值得称扬与钦佩的，所以大会特授予徽章、旗帜奖励他们，使他们更加努力、更加坚决为工农群众奋斗。”^①

同年11月27日，项英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和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在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项英还兼劳动人民委员，并代理财政人民委员，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将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②。

同年12月1日，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①这个通告，向全国劳动人民正式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及其肩负的历史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给全国劳动人民革命带来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组织和动员了千百万群众参加建设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学会治国安民的一次重要实践，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早期尝试，为中华苏维埃革命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时期。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的法令、条例和决议，对当时发展苏维埃事业是有很大益处的，当然也包括了具有“左”倾特征的内容。项英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开始参加筹备到胜利举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由于项英为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美国友好人士尼姆·韦尔斯将项英和毛泽东、朱德称为“中华苏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33页。

维埃的三巨头”^①。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一苏大”以后，中共临时中央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强调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项英对中央“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看不清楚，在实践中是坚决贯彻的。

这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已于1931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四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在瑞金正式创刊。项英重视运用这个舆论阵地，亲自为这张报纸写了不少文章，宣传革命的胜利和革命的主张，其中有不少“左”的东西。这些文章，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和实践的记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不抵抗政策。项英于12月28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的文章。指出：日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工运史研究资料》（二）。

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三省以后，继续向锦州进攻；法国出兵广西、云南边境；英国指使藏兵进袭四川、西康；而美国在国际联盟活动，企图将锦州、天津划为国际共管区，等等，都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共同行动。

项英在文章中继续指出：“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宰割殖民地的分赃公司”、“国民党和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推翻反动的国民党统治。”

项英在文章中还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完成全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只有苏维埃的政府才能实际领导群众去完成这一任务。”

1932年1月6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1931年的总结与1932年的开始》的文章。指出，1931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世界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兴盛，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恐慌和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向法西斯化发展；在中国，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屈服，加深了中国殖民地的进程，工农革命斗争的结晶和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中国境内有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国家。这是项英对1931年国际、国内形势

变化的概括，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赞颂，同时对1932年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作了展望。

同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这之前，临时中央还要求中央苏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在研究后，决定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选择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之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①。

项英在参与研究攻打赣州时，并不认为临时中央的要求是脱离实际的，而认为是可能的，因而他是赞成攻打赣州的。

同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确定以红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要攻击力量，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据此，项英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配

^① 《周恩来年谱》第216页。

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支援前线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大批粮食用肩挑车拉运往前线，运输队、担架队纷纷向前线集中。然而，由于当时红军没有大炮等重火器，无法摧毁赣州守敌的坚固工事，加之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红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改变计划于3月初撤围。

中央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于1月15日和21日开幕。项英在1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祝贺，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的工农和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少先队是青年的工农群众先锋组织，青年工农群众是苏维埃运动中一支生力军。”

同年1月27日，项英为《红色中华》报撰写了《大大地向外发展积极地进行革命战争》的社论。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最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大大地向外发展，积极地进行革命战争，以苏维埃的发展和红军的胜利，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发展革命战争，就是要“以积极的进攻策略，去进攻敌人，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去争取江西一省或湘鄂赣三省的首先胜利。”项英在文章中阐述的观点，说明他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是积极贯彻执行。

同年2月1日，项英以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帝国主义大战致全国的通电》。指出：帝国主义正在瓜分中国，日本强占东三省后复向热河进攻，最近又武力占领上海，炮轰南京；法国占领云南、广西边境，英国出兵康藏，美、英正调兵开往上海。通电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组织义勇军，夺取国民党的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建立全中国的民众苏维埃政权。

同年2月7日，是“二七”惨案九周年纪念日。项英在2月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二七增刊》上，发表了他亲身经历的《“二七”事略》的文章。写道：“‘二七’是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争工会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惨遭军阀吴佩孚屠杀的大流血纪念日。”它详细介绍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和“二七”大罢工的过程，歌颂了共产党员林祥谦等与反动军警英勇斗争的业绩。写下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光辉历史，推动了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这篇文章，成为后人研究“二七”罢工历史的宝贵资料。

项英进到中央苏区后的一年多里，从参与领导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发展经济对红军作战的关系极大，没有给养，就难以作战，如让红军都由自己筹措给养，其本身的训练就会减少，对作战就会有妨碍。据此，项英在当年2月17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社论。指出：“目前为加强革命战争发展的力量，使革命战争更顺利地向前发展，积极地去准备充分的经济，就成为一个主要条件了。”“要使红军以充分的力量去执行当前的大大向外发展，积极进行革命战争，……那就要我们准备充分的经济来帮助红军，供给红军的给养，减少红军筹款的工作，使其无顾虑的顺利的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这是我们各级政府和广大工农群众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就是积极参加革命战争的一个很实际的工作。”项英在文章中要求苏区各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增产粮食，丰富红军的给养，解决红军必须的费用，同时号召“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约，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约，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来支援革命战争。

同年2月，红十二军在闽西作战，接连攻占武平、上杭两城，扩大了闽西的赤色区域。消息传到瑞

金，项英十分高兴，于3月9日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致函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指出：“上杭、武平已被我红十二军配合广大工农群众，在几天内全部占领，团匪钟绍葵全部击溃而逃窜广东，这是当目前发展革命战争开始时就取得这一极大胜利，在全国苏维埃的发展和胜利上，都有伟大的意义的。”^①

项英在致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指出：“上杭、武平两县的夺取，不仅开展并巩固了闽西苏维埃区域，而且使闽赣的联系愈更巩固了，特别是上杭城的夺取，它是闽西的一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占重要的地位，因此杭、武的占领不是暂时的性质，而是使它巩固起来成为闽西巩固的赤色区域，上杭城要使它成为赤色的中心城市，这是你们很重大的任务，必须以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项英在信里，要求闽西苏维埃政府采取措施，把上杭、武平建成巩固的苏维埃区域^②。

就在3月9日这一天，项英还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九次常会，就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努力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第11页，江西社会科学编辑部1981年9月印。

② 同上。

帮助红军的问题进行讨论，接着发出了第四号通令。指出：要发展革命战争，就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革命战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工农群众积极配合下取得的，因而不应忽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通令”批评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和平麻痹倾向，好像战争是在前方、与后方无关的错误观念，扩大红军与节省经济、蓄积粮食等工作做得不够，还发生浪费金钱及贪污舞弊的现象，要求各级政府积极地加以纠正。“通令”规定：地方各种收入除留用者外，应尽量上缴；政府工作人员应尽量减少，办公费用要照原来预算减少四分之一；打土豪收来的谷物，要以区、县为单位全部集中，送到前方；要动员群众多缴捐谷，同时要节省粮食，不要滥耗谷米，以帮助红军^①。

项英还在3月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反对对于革命战争的消极》的社论。指出：要使革命战争更快地向前发展，争取更大的胜利，不仅在于红军的勇敢作战，还在于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做好后方工作。他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纠正消极情绪，积极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以保障红军

^① 《红色中华》报第13期第6版，1931年3月9日。

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建立六十一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于汀州召开，选举张鼎丞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项英在3月16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第十次常会，认真讨论并通过了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这次大会的十点指示。着重指出：当时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正向前发展，必然要汇合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要努力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民族战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革命战争去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苏维埃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指示要求大会，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紧密联系福建的实际情况，贯彻全苏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路线和各项指示，并经常检查落实，使福建苏区有更大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信，对加强红色政权的领导，推动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战争、发展苏区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是在贯彻党中央的“进攻路线”的背景下提出的，是督促福建

^① 同上报，第15期。

军民为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服务的。

同年5月1日，项英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政治报告时，强调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实现发展革命战争任务的紧迫性，夺取沿赣江两岸的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要求各级苏维埃政权，应围绕着发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开展各项工作，扩大红军，巩固扩大苏维埃区域，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

项英的报告表明，苏区在巩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红色政权的领导在加强，这对推动发展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是有益的；但它旨在督促地方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革命首先在江西胜利，又是十分明显的。

同年6月21日，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各苏区努力扩大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的主力，从根本上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6月25日，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六号命令，

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朱德、邓发、邓子恢五人组成劳动与战争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席^①。

就在同年7月7日这一天，项英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研究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接着发出第十四号训令，指示各苏区立即成立红军补充团，以训练人员不断补充主力红军，并发动群众加入担架队、输送队、向导队、侦察队、破坏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等战斗战勤组织^②。

当年进入夏季以后，红一方面军先在粤北南雄重创进犯的粤军，接着在北线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消息传到瑞金，项英非常高兴。8月30日，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怎样配合红军的胜利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社论，指出：这些胜利，不仅是对国民党军的重大打击，而且是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为了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争取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他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提出六点要求：

(1) 要动员和领导地方武装展开积极进攻，与红军主力的行动相呼应。

① 《周恩来年谱》第222页，《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269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269页。

(2) 要在“到前线去”、“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加强红军的力量。

(3) 动员和征调大批干部，到新发展的地区工作，实行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

(4) 积极进行瓦解白军士兵的工作，削弱敌军的力量。

(5) 搞好苏区的征税和新区的筹款，以充实进行革命战争的经费。

(6) 要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帮助红军运输物资。

同年9月6日，是国际青年节。这一天，项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今年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战斗任务》的社论，号召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踊跃地到红军中去，增强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只有这样，才是实际的去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驱逐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同年9月13日，项英为《红色中华》报撰写了《猛烈扩大红军反对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的社论。认为：“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有彻底消灭阶级敌人的武装，才能取得阶级的最后胜利。”

而革命战争愈向前发展，同国民党的决战愈剧烈，扩大红军的工作就愈显得重要。他在社论中尖锐批评某些地方存在的对扩大红军的消极现象后，指出：“首先要了解目前是革命战争的时期，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战争。不断的大批输送新战士到前方强大红军，更是为争取战争胜利的实际工作，同时是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最中心工作之一。”社论还指出，要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就要加强宣传鼓动，使广大工农群众懂得不消灭敌人的武装，就不能保障革命已有的胜利，更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项英在社论中，反对忽视政治宣传、强迫命令的作法。指出：“强迫命令，不仅不能扩大红军，反而阻碍红军的扩大。”

同年9月30日，项英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五次常会，报告了他出席福建省苏维埃执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决议要求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应抓住主要问题，对各省、区苏维埃政府加以督促；福建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应加强巩固新苏区的工作，克服和平保守的现象、以战争为中心，来推动苏维埃建设的各项工作^①。

① 《红色中华》报第35期第3版。

同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一千余人举行毕业典礼。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致词祝贺,强调指出:工农红军是苏维埃的保卫者,是完成革命任务最主要的武装力量;红军要完成肩负的任务,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和新的军事技术;而经过政治和技术、战术训练的红军学校的学员赴各部队工作,对加强各地红军部队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要求学员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运用学到的本领,带领指战员,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的胜利^①。

同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根据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就红军反“围剿”作战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反对“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同志提出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②。10月

① 同上报,第36期第4版。

② 《周恩来年谱》第231、232、233页。

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① 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②。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在错综复杂因素的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对此是有错误的。

同年冬，国民党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10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就“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发出第十二号命令，要求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实行战争的紧急动员，来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要求：实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激发广大指战员和工农群众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战斗的热情，增强胜利的信心；红军各部队应根据作战方针和部署，以积极的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努力扩大红军，储备粮食，开发财源，打击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来支援红军；各军区要

① 《周恩来年谱》第231、232、233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231、232、233页。

组织赤卫军严密警戒，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确保交通干线的安全^①。

同年11月7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也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五周年。6日下午，在瑞金中央政府会场，举行庆祝会。驻瑞金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等单位的两百多位代表，出席了庆祝会。会议由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代部长何叔衡主持，到会代表高唱《国际歌》以后，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的报告^②。

项英在报告中，详细叙述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年来，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重大变化，特别是鄂豫皖、湘鄂西、陕甘、湘鄂赣、湘赣、赣东北等苏区和中央苏区的胜利发展，领导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巩固和壮大红军、进行土地改革、颁布和贯彻各种法令、执行财经政策、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他强调指出：“苏维埃中央在中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文件选编》第37—39页。

② 《红色中华》报第39期专刊。

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一年中行政方针的确立与实施，主要的是发展革命战争，开展苏维埃更大的胜利，来保障已取得的胜利，争取全中国工农的民族解放，因此一切工作是以战争为主体”^①。

项英在报告中对下一步任务，强调要围绕着以粉碎敌人“围剿”为重点，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各方面代表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临时中央政府在领导战争、积极进攻敌人、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要领导工农群众认真贯彻紧急动员令，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斗争^②。

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活动，在11月7日达到高潮。上午7时半，举行典礼。参加受阅的是红军学校学员、新编师、红军留守部队二千六百余人，瑞金县赤卫队、少先队、地方武装共五千余人，由瑞金卫戍司令叶剑英担任阅兵总指挥。检阅开始前，项英和各方面代表一起巡视全场一周，接着登上阅兵台。受阅的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队、少先队举行分列式，依次在阅兵台前通过，向领导人致敬，不时高呼“拥护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到底”、“苏维埃政权万岁”等口

① 《红色中华》报第39期专刊。

② 同上。

号。项英在台上为红军和赤卫队、少先队威武的英姿所鼓舞，带领台上人员呼喊“红军万岁”、“赤卫队万岁”、“少先队万岁”等口号，向受阅的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致意^①。

同年11月29日，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出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的文告。指出：据最近检查，各地执行紧急动员的工作不落实，主要是认识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一些人存在太平苟安，以为敌人还未来，仍然照老样工作；二是，边区一些地方惊慌失措，对革命缺乏自信心，存在失败情绪；三是，以为贯彻进攻策略单是红军的任务，坐等红军的胜利，忽视自己应做的工作，同时，忽视政治动员，采取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

《紧急决议》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反对空喊口号和不切实、不具体的做法，指出：这些现象在苏维埃政府中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决议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出：“一切工作要建筑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谁抛弃动员群众工作，谁就是脱离了群众。”“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觉悟

^① 《红色中华》报，第40期第2版。

与热情，来拥护法令的实施。”“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①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到中央苏区，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临时中央领导成员相继到达瑞金^②。从这时起，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包括军事、政治斗争和经济工作，都在临时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

项英对博古、张闻天、陈云等摆脱上海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安全地来到瑞金，表示欢迎。项英同博古、张闻天不熟悉，同陈云倒很熟悉。一方面，他俩同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他俩都是学徒出身，共同的语言很多。项英同陈云作了热情的交谈，简要介绍了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

不久，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任中央局书记。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苏区中央局的委员，很自然地参加了合并后的中共中央局的集体领导活动。

同年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

① 同上报，第43期第1版。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07页，《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2期第38—39页。

作战中，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基本歼灭，俘其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官兵一万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经验。捷报传到瑞金，项英十分高兴，立即参与研究以临时中央政府名义，给朱总司令、周恩来政委并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发去贺电，热烈祝贺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五十二师全部及五十九师大部，活捉敌军师长李明，俘人缴械各逾万、弹愈百万的胜利，表示：中央政府正在加紧动员全苏区群众，进行普遍的捐款借谷运动，来充实你们的给养，进行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来向你们增加生力军，猛烈地扩大赤卫军、少先队来配合你们作战，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争取更大的胜利^①。

项英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实际上是围绕着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进行的。尽管他把扩大苏区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紧密联系起来，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受“左”的影响，脱离客观实际，导致失败，这是深刻的教训。

^① 《红色中华》报第58期第2版。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的建设

1931年11月“一苏大”以后，由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当时大部分时间在前方领导红军作战，第二副主席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因而项英作为第一副主席，从这时起，到1933年5月前，实际领导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他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就把全力放在加速人民政权的建设上。

1931年11月28日，由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命令，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明确指出：“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①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

同年12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以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就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关的暂行程序发出训令。指出：“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坚决的迅速的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利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对于反革命的组织 and 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察逮捕和预审，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之后，以原告人资格，向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起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①随后，项英在批准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红军指战员中触及法律的，均由军事裁判所审理；在颁布的《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②

这表明，项英在人民政权成立之初，就强调依法办事，并根据实践的经验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完善。

同年12月18日，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地方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文章，指出：“没有健全的地方苏维埃，就不能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① 同上书，第380页。

② 同上书，第389页。

基础；没有强大工作能力的地方政权，就不能充分实施苏维埃的一切政纲，团结千百万工农和劳动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还指出，加强地方苏维埃建设是苏维埃的基本工作，当时应着重抓好两件事：第一，划分县、区行政区域，并规定区、乡苏维埃的管辖范围。这样，才能进行各级苏维埃的选举，也才能避免在分田中引起纠纷。第二，建立村、乡苏维埃，并使其发挥作用。项英指出，做好这两项工作，不仅要靠苏维埃工作人员努力，而且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使他们了解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意义，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这一建设运动。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使区、县、省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

项英抓地方苏维埃建设，是他在参与领导苏维埃运动过程中，重视打基础的工作，是从事治国安民的具体实践。

1932 年到来之初，项英根据江西上一年发生过疟疾、痢疾等传染病，当时闽西发生天花、富田地区发生瘟疫等情况，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就关于红军和苏区人民群众健康的防疫卫生工作，进行了专门讨论。在此基础上，他在 1 月 13 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的文章。

指出：在发展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事业更大胜利的情况下，防止疫病发生和发展，避免危及红军和工农群众的健康从生命，开展防疫的卫生运动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健康的运动，是强健革命力量以便使苏维埃更大发展的运动。项英对防疫工作提出六条办法，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这一活动，要求红军的医疗单位积极指导群众开展这一活动。这在战事频繁，人民群众经济困难、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能注意抓卫生防疫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关心群众的一种体现。

临时中央政府在成立后，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制定了很实际的方针和办法，颁发了许多训令、通令，通过了许多决议、条例，以指导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对敌斗争，发展经济，增强革命力量。然而，据调查，不少地方落实得不够，有的只是翻印照转了事，有的没有认真讨论，有的虽然办了却没有向上级作报告。这种状况，引起了项英的重视。于是，他在同年2月24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实行工作的检查》的社论，指出：对于上级指示不落实，不仅仅是下级政府工作不健全，更重要的是上级政府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没有实行工作的督促和考察，

特别是缺乏严格的检查。他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按照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的规定办事，严格实行工作检查，健全工作制度，使工作更有效地开展起来。

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后，有的读者对离婚、离婚后偿还债务和维持子女生活等问题提出疑问，项英应编辑部的约请，于同年2月24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作了解答。他指出：“婚姻法主要的精神，……是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消灭男子对于女子的压迫，……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婚姻条例，正是站在彻底解放妇女，消灭任何束缚女子的方面”。对离婚、离婚后的债务和维持子女生活等问题，“我们不应从男女双方来认识，应该从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解放妇女的意义来了解。”项英对婚姻条例基本精神的解释，表明了他对解放妇女的基本态度。

为了加强苏维埃建设，临时中央政府举办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于2月29日毕业时，项英到会讲话。他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要围绕着支援红军在前方作战来开展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多做实事，少讲空话。为了使这批学员尽快

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将他们先派到瑞金县各区苏维埃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再正式分配工作^①。

同年3月2日，项英在主持人民委员会研究后，就切实执行工作检查问题，发出第五号命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条例、训令、通令的执行情况，认真地进行检查。当时规定要对选举、春耕、支前、财政等六个方面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报告临时中央政府^②。项英强调建立和实行工作检查制度，对保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各项法规的执行和落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时，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负责人的文化程度低，看不懂上级的命令和文件，影响到对指示精神的理解和在工作上的贯彻落实。这在客观上有其历史原因，也确有少数的不愿学习，总以“我是工农”来搪塞。项英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降低苏维埃政府的威信和作用。于是，他在专门组织研究后，于3月2日发出人民委员会第六号命令，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加紧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尤其是不识字的工农干部，要努力识字，学习政治，凡不积极学习的就是对革命的怠工，对苏维埃政

① 《红色中华》报第12期第5版，1932年3月2日。

② 同上。

府工作的不努力；规定各区、县、省苏维埃政府都要设立识字班，认真组织不识字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学习识字，并经常进行检查^①。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项英对于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活动，当做巩固发展革命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在临时中央政府里，设立了临时最高法庭，由何叔衡任主席；在《红色中华》报上，开辟“苏维埃法庭”专栏，刊登判决书等法纪方面资料，以教育广大工农群众，威慑对苏维埃事业的敌对分子。

同年3月2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的“苏维埃法庭”专栏里，发表了《写在前面的几句话》的短文，指出：为保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制裁。对于肃反问题，一方面，要彻底肃清反革命派别，纠正过去在肃反中发生的错误，建立正确的肃反路线；另一方面，要保障工农群众的权利，建立革命秩序，并废止肉刑，严禁偏听口供，注意侦察工作和事实依据。对犯人的处置，应区分首要、附和来判罪，规定拘捕反革命的机关属于政治保卫局，审判归裁判部和将来的各级法院。

^① 《红色中华》报第12期第6版。

当时，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苏维埃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工作，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然而也有少数不纯分子，受做官发财、贪图享受思想的侵蚀以及自私自利思想的影响，出现了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现象。对这些问题的出现，项英是十分重视的。

在3月2日《红色中华》报的“苏维埃建设”栏目里，项英发表了《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在后方的同志，除了积极领导群众去参加革命战争、建立巩固的后方外，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文章“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

项英这篇文章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把反对浪费、贪污与当时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任务——发展革

命战争、支援红军作战和加强苏维埃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摆到了应有的高度。第二，表明了他对浪费、贪污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严肃处理的决心。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同于国民党腐朽政权的区别之一。第三，在做法上，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厉行节约，克服浪费和贪污等不良现象。

项英对待浪费、贪污的态度和做法，对人民政权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号召，得到许多单位的响应。当时，少共江西省委机关举行工作人员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作出决定：每人每天节省半碗米；每五天，将自己的伙食尾子捐出二分之一，作为红军的军费；实行共产青年团礼拜六制度，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以消灭少共省委所在地有荒田的现象。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省苏维埃、省军区指挥部等单位，对此也都作出了类似的安排^①。

同年3月16日，项英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会，通过了关于开展植树运动的决议案。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向群众宣传植树对减轻水

① 《红色中华》报第14期第6版。

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解决群众日常燃料的困难，都有重要意义，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植树运动；要求在沿河两岸、大路两旁以及旷场空地，都要种植各种树木^①。

就在3月16日这一天，项英用江钧的化名，在《红色中华》报的“突击队”栏目里，发表了三篇小文章：

第一篇的题目是《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项英在文章中批评这个单位摆阔气、不注意节俭的作风：做一面旗子，花了九块多大洋；购两根手枪丝带，用了一块二毛四分；买十本日历，使了三块多大洋；不用油灯点洋烛，一个月就点了三十包。

第二篇的题目是《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项英在文章中批评会昌县洛口区苏维埃秘书专权，欺负工农干部不识字，拿区苏维埃主席当菩萨，希望上级政府要很好检查。

第三篇的题目是《无奇不有的兴国国家商店和合作社》。项英在文章中批评该县的国家商店和区属合作社，学投机商人那一套，搞垄断商业、操纵市场的不良行为。

① 《红色中华》报第14期第6版。

项英这三篇文章虽短，少者只一百八十余字，多者三百余字，但观点明确，战斗性强，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与苏维埃政权性质不相容的腐朽作风。

4月6日，项英又以江钧之名，在《红色中华》报的“突击队”栏目里，发表了两篇短文：

一篇的题目是《好个石城县主席的迁家大喜》。项英在文章中批评石城县苏维埃主席由农村向县城搬家时，放了很多鞭炮，收了很多贺礼，真是荣耀得很！他气愤地说：“现在是苏维埃政权，主席是代表工农群众来办政府事的，对于封建县长式的主席，就要请他出苏维埃啦！”

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沿用当铺惯例的闽西工农银行》。项英在文章中写道：工农通讯社临时向闽西工农银行借用二百元钱，其中一百元只隔四天就归还了，可是闽西工农银行却算收一个月的利息。这是他们学着过去旧社会当铺放高利贷那一套，拿着工农银行的招牌，去做高利贷剥削那一套。

项英这两篇短文的共同特点，就是要破旧社会那种剥削群众、欺压人民的歪风，树苏维埃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新风。

同年4月7日，项英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十一次常会，检查分析当年头三个月的工作，安

排下一步的工作。他在报告中指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三个月中，在领导各级政府统一财政，发动群众节省经费粮食、参加革命战争等方面，发布有命令、训令和规定，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同时，中央政府本身的工作有相当建立，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有相当树立。在工作指导上，他强调要经常派人下去检查指导，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①。仅在当年3、4月份，就派五名部长和副部长到各县检查指导，他本人也多次到各县去检查指导。通过自己亲自下去调查和派人下去检查，获得了很多实际情况，帮助下面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沟通了上下的思想，密切了上下联系，工作指导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同年4月12日，项英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作出决议，宣布合作社组织为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形式，分为消费、生产、信用三种，由工农劳动群众集资组织。其中，消费合作社，主要是便利工农群众购买日常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之操纵；生产合作社，制造各种日用品，以抵制资本家之怠工；信用合作社，主要是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和借贷，以抵制私人的高利贷剥

^① 《红色中华》报第12期第3版，1932年4月13日。

削。条例还规定，社员按入股的多少来分享红利。

同年4月13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突击队”栏目里，用江钧之名，发表了《好摆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的短文，批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一位姓钱的女同志，给商人开路条，贩卖政府禁做的米粉，被地方政府查获扣留后，又开假证明去索取，终被揭露出来。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机关中帮助开假证明、随便盖公章等失职行为。这种直接了当地批评政府机关各种不正之风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同年6月20日，以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就“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出人民委员会第六号训令。指出：不少妇女参加游击队、义勇军、赤卫队、少先队等，对革命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日益扩大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多数工农男子要当红军上前线的情况下，后方工作更要有妇女来担当，因此，应坚定地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调动妇女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加速革命胜利的速度。训令在指出当时轻视妇女的倾向后，规定在苏维埃政府之下，男女一律平等，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切实纠正轻视妇女、忽视妇女权利的倾向；要提高劳动妇女的觉悟和对苏维埃政府的认识，鼓励她们的丈夫、兄弟、儿子到

红军中去，组织洗衣队、救护队，参加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要举办妇女半日学校、识字班、训练班等，来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水平；要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男女同工同酬，女工在产前产后受到保护；要严格执行婚姻条例，实行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打骂妇女、虐待童养媳等现象^①。

项英主持制发的这一训令，是苏维埃政府关心妇女权益的又一体现。

那时，中央苏区遭到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经济形成严重的剪刀差。一方面，外地产的工业品，如布匹、煤油、火柴、食盐等进货减少，价格日见昂贵；另一方面，苏区内地产的农产品，如纸、木材、烟叶、夏布、粮食等却销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加之商人从中盘剥，贱买贵卖，致使工农群众收入减少，经济上蒙受损失。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利于土地革命的深入，减少工农群众的经济损失，项英召集人民委员会研究后，于同年8月21日发出训令，要求各区、乡在群众自愿参加的情况下，建立粮食合作社，组织农产品的收购，然后以集体或分散的形式，运用各种途径，组织农产品向外推销，换取群众需要

^① 《红色中华》报第26期第5版。

的工业产品，以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减少群众经济上的损失^①。

同年9月20日，由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联名，就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发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号训令。指出：在目前革命战争急剧的发展中，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应以战争为中心；而健全与巩固苏维埃的领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有些地方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不健全，执行任务不坚决，对扩大红军的工作抓得不紧，对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政治领导不坚强，扩大、巩固苏区的工作不重视；有的政府内出现了官僚腐化、贪污浪费的现象。训令要求各省对地方苏维埃继续进行改造工作，通过改选，以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适应发展革命战争的要求^②。

1933年春季，中央苏区由于上一年粮食减产，边境地区群众遭敌人抢劫，以及缺乏调剂等原因，许多群众缺粮，红军粮食供应也很困难。2月26日，项英主持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会，研究了群众自愿借谷供给红军和调节粮食等问题，确定接受各地群

① 《红色中华》报第31期第7版，1932年8月30日。

② 同上报，第35期第1版，1932年9月27日。

众自愿借谷供给红军的要求，颁发训令，开展普遍的借谷运动，以筹集红军的军粮，便于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规定在苏区境内，不得禁止粮食流通，以利调剂；同时，设立粮食调剂局，各地组织粮食合作社，负责粮食的调剂事宜；还责成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何叔衡发出布告，讲明粮食调剂的有关事项^①。

同年3月1日，以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就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的问题，发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号训令。指出：为让红军指战员吃饱饭粉碎敌人的进攻，临时中央政府确定普遍开展借谷供给红军的活动。规定：借谷要先宣传，讲清办法，坚持自愿，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办法；借谷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普遍一律，产谷多的地方多借，产谷少的地区少借或不借；对借谷的群众要发给借谷票，当年下半年可用以抵纳土地税或作价付款；借到的谷米，由区、县集中供给红军^②。

同年3月4日，以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就调剂民食、接济军粮问题，发出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九号命令，指出：“各区各县的互相调剂，不但关系

① 同上报，第58期第5版，1933年3月6日。

② 《红色中华》报第58期第5版，1933年3月6日。

一般民众的日食，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关系红军及后方医院的给养，乃至打破敌人四次进攻不可一天缺少的条件，尤其重大得很。”要“告诉当地群众，一定要全苏区都有饭吃，尤其要红军有饭吃，同心合力，打破敌人，才是出路。要告诉那些粮食有余的人家，不要只想高价，别地在挨饿，前方缺军粮，大家不能坐视不理。须知全体不好，红军不胜，你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得不到的。……须知全体的利益和战争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第一位。”命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解决粮食调剂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政府，成为有力地领导战争的政府^①。

项英在一年多抓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发展革命战争的全局出发，从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利益着想，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这也是他抓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较为集中的展示。项英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报告中，讲当时抓人民政权建设，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健全苏维埃政权，使政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对县级以上的政权机构，根据形势的发展，不

^① 《红色中华》报第58期第5版，1933年3月6日。

断在组织上予以健全，在实践中逐步明确工作责任，建立各项制度，包括巡视与检查等项制度。各级苏维埃的领导成员、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并通过改选、留优汰劣，使苏维埃政权更好地为群众服务。项英为使苏维埃政权更好地联系群众，强调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居民选出的代表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传达上级苏维埃政府执委会的指示和要求，使苏维埃政权同广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也使广大工农群众关心苏维埃，自觉地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第二，切实执行土地法、劳动法和有关法规，保护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对土地法，督促各级政府严格执行，查清阶级成分，搞好土地分配，打击那些阻碍分田的反坏分子，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为贫农、雇农、中农所享受。同时，认真执行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为了保障妇女的权利，颁布了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禁止虐待童养媳等封建习俗。发动群众开展防疫活动，保障工农健康。项英从实践中，逐步增强了依法办事的思想，根据需要，主持制定了许多法令、条例、制度，以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例如，对肃反，他一方面强调对破坏苏维埃事业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同时，又强调要按司法程序办事，查清证据，废除肉刑，并

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司法机关办理。

第三，调整经济政策，发展苏区经济。领导开展春耕运动，帮助群众解决春耕中的耕牛、种子、农具等问题，以增加农业生产。恢复商业，使群众需要的日用品能从境外不断输入，同时注意组织苏区境内的工农业产品向外输出。成立国家银行，发行纸票和辅票，统一货币。颁发税则，整理税收，纠正过去只靠打土豪的财政政策，树立苏区财政基础，有助于红军的供应，减少红军筹款的负担，利于红军全力发展革命战争；同时，废除国民党军阀时期制定的苛捐杂税，对红军、工人、雇农、苦力实行免税，对一般贫苦群众实行减税。颁布财政条例，统一财政，实行预算、决算制度。

项英在抓生产过程中，注意了以农业为重点，号召群众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他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推广好的生产经验。1933年，他亲自将瑞金县沙洲坝老农吴正廷种植稻谷的经验加以推广，使沙洲坝地区当年谷物的产量有很大提高。

项英还注意抓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业生产，以解决人民群众生活的困难。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群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食盐十分困难。项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动

苏区人民自己动手，用墙上的老土和旧砖熬硝盐。项英还指示不要损坏群众的住房，要用新土、新砖来换旧土、旧砖。群众很满意，称赞这个办法好。不久，许多村子办起硝盐厂，开展熬硝盐的活动，不仅缓解了群众食盐的困难，而且生产出制火药的硝，直接支援了革命战争。

第四，把发展红军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项英认为：“目前扩大红军，是保障战争全部胜利的最主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尤其是为了更多地消灭进攻的敌人，更要努力扩大红军。”“只有全体工农群众武装起来，造成最伟大的阶级武力，任何敌人都能彻底消灭。”^①为了扩大红军，督促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优待红军条例，苏区邮局对红军战士家信实行免费，组织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对牺牲和负伤的红军指战员实行抚恤。对赤卫军和少先队广泛组织，已组织起来的赤卫军和少先队达数十万人，不仅能维持治安，保护后方安全，还为红军的扩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项英重视运用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来做扩红工作，亲自主持制定了优待红军的法令，提高红军战士

^① 《红色中华》报第39期专刊，1932年11月7日。

的地位，给江西籍以外省、区的红军战士分配一份土地，发动群众给红军家属代耕，消费合作社对红军家属实行百分之五的廉价，对红军家属患病等困难发动群众募捐救济，从多方面造成红军光荣的气氛，使大批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

项英还亲自做优属工作。1932年10月的一天，他走到驻地附近的军属李祥征家里访问，在那又低又黑的屋里，和李老汉拉家常，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

李老汉情绪低沉，不肯说话，只是摇头。项英改变话题，和李老汉谈起生产来，慢慢地才得知李老汉家的麦子还没有种下去。

项英随即走到耕田队长家里，嘱咐说：“红军战士在前方流血流汗，打敌人，保家乡，耕田队在后方生产应该先人后己，首先把红军家属的地先种上，再种自己的，你说这样对吗？！”耕田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后，他们总是先帮助红军家属收好、种好，再干自己的农活。

1933年1月19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项英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军属王又英家里访问。他发现她床上的盖被破烂不堪，难以御寒，立即叫警卫员小张把他的被子拿来送给老人。

小张有些犹豫，说：“副主席，你也只有一条被啊，送给了老人，你盖什么呢？”

项英说：“我身体好，有棉大衣就行了，你快去拿！”

小张没有办法，只好去把项英的被子拿来。

王大妈接过小张拿来的被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对项英说：“苏维埃政府什么事情都给我们想到了：我一定要写信给我儿子，叫他在前方多杀敌人，多立功，用实际行动来感谢苏维埃政府！”

由于中央苏区拥军优属工作做得好，工农群众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当红军的参军热潮，使红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第五，依靠群众力量，加强苏区廉政建设。项英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欢迎群众检举揭发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官僚腐化现象。同时，加强了各级工农检察机关和工作，设立各级控告局，受理群众的举报。强调勤俭节约，杜绝浪费，健全制度，制定法律，严惩侵吞公款、营私舞弊等行为。在《红色中华》报上，开辟“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奋发工作的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少数工作人员那些消极

怠工的行为；“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披露那些贪污案件情况及处理结果，这对于扶正压邪是很有帮助的。

项英在抓廉政建设的过程中，有三条是很过硬的：

一是，以身作则。项英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工作上勤奋努力，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从不搞特殊。

二是，敢抓敢管。项英对脱离人民群众、铺张浪费的行为，通过讲话，写文章，及时批评揭露。他还亲自率领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处理重大案件，及时严肃处理，并公布于众。

三是，实施集体领导。项英对重大问题，都提交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讨论，分析情况，研究措施，然后以不同的形式公布实施。

项英抓廉政建设的措施和实践，对伸张正气、抑制歪风，对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项英在中央苏区抓人民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政权等建设方面伟大尝试的组成部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缺乏经验，不可能那样成熟，但其基本经验是有很好的

的借鉴意义的。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项英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曾三次担任过军委的领导职务。

第一次，是1931年1月至5月，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后改任军委副主席，直到当年11月“一苏大”召开时为止。

第二次，是1933年5月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在朱德去前方指挥期间，代理过中革军委主席，至1934年1月初前方总部返回瑞金时为止^①，历时七个多月的时间。

第三次，是1934年9月，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至10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为止。

项英在1931年1月至4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除参与领导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外，还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办了两件有意义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定建立军委总政治部，规定了总政治部的职责和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之间的关系。2月17日，项英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

^① 《周恩来年谱》第258页。

朱德、毛泽东联名，就《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发布了军委第六号通令。

通令指出：“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的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执行这些任务的，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统辖各地红军的这些任务就要有个总政治部，现在全国各地红军有大的发展，统一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指导，成了迫切的需要。”^①

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设总政治部，并暂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总政治部主任。

通令规定：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之中政治部要绝对的服从。而关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则政治委员同样要接受并服从，各红军中的政治部要经常的按级向总政治部做报告，政治委员除向上级的政

^①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82页。

治委员报告外，同时并向上一级的政治部做政治工作报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则下级政治部要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①。

项英参与制发的军委第六号通令，确定建立总政治部，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及其任务，明确了总政治部与下级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关系、上级政治委员与下级政治委员的关系、上级政治部与下级政治部的关系、同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关系。这在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都始终贯彻这些原则，激励指战员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另一件大事是，项英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于4月17日发布第九号通令，决定在军委总参谋部设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指定叶剑英、朱云卿、郭化玉（若）、左权等十三人为委

^① 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82页。

员，以叶剑英为总编辑，朱云卿为战史部主任，左权为编译部主任，郭化玉（若）为杂志部主任，着手搜集、总结各地红军作战经验，准备编写中国工农红军战史^①。这在红军以至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编写战史。当时，反“围剿”作战频繁，斗争十分激烈，军委能重视总结红军作战的经验，提出准备编写战史，是很不容易的。它对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是有意义的。

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②。这样，项英就再次负责军委的领导工作了。

同年6月初，经党中央批准，项英发布命令，调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194—195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记事》，第327页。

整红一方面军的编组，将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下辖第一、二、三师，红三军团下辖第四、五、六师，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十五师。这就精简了机关，减少了作战指挥层次^①。

同年6月6日，项英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会上就扩大红军的工作作了报告。他认为，要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展苏维埃事业，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红军。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扩大红军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提出了建议，着重总结了一年多来扩大红军工作方面的十条经验：（1）扩大红军应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2）切实地执行优待红军条例。（3）党必须领导政府和各群众组织协同一致地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4）赤卫队、少先队作为扩大红军的群众基础必须加强。（5）切实做好思想动员工作。（6）要把扩大红军作为经常工作来进行。（7）开展革命竞赛是突击扩大红军的很好形式。（8）组织妇女做扩大红军的工作。（9）做好归队工作。（10）做好新战士的欢送和欢迎工作^②。

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出了《关于

① 同上书，第337页。

② 《六大以来》（下）第254—25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扩大红军的决议》，要求各地区根据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采取经常和突击相结合的形式，把扩大红军的工作当作重要任务来进行，争取尽快完成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光荣任务^①。

项英在组织贯彻苏区中央局关于扩大红军的工作中，逢会必加强调，特别重视运用兴国县的典型经验。这个县的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由于思想发动工作做得深入广泛，优待红军条例执行得好，仅在1933年9月20日至30日的十天中，参加红军的就有一千六百人，其中补入红一方面军的就有一千四百四十七人。这些新战士质量高，有三百五十三名共产党员，四百四十七名共青团员；有三百七十二名家庭出身是工人、农民和苦力。因而兴国被誉为“扩大红军的模范县”^②。项英经常宣扬兴国扩大红军工作的经验，称赞兴国人民为苏维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号召中央苏区各地向兴国学习。

同年6月25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

① 《六大以来》（下）第254—25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所存战史资料。

发出《为参加查田与保护秋收的训令》。指出：军委为完成中央政府所给予的查田运动的任务，保护秋收，特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与赤少队的队员，积极拥护与参加查田运动，实行武装保护秋收。要求：红军各部队要以粉碎敌人进攻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查田运动，并就地帮助苏维埃政府开展查田运动，发动群众扩大与深入土地斗争；要求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抢粮活动；组织边区赤少队保护群众秋收秋种，并动员中心区的赤少队帮助群众割禾^①。

同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定将“八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命令指出：

“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

^①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所存战史资料。

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①。

项英发布这个命令，是他重视人民军队的重要体现，是他为中国人民办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好事。

同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五次会议，批准将每年“八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②。

把“八一”南昌起义之日定为建军节，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南昌总政治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在《南昌暴动的故事》一文中写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八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其意义的刻切和庄严，深远和伟大，是我们全中国英勇红军六年战绩中最可宝贵和尊重的一天。”^③

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至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成为人

① 《红色中华》报第93期第2版，1933年7月11日。

② 《红色中华》报第95期第1版，1933年7月23日。

③ 同上报，第97期第6版，1933年7月29日。

民军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地方进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日子。

同年7月9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决定对指挥革命战争有特殊功绩的，或在某一战役中获得伟大胜利的，或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按其功绩的等次发给红星奖章^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7月11日批准了这一决定^②。

红星奖章的基本形状是：五角星及两枚五角星交错而成的星花，象征着革命的星星之火，由五星和禾穗组成的圆形图案，象征着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的本质，与全心全意为工农解放而服务的宗旨，以“红星章”三字标明为红星奖章^③。

按照项英的这个命令，在当年的“八一”建军节时，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对领导南昌起义和创建红军、指挥作战有特殊功勋的周恩来、朱德、彭德

① 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历次资料》第2册第661页。

② 《红色中华》报第95期第1版，1933年7月23日。

③ 军事博物馆：《军事史林》1985年第2期第58页。

怀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程子华、罗炳辉、毕占云、滕代远、彭绍辉、王诤等三十四人。他们当中，有领导红军长期斗争卓有功勋的；有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屡建战功的；有在某一战斗中挽救危局的；有领导白军兵暴的；有建立特殊功勋的。授予三等红星奖章的，有王震等五十三人^①。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星奖章只在 1933 年和 1934 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过两次，而且多是授予红军总部、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指挥员。

红星奖章的颁发，对鼓舞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年 7 月 28 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训令，公布了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供在“八一纪念日及最近期间内诸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要求“各级指挥员务须事先负责详细讲解，使每一个红色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行”。这个誓词，表明了红军的性质、根本任务和誓死保卫革命利益的坚强决心^②。它成为红军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至

① 《军事史林》1985 年第 2 期第 58 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2 册第 678 页。

今仍有教育作用。

同年8月1日，中革军委在瑞金举行盛大阅兵典礼，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这是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盛夏酷暑，同时避免国民党军飞机的突袭，决定阅兵典礼在黎明前举行^①。

这一天清晨3点多钟，东方还刚刚发亮，数千只火把就把炮兵射击场的四周照得通亮，参加阅兵典礼的，有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党政军领导干部，各界代表，他们陆续走上主席台，项英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中革军委代主席也早早来到这里；参观的群众也来到广场的四周。参加受阅的中央警卫师（又称工人师，这支队伍以工人为主组成）和红军学校的学员，全副武装，早已排列整齐^②。

清晨4点，阅兵典礼正式开始。在震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在悠扬激昂的军乐声中，项英代表中革军委，将绣有“八一”字样的军旗授予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他随后走下主席台，跨上战马，在中革军委另两位负责人的陪同下，检阅了排列达六百多米长

① 《红色中华》报第99期1933年8月4日。

② 《红色中华》报第99期，1933年8月4日。

的雄壮队伍。受检阅的红军指战员，庄严地行注目礼，不时地呼喊口号^①。

项英检阅后，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南昌暴动开始的，是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盗战争危险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及华北的时候，也是全国人民反国民党运动高涨、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接着说：在这个光辉的日子里，给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授予光荣的军旗，其他的红军团以上单位也将授予军旗。他希望红军各部队高举军旗，勇往无前地去打击敌人；他希望红军学校高举军旗，培养出大批的红军干部，带领红色战斗员去消灭敌人^②。

项英在这次阅兵过程中，还带领受检阅的红军指战员，庄严地朗读了红军誓词。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发出的响声，震动着大地^③。

这次“八一”阅兵典礼，最后举行的是分列式。

① 《红色中华》报第99期，1933年8月4日。

② 同上报，第99期第7版。

③ 同上。

受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抬着大炮，扛着机关枪或步枪，雄赳赳地通过主席台。项英同博古、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不时地向受阅的红军指战员招手致意，祝愿红军不断发展^①。

当8月1日这一天的太阳从东方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时，项英主持的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庄严隆重的阅兵典礼胜利结束。

就在8月1日这一天，项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颁发了《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这个《条令》分为总则、奖励、惩戒、附则，共四章十八条。总则指出：工农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工农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而作战，“红军的纪律是建筑于工农群众自己利益之上”；“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的命脉，红军指挥员应教育“部属人员遵守纪律”，“要以本身作遵守纪律的模范”；“凡军人表现堪为表率之事迹者给予奖励”，“在纪律上犯过失者给予惩戒”。奖励和惩戒分别规定了奖励、惩戒的等级和各级指挥员实施奖励、惩戒的权限。附则规定：“凡曾受苏维埃功勋奖章而犯本条令者，得酌情减轻之。”^②

① 《红色中华》报第99期，1933年8月4日。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第11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同年7月底8月初，以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治委员的东方军接连取得朋口、连城之役的胜利，消灭白军第七十八师近三个团，俘获旅长以下近三千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收复了连城、新泉等苏区。东方军，是根据苏区中央局6月13日转发临时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的“长电”中，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该实行“分离作战”的方针，项英代表中革军委于7月1日发布《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由红三军团和红十九师组成的，负责入闽作战^①。

当时正是盛暑季节，入闽作战困难很多，指战员们在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等前方指挥员的指挥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敢战斗，接连打了一些胜仗。《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东方作战军的光荣战绩》一文中写道：“我东方作战军自东出以来，第一仗就消灭了卢兴邦半部，克复了泉上、清流、归化、太宁；第二仗又消灭了区寿年大半，吓跑了六十师、六十一师，恢复了朋口、连城、新泉、白沙，使十九路军退到龙岩、永安不敢伸头，一共赤化了五六百里”^②。

① 同上书，第111页。

② 《红色中华》报第103期第5版，1933年8月19日。

对此，项英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联名，于8月8日打电报给东方军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祝贺胜利，说，“英勇的你们，在东方战线上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表现我工农红军已更加壮健，更加无敌，给正布置第五次‘围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威胁，也就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开始胜利，我们听到非常欣慰。”电报要求他们“奋发更大的勇气，向前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更多更光荣的胜利。”^①

东方军作战历时三个月，指战员们发扬英勇奋战的作风，克服酷暑远征的困难，虽取得局部的胜利，但临时中央“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指导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使红军主力自身受到削弱，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带来困难。项英在贯彻临时中央“长电”的过程中，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没有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要求东方军进攻城防坚固的清流，遭受失败，教训深刻。

就在这时，国民党正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于7月24

① 《红色中华》报第103期第5版，1933年8月19日。。

日在瑞金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发布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苏区的党组织在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下，动员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以极大的注意力，开创苏区周围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①。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讨论，完全赞同决议的精神。

同年7月26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纲要，规定首先迅速给河西湘敌和闽西闽敌以打击，消灭其主力，建立抚河以东、赣河以西两个作战线，来辅助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同时，命令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湘鄂赣区红十六师，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湖南敌人，配合红六军团的作战行动^②。

同年7月30日，项英和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下达了《关于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粉碎敌人第五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八）第650—656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次“围剿”的训令》。指出：反对敌人第五次围攻，“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决战，是关系苏维埃新中国与殖民地中国的决死斗争”；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攻，这是当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诸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应当依照既定的作战方略，坚决消灭敌人。训令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师、团。训令号召广大红军指战员勇敢战斗，游击武装要深入到敌后活动，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训令要求各部队加强白军工作，瓦解白军，削弱白军的力量。训令还要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防疫工作，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①。

同年8月28日，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联名下达密令，分析了敌情，对江西、粤赣、福建、闽赣军区各作战分区区分了任务，要求各作战分区指挥地方红军、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独立发展游击战争，袭扰打击敌人；还可组织精干的游击队，深入到敌人后方，破击敌人交通，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法令，以配合主力作战^②。

同年9月18日，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一起，就保守军事机密问题发出指示。指出：保守军事机密，

① 江西档案馆抄件。

② 同上。

是争取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保证作战计划完成的重要前提；要搞好保密，在搞好伪装、隐蔽作战行动的同时，要教育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工农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养成保密的习惯^①。

同年9月25日，共产国际所派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到达中央苏区。此人曾任苏联红军一个骑兵师的参谋长，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深受曾经留学苏联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赏识。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从这时起，实际上控制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②。

同年10月5日，面对国民党五十万大军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联名，下达紧急命令，要求红军各兵团、各地方部队，召开军人大会或党员大会，进行战争动员，讲清形势，紧急动员起来，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情绪，完成各种战斗准备，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要求各军区、分区迅速完成作战区域的布置；各独立团、营、游击队，依照各自的任务，主动打击、钳制、迷惑、疲惫敌人；各地赤卫军、少先队，

①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所存军史资料。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56页，《黎明与晚霞》第164页。

在最短期间完成新编制，准备随时出动^①。

同年10月15日，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一起，针对国民党军用持久的“堡垒主义”，逐步压缩中央苏区，以摧毁中央苏区的企图，以训令的形式，下达了战术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我们处于战略的防御地位，已成为不可争论的事实，所以我们的战术应根据这一事实来决定。”^②

指示要求：“我们现在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审计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这并不是说不可在堡垒地域或从正面上佯攻箝制敌人，以便突击队顺利实施机动。然而只须派出最低限度的兵力，并不受过分的损害。”^③

① 《红星报》第10期复印件，1933年10月8日。

② 高等军事学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集》之四第14—19页，1959年8月25日。

③ 高等军事学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集》之四第14—19页，1959年8月25日。

指示强调：“我们不应采取消极的，而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箝制敌人的兵力不得大于三分之一，而将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来机动突击敌人，突击队不是配置在箝制队的纵深，而是从其翼侧出来突击敌人。”^①

项英等对战术问题的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对付国民党军新的进攻时，不要采取消极的防御，而要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防御；要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而要打击运动中的敌人；不要平均地使用兵力，“必须组织成优势兵力的突击队于窄小地段上。”^②

同年10月28日，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九军团。第七军团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三十四师，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后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第九军团下辖第三、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③。

此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已发展

① 高等军事学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汇集》之四第14—19页，1959年8月25日。

② 同上。

③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62页。

到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力量是比较强大的。

同年10月17日，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一起，下发了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指出：根据革命战争的发展和红军不断扩大的需要，军委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扩编，分别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特科学学校、地方武装干部学校，以加紧培养红军指挥员和专门人才。为纪念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苏联原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后被国民党借口与广州起义有关将其捕杀的郝西史和海陆丰起义的领导人彭湃、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杨殷、红军的缔造者之一黄公略，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命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第一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①。

同年11月2日，项英和王稼祥、彭德怀联名，给红军高级首长及其司令部发了一封信，检查和分析了9、10月间作战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

第一，红军高级指挥机关及其司令部，工作上要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63页，《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第168页。

协调一致。对上级的意图要认真领会，各部队不应曲解和延误，并应寻找最好的执行方法。只有统一思想，协调一致，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第二，对上级首长及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不执行或迟延履行，就是破坏总的计划，影响整个战役的进行。

第三，各兵团指挥员及司令部向下赋予任务时，对侦察、警戒要提出具体的严格的要求。

第四，要注意保守军事秘密。“防止敌人侦察，保守军事秘密，是胜利的第一前提。”移动、接敌、突击及退出战斗等，最好在黄昏、夜暗或拂晓前进行；夜间运动或驻止时，要利用山坡、树林及居民地隐蔽，认真对付敌间谍侦察^①。

同年12月20日，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项英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组成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即：以红五、红七军团及一部分独立团为东方军，以红九军团及一部分独立团为中央军，以红一、红三军团及一部分独立团为西方军^②。

同年12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从前方撤回后方，并

① 江西档案馆抄件。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70页。

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同时取消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第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主席仍为朱德，副主席仍为周恩来、王稼祥。这样，“前方总部”很快回到了瑞金，项英也就不再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而仍回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了^①。

项英对于他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七个月的情况，在本人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我们击破敌人四次‘围剿’以后，敌人开始采用堡垒政策。为了打破敌人五次‘围剿’和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决定将军事委员会移至瑞金，是时毛（指：毛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调我代理军事委员会主席。开始，以主力一部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向东方进攻，击败十九路军，恢复福建之清流、连城，一直向建宁、顺昌、泰宁扫荡，给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可是，东方军在福建停滞太久，不能按时将部队转移向东北进攻，致使蒋占先机之利，将黎川占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372页。

领，虽然我们回师在洵口将敌军消灭大部，但战略已处于不利的地位”^①。

“随后因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完全违反革命军战略战术的原则，不仅在战略上变成单纯的防御，而且敌人所采用的堡垒政策，以缺乏子弹和炮兵的我们采取堡垒的对抗战术，事实上单就军事上讲，短促突击在我们中国红军的战术条件下绝不能实现，遂遭受在反五次‘围剿’中最严重挫折，……这时朱德及周恩来由前方回到瑞金，继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我仍当选为副主席及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于是，我又由军委会转到政府工作。”^②

项英第三次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是1934年9月。

当年9月7日，项英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联名发布命令，称：奉人民委员会命令，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生病之中，决定项英暂代替他的副主席职务^③。

① 项英自传。

② 同上。

③ 《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122页。

这样，项英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的一个月，又参加了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但时间很短，他只参加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动员，准备等项工作。

项英在军委领导岗位上的实践，对人民军队建设的进行，对苏区武装斗争的开展，都竭尽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项英当时受“左”的影响，加之他在军事领导方面缺乏经验，因而在作战等方面的有些决策超越了当时主观条件的可能，有些工作的要求脱离了实际，成为深刻的教训，这也是历史事实。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

1934年1月上旬，项英参与研究制定的《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正式予以公布。“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苏维埃政府，要普遍地、经常地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其中包括：对分有田地的红军家属，要保障他们的田地得到及时地耕种和收获；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群众团体和后方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严格地、普遍地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制度。就是在星期六或星期天，轮流帮助红军家属耕种、收割及其它劳动；给红军家属发优待证，到国营商店、合作

社购物实行九五折。“决定”要求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委员会，经常考察各地贯彻的情况，推动优待军属工作的落实^①。

这个“决定”对加强红军的力量，使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广大指战员减少后顾之忧，是有益的。

同年1月15日至18日，项英在瑞金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博古、洛甫（张闻天）等所作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国民党区域的工人阶级斗争与工会工作》等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上，项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②。

同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的临时中央政府礼堂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六百九十三人，候补代表八十三人，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参加了旁听^③。当天早上，在临时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了阅兵典礼，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博古、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了阅兵典礼，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步兵

① 《红色中华》报第134期第1版，1934年1月13日。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47页。

③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第423页。

学校、特科学校等单位接受了检阅^①。

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了长篇报告，总结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经济建设、红军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向大会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时，着重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与夺取革命胜利的关系，后来作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收入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②。

大会期间，朱德就红军问题作了报告，项英作了副报告。到会代表经过讨论，通过了决议。认为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执行了‘一苏大’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的；英勇的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扩大了苏区，红军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决议认为，工农红军是中国革命中前线的先锋队，是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柱石。大会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加入红军，使红军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建设苏维埃新中

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第423页。。

② 同上书，第424—426页。

国而斗争到底^①。

同年1月31日，项英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修改的报告。他指出：宪法是国家基本的法令，它的内容是根据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而决定的，苏维埃的宪法和帝国主义国家及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宪法完全不同。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实践，证明“一苏大”通过的宪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够完善。

项英在报告中说，新修改的宪法的基本点，是为了保障已取得的胜利和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主要包括：

- (1) 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 (2) 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成为自由、独立、完整的国家。
- (3)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群众的政权，政权的最高机关是全苏大会。
- (4) 一切重要事情都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决定。
- (5) 一切法令是根据保护工农兵的利益来决定的，工农兵是我们的主人翁。

^① 《红色中华》报第158期第6版，1934年2月20日。

宪法还规定了土改政策、经济政策、民主自由、妇女解放、民族平等等方面的内容。

项英的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①。

同年2月1日，是“二苏大”最后一天，主要选举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博古、毛泽东、项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百七十五人为正式委员，邓子恢、罗荣恒、李一氓、张爱萍等三十六人为候补委员。还选出项英、滕代远等三十五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最后在毛泽东主席致闭幕词后，宣布大会胜利闭幕^②。

在大会闭幕之前，项英提议用“二苏大”的名义，致电祝贺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们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委托主席团起草、发表^③。

同年2月3日，新当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根据“二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组织法，选举十七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为中央委员会闭会后的最高政权机关，

① 同上报，“二苏大”会议特刊第7期第3版，1934年2月3日。

② 《红色中华》报“二苏大”特刊第7期第1版。

③ 同上报，第148期第1版。

并以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内设十一个人民委员部，决定了各部部长，项英为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①。

项英担任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后，建立组织，明确职责，迅速展开工作。

同年3月，项英根据事前发现于都出现的问题为线索、带领工作组，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他从这个当时属于粤赣省的于都县，检查出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中有不少严重问题：在“扩红”运动中，出现强迫命令现象；在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利益，包庇富农、地主；冒领、贪污公款，侵吞公物；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做投机生意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败坏了苏维埃的声誉，损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影响很坏^②。

项英指出，这些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行为，是一种腐败现象。它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是

① 同上报，第146、第148期第1版。

② 同上报，第168期。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宗旨相违背的，必须认真对待，严肃处理^①。

项英对这些违犯苏维埃政策法规纪的行为，协同粤赣省和于都县党政机关，或报请苏维埃中央政府，分别作了严肃的处理。他还于3月20日，同毛泽东、张国焘联名发布命令：对熊仙壁“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他还亲自出席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熊仙壁的审判会。经审判，最高法院判处熊仙壁有期徒刑一年^②。

项英对于都问题的检查和处理，对于激励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制止贪污浪费，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项英对与苏维埃新型政权不相容的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高级干部违法也是逃脱不掉法律制裁的。

同年4月2日，项英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第二号训令，号召苏区军民继续开展检举运动，强调要以保障实现当前战斗任务为主体，反对对战斗任务的消极怠工，反对退却逃跑，反对不执行苏

① 《红色中华》报第168期。

② 同上。

维埃的政策法令，反对贪污浪费等现象，来改善与加强苏维埃的工作^①。

中央苏区大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给贫苦农民分田分地。同年4月16日，项英到云集区参加了一个烧田契的群众大会。几千名农民看到成堆、成卷的田契被烧得火光冲天，口号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项英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项英说：“田契是地主套在我们农民脖子上的枷锁，我们今天把田契烧毁了，从此以后，我们种的田就是我们的了，不再向地主交租交债了，不再受地主剥削压迫了，我们穷人翻身了！”

停了一会，项英又语重心长地说：“搞土改，分田地，来之不易，它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分得了土地，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参军参干，保卫红色政权，把革命先烈未完成的事业承担起来，沿着革命先烈未走完的路走下去，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②

项英的讲话，给到会农民以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同年5月，项英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

① 同上报，第177期。

② 云集区农民萧文华忆烧毁田契大会。

记处会议。会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红军在内线作战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报告并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①。

对长征的准备，中共中央确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②。这样，长征的准备便在极小的范围内开始秘密进行了。对谁走、谁留、何时走？项英不得而知，自然也不便过问。

同年夏，中共中央调项英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及赣南军区司令员^③。当时的赣南苏区，包括于都、赣县、登贤、杨殷、会昌等县。

后来的情况表明，项英受命领导赣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是与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密切相关的。

项英到达赣南地区后，和当地其他领导人一道组织当地军民，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项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有：

第一，抓“扩红”工作。项英到达赣南就职时，

① 《周恩来年谱》第262页。

② 同上。

③ 项英自传。

正赶上赣南 5、6、7 三个月“扩红”计划进行之时。他通过县、区、乡政权，深入进行思想发动，使“扩红”成为群众运动，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赋予赣南地区三个月的“扩红”计划^①。

第二，组织武装保护秋收。7、8 月份正是秋收季节。敌人在边沿地带组织割禾队，带着箩筐、镰刀、布袋准备到苏区内抢收稻谷。项英和赣南党政军机关，研究了武装保护秋收的措施。一面发动赣南各县中心区的群众，组织抢收队；一面组织各县地方武装、赤少队到边沿地区加强活动，掩护群众抢收稻谷。这样，既可以使群众免受损失，也能保证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确保前方军粮的急需^②。

第三，发展游击战争。项英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各县独立营打击进扰苏区和抢粮的敌人，还深入到敌后活动。当年 9 月《红色中华》关于赣南发展游击战争近况的一篇报道中，称赞最近几个月的游击战争出现了新气象，取得了新胜利^③。

经过项英和赣南党政军机构的共同努力，赣南地区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为红军主力经

① 《红色中华》报第 236 期第 1 版。

② 同上报，第 221 期第 3 版。

③ 同上报，第 235 期。

赣南向湖南方向突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年9月上旬，项英奉命返回瑞金。此时，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中央苏区东线和北线防御完全被突破，形势愈加严峻；由红七军团组织的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由瑞金地区出动，8月经福建向闽浙赣边界前进；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于8月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但由于兵力单薄等原因，未能达到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中央苏区的形势未能有任何改变。中共中央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三人团”的领导下，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①。

同年9月7日，项英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以后，立即参与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他和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发出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②。

① 《周恩来年谱》第263—264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264页。

同年 10 月上旬，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准备已进入到最后阶段。地方红军开始奉命接替第一线防务，红军主力开始向瑞金、于都、兴国、会昌等地集结。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坚持斗争。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开始了新的征程^①。

^① 同上书，第 265 页。

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一 掩护主力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瓜动派继续进行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

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①。

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同时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②。

当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城镇和地区^③。

党中央当时向项英他们规定，必须等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湖南以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74页，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7年出版。

② 同上刊，第14页。

③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4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出版。

这以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①。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②。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是：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有主力红二十四师（只有二千余人），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江西、赣南、闽赣、福建等军区分别指挥的一些独立团、营，共一万六千余人^③；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三万人。看起来，留下的人数并不算少，但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或持大刀、梭标。正如项英1935年1月27日关于中央军区情况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中，讲道：“独立师、团……平均梭标占二分之一”^④。特别是老弱病残多，一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和照顾。用这些力量来抵御八万主力红军未能抵挡的五十万国民党军的进攻，那是难上加难的。

这就是说，当时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肩上的领导坚持中央苏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76页。

② 同上。

③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411页。

④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110页。

区斗争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由于只是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极小范围内进行^①，所以项英也不清楚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行动的真正意图。至于项英被留下来坚持斗争，那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确定的，项英并不知道。

对于怎样看待项英被留下？在那五十八年以后的1992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常委陈丕显在一次谈话时讲道：“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②

然而，项英临危受命，对党中央让他留下坚持斗争，二话没讲，便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为重，顾全革命大局，以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度责任感，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同年10月7日，项英遵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在边筹建领导机构的同时，边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让红军

① 《周恩来传》第277页。

② 陈丕显同志同笔者的谈话记录。

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脱离原来阵地，开赴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①。在接防过程中，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以积极的动作，开展游击活动，阻滞敌人，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项英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领导各军区积极向中央红军主力输送兵员。几天之内，七个补充团先后开赴指定集中的地区，分别补充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战斗力量。

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由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和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机关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开始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于都开进。项英和留下的同志，同当地群众一起，为他们送行。

同年10月12日，项英在瑞金县的梅坑，送别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②。当他和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话别时，心情是异常激动而沉重的。他是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出征啊！可是，党中央已决定

① 《土地革命纪事》第410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页。

他留下坚持斗争，他就愉快服从，坚定地表示：他一定和中央分局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用鲜血换来的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到底。

项英和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人告别时，热泪盈眶，千叮万嘱，然后目送他们向远处走去，直到连人影也看不清时，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党中央离开瑞金后，留下中央苏区这个烂摊子就由项英为主来收拾了。

同年10月13日上午，项英赶到医院看望陈毅^①。此时，陈毅因在当年8月兴国老营盘作战中负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几天前才做手术，还躺在病床上。项英首先询问了陈毅的伤势，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接着，他向陈毅传达了党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规定要求。陈毅由于事前已从周恩来那里得知一些关于战略转移的精神，当即对形势分析和迅速分散游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项英在告知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部署、保密方面的要求以后，先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当天下午，项英又同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就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分别作了交谈。

^① 同上刊（二）第314页。

同年10月14日上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①。他鉴于这次会议内容重要，派人将陈毅用担架抬进会场。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均出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会议。

会上，项英在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各项要求，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正式成立后，作了重要的讲话。

项英指出：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地进行战略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我们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党政干部，一定要认清这个革命大局，按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开展积极的行动，以掩护、策应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项英认为，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和行动准则。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怎样做好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掩护工作。如果我们在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还没有离开苏区时就开始搞疏散，那就会造成混乱。

^① 《陈毅传》第134页，《江西党史资料》（二）第314页。

项英说，现在形势很严峻，苏区范围越来越小，当红军主力突围后，敌人对我们留下的红军及游击队必定会加紧“清剿”和进攻，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要作艰苦斗争的准备。对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要作积极的部署，并根据情况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开展。

项英的讲话，表明了他的坚强组织观念和对党的赤胆忠心。

在会上，陈毅等也作了简要的发言。

这次会议经研究后，项英确定从五个方面来执行掩护、策应任务：

第一，阻击骚扰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

同年10月中旬，当主力红军在向赣南集结时，独立第七团在石城头陂地区骚扰敌人，阻敌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头陂集中；当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宁都地区筑垒前进时，独立第七、第一团积极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筑垒，迟滞敌人的进攻。独立第十一团在石城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阻击敌人。由于红二十四师和地方红军及游击队积极阻滞敌人进攻，开展游击活动，封锁消息，断绝交通，从而掩护主力红军胜利地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

同年10月21日，当主力红军从龙布到韩坊全线

出击，迫使粤军余汉谋纵队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向安远、信丰、南康撤退，主力红军乘胜追击时，项英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派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派第一大队与江西独立营进至重石、版石和龙布一带，派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同年11月初，当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主力红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时，项英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同时，命令红二十四师在汀州以南河田地区，迟滞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前进。

项英在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同时，注意从政治上揭露敌人进攻的阴谋和屠杀人民的罪行。他同陈毅、梁柏台作了研究，用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于当年11月7日发出第一号布告，鼓动“白军士兵兄弟，莫听军阀欺骗，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冤，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快把枪口掉转，实行

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①。这张布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压士兵、残害人民的罪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很快传遍苏区内外，鼓舞了群众，威慑了敌人。

第二，对外暂不改变党政机关的办公形式，隐蔽红军主力出征的战略意图。

项英认为，尽管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已经离开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骨干多数已经走了，红军主力正在集结着，但他们战略转移的行动还没有公开，国民党暂时还摸不清楚，因此，在他们没有离开中央苏区之前和离开之初，仍要保持他们没有动的样子，以迷惑敌人，切不可不顾大局，只顾跑反，使自己乱了自己，而且迷惑敌人的时间愈长，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则愈有利。为此，他要求党政机关在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仍要保持原来的样子，坚持正常办公，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正常公务^②。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由于它每周都要和人民群众见面两三次，它能否和大家照常见面，影响很大。项英和分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 63 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 19 辑第 246 页。

局委员、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瞿秋白作了研究，确定利用各单位的来稿，继续出版、报头、印刷和以前一样。为了引人注目，还在报头上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①。它以此来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苏区，对内可以安定军心、民心，对外可以迷惑敌人。

由于中央军委军民保密工作做得好，就有效地迷惑了国民党军。北路国民党军至10月底，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国民党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在中央苏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11月3日报道，说原在瑞金的中国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蒋介石直到11月中旬，才彻底弄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②。

第三，开展游击战争，为长期坚持斗争作准备。

同年10月18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第二四三期上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他还指

① 同上刊，第245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77、298页。

出：敌人愈前进，敌人的后方就愈空虚，就愈便利我们开展游击战。他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来胜利的保卫我们的苏区！”^①

当然，项英这个时候所强调要开展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还只是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游击战，而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战。

同年10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从原西江、瑞金、于都三县划出八个区，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直接归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瑞西县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党政领导机构和独立营^②。看得出，这是项英为坚持斗争所作出的部署之一。

项英为帮助中共瑞西县委坚持斗争，在赴该县检查指导工作时，亲自帮助该县解决武器、被装等实际困难。当时担任这个县委宣传部长的钟良培，1981年在《瑞西县的建立》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瑞西县委成立不久，项英同志到瑞西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8—11页。

② 同上刊，第200、278页。

县指导工作，出席了中共瑞西县委会议并在会上讲话。项英同志说：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要坚持一天，就要战斗一天；要搞好地下组织，组织通讯网；要做好坚壁清野工作。项英同志还说：我们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将要离开这里，你们要和瑞金特委联系。瑞西、西江县委都受瑞金特委的领导。”

“为加强瑞西县的武装力量，项英同志还叫瑞西县委派人到中央分局驻地领了十挺花机关枪、一挺马克沁机枪、六十支步枪，同时还领了六担做光洋的银饼和一些棉被、呢子大衣，使瑞西县独立营充实了力量，瑞西县各机关干部和独立营指战员的给养问题也得到解决。”^①

同年11月上旬，根据中革军委11月3日的电令，项英为便于领导坚持“三角地区”的斗争，率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机关，由瑞金的梅坑转移到瑞西

^① 《回忆中央苏区》第53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00页。

县的宽田地区^①。

同年 11 月 10 日，红军撤离瑞金后，中共瑞金特委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成立的游击队迅速开展活动，并根据地形和游击队的分布情况划分了游击区；兆征县独立营、瑞金独立营也转入开展游击战^②。

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和游击战争活动的逐步开展，表明革命的火种不灭。它给当地人民群众以很大鼓舞，给国民党军增加了压力，给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以有力的策应。

第四，抗击进犯的敌人，减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压力。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立即跟踪追击，蒋介石还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调集军队堵截，使中央红军主力的处境异常艰难。在中央苏区，原来进犯的国民党军绝大部分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苏区城镇和交通要道，继以堡垒封锁政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 416 页。

② 同上书，第 418 页。

策将中央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并于11月下旬设立“绥靖公署”、“绥靖区”，分别来组织“清剿”。除此，在江西、福建分别配备“预备军”，指挥机动部队配合“绥靖区”的部队进行“清剿”，妄图将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包围在狭小地区，彻底加以消灭^①。

在严重的局势面前，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11月22日，国民党军东路第三师孤军冒进，趾高气扬地由瑞金向会昌推进。这时的中央军区红军部队，已放弃了阵地防御战术，转为运动战。集结在会昌县九堡一带的红二十四师指战员，纷纷要求抗击敌人。项英为了兴奋苏区群众，提高他们斗争的信心，同时为转移国民党军的视线，命令红二十四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之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守，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牵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在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平的具体指挥下，消灭敌人半个旅，击溃敌人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

^① 同上书，第425页。

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它打击了敌人的进攻气焰，迫使敌人由急进改为缓进，延缓了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步伐^①。

谢坊战斗后，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便加紧构筑封锁线，调整兵力，在宁都以北地区就集中了四个师，寻找留下的红军主力决战。到当年年底，中央军区所属红军及地方游击队，先后吸引、牵制敌人两个纵队、十五个师又两个旅^②。这是项英领导中央军区部队积极执行牵制任务的重要体现，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谢坊战斗胜利的捷报，对长征途中的主力红军指战员也是一个鼓舞。当时，红九军团供给部长赵镠在渡过湘江后的第三天，即1934年12月6日，在《长征日记》上写道：“军团政治部沿街遍贴出捷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瑞金、武阳附近，歼灭了由东面侵入的李延年部一个旅，缴获机、步枪千余支’^③。这看出，谢坊战斗的影响是很大的。

由中央军区指挥的红十军，根据中革军委11月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78页。

② 军事博物馆学术文章。

③ 《赵镠日记》文稿（二）第112页。

4 日的命令，与 10 月下旬进入赣东北的红七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为师长，聂洪钧为政治委员；原红十军和地方部队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兼师长，乐少华兼政治委员；由方志敏任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中革军委还明确：“省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委项英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继续执行保卫闽浙赣苏区和开辟浙皖赣苏区的任务^①。

同年 11 月 18 日，项英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方志敏、曾洪易等，指出：根据目前闽浙赣的形势，决定红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常山之间挺出浙赣铁路以北，首先活动于开化、遂昌、衢州、常山地区，并以一部兵力积极破坏铁路，威胁衢州，调动攻闽浙赣苏区之敌，集中主力坚决地争取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新根据地。中央军委同时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并以方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省军区、省委仍留闽浙赣根据地，继续领导发展广泛的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 416—417 页。

群众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①。

红十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上述要求，为调动敌人，在方志敏等率领下，向皖浙边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十军团的行动，吸引和牵制了东南诸省国民党军的兵力，对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有积极意义。

第五，接收伤病员和组织运输，保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同年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后，赣南军区地方红军立即奉命到安远、新田、古陂、韩坊等地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同时组织群众前运弹药，后运重伤病员，收容主力红军掉队人员。赣南军区在小岔、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卫生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了运输转运站，以保证红军主力在转移时后方收容与运输^②。

中央军委先后收容了一万多名伤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陆续参加当地的游击战争，重伤员逐步分批分散安置。从而保障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① 同上书，第421—422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5、第15页。

在这期间，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通过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思想动员，使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员，对当时严峻的形势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迎接尖锐复杂的斗争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

所有这些，都说明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虽然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并没有从战役战斗上直接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但它吸引、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在那四十七年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分局委员谭震林于1981年8月，为陈丕显所著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讲道：“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①。这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因而，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当时领导红军部队开展积极行动，以掩护、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是他在领导坚持南方三年

①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游击战争中长期被埋没的一个贡献。

当然，项英在开始时，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同时也为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和坚守“三角地区”、保密等规定所束缚，对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考虑不够，斗争方式的转变不够及时，对开展游击战争也缺乏具体细致的组织，甚至还提出“创造新的师团”的口号，将一些地方游击队充实到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同国民党军死打硬拚，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促使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加紧包围分割和猖狂“清剿”。项英后来对此有所认识，他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

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红军主力长征前剩下的宁都、长汀、瑞金、归化（今明溪）、于都、会昌等县城及重要集镇，到1934年11月底均落于国民党军之手，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中央军区军民陷于极度的困难中。

二 转变斗争方式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第6页。

1934 年的初冬，寒风格外凌厉。

那一年 11 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对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央苏区。国民党军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小块，加紧“围剿”，使留下的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受到很大损失。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项英和陈毅等中央分局成员迅即开会，分析形势，展开讨论，研究措施。项英开始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红军主力回师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于是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开始实行转变^①。他们围绕着开展游击战，从组织上、思想上相继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派得力干部去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群众虽表现比较好，但被占地区没有来得及动员，群众发动差。为此，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决定派一批得力干部去各地加强领导。这是他们为适应当时斗争需要所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其中：

派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地区加强领

^① 同上刊，第 10 页。

导。张鼎丞与范乐春、刘永生、陈茂辉等，随即由瑞金地区出发去闽西。

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地区组织中共瑞金特委，并任书记。

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

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

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织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

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到公略县），参与领导当地的斗争。

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

为加强赣粤边地区斗争的领导，建立中共信（丰）（南）康赣（县）（南）雄特委和军分区，并立即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这个特委和军分区于12月初在于都县的小溪正式成立，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

任特委副书记^①。

这批领导骨干在派赴各地区前，项英同他们分别谈了话，指出当时形势的严重性，要求他们和各地的干部一起，紧紧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国民党军及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这批干部去各地组织和领导党的、军事的组织机构，对各地特别是闽西和赣粤边地区当时和尔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各地区，特别在“三角地区”的党内、红军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

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项英和中央分局首先在红军部队中和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进行动员教育^②。

项英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瞿秋白研究安排，在《红色中华》报上加重了反“围剿”的报道分量，增加了动员群众坚持清野的内容，还刊登出该报地委韩进写的《游击队进行曲》，其中写道：

“我们不许一只梭标不见血，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0页。

我们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
我们是工人农民的游击队，
高举自己的苏维埃旗帜！”^①

项英对这首歌词很是满意。他认为，歌词中所讲的“不许一只梭标不见血”、“不许一颗子弹不中敌”的要求过高，不易办到，但它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动员苏区军民去同敌人进行拚死的斗争是有益的。

项英为使中央军区部队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与政治部主任贺昌一起研究，确定编发《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中央军区政治部随即于12月25日正式下发部队^②，作为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动员教育的基本依据。

同年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应为了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

^① 同上刊（二），第162页。

^② 同上刊，第70页。

展游击战争”。他还要求党政机关的负责人随队行动,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①。项英提出的上述要求,成为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依据。

为培养游击战争的骨干,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县宽田区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②。项英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经过游击战争的教育和动员组织,各地游击队发展迅速,瑞金、兴国一带的地方武装逐渐能进行游击战。活跃在闽赣边区地陶古游击队、瑞金游击队、武阳游击队,积极骚扰和打击敌人,闽赣军区部队也向宁国、石城、广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抓紧整顿部队。

中央军区所属部队,除红二十四师外,其余独立团、营的成份新,基础薄弱,在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的冲击下,受到很大损失,暴露出许多明显的问题。项英当时指出最突出的有四点:一是,斗志减退。其中,最严重的是登贤独立团见敌而解体。二是,减员数量大。部队巩固工作差,不断发生逃跑、投敌现象。

① 同上刊,第84—94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316页。

红二十四师不到三个月时间，减员达二千七八百名^①，相当于红军主力突围时该师全部的人数。三是，干部指挥能力弱。他们对新出现的情况不适应，使部队的损失加大。四是，游击习气严重。未经领导批准，随意没收群众的東西。对武器不爱惜，丢失和损坏现象时有发生。对命令执行不坚决，纪律松懈，生活散漫。

项英针对部队的实际情祝，以中央军区名义，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从五个方面抓紧整顿。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使部队认清形势，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增强指战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其次，健全部队的组织，有的拆解，有的合编，减少层次，充实基层。同时，将缺乏战斗力的登贤独立团解散，人员和武器分别补入红二十四师和赣南团。复次，调整干部，派较强的干部去，或将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的骨干分子提拔起来，充实各级领导岗位，加强党的领导。

再次，学习游击战术，提高部队的行军能力。最后，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游击主义倾向。

项英还以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就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性问题，发布训令，指出：在保卫苏

① 见项英 1934 年 12 月 27 日给中革军委的电报报告，载《江西党史资料》（二）第 110 页。

区的斗争中，必须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组织纪律，坚决克服脱离群众、不爱惜武器、执行命令不坚决等游击习气，以保证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①。

由于当时形势急转直下，斗争复杂激烈，巩固部队是个大问题。项英和贺昌研究，用中央军委政治部名义，于12月28日，发出《巩固我们的部队》的文件，要求各级领导从坚定胜利信心入手，把巩固部队当作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②。

中央军委许多部队经过短期整顿后，面貌有所改观，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战斗力有所提高。这看出，项英决定部分部队利用间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这些经过整顿的部队，接着分别派往各地去坚持斗争。

第四，开展反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斗争。

当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远征，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基本区急进时，各地区的部队和干部中的失败情绪严重，退却逃跑激增，纷纷向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集中，加上动摇分子的叛变，就使国民党军能迅速集中更多的兵力向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68—69页。

② 同上刊，第80页。

“三角地区”进攻^①。

项英和中央分局认为，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问题，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不能提高对敌斗争的信心，就无法坚持斗争，也就不能转变新的斗争方式，真正把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因此，必须在中央分局所属地区范围内广泛地开展反对逃跑的斗争，从政治上对失败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它作为“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与胜利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②。

当时，随中国工农红军龙上抗日先遣队行动的中央代表、到浙皖边后任中共闽浙赣省党委书记的曾宏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出于对敌进攻的恐慌而动摇，在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对中国革命前途完全悲观失望，竟违反党中央的命令，擅自决定将抗日先遣队拖回到赣东北。曾宏毅的理论是：“野战军出去必然被消灭，游击战争不能保卫苏区，也不能坚持斗争，而要失败下去，中国革命已失败而告结束，我们目前应该退却”。曾宏毅还积极布置到白区的交通路线，开设底子，准备到白区逃命（最后逃向国民党

① 同上刊（一），第12—13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94页。

方面，成为可耻的叛徒)^①。

项英和中央分局发现曾宏毅逃跑主义的行为和散布失败主义的谬论后，极为重视，认为这关系到能否开展游击战争，执行保卫中央苏区任务的重大问题，立即决定在中央分局所属范围内，开展反曾宏毅路线的斗争，揭露曾宏毅路线的实质是取消当时游击战争和中国革命。指出：中国革命并未完全失败，而是在新的矛盾条件下向前发展，野战军不但不会被消灭，还要创造新的苏区，争取新的发展，将会推动中国革命更好地开展；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定能坚持斗争，定能战胜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反对因敌人进攻而动摇。中央分局决定撤销曾宏毅的省委书记职务，并将曾宏毅的错误和分局的决定用电报传达到赣东北、闽北、闽西及其它有关地区^②。这一斗争的开展，对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当时和尔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坚持有积极意义。

第五，继续组织精简和疏散。

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委陆续将庞大的机关加以精简，将人员充实到基层。同时，积极安置伤病

① 同上刊（一），第13页。

② 同上刊，第13—14页。

员，基本痊愈的分配到部队，一时难以治愈的分散到群众家中安置。到12月下旬，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都比较充实。

同年12月下旬，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委机关由于都县宽田地区移到该县黄龙区井塘村^①。

项英和中央分局对老弱病残干部的安置十分重视，想尽各种办法加以安置。项英认为，这些老干部是党的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是为革命操劳而患病的，需要有尽可能好的条件治疗和休养，而当时中央苏区局势严重，无法给他们找到养病的地方，必须让他们到白区找合适的地方休养治病。于是，中央分局确定患病的江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陈正人经白区去香港治病，让陈的未婚妻彭儒也一同前往^②。项英亲自看望病重的陈正人，说明形势，告诉他当时已无法再继续随队转移，必须立即转到白区去治疗和休养。陈正人对组织上的关心非常感谢，表示完全同意组织上的安排，随即化装经梅县、汕头等地转赴香港治病^③。当时和陈正人一起赴白区养病的，还有红一方面军原政治部主任周一栗等。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319页。

② 同上刊（一），第182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93页。

同年12月28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详细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中央苏区的情况,请中央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及时作指示。

1935年1月,中央苏区的形势继续恶化,进攻的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苏区的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游击队不断向“三角地区”退却。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委为保卫赣南地区,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将红二十四师调到赣南,要求该师和独三团、独十一团一起打击粤敌。但由于师、团部署失当,指挥错误,致1月28日在赣县牛岭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①。

项英后来在向中央报告,谈及牛岭战斗时,讲道:牛岭战斗“成为结束我们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不仅“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②。

同年1月下旬,红十军团在向闽浙赣边转移,进至江西省德兴县港头村时,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切成两股,主力约两千人激战七昼夜,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等不幸被俘;先头部队约八百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1—12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1—12页。

下，突过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与中共闽浙赣省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会合^①。

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在1月30日向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报告红十军团受损失情况的同时，责成中共闽浙赣省委和军区立即以红十军团余部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南，开展游击战争。任命粟裕为挺进师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以后，挺进师转战浙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②。

在这前后，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经常向党中央、中革军委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然而，当时党中央、中革军委由于忙于率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及其他原因，以致在1934年10月22日离开中央苏区后的三个多月中，一直“无指示、无回电”^③。因而，项英当时的领导工作是艰难的，心情是焦急的。

三 突出重围

1935年1月，乌云笼罩着中央苏区瑞金、会昌、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439页。

② 电报抄件。

③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114页。

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三角地区”的上空。从南、北对进的国民党军，把中革军委规定中央军区坚守的基本地区截成数块，使项英率领的中央军区部队的活动不但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有在狭小地区内被歼灭的危险^①。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如何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是个重大问题。对此，分局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必须突围，但向哪里突围，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集中基干部队向西突围，转到赣江以西井冈山一带另图发展。有的认为，应背靠于都向南发展。

项英坚决反对向西突围的意见，认为向于南突围的意见也不可取。他指出：向西突围到井冈山另图发展，显然与党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不符，而且粤敌正集结两师之众在信丰河沿岸堵截，要到达井冈山地区，必须通过信丰河与大余河这两道河流，且当时正是春季涨水，不能徒涉，有在途中被全部歼灭的危险。至于背靠于都南部向南发展，因为粤敌当时比较强，容易受到打击，以至被消灭。此外，北面、东面均有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线，穿插成为很大的问题。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4—15页。

而他自己，当时感到难以提出具体的妥当方案，所以他坚持要请示中央才行。

同年1月30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报告国民党军“清剿”的情况，认为必须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①

同年2月1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请党中央迅速指示行动方针。电报写道：

“（甲）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乙）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

“（丙）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不利，即被敌冲散。”

“（丁）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易被敌各个击破。”

项英在电中还讲道：“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65页。

途。”他盼望党中央对中区的行动方针速作指示^①。

同年2月4日，是农历大年初一。项英在井塘村的房东谢招弟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请项英和夫人张亮一起吃米果，喝茶，拉家常，共度佳节。项英他们与房东相处得很好。房东帮助项英纳袜底，做草鞋。项英感谢房东热情相助，将蚊帐、被面、女上衣等送给房东留作纪念^②。

就在2月4日这一天，项英再次致电党中央、中革军委，在报告敌情后，写道：“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情况，以急迫的心情，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③

同年2月5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版第65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302、220页。

③ 同上刊，第114页。

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称：“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①

这时，项英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如何分兵突围等问题，是多么渴望党中央、中央军委早日给予明确的指示啊！

盼啊，盼啊，项英实在是心急如焚！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很快，项英接到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发出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对中央苏区的斗争作出三点指示。全文是：

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

^① 同上刊，第 115 页。

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2月5日^①

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如同久旱逢甘霖，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同陈毅等一起研究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各地就医。其中，长期患病的分局委员瞿秋白，年已六十岁的原中央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何叔衡，同分局委员邓子恢等一起，由一排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然后准备经广东、香港转赴上海就医。

项英鉴于情况紧张，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张亮安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5页。

排随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一行去福建，并于2月11日从于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启程^①。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情是很沉重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作出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转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再也听不到她的音讯了。

项英在准备突围的各项工作中，把安置伤员当作一件重要事情来办。红军主力转移时留下的一万多名伤员中，轻伤的已陆续动员归队，重伤员需分散安置。项英确定给他们发几个月的粮、钱和和一些常用药品，疏散到群众家中，要求他们痊愈后能回部队的回部队，找不到部队的可自行组织起来同敌人斗争，也可以回家或留在群众家中隐蔽。但到2月中、下旬，还有两千多名重伤员没有安置。严重的敌情不允许再拖下去了。项英商请陈毅领导重伤员的疏散安置工作。

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重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安置。他说：中央苏区暂时失败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但中国革命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299、301页。

肯定会胜利的，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新的革命高潮还会到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艰难，敌人已经临近，同志们必须迅速疏散转移，回到自己家里或到群众家里去养伤；大家将来伤好了，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愿意回来的也可以重返部队。陈毅还亲自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恳切地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报仇人！”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①。项英对陈毅迅速疏散、安置重伤员一事，甚为满意。

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在指导各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时，强调：（1）坚持在敌人新的封锁线内，领导武装与群众反对敌人的“清剿”。（2）积极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来牵制与吸引敌人。（3）运用游击区域斗争方式，将公开的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紧密配合。（4）严厉镇压地主富农活动，消灭其反动武装，扑杀叛徒，扑灭民团与反动办事处，使反动统治无法维持。（5）各地应集中主力打击与消灭敌人，分

^① 《元帅的风采》第24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

散部队，避免与优势之敌决战，灵活的转移，隐蔽目标，打破敌袭击包围与进击。在狭小地区被敌之大兵团包围与“清剿”时，以一部开展游击战争，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主力则伏击、穿插到边区或白区，打圈子，保持有生力量。(6) 积极迷惑敌人，疲惫敌人。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对于地方工作的指导，必须采取武装巡视指导方式。大部分干部派下去，加强地方武装与群众斗争的领导。

项英将上述部署，连同当时敌情，于 12 月 15 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报告^①。

同年 2 月中旬，项英在部署后，和陈毅、贺昌一起，率领部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从于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向该县南部和禾丰地区转移，一面整理部队，一面等候党中央的进一步指示^②。

几天后，项英接到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致中央分局电》，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韧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应

① 电报抄件，原件存江西省档案馆。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 321 页。

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的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牵制。”还指出：“部分的苏区与红军虽受到暂时的损失，但红军主力存在，新的胜利在我们面前。……必须首先把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①

党中央的指示中，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求：游击队应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应紧密联系群众；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分局应在赣南、闽西一带转动，最忌胶着一地；切实进行瓦解白军工作，并选派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开展工作。指示最后指出：“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界，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②

项英接到党中央这一电示后，立即同陈毅、贺昌等一起进行学习领会，一致表示完全拥护，对突围等工作进一步作了研究，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6—27页。

围。具体部署是：

(1) 独立第七团随分局委员李才莲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宁都）县以北，开展游击战争。

(2) 红二十四师四个连，随分局委员陈潭秋、谭震林到闽西与张鼎丞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游击战争。

(3) 由分局委员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4) 由李天柱、孙发力等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依靠寻乌南部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

(5) 派红二十四师二个连，向龙南、全南、定南挺进，建立游击区，并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 由龚楚、石友生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从南安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 由徐洪、张凯率红军独立第三团，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8) 留红军独立第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

(9) 中央军委直接统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周

建屏为团长，杨英为政委），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指导工作，分局书记项英和委员陈毅、贺昌随红七十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工作^①。

项英在下达突围命令后，接着召开突围动员大会。他向各单位干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后，强调要保持有生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他说：“我们要分散突围，以后要独立作战，不能靠上面指挥，因为条件困难了。要保存有生力量，不能硬打硬拚。中央分局虽然还在这里，不过作战要靠你们自己了。”^②

同年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在报告当时敌情的同时，汇报了贯彻中央指示的简要情况，称：正布置部队向赣南、福建突围，已“彻底检查了工作与错误”，分局俟各部队出发后，率部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③。

同年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洛甫，报告部队工作情况。讲道：为加强对各地游击战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11—12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195页。

③ 电报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争的领导，陈潭秋已去广东的饶平、大埔和福建的平和地区，并建立白区工作；汪金祥已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到寻乌南部一带游击；李才莲已率独立第七团到闽赣军区游击，原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善孚已随队到兴龙游击。挺进的部队一部出发，一部准备陆续出发。赣南、福建形势紧张，地区狭小，活动愈来愈困难^①。

同年2月23日，项英接到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的电报。这是正在指挥红军主力四渡赤水的党中央在贵州省仁怀县大坝地区发来的。要求：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的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队、被占领区或去白区工作；各级干部“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②。

到2月下旬止，按照项英和中央分局、中央军委的部署，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中央军委部队，大多数已陆续突围。其中由龚楚、石友生率领的红七十一团一路一千二百余人，配备着较好的武器和电台，于2

①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123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二）第125页，《周恩来年谱》第276页。

月25日从于都、会昌大山出发，向湖南进发，准备在那里建立游击区，并负责寻找、收容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三十四师余部。这时还剩下两路：一路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领，约二千余人，已定于3月4日从于都南部之左坑出发，向信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突围；另一路是项英、陈毅、贺昌及司令部所在的红七十团，拟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将于3月上旬最后行动^①。

同年2月28日，项英接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他除了请陈毅、贺昌阅看外，指示机要部门立即转发给还保持着电台联络的中共赣南省委等单位^②。

项英在3月9日从于都南部的上坪突围前，坚持将向党中央报告部队突围情况的电报发出后再走，但那时由于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联络非常困难，报务员连续呼叫几个小时，才与党中央的电台沟通联络，直到当天下午5时，总算将电报发出去了。这是项英和中央分局向党中央发出的最

① 同上刊，第323—324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88、第376页，《陈毅传》第142页。

后一份电报。遗憾的是，因中央的电台密码更换，回电译不出来，从此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失去联络^①。

此时国民党军愈来愈近，枪弹在空中呼啸，形势十分危急。电报一发完，项英便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这样，项英和中央分局便和党中央、中革军委失掉联系，同各游击区也中断了联系，开始独立地组织游击活动。

项英3月9日那天冒雨突围，是异常艰难的。贺昌率红七十团两个营为第一梯队，先行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途中在会昌县归庄与国民党军遭遇，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带一个营行动时已是晚间，先和国民党军遭遇打了一仗，后因渡河受阻，转来转去也出不去，只好退回上坪^②。

第二天，3月10日，传来贺昌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的消息。项英对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担任过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昌的牺牲，心情沉痛，默默地回忆一起并肩战斗的情景，为失去这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而十分惋惜，同时又为无法帮助安葬这位战友的遗体而深

① 同上书，第376页。

② 《南方三年游南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页；《陈毅传》第143页。

感遗憾。

项英、陈毅在上坪，鉴于向闽西突围已不可能，便决定改向赣粤边突围。他们还根据严重的敌情，确定分散行动。

当项英、陈毅正在困难的时候，巧遇原代英县（今属福建省上杭县）县委书记曾纪财。曾是信丰人，对那一带很熟悉，陈毅几年前任红二十二军军长时就认识他，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流落到这里。于是，项英、陈毅让曾纪财带路，专走敌人不曾发现的崎岖小路，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协助下，几经辗转，于3月下旬到达大庾（今大余）东南的油山廖地，与中共信康赣雄特委的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①。

项英从党中央1934年10月20日率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起，到他和陈毅最后率领部队突围离开中央苏区止，他们在中革军委所指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坚持斗争，达四个多月的时间。

这时，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阿丕（陈丕显）率领的赣南军区突围的部队也

^① 同上书，第377页。

到达油山。加上原在油山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一千四百余人。这样，项英和陈毅便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赣粤边游击根据地^①。

在这前后，由中央苏区向外突围的部队，大部受到损失，其中由龚楚、石在生率领向湘南突围的红七十一团，后卫约两个连由团参谋长贺敏学率领，按照项英的指示留在赣粤边；在各地领导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毛泽覃、阮啸仙、刘伯坚、万永城等相继牺牲，瞿秋白被俘后不久英勇就义^②，项英的妻子张亮也在战斗中被俘，后下落不明。这些情况项英是后来才逐步知道的。

四 分兵游击

从1935年4月起，项英在赣粤边游击区开始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战斗历程。

赣粤边游击区，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之一。它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十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页。

②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449页。

一个县的部分地区^①。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毗邻的油山一带，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是赣南心脏赣州通往粤北重镇韶关的必经之地。赣粤边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生存发展、回旋辗转的战略要地。

项英和陈毅到达油山地区后，由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李乐天和特委副书记杨尚奎陪同，立即去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对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项英和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原来的担心打消了。项英豪迈地对大家说：“国民党报纸上造谣、吹大牛，说我项英在江西仁风山上被抓获，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难道说我这个项英是假的？”^②说得大家笑起来。

项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指战员们。

为了便于保密，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就开始使用化名。项英化名叫“老周”，陈毅化名叫“老刘”^③。此后，人们都习惯于称呼他们为“老周”或“老刘”了。当时，不少人听他们讲话，看他们处理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3页。

③ 同上书，第310页。

问题，感到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水平高，分析问题准确果断，但直到很长时间，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同年4月初，在南雄县境的大岭下村，项英和陈毅召集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和部队领导干部会议^①。会议先由李乐天汇报了部队突围经过和当时的敌我情况，杨尚奎汇报了当地党组织的情况、群众情绪和当时工作安排。他们说：根据中央分局1934年11月下旬的决定，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于12月初在于都县的小溪成立，机关和一个营共七百余人，他们趁主力红军长征经过赣南，国民党军惊魂未定之机，突然行动，跳出合围圈，渡过桃江，横穿信康公路，翻越信丰、南康交界的大山，经过信丰的上乐村，于12月下旬到达廖地村，与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信康赣县委和油山游击队会合^②。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已经站稳了脚跟，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已作了初步部署，并正在陆续展开。

项英在听取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及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甚为称赞。他继续说：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是很好的，这里在大革命时期

① 同上书，第377页。

② 同上书，第4、第172、第377页。

就有党的组织，就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又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然一致，但存在着矛盾。广东军阀已经插足赣南，在大余、信丰各驻一个师，蒋介石正戒备他们继续向北发展。敌人内部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加之这里的地形复杂，便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项英根据短时间的接触和听到的反映，也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他们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如：有的盲目乐观，只看到这暂时的“平静”，而对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清剿”认识不足；有的照搬苏区的一套，处处搞正规化，吹号集合，吹哨开饭，有板有眼地过日子；有的认为队伍集中不少，应和敌人拚个痛快；队伍过于集中，大部分在油山转来转去，没有在有利形势下迅速分兵到各地开展斗争。这些不切实际的做法，都不符合游击环境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要求，必须迅速改变。

项英还明确指出，国民党军全部占领中央苏区以后，斗争的焦点会随之转向赣粤边来，国民党军对赣粤边的“清剿”也就很快会开始。因此，这里的机关要精简，队伍要分散，作风要迅速改变，以便适应

开展小规模、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需要^①。

项英上述看法这样尖锐，分兵的态度这样坚决，是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同时吸取中央军区部队分兵过迟的教训而提出来的。这在他的认识上是一个深化和飞跃。

在大岭下村的会议上，项英和陈毅等研究后，决定派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率部分队伍到信丰与安远县交界地区，去接应突围的部队，收容失散人员；命令油山游击队转向信丰县崇仙一带活动，以摆脱国民党军对油山的包围^②。

在大岭下村的会议上，项英和陈毅研究后决定：中共信康赣雄特委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仍由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同时让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③。

项英和陈毅所以确定让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是因为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九岁，但参加革命时间早，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青少年工作，善于联系群众，在斗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第224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77页。

争中表现勇敢坚决，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很有作为的“红小鬼”^①。

大岭下村会议，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使到会的领导骨干从思想上弄通了转移、分散的必要性，从作风上认识到适应新环境的重要性，从组织上采取了适应游击战争开展的一些积极措施。

对大岭下村会议的精神和项英所强调的问题，到会的多数领导干部是拥护的，但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更没有在行动上贯彻。他在率领队伍向信丰、南雄边界发展时，搞军阀主义，建令部队打硬仗，任意枪杀干部战士，他骑的马不舍得丢，结果敌人就沿着那匹马的蹄印追踪，那匹马无形中就成为敌人的向导，使队伍屡遭敌人袭击，伤亡很大。后来传来消息，这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向湘林，成为可耻的叛徒^②。

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对油山地区全面进攻的形势，项英和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在大岭下村会议后，立即率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和部队向北山转移。

① 《中国人名大辞典》（现任党政军人物卷）第21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09页。

同年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大余县河洞乡的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和赣粤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兴、少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刘新潮（刘建华）及机关、部队的连以上干部约七十人参加了会议^①。

项英在报告中首先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反对失败情绪。他说：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受到了挫折，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但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坚决反共，将在全国人民面前更暴露其反动的本质，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人心将归向共产党，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那种对革命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②。

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他强调要迅速分散，保存有生力量，就可发展壮大，几

① 同上书，第266、第377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66、第173、第224页。

个人可以发展为几十人的队伍，几十人可以发展为几百人的队伍。在军事上，要采取守势，找机会打击敌人，但政治上要积极进攻，保持党的旗帜，给群众以希望。游击队要到处活动，把军事工作与内部教育工作结合起来，打击敌人，宣传政策，组织群众，壮大自己，坚持斗争。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反对土匪主义倾向，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和政策，在游击中也要贯彻执行纪律和政策^①。

项英在报告中，还针对游击队来自各地的情况，强调要增强内外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本地籍的同志要关心外地来的同志，帮助他们熟悉情况，熟悉当地环境和风俗习惯；外地来的同志要虚心向本地的同志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斗争，坚持斗争。

陈毅在讲话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形势，认清革命的前途。他指出：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既要反对盲目乐观思想，又要反对悲观失望情绪。他要求大家迅速转变斗争方式，依靠和发动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66、第173、第224页。

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拚；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①！

项英和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开阔了心胸，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长岭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讲话精神，从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出发，确定的斗争方针是：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②。

会议对恢复建立中共赣粤边党组织的问题作了研究和部署。决定加强信康赣、南雄两个县委和信南工作团的领导^③。

会议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油山、北山为中心，把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五块游击区。即：油山区（信丰、南雄、大余边境山区）；北山区（大余、南雄间）；信（丰）（南）康赣（县）区；信南区（信丰和龙南、全南、定南）；上（犹）、崇（义）区。部队按

① 《元帅的风采》第 244—245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266 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266 页。

上述区域，分兵开展游击战争^①。

会议研究了分兵游击的战术。确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仗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②。

会议对分兵游击作了部署。确定将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分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每个小队由十多人、二三十人组成，便于分散活动，开展小规模、分散的游击战。其中，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省的汝城、桂东县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龚楚及湘赣省委取得联系。项英随后得知，蔡会文于当年5月，在崇义县赤水仙召开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和湘粤赣游击支队，陈山任特委书记，蔡会文任游击支队长兼政委^③。

会议决定，赣粤边军分区机关撤销，特委机关分散，由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负责指挥。当环境恶劣时，特委领导人将分散到

① 同上书，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6页、第378页。

各地，直接领导各地游击队开展斗争^①。

会后，按照分兵计划，各个游击队立即分赴指定地区，灵活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根据分散活动的情况，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网，以保持中央分局、特委与各游击队、县委的联系，实施对赣粤边各地游击战争的指挥。其主要干线是：一条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各地区还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线。这套联络系统，是他们当时的生命线，都派有对革命最忠诚、最可靠的人来组成^②。

长岭会议，是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指示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和策略，实行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这次会议的精神和贯彻，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长岭会议的意义，在那四十五年后的 1980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 281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173 页。

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杨尚奎，在《艰难的岁月》回忆一文中写道：“它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保存党的骨干；在赣粤边一角牵制一部分敌人，配合各游击区，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①

长岭会议后，项英和陈毅等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斗争^②。

同年4月下旬，项英和陈毅等率游击队一百多人在北山的棚洞，遭到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周文山部的袭击。当天夜里，项英和陈毅等研究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进一步分散，以缩小目标，利于与敌周旋和隐蔽。他们还决定，为便于隐蔽，防敌袭击，以后进山搭棚，不住民宅。从这时起，项英就和房子告别，而在山林里过着流浪生活了^③。

在棚洞遭袭事件后，项英和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率一个侦察班、一个特务班（即警卫班），由北山转到大余与南雄交界的帽子峰以西天井洞地

① 同上书，第17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77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77页。

区，指挥各地斗争^①。

五 反“清剿”

反“清剿”，是项英同陈毅与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发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残酷军事“清剿”和严密经济封锁所进行的殊死搏斗，贯穿于三年游击战争的全过程，最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阴谋。

1935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后，蒋介石即调兵遣将对赣粤边游击区实行重兵包围，任命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兼赣南第六绥靖区司令官，指挥其第一军和第二军第四师，以及江西省的保安团、当地的“铲共团”，共几十个团队，约五十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余汉谋会同驻赣其他各军于“5月底以前肃清赣境残匪”。余汉谋于4月15日在大余城召开会议，第六绥靖区所属各师师长、团长及赣粤边各县县长全部到会，研究和确定了“清剿”计划，叫嚣：“要在三个

^① 同上书，第378页。

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这一次‘清剿’，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的就把他们饿死、困死。”^①

国民党军在对赣粤边游击区完成层层包围和封锁后，于4月中旬开始大规模的全面“清剿”^②

(1) 组织军事“清剿”。粤军和江西保安团以营、连为单位组成“清剿”队，每天清晨进出“抄剿”，傍晚返回驻地，还运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等办法搜寻游击队，或伪装红军，或在山上伏击，妄图消灭游击队^③ (2) 实行经济封锁。对所有吃的、用的物品，包括胶鞋、电池等都严加控制，不准群众往山里运送；群众购买粮、油、盐等日用食品都加限制，以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妄图困死、饿死游击队^④。(3) 强化保甲制度。将游击区附近的村庄，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法，即发现一户“通匪”，十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7、第416、第377、第195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7、第416、第377、第195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家株连，一保“通匪”，五保连坐。还将保甲内青壮丁男子编成“铲共义勇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群众行动，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①。（4）进行政治欺骗。运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游击队是“朱毛不要的土匪”，引诱政治上不坚定的游击队员自首，用重金悬赏通缉项英、陈毅和特委负责人，以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军心^②。

国民党军的全面“清剿”，使项英、陈毅及其率领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项英和陈毅、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领导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同“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加强隐蔽伪装。

项英他们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一般情况下，弄些树枝、茅草，利用有利的地形，就能搭起棚子来；如果条件许可，就用竹子搭。随后，因棚子目标大，每人发把雨伞，下雨就把着雨伞睡。后来，由于大余岭的雨季时间长，就设法买雨布做成盖布，在四个角上

① 同上书，第8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7、第416、第377、第195页。

钉上绊子，挂在树上，可以遮露挡雨，带走也方便^①。

项英他们为缩小目标，领导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多者十余人，少者三五人，组成武装工作队（组），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他们改着便衣，按当地群众装束，把长枪的枪托锯短，以便隐蔽^②

项英他们为搞好隐蔽，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开展群众工作，还提出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以便掩护开展工作。交通员赖文泰当过铁匠，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作掩护，来开展工作^③

项英他们领导红军游击队同“清剿”的国民党军回旋。当时粤军抄山，第一天去过的地方，一般第二天就不再去了。游击队就针对粤军抄山的规律，采取捉迷藏的方式，回避敌人的“抄剿”。即使与敌人相遇，也能沉着镇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75、第20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标^①。

项英他们领导红军游击队用随机应变的办法，来对付敌人。为防敌伏击，就由走大路改走小路，或改走没有路的地方，有时故意在溪水里走，使敌人找不到痕迹。他们特别注意消灭脚迹，或故意扰乱痕迹，迷惑敌人。有时故意在野草丛中丢件东西，把“目标”暴露给敌人，让敌人在深山里捉迷藏^②。

由于红军游击队的隐蔽措施得当，使“清剿”的敌人难于找到目标。

第二，依靠群众反“清剿”。

项英他们领导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平时帮助群众生产，到形势紧张时，则与群众联合反“清剿”。信丰县的上乐、坑口一带群众，组织起来为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发现敌人进山时，就呼喊“牛吃禾了！”暗示游击队上山隐蔽。当红军游击队执行袭击敌人或打土豪任务时，群众先侦察敌情，后当向导，有的一起参加战斗。

在党的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按照项英他们的要求，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不脱离生产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75、第207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8页。

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两地就有五十多个^①。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作侦察，搞情报，保卫生产。这些不在册的游击队员，对配合反“清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红军游击队需要的鞋子、电池等物品，就通过群众去购买。妇女时常进城卖柴，她们卖掉柴，买上游击队需要的物品，再买些青菜、辣椒盖在上面，国民党军和警察往往不予注意，能顺利地回到山里。有时还通过商人购买物品，这虽有危险性，但商人还是愿意赚钱的。

项英他们领导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采取积极措施，来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他们从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等斗争。当敌人抓丁厉害时，游击队就派人警告抓丁的反动保长，要他不要为非作歹；有时发现敌人把壮丁关在一起，游击队就突然袭击，把壮丁营救出来。对勒索群众过重、逼得群众喘不过气来的税卡，游击队就把它敲掉。割禾时，地主带着狗腿子收租，把粮食运走，游击队就中途袭击，帮群众夺回谷子。这样，就使群众靠向游击队，主动配合红军游击队开

^① 同上书，第196页。

展反“清剿”斗争，既巩固了老游击区，又发展了新游击区。

第三，千方百计地解决吃饭问题。

项英他们明白，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游击队带来的最大困难是吃饭问题，于是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平时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战士，都要背五斤干粮，一般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准动，只有在最困难时才可食用。

群众千方百计的支援，使红军游击队的食粮不断得到补充。与红军游击队有血肉关系的群众，总是寻找机会，把粮食、油、盐等送给游击队。有时把东西放在篓子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游击队在那里付钱收下。有时群众被逼随着国民党军去搜山，群众就把竹杆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食盐，进山后趁敌人不防，一面将竹杆丢下，一面唱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被赶出山的群众要回去耕种，也可以带着粮食去。

向土豪劣绅要经费、要物资，是解决红军游击队经费的重要来源。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就向地主派粮派款，规定限时交来。抓到白区的土豪劣绅，除个别民愤大、特别反动的予以镇压外，一般的只要肯悔过，肯缴纳战争经费，送钱、送粮、送物资来，仍然

放他们回去。而土豪劣绅虽爱惜金钱，但更怕杀头，总是愿意罚款，愿意给红军游击队代办“违禁品”。后来得知，凡被游击队抓过的土豪，大都能保持中立。

由于国民党军连续的“清剿”、搜山，项英和红军游击队也出现断粮。好在山上可以充饥的东西很多，春天就挖竹笋、野菜吃，夏天摘杨梅吃，冬天就找山果吃。山里老虎、狼、野猪等走兽很多，但因怕开枪暴露目标，他们不能开枪打，只好“和平共处”。他们有时能捉到小鱼、虾子、田鸡，来改善生活。如果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也只好挨饿了。项英就曾多次一连几天吃不上饭。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说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①的情况，那是常有的事。

第四，开展反“清剿”战斗。

项英和陈毅等根据敌强己弱的情况，指挥红军游击队按照“赚钱就来，赔本不干”的精神，有目的地进行战斗，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在封锁线内，红军游击队主要以突然袭击和伏击的方式，来打击、消耗敌人。对搜山的敌人，常常在其返回的路上打埋伏，截尾子，打掉队的。有时也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整股的敌人，打敌措手不及。有

^① 《陈毅诗词选集》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时趁敌人在村子里抢劫，突然予以袭击，当敌人清醒过来时，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

红军游击队的主要力量，则按照项英、陈毅的指示，跳到敌人封锁线外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据点和后方。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以曾彪为队长的油山游击队最为活跃。1935年4月下旬，油山游击队乘敌主力进山“清剿”之机，隐蔽急行军一百多里，突袭南雄县乌迳圩，全歼靖卫团，击毙靖卫团总邱光华，还用×支队、×大队等番号在四乡张贴传单、写标语，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迫敌将“清剿”油山的部队调回乌迳守防，从而直接减轻了对油山区的压力^①。等敌抽兵回到乌迳时，油山游击队又转到大余县，夜袭游山圩据点，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将保安团的一个班引出碉堡加以歼灭。同年9月7日，油山游击队根据中共南雄县委送去的紧急情报，在南雄到大余的公路上伏击由曲江（韶关）开往大余的三辆军车，缴获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然后让被释放的驾驶员带着宣传品回去散发，造成敌人恐慌，有的土豪劣绅竟从韶关逃往广州^②。项英和陈毅组织游击队配合作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6、第378页。

② 同上书，第379页。

战。当国民党军大举“清剿”油山、北山游击区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奉命带领队伍乘虚南下，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捕杀了反共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他们乘胜深入到全南县的青龙山一带，打击反动民团，镇压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很快建立起新的游击区。

第五，对国民党的保甲长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项英认为，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组织，是为压榨人民和严格控制人民进步活动而建立的，但保甲长并不都是坚决的反动分子，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根据项英的指示，对山里的保甲长，基本上加以掌握；对边沿地区的保甲长，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对很坏的保长、联保主任，非整不可的，就整掉一个，其他的也就规矩一些了。在梅山，游击队镇压了反动保长廖桂山，争取了大余城附近的联保主任吴其瑞。后来，吴其瑞时常给游击队送情报，帮助游击队购买一般群众难以买到的东西。有的地区还派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担任保甲长，以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游击区就由里山推向外山，从外山推向白区，游击区也就不断扩大了。

在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下，在各

级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使国民党军原定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只好把期限从三个月展为半年，以后又由半年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①。在这严峻的斗争中，游击区军民经受了考验，积累了经验，迎接着新的斗争。

同年10月，发生了余汉谋利用叛徒龚楚破坏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的严重事件。

龚楚原为中央军委区参谋长，当年2月下旬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大部向湖南转移，5月2日在湖南郴县黄茅率部叛变投敌。他对余汉谋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粤军很赏识龚楚，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三十多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②。由于当时联络中断，项英和陈毅对龚楚叛变的情况毫无所知。

同年10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为“红军游击队”的卫队，来到北山游击队后方的驻地天井洞。他们骗得红军游击队交通员的信任后，就于13日利用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9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9、第80页。

开联欢会的机会，来消灭在那里的北山的一部分游击队，导致三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带伤冲出虎口，后方主任何长林被抓住后叛变。20日，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侦察员吴少华，何长林声称：“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周同志（即项英）和刘同志（即陈毅）汇报，请你给他带路。”吴少华及时识破敌人，就设法对付，当接近指挥机关哨兵时，他指着身后的匪徒大喊：“他们是反革命”，向指挥机关报警^①。

当时，项英和陈毅正在下象棋，听到三枪报警，立即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也急速转移到后山隐蔽。吴少华和哨兵向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龚楚惧怕游击队实力雄厚，只好逃遁，阴谋遂告失败。后来，人们称它为“北山事件”^②。

对吴少华机智勇敢的表现，项英和陈毅给予了表扬，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项英和陈毅等鉴于敌人已发现天井洞一带为指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9、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挥机关所在地，必定大加破坏，于是立即派两名侦察员连夜分头通知油山和信康赣两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告知龚楚、何长林叛变及北山事件情况，要他们预加防范。然后，他们立即率指挥机关向油山方向转移^①。

果然不出所料。在龚楚、何长林的指使下，北山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蒙受很大损失。

同年10月下旬，项英、陈毅在向油山转移途中，发现群众由山里向山外搬家，察觉敌人“清剿”的重点由北山区转向油山区和信康赣边区，于是，他们果断地作出决定，派遣跟随他们转移的北山游击中队及后方特务队返回北山，以马鞍山为支点，帮助恢复北山区委的工作，同时，他们请杨尚奎、陈丕显前往南雄县委，传达反对敌人封锁的指示。而项英、陈毅、李乐天率少数人，继续向油山转移^②。

项英和陈毅、李乐天在向油山转移时，由于没有向导，又要避开大路，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遇到下雨，山路滑，摔跤那是常事。陈毅拖着负伤的腿，有时一滑就滑很远，项英风趣地说陈毅

① 同上书，第82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83页。

“坐飞机”。他们凭着概略的方向，先向大梅关前进，然后再确定方向，经梅山到油山。

项英和陈毅、李乐天一行偷越梅关，是一天深夜的事。梅关，在江西省大余县和广东省南雄县之间，北离江西的大余城七点五公里，南距广东的南雄四十五公里，关楼南面嵌着“南粤雄关”，北面嵌着“南岭第一关”，是我国著名古迹^①。他们越过梅关后，继续前进数里至仙人岭时，实在太累，就在避风处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②说得大家笑起来。

对偷越梅关，项英后来在回忆时是这样记述的：“……乱爬乱走，爬到第二天清早三点钟时，才到达梅关（张九龄修的梅关）最高峰上。大家沿途跌跤乱爬，已是疲劳不堪而不能继续走路了，于是大家就在梅关高峰露营，我们久已闻名的梅关，不料这夜我们高卧上面，赏玩无穷的妙境。”^③

同年10月底，项英和陈毅、李乐天一行经长途

① 《中国名胜词典》第579、第8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元帅的风采》第250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82—83页。

艰苦跋涉，到达信丰县的潭塘坑，与中共信康赣县委会合^①。

这时，余汉谋鉴于连续数月的“清剿”未能消灭游击队，便采用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进行更残酷的“清剿”，妄图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将游击队饿死、困死于空山之中。敌人把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村庄房屋烧光，强迫群众连人带粮全部搬出山外，并入山边和山外的大村庄，集中编保甲，只准每月初一、十五进山砍柴，违者以“通匪”论处，由保甲长严密监督执行。同时，还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寻找游击队的踪迹。

同年11月2日，项英和陈毅在潭塘坑，召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信康赣县委、南雄县委联席会议。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和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等参加了会议^②。

项英在听取两位县委书记汇报国民党军的动向和采取的措施后，作了讲话。他指出：国民党军封坑，强迫群众出山，并把粮食搬出，是妄图消灭游击队的一种新的“清剿”手段。它妄图使群众与游击队隔离，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80页。

② 同上书，第9、第380页。

便于“进剿”，陷游击队于空山中饿死，或迫使游击队在外出找给养时来消灭。对于国民党军新阴谋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必须有充分的认识^①。

项英对反封坑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强调：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我们的对策。我们不能空喊反对出山，而应有组织地领导出山的群众到白区去发展工作，有计划地分配党团员随同出山的群众一路居住，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按党团员新的分布来编支部、小组，便于开展新的斗争。

陈毅在讲话时强调指出，在反封坑斗争中，如不采取积极的对抗措施，游击队将会处于孤立的局面。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讲话精神，确定了反封坑的具体办法。为加强反封坑斗争的领导，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会议决定指挥部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地指挥斗争，县委的领导人则分散到区委，深入到山边或山外加强新区群众工作的领导。具体分工是：项英、陈毅留信康赣县委；李乐天率直属队到信丰县的崇仙地区，向龙南、全南、定南的边界发展新游击区；杨尚奎、陈丕显到南雄县委，向大余边界发展；王龙光到大龙中心区委；刘新潮到信丰的上乐，向大余、

^① 同上书，第85页。

南康边界扩大新游击区^①。

这次会议还确定，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由项英兼任^②。

潭塘坑联席会议的精神，很快在各游击区得到贯彻。

这次会议研究的斗争策略的转变，再次分散和缩小了游击队的目标，加强了群众工作，使党的组织和游击队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联席会议后，项英为了加强反“清剿”斗争的指导，保持与各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联系，指定由刘新潮负责，在潭塘坑的山上建立交通总站，由李绪龙任站长，迅速沟通了通向北山、三南、南康龙回和赣县大龙的交通线。这些由革命坚定、最勇敢、最能吃苦的战士担任的交通员，不分春夏秋冬，不管狂风暴雨，不顾形势险恶，日夜奔波在高山密林间，传达特委指示和传递各地往返的信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③。对于交通站出色的工作，项英甚为满意。

项英为了使特委的指示、宣传品、教材能很快印发各地，委托刘新潮负责筹建特委油印处。这个油印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85页。

③ 同上书，第276页。

处在上乐宝塔后面的水口庙里，很快建立起来，设备仅有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架油印机，共三个人，一人负责刻写钢板，两人负责油印和分发。他们条件艰苦，就在膝盖上刻钢板，在神台后面摊的一块门板上油印。一次，他们转移时丢失铁笔，就用布伞的一段钢骨磨成铁笔来刻写。对于油印处的建立和工作，项英非常关心，时常过问，亲自去看望，称赞谭延年刻写的字非常漂亮，称赞老黄和郭洪传印得好、分发得快^①。当年在油印处工作的郭洪传，在那五十年后的1986年，在回忆《特委油印处》一文中，写道：

“油印处自开办至1937年冬，历时两年，油印的东西不少。项英同志写的东西最多，有文件、传单和标语，还有政治教材和识字课本。”“项英同志经常来我们油印处。有一次，他看到条件这么简陋，刻印的东西却这样好，又是表扬，又是慰问，讲得我们心里乐滋滋的。”^②

同年11月上旬，项英从报纸上得知华北事变的一些情况，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非常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75页。

② 同上书，第315页。

愤慨，在和陈毅研究后，提出了“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起草了将游击队改为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了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和国民党丧权辱国的行为，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①。这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同年 11 月中旬，项英和陈毅在潭塘坑，接见了原在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做兵运工作的陈宏（又名陈海）、陈桂华，指示他们打入余汉谋部第一、第二师，在士兵中进行以抗日为中心的宣传活动，建立中共党的支部和抗日士兵委员会的组织。随着兵运工作的开展，秘密的中共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就从国民党军内部瓦解和削弱了进攻赣粤边游击区的力量^②。

项英来到潭塘坑一带后，抓紧检查信康赣游击队和党组织的工作，在肯定他们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发现他们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把游击战争看成是打土豪、肃反扩大化，等等。他还听说南雄那边也有类似的问题。他和陈毅研究后，认为只有认真解决这

① 同上书，第 380 页。

② 同上。

些问题，端正思想路线，才能有助于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于是，他和陈毅作了分工：陈毅到南雄县委直接指导工作；他留在信康赣县委，一面领导整个赣粤边的游击战争，一面直接指挥信康赣地区的反“清剿”斗争。正如项英后来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实际上，此时陈毅和他分别成为南雄和信康赣的县委书记了^①。

项英根据潭塘坑联席会议的部署，指挥信康赣地区各游击队和党组织展开积极的反封坑斗争。有的挺进到信丰县城附近活动；在南康县的潭口和赣县的长演坝等地，砍电线，炸碉堡，贴标语，扰乱敌人后方，箝制其对重点区域“清剿”的力量。在山边和山外一些地方，警告反动保甲长和土豪劣绅不要为非作歹，捕杀了信丰县杨柳坑劣迹很大的土豪刘翼德，处决了大余县长江圩反动保长蓝秀清。通过警告和惩治，使信康赣和信丰、大余边界的土豪、反动保甲长在行为上有所收敛^②。

其他地区游击队按照项英的部署，积极配合信康赣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北山游击队在南雄县，先在横山伏击地方民团，毙伤民团十多名，缴获步枪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381页，《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90页。

十七支。接着，抓获大土豪江碧山，缴获短枪七支；袭击里东乡公所，活捉乡长，缴枪二十余支。李乐天率领游击队在崇仙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游击区，以“牵牛出山”，分散敌人对油山、北山“清剿”的力量。杨尚奎在大余县梅山和黄坑一带开展游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使梅山地区成为新的根据地。陈丕显率工作团在大余县彭坑一带，组织贫农团，建立党团支部，组织共青团员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活动，使游击区从山里向池江平原地区发展。

项英对各地传来的反“清剿”斗争的捷报，甚为高兴，称赞他们干得好，用斗争的胜利送走了1935年，迎来了1936年。

1936年1月，项英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分散国民党军对油山游击根据地的“清剿”力量，在和陈毅等商量后，决定调特委警卫班，由吴少华带领，到全南县青龙山地区，编入三南游击队。行前，项英亲自对他们作了动员，称赞这个班的成员个个斗争坚决，勇敢机智，任务完成得出色，鼓励他们在新斗争中锻炼成长。项英后来得知，这个警卫班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他们到三南游击队后，各方面表现很好，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时任三南游击队政委的张日清，在那四十七年

以后的1982年，在《艰难的历程》一文中，对此专门写道：

“项英、陈毅同志和特委的领导同志，了解到我们在三南开辟新区的情况后很高兴。领导同志也敏锐地预见到敌人是不会放过这块新的游击区域的。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力，特地将特委的警卫班调拨给我们，班长吴少华同志带着警卫班，于1936年1月来到了青龙山，我们把这个班改为侦察班。这个班在以后的战斗中，成为我们三南游击队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集体。”^①

同年2月初，赣粤边出现了多年罕见的大雪封山，粤军乘群众回坑春耕的机会，向信康赣游击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清剿”，强迫大余、信丰、南康等地群众携带斧头、火柴和粮食，分八路向信康赣游击区进行蔑梳式大“搜剿”，每路有粤军或保安团一个连监督，号称“万人大搜山”，妄图将树砍光，使游击队无处藏身^②。

项英预计到，在群众回坑春耕前，国民党军会有新的进攻。当他得知国民党军要搜山的情报时，就立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36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即和陈毅研究对付的办法。他们认为，驻大余的属粤军第一师，驻新丰的属粤军第二师，驻南康的属保安团，其建制不同，动作难以协同，这些情况和特点要很好利用。他们确定运用敌进我退、攻其不备的战术，来领导这次反搜山斗争^①。

首先，将领导机关疏散、隐蔽。项英率特委机关和信康赣县委，从信丰境内的潭塘坑一带，移至信丰、大余交界的钟鼓岭隐蔽，工作人员撤出山外，把棚子全部拆毁，消灭目标。他还考虑，如敌人在大余、南康抄山时，领导机关再转到信丰境内^②。

其次，组织游击队挺进到敌人后方袭扰。当国民党进山“抄剿”时，游击队潜入粤军后方放冷枪，贴标语，袭击乡公所，抓土豪，骚扰粤军驻点，闹得粤军首尾难顾^③。

再次，动员和领导群众对抗搜山。进山时，故意把柴刀弄得叮当作响，或哼唱山歌、号子，暗示游击队隐蔽或离开。进山后，砍树不用力，故意拖时间；有的故意不带火柴，或假装跌倒水中将火柴弄湿；也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10—11、第91页，《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91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91页。

有的故意少带粮食，使“抄剿”难以按计划进行^①。

最后，制造假象调动敌人。组织游击小组到山外砍电线，放鞭炮，给敌造成游击队已到山外的错觉；散发落款为游击第三或第五或第八支队等单位的标语，故意让群众向保长、区署和国民党军营部、团部报告，搞得敌人惶惶不安^②。

由于项英和陈毅积极领导反搜山斗争，使国民党军原定七天的“清剿”计划只折腾了三天，就草草收兵。

当1936年春播来到时，中共信康赣县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组织游击队员和地下党团员发动群众到粤军军营里请愿，要求回山春耕。国民党军百般无奈，只好准许群众回到山里搞生产。这样，游击队又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国民党军封坑和移民并村的阴谋也就被彻底粉碎了。

同年3月，项英给党中央写信，汇报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交给上海党组织派在余汉谋部做兵运工作的张赋转交。从党中央率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日夜思念着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热切地盼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指示。但遗憾的是，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91页。

② 同上。

这件事没有办成^①。

同年5月，项英与陈毅研究，为了推动龙南、全南、定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成立中共信南县委，负责“三南”北部和信丰部分地区的领导，调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为信南县委书记，南雄县委书记由杨尚奎兼任。

在一年多的反“清剿”斗争中，项英与陈毅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中共地方组织，不畏强暴，英勇斗争，闯过许多难关，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其中，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开展和坚持湘粤赣边区的游击战争中，于1935年12月4日壮烈牺牲。赣粤边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李乐天，1936年1月底在信丰县凹背村与国民党军战斗中英勇牺牲^②。他们和游击队无数指战员的英勇牺牲，是赣粤边游击区的重大损失，但更激发了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反“清剿”的斗志，去夺取新的胜利。

六 巩固内部

1935年4月，项英进入赣粤边游击区之初，红军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05、第383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游击队内部思想混乱，失败情绪严重，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相继发生了逃跑以至叛变投敌的事件。

项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和陈毅一起以很大的注意力，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巩固内部，保证游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数十倍于己的强敌面前，能够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高举革命的红旗，战胜各种困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英勇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项英大力巩固内部，主要从下列七个方面从事工作。

第一，经常进行革命前途教育。

项英经常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游击队内部的思想状况，给指战员讲清革命形势的变化，引导大家正确地认清革命形势，坚定革命胜利信念。当时，他根据红军游击队的艰难处境，明确提出：要在政治上坚决反对那种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和“等待主力回师”的悲观主义倾向，号召大家懂得红军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同样要坚信在游击战争中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革命的前途^①。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3页。

项英在进行革命前途教育时，总是把问题和大家讲清楚，既讲全国的革命是向前发展的，又讲当前的、现实的困难是很大的，还将希望告诉大家。这样，就使大家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又对克服当前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35 年冬和 1936 年春，是赣粤边游击战争最困难的岁月。国民党军疯狂的“清剿”，抄山搜山，加之寒冬季节，大雪封山，游击队简直难于生存下去。项英告诉大家：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要看到现实的困难，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少数人动摇叛变不足为奇，但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信能够度过艰苦的岁月，迎来光明的前途，到那时，能坚持到底的将会成为革命的骨干^①。

1935 年 11 月 2 日下午，项英在信丰县的潭塘坑，和担任警卫工作的战士席地而坐，赤诚谈心。他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广东军队和地主武装几万人马把我们围困在狭小的山区内，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中断了，和各个根据地也联系不上，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有随时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 63 页。

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不仅消灭不了而且还会燎原，燃遍万里江山，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必然会到来。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的、叛变的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砂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①。

战士们听了项英的一席话，感到他对问题认识深刻，分析精辟，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项英在进行革命前途教育时，总是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诸如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告诉指战员，使大家把在赣粤边的反“清剿”斗争和全国各地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联系起来，增强斗争的信心和自觉性。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不仅使日本帝国主义得以从容地侵占热河、内蒙及华北的一些地方，还将长江及南方许多地方奉送给英、美帝国主义。1937年1月，项英编写的《帝国主义》的教材中，在介绍什么叫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现状、帝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边游击区》第310页。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等情况后，特别揭示了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深刻指出：“不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就不能抗日打倒帝国主义，以至求得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所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成为争取中国民族革命胜利的前提。”“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不能得到独立和解放，同时中国革命的其他任务也不能彻底的完成。”这就把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紧密地联系起来^①。

项英还组织大家读革命书籍。他说：“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写的书，是告诉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一个革命者只有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才能懂得怎样去革命。”他从突围时带出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几本书，就成为他和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经常阅读的书籍，尽管已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但大家在行军时争着背，驻下时抢着看，从中吸取政治营养^②。

第二，经常进行革命气节教育。

① 同上书，第41—42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1页。

当时环境恶劣，斗争残酷，游击队在随时有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危险处境下，绝大多数干部战士经受住考验，但也确有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经不起考验，逃跑离队，甚至还出现了象龚楚、向湘林、何长林等叛变革命的可耻叛徒。而敌人又利用这些叛徒，来破坏游击队，破坏地方党组织，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手段是非常毒辣的，危害是很大的。根据这些情况，项英重视从抓革命气节教育入手，来开展反叛变与逃跑的斗争。

1936年4月，项英亲自起草了长达约六千字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下达，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组织学习讨论，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开展反叛徒斗争。大纲指出：（1）革命，是工农群众解放的出路，是推翻豪绅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残酷的战争。（2）要革命，就要有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3）革命的胜利，来自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因而流血牺牲是革命的光荣事业。（4）革命战士的流血牺牲精神，是推动和争取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5）叛变革命是可耻的行为，叛徒是革命凶恶的敌人。（6）叛徒的发生是革命投机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产物，其下场必将受到革命的制裁。（7）开展反叛徒斗争，巩固革命队

伍，推动革命的胜利发展^①。

游击队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学习讨论这个大纲时，紧密联系实际，大力赞颂那些为革命奋不顾身、流血牺牲的先烈的崇高精神，同时对那些叛徒更加仇恨和鄙视，从而提高了革命觉悟，更加坚定革命的信念。

项英在领导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的同时，还要求对那些被国民党军监禁的游击队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尽力设法营救；对那些缺点较多的人，尽量避免简单粗暴的批评，而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对于政治上有消极、动摇迹象的人，要积极争取，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以坚定其革命信念，防止把这类思想落后的人推向敌方。项英特别称赞信丰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主动，防微杜渐，使逃跑、叛变现象大大减少，县委机关从未发生过这类现象。

第三，正确地执行政策。

项英根据革命主要靠自觉的原则，要求各游击队的领导干部正确区分和对待三种人：（1）对不愿意留下来的，首先应从思想上进行帮助，实在留不住的

^① 同上书，第28—35页。

就发给路费，送出游击区，劝其站稳立场、不要叛变和危害革命。这叫作以礼相待，好来好去。(2)对已经离队但有悔改表现要求归队的，表示欢迎，不歧视。这叫作“浪子回头金不换”。(3)对有一般自首行为的，通过其亲属好友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危害革命；对顽固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这叫作善恶有分，区别对待^①。

项英在领导巩固内部过程中，要求各单位特别要注意争取落后分子。他说：这些落后分子，既有滑向敌人方面的可能，也有挽救回来的可能。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就有可能使落后分子回心转意，去反对敌人，把落后分子争取过来，就使敌人失掉了耳目，就会减弱敌人进攻的力量；如果把落后分子当成反动分子看待，那就是将落后分子推向敌人，正是敌人所盼望的。因此，要特别注意争取落后分子，多进行诱导和规劝，争取他们站在我们方面，切不可把他们当成反动分子看待。项英所强调的争取落后分子的原则，在巩固游击队内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项英从斗争中体会到，那种在政治思想上动摇、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24页。

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就容易在环境紧张时逃跑或叛变。因此，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重视大力振奋革命精神，坚信游击战争的前途；坚持说服教育，讲清革命道理，只要那些犯有错误的分子还没有去投降敌人，就要耐心地去教育、去争取；在党的发展工作上，要大胆吸收斗争积极、勇敢坚决的分子，不要把胆小怕事的人吸收到党内。这样，就能在艰苦的环境下，使游击队内部巩固，党的组织有战斗力，将游击战争坚持进行下去^①。

第四，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

项英从实践中认识到：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其基础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难以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难以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保证长期的给养供给，也难以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因此，他要求游击队必须牢固树立依靠人民群众的观念，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越是困难，越要依靠人民群众^②。

项英要求游击队处处关心群众的利益，和群众

① 同上书，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21页。

同甘苦，共患难。群众农忙时，要帮助收割、耕种。对欺压群众的保甲长，要设法秘密规劝、警告，使其有所收敛。对群众所痛恨的作恶多端的地头蛇，要坚决惩治，为民除害。对被国民党军抓去的群众，要设法营求。因此，游击队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①。

项英强调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执行政策，宁愿自己多受苦，也不能加重群众的负担。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必须调查清楚，决不能把富农当豪绅地主打，更不能损害中农的利益，商人的合法利益也应得到保护。向群众借钱借粮，要打欠条，有借有还，不能失信于民^②。

有一次，游击队向群众借米。群众知道游击队困难，不仅借给米，还送给了一些蔬菜。项英就此问炊事员萧平权：“都记帐了吗？”

答：“粮食的帐记了，菜没有记帐，是群众送给的。”

项英明确指出：“菜也应当记帐，待我们有了钱时，如数归还。”^③。

① 同上书，第 333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333 页。

③ 同上书，第 334 页。

1936年夏，两广事变后，游击队到游击区外打土豪的机会多了，有一天没收了土豪的一头牛。项英知道后，告诉说：“你们了解一下，看附近群众耕田缺不缺牛，如果缺，就把牛送给群众。”他们到驻地附近了解后，向项英反映，眼下群众不缺牛，建议把这头牛杀掉，改善一下生活。项英表示，牛可以杀，但要有福大家享，游击队吃一半，群众吃一半。这样，这个村的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牛肉^①。

第五，良好的内部关系。

那时，游击队条件艰苦，包括项英在内，都是同甘苦、共患难，同吃同住。冬天，他穿的也是两件单衣、一套夹衣，盖的是一条夹被。夜里，他冻的够呛，就和警卫员丁上淮、曾忠山挤在一起睡，说“挤在一起更暖和”。到1936年冬，通过白军工作关系弄到两床丝棉被，项英和陈毅各一条，但他仍然和警卫员挤在一起睡^②。

项英多次用个别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而造成损失的事例教育大家。他说：图享乐，贪吃喝，不仅会加重群众的负担，破坏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损害游击

① 同上书，第334页。

② 同上书，第326页。

队的形象，还可能导致敌人的袭击，造成意外的损失^①。

项英和身边工作人员亲如兄弟。他和大家一样，常年风餐露宿，终年奔波。打土豪搞来一点东西，或捉到田鸡一类的东西，警卫员总想送给他吃，可他从来不自己享受，总是分给大家享用。粮食接济不上，他总是少吃，让警卫人员吃饱。有一次，中共信康赣县委警卫班的李德和发疟疾，时冷时热，吃不下，睡不好。项英亲自帮助烧开水，叫炊事员给李德和做稀饭，还通过地下党组织买来药品给他治疗，使他的病很快好了。这件事给李德和的印象很深，以至在那五十年后，他都记忆犹新^②。

由于项英和下面及身边工作人员关系融洽，他遇到难处，周围的人也乐于相助。一次，项英在转移时，穿的鞋子丢掉了，打赤脚走路。这个困难是很实际的，而一时又不易解决。炊事员萧平权发现后，感到心疼，就毅然拿出自己保存的一双布鞋送给项英穿。项英不好意思地说：“这个使不得。你们女同志穿的鞋，怎么能让这个男同志穿呢！何况我穿了，你又怎么办呢！”性格开朗的萧平权，笑着对项英说：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87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11页。

“你这个首长还有封建思想哩！现在是战争时期，穿鞋子还分什么男的、女的！我有两双，送给你一双，有福共享嘛！”经过大家劝说，项英勉强地收下了萧平权送给的鞋子。其实那双鞋，项英穿上正合脚^①。

对于容易影响内部关系的事情，项英主张向大家讲清楚。他和陈毅从于都南部突围时，组织上曾交给他们几根金条带着。他们把这些金条缠在腰里，穿衣服多时还可以掩掩盖盖，到穿单衣时腰里就鼓起来了。少数心奇的战士，为此在背后嘀嘀咕咕，有时指指点点。项英觉得不讲清楚，反而会影响内部关系，于是，他和陈毅商量后，决定把事情向大家讲明白。一次，项英指着打开的金条，对战士们说：“我们带的这几根金条，是党交给我们保管的。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我们个人是绝对不会乱用它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讲清楚，大家都有责任来保护党的经费。”^②

陈毅爽快地补充说：“这是党的钱，今天和你们讲清楚，大家就不要再猜疑了。以后，如果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但钱无论如何要拿走，不能

① 同上书，第334页。

②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63页。

落到敌人手里。”^①

经过项英、陈毅这样一解释，就使大家知道这些金条是怎么回事，从而消除了影响内部关系的一个因素。

第六，个人的表率作用。

项英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大家。当时，他虽是赣粤边游击区的最高领导人，但生活却是非常艰苦，衣食住行和普通战士完全一样。按规定，干部战士发的伙食费，月底结帐，可以分点伙食尾子，可分到项英名下的伙食尾子，总是放在警卫员或炊事员手里，经过几个月，就拿出来买点菜加加餐，大家吃上一顿^②

项英率红军游击队驻在信丰县上乐区潭塘坑时，吃菜困难，当地的地下党员李绍仁得知后，就常弄点豆腐乳送来。项英知道了，便问李绍仁：“豆腐乳是哪里弄来的？花多少钱？”李绍仁回答说：“豆腐乳这个东西，山里群众家家户户都有，过年的时候做，又好保存，可以一年吃到头。给你们的这一点点，都是群众真心实意送的，不必花钱。”项英听他这么一说，便讲：“不要钱，那我们以后就不吃这豆腐乳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 63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334 页。

了。”^①

项英那时身体不大好，可他总是忍耐着，坚持着，不表露出来，不愿意拖累大家。他有病，叫他吃药，总是不肯吃，说要留着急用。当时药品奇缺，仅有的药就是几盒“万金油”、几瓶“剂众水”和几包“八卦丹”，拉肚子也就是吃“剂众水”^②。

正因为项英在生活上和大家同甘共苦，在思想感情上和大家非常融洽、亲切，因而大家也就信任他，尊重他，他指向哪里，大家就打到哪里。

第七，积极提高指战员的素质。

当赣粤边游击区经过头一年急风暴雨的斗争，形势相对平静后，游击队指战员也适应了游击战争的环境。这时，项英所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战胜敌人，同时也才能适应今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③。

当时在项英身边担任炊事员的萧平权、交通员的曹秀英，在那五十年后的1986年，在回忆《在项英同志身边》一文中，写道：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4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7页。

③ 同上书。第274页。

“项英同志十分关心干部和战士的学习。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文化水平都很低，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就不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也就很难挑起革命的重担。他还和我们开玩笑，说将来革命胜利了，组织上如委托你担任领导干部，你没有文化那怎么当呢！”^①

为了解决学习材料的困难，项英亲自动手编写教材。为使大家既学文化，又懂道理，他编了几册课本。第一册大意是讲人，第二册大意是讲地理常识，第三册大意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编教材时，为便于大家好学好懂，总是把教材初稿读给身边工作人员听听，问懂不懂，不懂就修改，直到听懂为止^②。

项英还手把手地帮助身边工作人员识字、写字。有的就是在他的耐心帮助下，抓紧学习，由一字不识到能够看报写信，看懂文件。

项英通过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提高了游击队的素质，增强了游击队的凝聚力，使游击队得到巩固和壮大。

① 同上书，第332页。

② 同上书，第274页。

正如项英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在当时残酷的斗争中，他们依靠党的政治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队伍，从而最后战胜敌人，赢得胜利^①。

七 游击新特点

项英在从 1935 年 4 月进入赣粤边领导和坚持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此时的游击战和以前的游击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一是，井冈山时代的游击战争，是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地，有幅员辽阔的地域可以进退自如，红军和游击队可以依靠根据地向四周大规模游击，或在幅员辽阔的地域内同敌人周旋，其战术带有运动战、山地战的性质。

二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过程中的游击战争，是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主要是破坏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战术是进攻性的，多采取挺进游击、突然袭击和埋伏袭击。

三是，在赣粤边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是国民党军完全处于优势，利用其掌握的堡垒线、民团和保甲制度等各种手段，对游击区进行长期的、持续的包围和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130 页。

“清剿”，妄图“斩草除根”，游击队员只有和群众紧密联系，共同斗争，才能生存下来，并将游击战争坚持进行到底^①。

项英领导赣粤边的游击战争，就是根据和以前游击战争不同的特点来组织实施的。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军进攻的特点，和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一起，研究确定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主要是：

- (1) 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
- (2) 不打硬仗，不攻坚；
- (3) 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
- (4) 要消灭敌人，反对只吓敌人；
- (5) 有利时集中消灭敌人，不利时就分散。

项英根据上述基本原则，从敌强己弱和地形等实际情况出发，来组织指挥游击战争^②。其特点是：

第一，切实搞好隐蔽，保存有生力量。

项英十分注意保存有生力量。他说：“我们的本钱不大，打仗只能打赚钱的仗，不能打亏本的仗。游击队的人数就那么多，牺牲一个少一个，绝对不能硬

① 同上书，第 115—116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116—117 页。

拚硬打。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力量保存了，就有发言权，我们这些火星，定能烧遍万里江山。”^①

1935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差不多控制了赣粤边地区所有村庄，红军游击队不能进村庄居驻，项英便开始率领寄宿山林，用树枝、芒杆等材料搭棚子居驻。这种棚子位置的选择，首要的条件是有利于隐蔽，能很好地观察敌情，有很好的进、出道路，一旦发现敌情，立即转移。驻处要经常转移，不宜久驻一处，否则容易遭到敌人的包围和袭击^②。

领导机关和后方，更要进到大山、深山中隐蔽。1935年5月，当敌“清剿”进攻开始时，项英就将赣粤边的后方部署在大余与南雄交界的帽子峰地区，指挥机关则在帽子峰以西的天井洞地区，这里山地复杂，群众极少，不便之处是给养困难，消息不灵通。正由于山大、山深，敌人不敢轻易进山“抄剿”，更不敢进山“驻剿”^③。

项英根据斗争的实践，和陈毅等一起，提出了游击队的《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

《秘密原则》分为四条：（1）生火做饭不出烟，以

① 同上书，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免被敌人发现。(2) 不出响声，说话要小声。(3) 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荒地，走水沟。(4) 各机关无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①。

《行军守则》分为八条：(1) 选择好时间，不任意行动。(2) 行军时爬山走荒地，以免中敌埋伏。(3) 过山坳要从旁山爬过。(4) 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5) 夜间行军要一个紧跟一个，以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电筒。(6) 行军间隔要短，与尖兵距离须在十米以外，以便发现敌情及时应付。(7) 行军时绝对禁止高声说话。(8) 睡觉不脱衣，武器不离身，时时捆好衣物，如有情况好迅速行动^②。

项英的上述要求很具体，很实在，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成为游击队保持和发展有生力量的基本依据。

第二，想方设法获取信息，掌握情报。

项英到达赣粤边以后，由于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缺乏侦察手段，致消息闭塞，情报没有来源，给作战指挥带来了巨大困难。项英就和陈毅凭着丰富的领导经验，从反面和侧面来获得信息和情报。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 49 页。

② 同上。

国民党的报纸，是项英当时获取国内重大局势变化信息的主要来源。华北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事件，他都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信息的。为此，他想方设法弄到国民党的报纸，包括整张的、半张的、一小片的，都看作是宝贝，仔细阅看和分析，从中找到与他们有关的信息。

项英从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发现，被国民党称之为“匪首”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粟裕、刘英、谭余保、傅秋涛等在闽西、闽北、闽东、浙南、湘赣边、湘鄂赣边等地区“活动猖獗”。这正说明，这些领导人还活着，他们正在各地坚持游击战争。他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并及时在红军游击队中传播，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①。

对于项英那样注意国民党的报纸，有人感到不解，曾经问他：“国民党办的报纸，经常诬蔑红军游击队，为什么还要看它呢？”

项英回答说：“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诬蔑我们党和红军游击队是事实，但从中也可以了解情况，分析动向。例如，国民党报纸上吹嘘他们在什么地方消灭了我们多少游击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个地区有游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90页。

击队在活动，等于给我们通风报信。不看报，不分析，就不晓得全国的形势；不了解形势，也就不能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作斗争。”^①

项英这一席话，使大家懂得了收集国民党报纸的意义，收集就更自觉了。

巩英对就近国民党军“抄剿”的动向，有的是派侦察员去侦察得来的，不少是从“两面政权”、黄色村庄的保长那里得知的。这样，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能在国民党军行动前就有所准备，从而避免或减少了损失。

第三，频繁转移驻地，转变斗争方式。

那时情况紧张，项英指挥游击队同敌人周旋，经常变换驻地，甚至有时一夜变换两处，变得飘忽不定。

当时游击队很能走，一晚上跑百儿十里是常有的事，跑起路来象兔子一样的飞快。

行军很有学问。不走大路，不留痕迹，使敌人找不到目标，做到来无影、去无踪。

项英根据敌情的变化和地形的不同，经常教育游击队不断变换斗争方式，来对付敌人。他还用那种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1—332页。

墨守成规而不变，导致遭受损失的教训来教育指战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赣粤边少共特委书记的刘新潮，在那五十年后的1986年，在《难忘的三年》回忆一文中，写道：

“项英同志每次向我们布置任务时，不但交待工作方法，而且很重视我们的安全。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很生动的事例。他说：山里有野猪，有麂子。野猪这种东西会损坏庄稼，但它有个特点，就是活动没有规律性，出去觅食，来去不走同一条路，不容易被人捕杀。麂子就不一样，它的活动有规律，出去回来都是走老路，容易被人逮住。游击队的同志要学野猪的活动方式，不要学麂子走老路，专走老路是很危险的。他讲得大家都笑了起来。”^①

第四，运用灵活的战术，来对付敌人。

项英面对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指挥红军游击队根据国民党军“清剿”手段的变化，采取敌变我变的方针，运用挺进游击、夜间袭击等战法，来同敌人战斗。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73—274页。

“你进山，我出山”。这是项英指挥红军游击队常用的战法之一。就是你来我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当国民党军向山区游击队的腹地“进剿”时，其后方必然空虚，游击队主力就跳出圈外，到他们的后方活动。1936年2月，国民党军对赣县大龙地区抄山，信康赣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主力东渡桃江，挺进到赣县的长演坝、韩坊一带活动，袭民团，抓豪绅，筹集经费，影响很大，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回来啦！”迫使国民党军跟踪追来。同年9月，国民党军对全南县的青龙山中心区进行“清剿”，三南游击队钻出封锁线活动，用“中国工农红军三南游击支队”名号贴出布告，敌见后方接连出事，被迫搬兵追来时，游击队又返回中心区。同年11月，国民党军对信康赣游击区进行逐山“清剿”，信康赣游击队就挺进敌后，贴标语，散传单，声东击西，扰乱敌人，使敌顾此失彼，被迫撤回固守据点^①。

“牵牛出山”。这是项英指挥游击队常用的又一战法。1937年春，国民党军又在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清剿”，项英就布置游击队主力转到外线，“牵牛出山”。三南游击队侦悉广东南雄水口圩的国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04、254、281页。

民党军大部进山“清剿”，只有保安队一部留守，就长途奔袭，将保安队、保丁、税卡全部解决。接着，他们又在那附近打土豪，用“游击第×支队”、“游击第×大队”、“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等名义张贴布告，搞得敌人虚实不明，土豪劣绅更是惶惶不安。当“牛”尚未牵出山时，他们就加紧活动，迫敌搬兵看守老窝^①。

打有利于发动群众的仗，打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的仗。这也是项英指挥游击队常用的一个战法。1935年秋，进到全南县青龙山地区的游击队，为了建立基点，发动群众，镇压山霸，惩办坏人，都用游击队名义张贴布告，扩大了政治影响，很快使这个地区的群众发动起来。1936年春，国民党军洗劫全南县鸭卵洞时，杀害了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基本群众多人。信南工作团查明情况，派游击队处决了与粤军勾结的土豪，打死了出卖游击队地下人员的坏人，使共产党在白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游击队的威望日益提高^②。

第五，开展白区工作，发展“红色细胞”。

1935年夏，项英和陈毅指挥红军游击队在赣粤

① 同上书，第254—255页。

② 同上书，第231、234、243页。

边游击区站稳脚跟以后，立即派人去白区和国民党军队中活动，广交朋友，开展瓦解敌人的工作。这些“红色细胞”，利用各种渠道，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传播游击队胜利的消息，收集军事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许多地方建立了联络点，争取许多农民、职工站在共产党一边，一些保甲长变成“白皮红心”，连国民党控制很严的军队中也有了游击队的人，他们常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情报，传递信息。大余县池江区区区长黄承祥，左腿有毛病，走起路来一走一拐，大家给他起了个浑名叫黄老拐，在游击队的教育、争取下，为游击队办了不少事。上犹县有个姓孔的地下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军抓去，由黄老拐出面保释出来；当国民党军要进山“搜剿”时，黄老拐就对山里来赶集的人说：“喂！明天不要乱跑呀，有军队去搜山”。他就用这种办法给游击队带信^①。

项英所布置的白区工作，成效愈来愈明显。到后期，游击队随着情报、信息来源的增多，国民党军队要到哪里去“清剿”，也就很快知道了，可以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埋伏，打敌人措手不及。有时，当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13页。

国民党军军官被打得晕头转向跑回驻地时，写有“……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宣传品，却早已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1937年4月，还发生了国民党军一个班企图投诚红军游击队的事件。驻南雄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一个连长率一个班，携带全副武装，到北山准备投诚游击队，接应的游击队，见这支小队伍后面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以为是敌人假投诚、真进攻，便立即转移。后来得知，这个班在国民党军追击的情况下，没能找上游击队，便把一挺机枪和七八支步枪及子弹交给当地的工人，要求转给游击队，然后换成便装逃走了。项英得知这个消息后，虽为没有接洽上而惋惜，但又为白区工作的成就而感到欣慰^①。

项英为了推动赣粤边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游击队的建设，亲自起草了《红色指挥员必读》和《红色战士必读》，其中对游击队的任务、纪律、注意事项作了明确的要求。

游击队的五大任务是：（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建新红军^②。

① 同上书，第306页。

② 同上书，第120页。

游击队的五大纪律是：（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3）打土豪要执行阶级路线；（4）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5）不准打人骂人^①。

游击队的十项注意是：（1）武器不能离身；（2）说话要小声；（3）行军不能掉队；（4）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5）打土豪要归公；（6）说话要和气；（7）买卖要公平；（8）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9）不搜俘虏的腰包；（10）对同志要友爱^②。

在《红色指挥员必读》中，规定了指挥员的职责、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还对战术、袭击、埋伏和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的要诀提出了要求。

在《红色战士必读》中，除讲清共产党的十大政纲、游击队的五大任务、五大纪律、十项注意外，规定了红军战士的职责和射击、刺杀的要领，还对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以及要学唱《红军歌》、《游击队歌》等都作了讲解^③。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2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这些“必读”，成为干部、战士很好的学习教材，对干部、战士的提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项英为了便于指战员记忆游击战术的原则，还将战术原则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

送终^①。

这首歌诀，是项英对赣粤边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理论的组成部分，受到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欢迎，并为后人研究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史料。

八 新的考验

1936年6月1日，发生了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救国的名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这次事变后，粤军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进攻，并陆续从大余、信丰等地撤走，保安团、“铲共团”也随之龟缩起来。赣粤边游击区持续一年多的紧张形势，突然出现了罕见的平静^②。

项英得知发生两广事变的消息后，立即派交通员分路去请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到信丰的潭塘坑商量，接着召开由各县县委负责人、游击队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17页，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51页。

② 同上书，第14、383页。

长、交通站长和就近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在新形势下怎样开展活动^①。

项英在会上指出：西广事变是两广军阀利用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它说明全国抗日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态度是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要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战争^②。我们要抓住军阀与军阀之间发生矛盾的时机，利用这些矛盾，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向广大群众进行反蒋宣传，打击国民党保安团继续对游击区的进攻，壮大革命力量，扩大游击根据地，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不能变，否则会要吃大亏的。

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两广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产物，它表明革命将要进入抗日的新阶段；要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制订新的策略，开展新的斗争^③。

项英和陈毅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要求，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

① 同上书，第 323、279 页。

② 同上书，第 279 页。

③ 《陈毅传》，第 165—166 页。

会议根据项英和陈毅的讲话精神，作出新的部署，确定抓住这个时机，把游击队适当集中，狠狠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同时派人到游击区外的一些县城和城镇开展工作。

会后，项英指挥各地经过短期整训的游击队，迅速开展了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的活动，相继取得胜利，使信康赣、北山、三南等游击区得到巩固和扩大，从山里向山外延伸，游击队也得到扩大。随后，崇仙、南山、三南游击队合编为三南游击支队，邓金莲任支队长，张日清任政委^①。

同年6月23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它是中国人民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当时正值两广事变之后，赣粤边地区的局势平稳，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和当地群众一样，也在欢欢喜喜地吃粽子。潭塘坑的地下党员李绍仁，知道项英不喜欢吃带咸味的粽子，就特地给他做了几个白水粽子送去。项英见他吃的粽子和大家吃的不一样，就问李绍仁是怎么回事？李绍仁对此作了说明，这是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咸味，正是他所喜欢吃的。项英非常高兴，边吃边对李绍仁说：“感谢你们，感谢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4—15页。

支持。”^①

在这期间，各地根据项英的指示，加强了白区工作，在大余、南雄、龙南等县城开设糖铺、铜匠铺，作为联络的地下交通站^②。

项英对各地游击队和党组织在两广事变后的积极行动，以及取得的成就，甚为满意，认为它标志着赣粤边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两广事变随着蒋介石收买余汉谋，以陈济棠被迫下野而结束。赣粤边游击区较为平静的形势，只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又变得紧张起来。同年8月，蒋介石派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向赣粤边游击区发起了新的“清剿”。它除继续沿用封坑、移民并村、搜山、“抄剿”等手段外，强迫群众出钱出力筑堡垒、办民团，参加“铲共义勇队”；强化保甲制度，撤换一批保甲长；收买落后分子，奖励叛变分子，在交通要道、山头、圩镇修筑碉堡，妄图把游击队封锁在山区，然后逐山“抄剿”。从8月底起，四十六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又对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清剿”^③。

① 同上书，第334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95、第385页。

面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红军游击队内部少数动摇分子由乐观变为悲观，错误地认为革命无胜利指望，失去斗争信心。项英在信丰的油山召开干部会议，指出：两广事变虽为蒋介石所解决，但它阻止不了抗日革命运动的发展，只要我们相信和依靠群众，正确运用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就一定能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①。

项英主持会议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研究了对策，形成了会议的决议（称为“九月决议”）。决议号召各游击队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决议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白区工作，是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两个基本条件。要巩固和扩大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动员群众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筑碉堡、建民团、编“铲共义勇队”的阴谋。决议规定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党既要正确执行阶级路线，又要积极做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搞统一战线，开展“两面政权”的工作，游击队转到白区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②。“九月决议”，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打破国民党军新的“清剿”指明了方

① 同上书，第96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6页。

向，为尔后进入联合抗日新阶段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根据“九月决议”，项英组织以红军游击队和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宣传工作队，从油山出发，分四路秘密进入信丰、大余、南康、南雄等县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传单，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的阴谋，以争取广大群众，扩大了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治影响。许多群众受到鼓舞，奔走相告：“昨晚来了大队红军啦！”“共产党并没有失败，还贴了标语传单呢！”^①

为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在认真总结红军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细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印发到各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当时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②。

与此同时，项英派游击队主要力量跳出国民党军“清剿”的包围圈，到其后方或非“清剿”区去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民团，建立新的基点。游击队在白

① 同上书，第16页。

② 同上。

区的活动，转移了国民党军对游击区的注意力，当国民党军被迫抽兵返回追击时，游击队又伺机从白区转回到游击区^①。

项英领导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调整政策、策略过程中，要求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搞“两面政权”。他们趁国民党撤换保甲长的机会，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开明人士当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他们采取灵活的政策对待保甲长，除最反动的必须惩治外，一般的尽量争取；对有悔改表现的可以既往不咎，争取其中立；在赤白交界地区，主要搞“黄色村庄”。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甲长突然进行“访问”，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利害，提出要求。例如要他们不准危害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当奉命带路搜山时，须事先通知游击队；不准走漏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帮助游击队代购粮食、药品等，进行谈判，并要对方签字盖章。这样，所谓“通匪、济匪者杀”的命令就成为废纸^②。经过反复做工作，许多保甲长俯首听命，逐步成为

① 同上书，第 215 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16、211 页。

“白皮红心”的两面派。

项英领导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的工作，搞得很活跃，逐步由村一级发展到区一级。当时大余县池江区更换区长，有两人竞选。陈丕显带人到较为开明的黄承祥家里做工作，还公开揭露黄承祥的政敌的劣迹，帮助黄承祥在竞选中战胜了对手。黄承祥当上池江区区长后，见到国民党官兵喊“老总”，见到红军游击队喊“同志”。他多次帮助红军游击队买棉衣、毛毯、药品，订购报纸，保释被捕的人员，传递军事情报，掩护地下联络站开展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①。

项英对“两面政权”的建立和扩大，甚为称赞，认为它削弱了国民党军力量，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从而使游击战争得以坚持和发展。

项英根据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残酷的实际情况，确定放宽对有问题人员的处理。对为应付敌人而贴反共标语的群众，不予追究。对个别反水的农民，除造成很大危害者外，一般均采取宽大教育，让他们回家生产。这些政策的调整，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真是顺天理、合人情，仁

^① 同上书，第16、213页。

至义尽啊！”这些情况，很快传播开来，使共产党、游击队的影响日益扩大^①。

项英还和陈毅研究，采取“孙行者钻到牛魔王肚皮里去”的战术，派人打入到国民党军、民团、“铲共团”内部工作。这些人进去广交朋友，不断扩大、扩散，使许多地方都有游击队的耳目。漂塘钨矿局的矿警队里，有十一名矿警成为游击队的人。信丰潭塘坑的锡坑村，国民党筑了炮楼，驻上民团，游击队派进去的人很管用，敌人一有动静，就托人将情报传出来，游击队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伏击，打敌措手不及^②。

对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人员反映的重大情况，项英总是慎重处理。一次，在粤军余汉谋部从事兵运工作的陈宏汇报说：国民党军队生活很苦，怨言很多，有两个连随时可以拉出来。项英当即表示：应当钓大鱼，现在不要急着动，以免打草惊蛇^③。

项英和陈毅确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认真贯彻，领导群众广泛地开展斗争。国民党强迫群众在山里修碉堡，群众一拖再拖，或去些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04页。

② 同上书，第214、235页。

③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110页。

老弱和妇女应付，以延误时日。有的等碉堡快要筑成时，游击队夜里把它炸掉。结果许多地方的碉堡修了好久，也没有筑起来。敌人无法，最后派其军队去筑。群众对出钱办民团，更是拖延和抗拒。对搞起来的民团，就设法派人打入，掌握枪支，使它不为国民党所用^①。

这样，国民党军尽管严加封锁，却未能将游击队困死、饿死，阴谋一再破产。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当时赴南雄检查指导工作的项英，在途中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很快从报纸上弄清了事变真相^②。

蒋介石的被扣，使赣粤边游击区人心振奋，但众说纷云。项英在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研究后，为统一大家的认识，立即写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阐述了事变的原因、意义和前途，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要把抗日救亡的斗争放在首要的地位。

项英为了统一思想，调整部署，很快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确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并提出了

① 同上书，第214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98页。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到抗日前方”的口号。会议要求各地游击队相对集中进行整训，同时要求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迅速做好迎战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新的军事“清剿”^①。

在这次会议讨论过程中，大家对蒋介石会不会释放的问题争论得很热烈。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抓蒋介石，杀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怎么能放呢？有的说得更肯定：“会杀”，“该杀”，“绝不会放”。

项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大家有所不同，说“还有一个放的可能”。

有人不赞成项英的看法，颇有点激动地说：“除非叫你项英处理才有可能放，别人处理就不会有放这个可能！”

项英对那人激动地说法并没有介意，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要是叫我处理，我就放，因为这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②

项英的上述说法虽未能说服大家，但却引起大多数同志的深思，引导大家从国家民族全局的利益

① 同上书，第185、386页。

② 同上书，第333、324页。

来考虑问题。

大家没有就此再争论下去。但仍有人不同意项英的说法，在背后发他的牢骚：“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调！”

不久传来消息，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许多同志说：“还是项英同志的水平高，看得远，看得准！”原来不同意项英看法的人，对他也更佩服了^①。

项英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后，估计国民党军将会发动新的进攻，立即给各县委、各游击队写信，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同时，把北山游击队从油山调回北山，并将信丰两支游击队转移到北山地区，与北山游击队会合，努力筹款，以迎接新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下达密令：务必趁与共方谈判之机，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消灭共产党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组织。于是，国民党军又加紧了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在赣粤边，项英又领导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新的斗争^②。

项英随即同信康赣县委机关由信丰的潭塘坑转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移到上乐钟鼓岭一带活动，领导和指挥斗争^①。

1937年2月11日是春节，项英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当时，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重点仍是信康赣地区，实行蔑梳式的搜索，进行大砍山、大抄山、大烧山，妄图使游击队无藏身之地^②。

项英获得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后，当即布置了反抄山的措施：立即拆除所有搭盖的棚子，机关工作人员到山外隐蔽；游击队转移到山外，配合当地的秘密游击小组，袭击敌人的后方；警告保甲长不得胡作非为。

项英在对反抄山部署后，对中共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说：“好嘛，敌人进山，我们出山，同他们换个防好了。”于是，他和刘符节同警卫班长胡大炳、警卫员曾忠山、丁上淮等一行五人一起，用兜圈子的办法同敌人周旋。当敌人未进山前，他们先在深山密林里隐蔽；当敌人进山“抄剿”时，他们则转移到坑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7页。

外隐蔽；当敌人回到坑外时，他们又转入坑内^①。

同年2月下旬，项英一行五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来到大余县新城平原的鹅湾里村。它位于章水东岸，西岸的新城是一个大集镇，是国民党的区署所在地，有保安队驻守。项英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住了三天三夜^②。

第一天，项英他们在天黑后进村，来到鹅湾里村一个老表家里。本来，刘符节已向老表交待要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可他们刚进来，就有人来看望他们，而且越来越多，向他们问寒问暖，问这问那，还有的送来红薯干、花生、黄元米果，像亲人一样关心他们。有的还说：“反动派造谣说你们在深山密林里住久了，骨瘦如柴，满身長满了毛，像野人一样。现在看到你们，我们放心了。”群众的热情和关心，使项英他们感到温暖和鼓舞。但警卫人员看到人来的这样多，七嘴八舌，觉得很危险，就建议转移去别处。刘符节也有同感，但当他同房东商量时，房东说：“不要紧，你们放心，这里没有坏人。”项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转移不好，会伤害群众的感情，于是，他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7—328页。

② 同上。

们当晚就住在那里^①。

第二天上午，鹅湾里村南狗叫的厉害，是几个白狗子进村了。警卫人员有些紧张，因他们力量单薄，带的都是短枪，且离敌人据点又近。项英很镇静，让警卫员丁上淮找房东。房东说不要紧，有地方躲，随即将他们引到楼上的夹壁墙里隐蔽。半小时后，房东来告诉他们：“刚才是几个白狗子路过这里，抢了几只鸡就走了，没事。”这次惊吓，使他们感到在这里危险，应当转移别处^②。

项英和刘符节商量后，决定转到北面离那里四五里的周屋村。

刘符节带着警卫员先到周屋，通过地下党员联系，找到一个开明绅士家里。这位开明绅士开始讲离国民党军驻地太近，太危险，有些难意。刘符节作了说明：“正因为这里离国民党军驻地近，不至于引起注意，所以我们才考虑到这里来。”经刘符节这样一说，绅士也就答应了。项英对刘符节的考虑和说明，很是欣赏^③。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7—328页。

② 同上书，第328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9页。

第二天晚上，项英一行五人由周屋的地下党员领路，转弯抹角，来到绅士家里。绅士家过道间的楼上堆放许多甘蔗渣，就安置他们睡在那上面。这个过道过往的人很多，门口是个晒场，白天很多人在那晒太阳，说笑，拉家常。他们五个人在楼上既不敢大声讲话，又不敢咳嗽，连大小便也在楼上用尿桶接^①。

事情也真凑巧，差一点惹出大乱子来。那知这只尿桶漏，透过楼板，滴到一个过路的人头上了。

那人很不高兴在下面大叫起来：“谁在上面屙尿！”

绅士赶忙出来赔不是，搪塞说：“是前几天房子漏雨，我用尿桶接漏，忘记提下来，以致滴在您身上，对不起！”

那人雄辩说：“是尿，不是水，还有臊气哩！”说着说着，那人就走开了。

绅士表示歉意，连声说：“是，是，当时桶里的尿没有倒掉就提上去了，很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把尿桶提下来。”^②

项英他们在楼上听了楼下的对话，又惊又好笑。不一会，绅士上楼把有漏的尿桶换了，这场虚惊才算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9页。

② 同上。

过去。

项英他们在那位绅士谨慎、细心而又热情的照顾下，安全地度过了两天两夜。项英虽然没有出门，却布置刘符节出去联系，指挥当地的地下党员，领着游击小组到章水西岸，砍断敌人的电线，散传单，还将标语贴到新城区署的门口^①。

国民党军这次进山抄搜，因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群众嫌“过年乱走不吉利”，吵着要回去，加上传说山外出现了游击队，因而原定五天的进山抄搜，第三天就撤兵回营了。

第四天，项英他们得到消息，进山抄搜的国民党军已撤回据点。于是，他们离开周屋绅士的家里，从容地回到了游击区^②。

当信康赣地区军民进行反“清剿”时，各地红军游击队根据项英的部署，积极作了配合，打击民团，捉拿土豪，有力地配合了信康赣地区的反“清剿”、反搜山斗争^③。

这年春天，信康赣地区由于头一年歉收，加上租税重，造成农民春荒。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0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4、第305页。

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开展闹春荒斗争，一则解除农民的痛苦，二则扰乱和破坏敌人砍山的计划。信丰一带农民向当地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发还征收的粮食接济春荒，未获解决，便哄抢谷仓，挑走七十多担谷子。有的地方强行向地主借粮。对此，国民党当局非常恐慌，赶忙从山里调回军队制止，但又怕激怒更多的群众，不敢过于镇压，并被迫同意开仓借粮。从而使农民闹春荒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并使担任“清剿”的第四十六师顾此失彼^①。

项英在信康赣地区经过一段紧张的斗争之后，很想念当时正在北山指挥南雄、大余地区斗争的陈毅，挂念他腿上伤口是否复发，想去看看这位老战友，并一起交流情况，研究工作^②。

项英和陈毅在斗争中结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互相支持，互相尊重。他经常向身边警卫人员念叨：“大老刘（陈毅）现在不知怎样了？又好久没有见面了，心里真想得慌呢！”

于是，项英在当年3月下旬，由交通员带路，带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4、第305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5页。

上警卫员丁上淮、曾忠山，由信康赣游击区动身去南雄^①。

当项英正要动身去南雄巡视工作时，接到一批报纸，其中香港《工商日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当年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同时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张报纸，引起项英极大的关注^②。

项英在认真分析研究这张报纸后，认为党中央的电报是真的，党中央的提议是正确的，于是立即写信给赣粤边各游击区，在告知党中央电报的主要内容后，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进一步展开，抗日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但要警惕国民党对于游击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25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区发动新的进攻。信中还揭露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投降了”的谣言，要求各地积极配合全国的抗日运动，争取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①。

同年4月，项英在同中共南雄县委讨论工作后，鉴于陈毅已去北山巡视工作，于是立即写信约陈毅到梅岭附近碰面，并约杨尚昆、陈丕显一起去开会，顺便检查一下白军工作^②。

项英和陈毅等在梅岭会合后，共同召开了兵运工作会议。他们听取了做白军工作的人的工作汇报，详细检查了他们的工作，并作了进一步的安排，还确定将白军工作分工由陈毅负责^③。

同年5月初，又发生了国民党利用叛徒妄图诱捕项英、陈毅的严重事件，即“梅岭事件”。

原来，在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搞兵运工作的陈宏在梅岭参加兵运工作会返回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大余城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和中共赣粤边特委曾布置他利用白军关系设法与党中央联系等情况。于是，叛徒龚楚、何长林同陈宏密谋，立即利用

① 同上书，第387页。

② 同上书，第104、第98页。

③ 同上。

这一情况，设置圈套^①。

同年5月2日，正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及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突然接到交通员送来陈宏的密信，称：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大家得知这个信息后，自然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都日夜盼望着同党中央恢复联系啊^②！

陈毅不知道陈宏叛变的情况，只是怕错过同党中央恢复联系的机会，就由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前往大余城接头，先去陈宏家找未遇，便去广启安糖铺，但从远处望见国民党军士兵正在那里搜查。机警的陈毅和黄赞龙躲进茶馆。在这里，巧遇糖铺老曾师傅，老曾告知陈宏已叛变，要陈毅他们立即离开。陈毅和黄赞龙离开茶馆后，就绕道分路回梅岭^③。

原来，叛徒陈宏把信送出后，先在大余城等候项英、陈毅下山，见没有等到，便迫不及待地领着国民党军向梅岭的斋坑扑来。正在站岗的项英警卫员曾忠山，突然发现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报告已来不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5、306页。

② 同上。

③ 《陈毅传》第175页。

及，就大喊：“反动派来了！”同时举枪射击，随即滚下山去。

曾忠山这一枪，不仅向在棚子里的项英、杨尚奎、陈丕显等报了警，又由于打倒了一个敌人，吓得其余的敌人不敢冒然而进。

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及警卫员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冲出棚子，转到树木不多但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蔽起来。不幸的是，正在向项英他们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彭茶妹（大家习惯于称她彭妹子），被敌人抓住，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强不屈，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这位家在南雄的英雄妇女不久牺牲在大余城。

说来也怪，三百多敌人在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搜查近两小时，有的离项英不过几尺远，他的手枪子弹已上膛，准备扣扳机，可万幸，敌人却没有发现他。敌军官气急败坏，下令士兵放火烧山，火随着风势燃烧起来。正在这时，忽然狂风大作，下起雨来，把火苗给淋灭了。敌人见天快黑了，便无可奈何地离去。这样，项英他们得以脱险^①。

陈毅从大余返回途中，不知斋坑出事，竟撞见敌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07页。

人。敌兵要他带路，他先是推拖，后以到路旁大便之名跑掉，直到晚上才赶到斋坑。他在那附近，一直呼喊“老周”（项英）和杨尚奎、陈丕显的名字，还是他的警卫员宋生发辨认出来，于是才会合到一起^①。

项英见陈毅回来，十分高兴。他们在遇险之后幸又重逢，都有说不尽的喜悦。其实，他们俩人分手不过十二小时，却像多年没见面的亲兄弟一样，互相拥抱起来，久久不松手。他们的生死友谊，给警卫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项英和陈毅会合后，简要交流了情况，认为敌人还会再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于是他俩和杨尚奎、陈丕显等一起，转移到北面山上隐蔽起来。

果然，敌人很快重新包围了斋坑，放出猎犬寻踪，用探照灯四处照射，乱打枪，乱嚎叫。

此情此景，项英和陈毅他们在对面山上听得见、看得清，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我们要不是快点离开那里，恐怕就出不来了。”有的还说：“要不是老天爷下雨把火淋灭，我们已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

① 《元帅的风采》，第257页。

② 同上。

风趣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啊！”陈毅的话，说得项英和大家笑了起来^①。

第二天，警卫员曾忠山也找回来了。项英询问了情况。原来，头一天曾忠山滚下山以后，就躲进老百姓家里，买了一把砍柴刀和一升米，装作砍柴人，到山上找游击队，又碰到一起了^②。

项英和陈毅在大山上隐蔽了一天多，没吃一顿饭。因为他们既没有米，又没有做饭的用具。曾忠山把买来剩下的五六两米拿出来，用压扁了的大搪瓷缸当“锅”做饭吃。尽管大家饿得很，但谁也不愿多吃，结果五六两米做出的饭，八九个人还没有吃完。剩下的加上采来的苦菜叶熬成稀饭，又吃了一顿^③。

国民党军为了抓到项英、陈毅，先后调来五个营的兵力，对梅岭及附近反复“清剿”，仍一无所获。至此，国民党精心策划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④。

项英从“梅岭事件”中进一步认识到，指挥机关要更加注意隐蔽，活动方式要进一步改进，否则要出大问题的。

① 《元帅的风采》，第25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同年5月中旬，项英回到了中共信康赣县委的驻地，陈毅和杨尚奎、陈丕显又回到中共南雄县委的驻地，分别投入了新的斗争^①。

梅岭事件后不久，项英从一位保长那里得知，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将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分信康、康赣、信南三个“绥靖区”进行。每区派一营队伍，加上当地“铲共义勇队”，叫嚣要在四十天之内肃清游击队^②。

项英接到情报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立即作出反“清剿”的部署：各游击队要准备四十天粮食，不准白天煮饭，夜间做好第二天的饭，各机关全部转移到三个“绥靖区”的边沿山腰暂住，互相不准来往，一切行装从简，随时准备行动；积极争取落后群众，使敌人失去耳目。同时，命令三南游击队和北山游击队，离开根据地向外游击，以吸引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③。

同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首先“进剿”信南区。各地游击队根据项英的指示，展开了新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6页。

② 同上刊，第308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08页。

的反“清剿”斗争^①。信南游击队转到“清剿”范围外的信丰、龙南边境活动，打击“铲共义勇队”和地主武装，缴枪百余支，筹集了一批经费^②。康赣游击队受地形限制，转到北山地区活动，留下的少数人员和不脱产的群众游击小组混在一起，使敌难分兵民，“抄剿”落空^③。北山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打土围子，捉土豪，缴枪支，恢复老游击区^④。

在项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下，在各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努力下，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清剿”。

同年7月初，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鉴于“分区绥靖”仍无济于事，便将保安团一部配给各县作政治警察队，准备作新的进攻。正在这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被迫于7月11日停止^⑤。

① 同上刊，第30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0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8页。

至此，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九 实行谈判改编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然而项英由于天天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非常闭塞，对这一事变的情况却知道得比较晚。

就在这时，“围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突然于7月11日停止了军事“清剿”，局势骤然平静下来了。项英凭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从征兆中敏锐地预感到：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变！

果然不出所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几天后，项英从报纸上得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立即给陈毅写信，派交通员火速送去。陈毅接信后，立即赶到项英住地。他俩商量后，迅速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分析形势，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①。

项英根据个人和大家对形势的看法，立即写了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3页。

一篇题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和平妥协，同时表示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①。

项英根据当时的形势，还领导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宣传，强调：保卫平津，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华北，就是保卫全中国，要保卫华北，就得实行对日宣战。于是，抗日的浪潮在赣粤边游击区内外迅速掀起^②。

7月下旬，项英通过同情者之手，买到了香港出版的一批进步书籍，特别是从一本名叫《新学识》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适应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确定调整党在当时的国内政策，以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③。

毛泽东的报告还写到：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0、79页。

② 同上刊，第80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1页。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①

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两年多的项英，此时看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所作出的政策调整的指示，如同久旱逢甘霖一样的高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②

7月底，项英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一起开会，学习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对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联合抗日提出的具体要求。他随即以他个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8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1页。

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他指出：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生和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目前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打倒帝国主义是实现中国革命任务的中心；日本帝国主义是现阶段最主要、最凶猛的敌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达到中国民族的解放，无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共合作正是为了联合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抗战，削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力量，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①。文章还指出：我们党放弃苏维埃运动和土地政策及改变红军名称，是为了取得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达到革命的目的，并未放弃这一阶段中的其他革命任务。

项英在文章中，要求各游击区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时，必须严格遵守党中央指示中所提出的条件：一是，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我们党的领导权；二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党的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1—82页。

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三是，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①。

项英要求各地游击队必须遵照党的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力争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他还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如若违反这三个基本条件，就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覆辙。”^②

项英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赣粤边及邻近游击区统一党内外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由反蒋转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的重要思想武器，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项英为了使赣粤边游击区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了解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和陈毅等研究后，立即派人赴各地传达当时形势变化、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赣粤边特委的贯彻意见，告诉各地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游击队应下山集中整训，准备上前线去打日本侵略者。他们为了争取合作抗日的需要，确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

① 同上刊，第 83 页。

② 同上刊，第 83 页。

队正式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①。

当时，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干部思想活跃，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议论纷纷：

有的说：“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十年内战，还能跟我们合作抗日?!”

有的说：“同国民党合作，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也有的说：“这下可好了，不用打仗了。”

项英意识到，在历史转折关头，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一起，于8月初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干部大会，并亲自作动员报告，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必须尽快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②。

经过学习和讨论，赣粤边游击区的广大干部很快弄通了思想，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提高了对停止敌对行动和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自觉性，增强了合作抗日的信心。

8月8日，项英在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

①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20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89页。

新潮等研究后，亲自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联合宣言，指出：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愿意遵照党中央的路线，放弃对政府的敌对活动，停止游击战争，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抗日；同时，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允许抗日自由，呼吁团结抗日，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①。

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马葆珩及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敦促他们协商合作抗日事宜^②。同一天，项英还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命令南雄、大余、信丰、南康、赣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立即停止游击活动，以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

8月25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指出，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已经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待与国民党地方当

^① 同上书，第43—44、第389—390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3页。

局谈判达成协议后，即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①。

为了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项英领导中共赣粤边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宣传，把抗日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投入河流中，漂流到大余、南雄、赣州等地^②。

可是，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反动军警，却借此宣传游击队要“投降”，归顺国民党军队，给游击队发出信件，要游击队负责人出来“自新”，要游击队下山改编，不愿意改编的可以回家种田等等；一些地主豪绅，更是乘机大肆造谣。

为了回击国民党的造谣污蔑，争取政治上的胜利，项英又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以笔战的形式，严厉谴责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同时指出，只有他们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从政治上承认合作抗日，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45—46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2页。

进行谈判，否则拒绝接洽^①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加上日本侵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直接威胁着蒋介石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地位，局势进一步紧张，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赣粤边游击区周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当局的腔调完全变了样^②：

围攻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和大余、南雄、南康、信丰等县县长，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称：“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③

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于8月27日给项英、陈毅送来“感秘代电”专函，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④。

项英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研究，分析了上述变化的情况，认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2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2—313页。

③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22—123页。

④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3页。

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项英和陈毅为不失时机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扩大政治影响，立即提出将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以便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主力相呼应的正确主张。这就同党中央当时决定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在一起，后来确定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想到一起去了^①。

项英为实现其正确主张，一面积积极扩大部队，壮大抗日力量，一面准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

8月下旬，项英又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再次学习毛泽东有关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强调要正确认识国共合作的形势，既要防止麻痹思想，又要防止关门主义倾向。他同时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污蔑红军游击队下山合作抗日是“要求投诚”、“归顺国民党”等情况，要给予坚决的回击^②。

项英根据当时南方各游击区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联络的中断，都是独立自主地行动，消息闭塞，对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更

①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2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90页。

是一无所知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将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通知邻近游击区^①。这也是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应当履行的职责。

靠近赣粤边的邻近游击区，也正因为项英在那里，就很自然地注视着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心所在地赣粤边游击区的变化，主动派人前往联络。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听到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就派其负责人之一的彭胜标到大余县池江，向中央分局汇报情况，接受指示。项英和陈毅接受了汇报，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彭胜标感到事关重大，怕回去讲不清楚，要求派代表去传达。项英和陈毅满足了彭胜标的要求，决定派陈丕显到活动在瑞金一带的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去传达。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②。

绝大多数游击区的领导人，由于较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行新的战略转变，为红军游击队尔后的集中、改编铺平了道路。

项英对应不应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要和昨天你死我活的敌人谈判，是事关重大的问题，本应请示党中央批准才好，但当

①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2—133页。

时他与党中央失掉联系，无法直接请示，而如果久拖不决，又会丧失有利时机。他同时认为，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来说，经过三年浴血奋战，需要通过谈判停止武装冲突，借机恢复联系，进而联合起来，将会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要联合，就要利用谈判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项英从大局考虑，为把握时机，在同陈毅商量、提交赣粤边特委反复研究后，决定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以便停止武装冲突，进而使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联系起来；至于武装冲突停止以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需待党中央决定，游击区无权谈论^①。

接着，项英起草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内容。主要是：

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

要释放政治犯；

要解散“铲共团”；

要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要将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

要保证游击队的给养；

^① 《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69页。

要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

这些，就成为赣粤边和附近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基本依据^①。

项英鉴于谈判的政策性很强，请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他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他与陈毅长期并肩战斗过程中，发现陈毅不仅政治、军事才能强，而且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是一位很好的外交人才。陈毅对要他担任谈判的全权代表，欣然答应。

9月3日，陈毅在和项英商量后，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反政府的军事活动，希望国民党也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同时告诉：一二日内将派代表前往谈判。这个“代电”送到大余城，彭育英当即复信响应，欢迎游击队派一负责人去谈判^②。

项英在领导谈判过程中，强调要按照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条件为基础，掌握五条原则：

(1) 保持红军和游击队的独立性，以及共产党对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3页。

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番号可以改，但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建制单位。

(2) 取得抗日和党的活动的自由。

(3) 释放政治犯。

(4) 游击区内的保甲长要实行民选。

(5) 不准土豪追缴以前的租税和债，不准报复^①。

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就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等问题，开始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而又曲折的谈判斗争。

赣粤边游击区大的谈判有四次：

第一次，9月8日，由陈毅作为全权代表，在池江与大余县政府代表谈判。这次就国民党当局停止武力“清剿”、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停止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造谣污蔑等问题，达成七项初步协议^②。

在谈判中，陈毅曾提出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联合起来等问题，大余县长彭育英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同江西省政府的代表和第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84—85页，第313页。

② 同上刊，第313—314页。

第二次，9月11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保安处参谋长熊滨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当陈毅乘坐国民党当局提供的汽车到达赣州时，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在赣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按照项英事先的指示精神，散发“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等传单，张贴欢迎标语，对谈判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①。

这次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9月12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的代表，在“合作意见书”上签字^②。

16日，熊滨代表国民党江西省当局在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办法”上签字^③。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陈毅根据事先同项英等研究的意见，要求国民党当局将关押在南昌的原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妻子、共产党员缪敏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4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一）第355—357页，1964印。

③ 同上书，第358页。

迅速释放，并通知其来中共赣粤边特委^①。

陈毅返回池江驻地后，迅速向项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汇报了去赣州谈判的情况，其中谈到了军乐队奏起了欢迎乐曲。项英插话说：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不仅表示对陈毅同志本人的欢迎，还表明了对赣粤边游击队的态度，这是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三年英勇奋斗的结果^②。

第三次，9月21日，项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会见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和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主要是：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9月底前，在大余县池江附近集中进行点编；点编后，一切经费、给养都由江西省政府发给，按保安团官兵同样待遇；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第×游击队，在集中改编期间，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令各县政府及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③。

至此，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①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第137页。

② 《元帅的风采》，第259页。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4页。

第四次，9月24日，项英应邀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解决赣粤边游击区以外的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①。

项英在南昌，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正派代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并看到了由中央社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共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政局的变化，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蒋介石迫于形势，到9月22日才批准交给中央社发表，并于23日亲自在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的宣言向全国郑重宣称：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4—315页。

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个“宣言”还讲道：

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①

项英对中共中央的宣言，看了又看，仔细地领会党的政策有哪些变化？对照他们的做法看有哪些不符合的？认为在总的方面是符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个精神的，谈判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据此，他确定将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在此基础上，项英在同国民党江西省代表熊滨谈判后，双方口头谈妥了以下三点：

- (1) 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抗日义勇军。
- (2) 游击区域的老债、新债均废除。
- (3) 在游击队集中期间，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

^① 《周恩来选集》（上）第77—78页。

负担。

双方还商定，其余各项问题，待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决定^①。

9月27日，项英应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上的邀请发表讲演。他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最近代表全党发表宣言，即本乎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我们“遵照共产党宣言，以江西为中心的各个边区已正式宣布取消游击战争，放弃过去各种活动，并愿将各部武装改编为国家的抗日武装，统辖于政府指挥之下，担任前线杀敌之职责。”他还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②。

项英在南昌期间，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驻地——大余的池江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项英还会见了湘赣边游击区的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向他传达了红军游击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54—55页（原载1937年9月30日《明耻日报》）。

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精神。

9月29日，项英离开南昌。行前，他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救国武装的指示精神，略称：

“中国在近年来，由于日阀积极侵略，使民族危机到最后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①

项英这封信，通过报纸，很快向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传播了信息。

为便于同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联络改编的各项事宜，项英确定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在吉安等地设立红军游击队接洽

^① 1937年9月30日上海新闻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71页。

处^①。

项英在南昌期间，催促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立即释放方志敏之妻、共产党员缪敏。据当年10月1日国民党《赣南民国日报》报道：“缪敏女士，江西弋阳人，在南昌军人监狱，被判无期徒刑。此次项氏抵省后，经省电呈何部长（按：指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准，恢复自由。”缪敏获得自由后，于9月29日随项英离开南昌，30日到达赣州。项英对倍受折磨、身体虚弱的缪敏表示慰问，要她到游击区先行调养，然后再继续参加革命活动^②。

10月1日，项英由赣州回到了大余县的池江。他立即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改编的具体事宜。

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他们先在南雄、信丰、全南等县集中，后陆续转至大余县的池江地区集中整训。经过短期整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由三百多人增加到五百多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91页。

② 同上书，第459页。

人，最后达七百多人^①。

中共赣粤边特委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还在大余县池江圩设立“江西义勇军办事处”。当时，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经常在那里活动。一方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当局官员和士绅，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另一方面，接受各地党组织来人的请示汇报，联络各地失散人员，扩大革命队伍，指导各地开展革命活动。这个办事处当时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大有门庭若市之势”^②。

在项英和陈毅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前后，战斗在鄂豫皖、闽西、湘鄂赣、浙南、闽东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先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党中央还请林伯渠、董必武就近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两游击区的谈判进行指导帮助。项英陆续得知各游击区同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取得进展的情况后，甚为满意。

项英为了帮助各游击区了解当时形势和党中央指示精神，派刘新潮去寻邬，联络红军游击队；派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6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6页。

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他还写信给崇义、上犹一带王赤领导的原湘南游击队一部，联络下山改编的问题。王赤接信后，立即率领他领导的游击队从桂东开到池江集中^①。

为履行赣州和南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指示各有关县委、区委，要他们派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的县、区代表谈判。各地谈判均达成相应的协议。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铲共团”全部撤离，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陆续被释放^②。

经过多方努力，各地区终于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达成协议。

项英和陈毅在谈判达成协议以后，决定将赣粤边区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先后集中在潭塘坑、池江圩等地整训。最后，选择在池江圩，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一是，当地群众基础比较好，接近油山游击区，在安全和给养供应等方面都不会有问题。二是，靠近赣粤边特委办事处，便于指挥和组织训练^③。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当局，有的以“谈判”掩护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315—316页。

② 同①。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7页。

其军事进攻，妄图吞并红军游击队，用改编来达到其在战场上所没能达到的目的；有的设置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山，然后聚歼。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丧失警惕，使六百多人的武装先被改编，后于7月16日被缴械，成为闻名的“漳浦事件”^①。消息传来，使项英对谈判、改编更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确保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项英决定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分驻三处，各距五里，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互相策应^②。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整训时，按照项英的指示，把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对党中央在新的战略转变时期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绝大多数同志虽表示拥护，但理解并不深，还有少数同志仍抱着十年内战时期的观点，留恋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对国共合作缺乏认识，认为把帽子上的红五角星摘下换上“青天白日”帽徽是向国民党“投降”。项英针对这些反映，深入到游击队中做思想工作，亲自讲解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讲解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帮助指战员实行战略思想

① 《新四军事人物录》第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57页。

的转变。与此同时，游击队还抓紧学习军事知识，提高杀敌的本领。

在那一段时间里，项英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要领导或亲自去谈判，要做游击队的内部工作，要做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甚至连对外联络的信函也得亲自起草，经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工作。然而项英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因为国民党军通过三年的“围剿”，不仅没能消灭红军游击队，还被迫坐下来谈判，合作抗日；他们三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和其他游击区的红色健儿，同国民党军从对抗到合作，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表现出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胸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四军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自然，项英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赣粤边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在南昌看到有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报道外，他对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方针、原则以及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有不妥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于项英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才有新四军的诞生，才可能成为尔后战斗在大江南北地区的抗日劲旅；反之，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不集中改编参加到抗日的行列，而仍分散在各地坚持原来的斗争，那是不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赣东北和赣北两支游击队拒绝下山集中改编，先后被消灭，就是有力的证明^①。因而，项英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谈判改编的做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符合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1937年9月下旬，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的项英，尽管从当地报纸上间接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但由于没有看到原文，加之对全局情况不了解，是多么渴望同党中央取得联系，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当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时，立即给他们发去电报，并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21页，1963年12月印。

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原文是：

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①。

这是项英在 1935 年 3 月以后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以来，至此始得到恢复。

项英在发出电报后，等了两天见没有复音，因为公务繁多，就于 9 月 29 日急忙返回赣南大余县池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驻地去了^②。

正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此时正为寻找项英而着急。因为党中央领导同志从报纸上得知项英在残酷的斗争中没有牺牲，并正在和陈毅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音讯后，就曾设法联系，准备告诉当时党的政策以及他们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联络上。

就在这时，博古接到了项英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博古在 10 月 1 日将项英的电报转报党中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 40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459 页。

央时，还附了以下两句话：“我们日内派交通带《解放》周刊及文件去，并去电约其来京。”^①

这时，党中央曾有两电提到项英在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10月1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张云逸、南杰、博古、叶剑英等的电报中，说：“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着危险性。”^② 10月2日，洛甫、毛泽东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中，称：“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③ 博古、叶剑英看到这两份电报，愈感到从速派人找项英联络的紧迫性。但此时在赣粤边游击区的项英，并不知道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

派谁去和项英联络？博古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想起才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保释”出来的顾玉良，1928年到1930年曾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担任过交通，认识项英，且已经过审查，恢复了党籍，正

① 同①。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同上书，第41页。

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可派其前往联络。博古和叶剑英把顾玉良找来，询问了情况，要顾玉良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官的合法身份，穿着八路军的军服，佩戴着上尉军衔，拿着办事处的护照，持着叶剑英给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的公函，带着博古给项英、陈毅的亲笔信及文件，去江西找项英联系。博古、叶剑英还对顾玉良交待了在沿途的注意事项，及口头转告项英的话。

顾玉良稍事准备，于10月3日从南京起程，乘轮船，经九江转乘火车，于7日到达南昌。顾玉良乘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提供的一辆小汽车，经吉安，于11日早晨赶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办事处所在地——大余县池江圩^①。

这天早上，从野外跑步锻炼回到住处的项英，以新奇的目光注视着有位身着国民革命军制服的军官，很快就认出是顾建业，略有所思地说：“这不是顾建业吗？你现在哪里？怎么到这里来了？”

此时，急于想找到项英的顾玉良，尽管与项英已七年没有见面，但一看到项英的身影，立即就认出来了，便走上前去，高兴地说：“项英同志，党中央派

① 顾玉良的回忆文章及笔者走访记录。

我来接您啦！”

刹那间，一个听说是党中央派来联络的同志，一个找到了自己要找的同志，都是无比的高兴，热情地握起手来，热泪盈眶，激动异常。因为他们俩在不久前，一个在激烈的战场上同国民党军队厮杀，一个被关在国民党黑暗的监狱里，做梦也想不到会在池江圩重新会面。对于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达三年之久的项英来说，看到党中央派来联络的亲人真是无比高兴，那是长时间梦寐以求的啊！

顾玉良向项英说明来意，先说明自己现在已经不叫顾建业，而沿用被捕时的化名顾玉良了，然后迅速将所带的博古亲笔信、《解放》周刊及文件交给项英，并向项英转达了博古提出的关于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时应注意的事项：第一，负责人下山谈判可以进行，但部队决不能下山。第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据有利阵地，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第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第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就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①。

① 顾玉良回忆文章。

顾玉良还向项英转达了博古的话：要项英按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随他一起去南京。

项英和顾玉良就分别后的简要情况进行交谈后，要警卫员安排顾玉良先吃早饭，再找个地方休息。他自己如饥似渴地打开博古的信看起来。博古10月1日在写给项英、陈毅的信中，首先表达了他对他们的想念之情，告诉红军主力长征和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及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告诉全国抗战展开的情况及对抗战的看法，提醒各游击区在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防止类似何鸣事件的发生。

项英对博古的信连续看了两遍，接着看了带去的文件，翻阅了《解放》周刊上的有关内容。他对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抗战局势的胜利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受到莫大的鼓舞；对于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要防止上当的问题，他暗自思量，引以为戒。

10月11日这一天，项英特别兴奋，也特别忙碌。他简单地吃了早饭，就赶到离池江圩五里以外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驻地，向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传达中央指示，同他们一起研究了谈判和集中、整编等问题，确定杨尚奎担任中共赣粤边特委（后改为赣南特委）书记，并与陈丕显一起负责红军游击队的下山

改编、扩大部队等工作^①。

当时由于交通断绝，三南游击队还没有联系上，无法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他们仍在那里作战。对此，项英十分关注。他请陈丕显带人亲自去南雄、全南一带联系和传达。不久，三南游击队一百余人在政委张日清等率领下，开到池江圩参加整训。

就在这一天，项英还接待了国民党当局的联络官员，直到傍晚才返回池江圩，并确定第二天就起程赴南京。

10月12日上午，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同乘一辆小汽车，从池江圩出发去南昌。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告别，和战斗了三年的赣粤边游击区告别。

项英沿途在兴国等地多次停留，找有关的同志谈话，商谈工作，处理问题，还在兴国做了一套衣服。在安排工作时，项英都没有让顾玉良在场，大概是因为顾玉良当时穿着同国民党军服一样的服装，有诸多不便。

10月16日中午，项英到达吉安，同陈毅进行了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16—217、391页。

长时间的交谈。他请陈毅看了博古的信和中央的文件，就赣粤边游击区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并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向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还用他自己的名义，给陈毅写了介绍信，上面写道：“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①

10月18日早晨，项英一行继续行进，于当晚到达南昌。次日，他到江西省政府保安处找到熊滨，说明他自己因事要去南京，那里的事情由陈毅负责，要熊滨提供包括警卫员在内的三个人去南京的护照。经过一再交涉，直到第二天才拿到护照。

10月20日，项英一行离开南昌乘火车去九江，然后乘船顺流而下，于23日到达南京。由顾玉良带领，到傅厚岗六十六号（今青云巷四十一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博古、叶剑英见面^②。

南京是古都，风景名胜很多，然而项英对它不感兴趣，而是在八路军办事处同博古、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多次的交谈。

① 《红旗飘飘》选编本（二）第562页。

② 《南方三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70页；顾玉良回忆文章。

博古、叶剑英向项英详细介绍了红军主力的长征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变化，“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形势，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决策，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及开赴前线，以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将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等情况，使项英对整个形势和党的政策、部署有了初步了解。博古、叶剑英还将党中央领导人对项英他们在谈判中的担心，也如实地作了转告。

项英在交谈中，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同国民党当局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的谈判，以及红军游击队的情况等，向博古、叶剑英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项英对党中央领导人为他们谈判的担心和批评，理解为对他们政治上的关怀，没有作正面解释，但通过详细介绍谈判的经过及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情况，也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博古、叶剑英听取项英的情况介绍非常认真，对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英勇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他们谈判中进行斗争的情况表示理解。

由于当时抗战形势紧急，上海前线吃紧，项英在南京不便久留，于10月26日离开南京，乘轮船，坐火车，经武汉、西安转赴延安。

就在项英离开南京的当天，博古、叶剑英给洛甫、毛泽东打电报，报告项英已于今日起程赴延安，同时讲道：“因情况不明，项（英）陈（毅）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①博古、叶剑英这段话，实际上是对中央和洛甫、毛泽东 10 月 1 日、2 日两次电报对项英谈判的批评所作的公正、有力的说明。

项英从到达南京和转赴延安期间，《解放》周刊编辑部约他写一篇介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的文章。他怀着对抗战的极大热情，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文，刊登在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公元 1937 年 12 月 2 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期上（后又在 1938 年 2 月 2 日《新华日报》上刊登）^②。

项英在第一次正式反映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的文章中，高度赞颂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用劣等的战器，同拥有优良武器装备、数量超过己方三十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 55 页。

②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 8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倍至五十倍不等的国民党军，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一，保持了南方许多游击战的支点，这些支点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战略的主要支点。”

“第二，保持了经过十年血战所锻炼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将在当前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力量。”

“第三，坚持的为实现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而奋斗。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卒至达到抗日战争的实现。”

“第四，红军主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创造了空前的伟大的事业，我们配合主力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在目前新阶段的开展中，起了推动机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成为目前抗战中一个实际的榜样，对于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项英在文章中，分析了当时抗战的主客观条件，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实际，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缺乏信心的‘恐日病’、‘唯武器论’的失败主义，揭

破汉奸亲日派的和平妥协的投降阴谋。”^①

项英在文章中，讲到了在山地、平原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一般的说来，山地的地形是便于游击战争的，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平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争：第一是广大群众的帮助，第二是游击战术的正确应用。领导者要根据主客观条件灵活的实现自己的行动。当然，没有山地，游击战争的困难就比较的多。”^②

此时，新四军的编组原则还没有确定下来，更没有集中，八路军也还没有在平原地区大规模展开，他就科学地认定在平原地区也可以进行游击战争，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对后来统一新四军指战员的思想，坚定指战员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念，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当时抗战的教训，项英在文章中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要有正确的总的方针，才能领导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经过了最大的代价，却不能获最后的成功。我们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正因为其在共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② 同上书，第79页。

产党的正确方针之下，才能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到底。在目前抗战中，中国军队作了很大的英勇战斗，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受到不少的挫败，……我们应该接受痛苦的教训，只有坚持抗战，实行全面抗战，变更我们的战术战略，才能保证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民众力量是最伟大的。我们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就是依靠民众力量。若是没有民众的拥护和参加，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胜利，而且不能坚持长期斗争以至遭受失败。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抗战只限于政府的军队的抗战，没有成为全民的抗战，甚至惧怕民众参加，是一种自杀政策。”

“第三，我们以劣势的兵力，能与优势的部队作长期的苦斗，这正因为我们的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有经常的政治工作，特别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必须按照革命军队的组织，教育，生活，关系，来改造目前抗战的军队，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样才能保证在持久抗战中获得最后胜利。”

项英在这篇文章中最后指出：“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应该迅速把政府军队的片面的抗战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转变单从正面

的消极防为积极防御，采取侧面的进攻和运动战与游击战，改造抗战的军队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革命军。若是执行了这些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在持久的抗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①

11月7日，项英经西安到达延安，回到了党中央身边^②。从而结束了他和南方红色健儿三年来同党中央失掉联系、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项英本人所说的：“从此以后，我们与中央取得联系，以至得到中央的领导，使我们失掉中央领导、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的我们，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而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③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

1937年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后，洛甫、毛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81—83页。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70页。

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14页。

泽东等领导人当天就前往项英住处看望，对这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表示欢迎，对在南方浴血奋战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项英向洛甫、毛泽东倾吐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对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念之情，他们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日夜想念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盼望着早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早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项英还简要谈及陈毅的情况，转达了他对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之意。

洛甫、毛泽东在交谈中告诉项英：在“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对国内政策作了许多重大调整；组织方面有许多重要变化，包括当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健全了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为军委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将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进展情况，叶挺已被蒋介石于9月28日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党中央在同叶挺交谈，得知“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①的政治态度后，也同意由叶挺担任军长；党中央还确定项英任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57页。

新四军副军长，参加筹建工作。

洛甫、毛泽东还告诉项英：党中央政治局将于12月份开会，听取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届时请他出席会议，并请他介绍一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

洛甫、毛泽东要项英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尽快熟悉情况，并将用鲜血换来的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

对这次亲切的历史性的会见，项英永远留在美好的记忆里。

项英得知叶挺当时就在延安，并在一两日后即将离开延安等情况后，便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前往看望。1926年，项英与叶挺就有交往。那时，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是攻打武昌的先锋，被誉为“铁军”，后来任师长，担负武汉的警备任务；项英是武汉中共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人之一，曾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夺占武昌，并担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项英和叶挺在交谈中，共同回顾了这段美好的往事，并就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第二天，即11月8日晚上，党中央为项英专门

召开欢迎会^①。党中央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参加了欢迎会，洛甫、毛泽东和项英同坐在主席台上，叶挺也应邀上了主席台。

毛泽东在致词时说：我们所以开会欢迎项英同志，是因为他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进行了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连续的“清剿”、“围剿”，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坚持了十多块游击区。这是 we 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的革命力量。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全党同志都应学习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模范事迹，更好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完成党中央所确定的各项任务^②。

项英在讲话中特别讲道：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广大指战员，在那斗争残酷、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意志坚定，斗志旺盛，紧密地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时刻想着党中央，倾听着党的声音，注视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保持着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到

① 叶挺回忆（载中征委《党史资料征集情况》1983 年增刊第 5 号）。王德回忆。

② 同上。

底的坚强信念。他表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参加到抗日的行列里，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各项任务。

毛泽东和项英的讲话，赢得了到会同志的阵阵掌声。

整个晚上，项英都沉浸在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无比欢欣之中。

项英从11月中旬起，在查体治病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党中央当时发出的指示、宣言和文告，编印的报纸和刊物，又听取李富春等同志介绍的许多情况，使他对“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对国内形势分析和对许多重大问题采取的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心里更亮堂了。

11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从外地回到延安^①。他们得知领导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项英已到延安后，很快就到招待所来看望项英。周恩来向项英介绍了同国民党谈判、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彭德怀向项英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抗战的情况，项英向他们介绍了三年来坚持斗争的情况，谈到了陈毅伤腿的恢复状况，并

^① 《周恩来年谱》第392页。

转达了陈毅对他们的问候。这三位都是同龄人^①，又是经过许多磨难的战友，对这次重逢十分愉快，交谈非常亲切，他们相互为对方的幸存、健康而感到高兴。

11月29日，党中央代表陈云从苏联经新疆飞回延安^②，很快就到招待所来看望项英。这是他们两位学徒出身的老战友在分别三年后的重逢。他们共叙了革命情谊，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共同展望了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项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他在没有资料可以查考的情况下，完全凭着自己的丰富实践和顽强的记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了他自1934年10月12日同党中央、红军总部分别后，南方各游击区，特别是赣粤边区三年来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过程、经验和教训，向党中央写出了全面系统的书面汇报，题为《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达六万多字^③，为全面研究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册第57、第66、第78页。

② 同①。

③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107页。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项英在这个报告中，以大量生动的事实，歌颂了南方各游击区特别是赣粤边军民英勇无比的斗争，详细地叙述了三年来各个时期的形势、斗争进程和游击战术，对群众工作、思想教育、党的领导等方面，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方面，项英写道：“我们这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基础是依靠在群众力量上。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不断的‘进剿’，不能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抄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保证长期的给养的供给，使我们清楚了解敌人的情形，而使敌人不知我们的实际行踪，也不能在敌人集中和交通便利的狭小山地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以至最后战胜敌人。”^①

“我们深深知道，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进行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②

在党的领导作用方面，项英写道：“一切斗争的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胜利和失败，对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堡垒，就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至于对付敌人的进攻和转变我们的一切斗争方式，以及战术运用、克服许多的不正确倾向，更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来解决。”^①

在失掉党中央领导的情况下，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呢？项英在报告中写了以下七点：

（一）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这一方面，我们曾进行过学习理论的运动（我们曾带有少量的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右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

（二）要用尽一切方法取得报纸看，能够了解全国形势，不致弄成狭隘的局部的观念，并在干部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在估计政治形势和确定自己的方针时，应该依据全国形势，确定我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26页。

们的总方针。随时依照自己当地的斗争形势，来决定一切执行方针和反对敌人进攻的方法和策略。这样，才不致使我们与全国斗争脱离，同时可以力求我们的斗争与全国斗争的联系。

（三）要在斗争中时时检查自己的方针和策略是否有错误，在斗争中学习一切经验与教训，来帮助对于以后斗争的领导。

（四）以最高警觉性注意时事和敌人的一切动态，以敏锐的观察和分析，加以判断，事先布置我们的工作，以迎击敌人每一次的进攻。

（五）以最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坚持党的正确方针。任何困难情形，绝不动摇，而改变自己的方针。

（六）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艰苦（如二年多不住房子，不脱衣，吃冷饭，喝冷水，爬无路的山等等），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不致受埋伏包围而影响全党。特别是最有力的，这种模范可以帮助克服任何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

在环境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

（七）领导者要常在斗争前线的地区，来观察一切征兆和动态，才能事先指导全党的工作^①。

项英所讲的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方面的体会，是他从亲身的实践中得出来的。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他在那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还把《共产党宣言》、《‘左’派右稚病》一类的革命书籍携带在身边，有空就学一学，看一看，这是他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体现。

项英在报告中讲道，进行思想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增强团结、巩固内部，克服消极现象，将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在那形势变化剧烈、斗争异常残酷的情况下，通过经常的思想和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政治上反对失败情绪和空洞的乐观情绪，在军事上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游击主义、土匪主义，在生活上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从而保持了红军和游击队的政治旗帜。

项英在报告中，还认真检查自己在三年游击战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26—127页，《江西党史资料》（一）第102—103页。

争初期领导方面的缺点、错误。他写道：

“开始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使我们对于整个工作没有及时转变，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影响任务的全部完成。”^①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的实际的开展起来，对于群众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已放弃了阵地的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战术转变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在战略上说是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以期待野战军到达湘西以后，争取胜利的开展，以便配合野战军进行反攻。所以，当时在部队有一个中心宣传口号是：‘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准备配合野战军进行反攻’。”^②

“对于地方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建立和加强，表现得极其不够，甚至在开始为了加强各独立团，将地方许多游击队改编到独立团，削弱了原有的地方游击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③

①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2页。

② 《江西党史资料》（一），第7页。

③ 同上刊，第6页。

项英在报告中，对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连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意图都没有告诉他，毫无埋怨之意；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夸耀，而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找出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这是难能可贵的。

党中央秘书处接到项英关于《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情况报告后，立即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等阅看^①。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十二月会议。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洛甫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发言；项英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作了补充性的说明^②。

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全文如下：

政治局听了项英同志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之后，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集》（上）第208页。

② 同上。

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现在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任务，是在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寇。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①。

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对一个地区的工作作出专

① 《六大以来》（上）第 896 页，人民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门决议，并在不到三百六十个字的决议文稿中，三处提到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项英的名字，确是很少见的。这是党中央对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工作，给予的最高奖赏。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中国党的工作^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精神，迅速传到南方八省各游击区，给红色健儿以巨大的鼓舞。曾在闽北红军游击队工作的陈仁洪，1985年在回忆中写道：1938年2月在江西省铅山县石塘街举行新四军第五团成立大会上，当听到传达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时，大家欢欣鼓舞，边听边激动得流下了热泪^②。

1991年，在那五十多年以后，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编审委员会主任陈丕显领导编写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一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之一而正式出版，对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军民

① 《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第27页。

② 《军史资料》1985年第4期第54页。

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讲道：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多次‘清剿’，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而且造就和锻炼了一批忠于革命，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①

“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所以能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摧不垮，打不烂，拖不散，始终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主要是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万难不屈和英勇善战的结果，是游击区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支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领导的结果。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项英、陈毅在直接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赣粤边游击区各个阶段的斗争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和总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1页。

结了一整套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统一战线的灵活斗争策略，丰富和发展了井冈山时期游击战争的理论 and 实践，使赣粤边游击区在极其复杂和艰难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他们为取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上述评述，不仅客观地反映了项英、陈毅和他们直接领导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历史，而且是对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公证评价。

从革命全局看，在红军主力北上后，在极其艰难困苦条件下，以项英为首的革命队伍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国民党军，对革命全局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21页。

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促使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项英和陈毅及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为能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而感到欢欣鼓舞。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根据统一战线的开展和抗日战争形势，以保存和扩大革命支点为目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全面地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指示在要求各游击区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以后，对武装问题明确指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

严防国民党瓦解和消灭我军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在达成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坚定革命意识，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同时要掩护当地群众工作^①。

党中央这一指示，是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重大决策。然而，项英由于同党中央失掉联系，直至当年 11 月到达延安后才看到中央的指示。

日本侵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后，党中央鉴于上海、南京、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可能很快陷落，领导这一地区广大人民奋起抗战已成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时，长江下游地区广阔，人烟稠密，地形复杂，具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良好条件。因此，党中央及时地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国民党因抗战形势紧急，很快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妄图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来消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就开始了统一整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谈判。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终于达成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一个军的协议。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 12—14 页。

由谁来领导改编后的这支队伍？当国共两党提出的人选未能取得一致时，十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在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回到国内，表示愿意领导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称“新四军”，很快得到国民党当局批准。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经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①。

当时，国民党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有其用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后恐怕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了，于是，他想乘机拉拢叶挺，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拉到自己手里。蒋介石所以同意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以为既可以把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稳定“后院”；又可将他们送往敌后与日军直接较量，以借刀杀人。当然，蒋介石这个单相思并未得到实现。后来的情况表明：叶挺靠近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被国民党监禁五年多以后重新加入共产党；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华中抗战的劲旅。

中共中央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是有个人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43页。

过程的。开始，党中央对叶挺的委任持保留态度，直到10月21日在接到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关于“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①的保证，特别是叶挺11月初到延安同毛泽东等领导人会谈，作出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②的表示后，才赞成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式转发蒋介石的电报，明确将“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③。这是在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谈判之后发表的。后来，10月12日这一天就成为新四军的建军节。

然而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怎样编组为新四军？此时还没有确定下来。

10月30日，洛甫、毛泽东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报中，即已提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④。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54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③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494页。

④ 《新四军·文献》（一）第56页。

这说明，党中央此时已就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问题确定下来。

11月7日，项英到延安受领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后，在考虑编组原则等问题的同时，多次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交谈，请他们为新四军配备一批干部，特别是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团以上干部。他们均答应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和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物色一批干部派去。

项英在同中央组织部商量为新四军调配领导骨干时，除重视军事、政治工作的领导经验外，还注意到尽可能有利于同叶挺军长的协调配合。较早确定的名单有：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广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任师参谋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过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此时正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已与叶挺取得联系，可担任新四军的参谋长或支队长^①。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周子昆，广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册第9—11页。

争和南昌起义，在红军中任过师长、军长、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等职，可任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或参谋长、或支队长^①。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冯达飞，广东人，1924年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担任过红军团、师、军领导职务，可在新四军主管培训干部的工作^②。李一氓，四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早年就与叶挺、项英相识，可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③。项英对调这几位同志到新四军工作是很满意的。

12月14日下午，也就是南京失陷后的第二天下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等问题。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了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了会议。

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其要点是：

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的分布；

红军和游击队对党中央的基本态度，“各游击队

① 同上书，第112—113页。

② 《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第252页。

③ 《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人物卷）第137页。

对中央及朱（德）毛（泽东）信仰很好”；

改编的原则，“各游击区将来要求得发展，须留三分之一的武装，并尽可能多留些，不要绝对集中”。这个原则，显然是根据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图提出的；

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

对加强党和军事工作领导方面的建议。

项英报告后，政治局会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兼任。

陈云、李富春、康生、张国焘、曾山、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

洛甫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便是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干部中、全党中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在山内要稍让一点步，去换得城市工作的开展；目前工作要下山去，开展到大地方去；把老的部队调到前方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扩大影响，发展新的根据地。确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军分会

主要做新四军的工作，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①。

中央政治局这次会议，对新四军编组的方针、原则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最后确定了下来。

此时，叶挺正就新四军的编组问题，在武汉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磋商，并多次致电毛泽东主席。

就在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这一天，毛泽东、项英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按：指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②这就对新四军的编组、部署和干部配备表明了基本态度，还特别强调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尔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① 会议记录摘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62页。

鉴于当时抗日前线形势紧急，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以及尽快解决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王明、周恩来、博古没有等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开完，就提前赶到武汉^①。

项英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与彭德怀离开延安，于12月18日中午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军委派往新四军工作的第一批干部会合^②。当天下午，项英同原红一军团的师政委赖传珠、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原陕甘宁边区粮食局长宋裕和、军委原二局副局长胡立教等见面，听取他们的情况汇报，安排去武汉的行程。他鉴于待去武汉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人数较多（按：据叶钦和1986年6月17日提供的资料称，共五十多人），确定分两批走：第一批由李子芳率二十人，于第二天即19日先起程；其余的为第二批，包括赖传珠在内，和他一起走^③。

12月20日上午11时，项英一行从西安坐火车去武汉。由于当时是在战争情况下，车行慢，走走停停，直到23日12时，才到达武汉大智门车站下车，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63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0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③ 同上。

住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①。

项英到达武汉后，立即与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会面，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中央确定调往新四军的领导骨干的情况，就新四军的有关干部配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当日用电报向中央书记作了报告^②。由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两个机构的成份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在武汉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后向中央建议，将两个机构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以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③。

项英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就同叶挺军长见面，交流情况。他介绍了党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编组原则，介绍了中央对确定调到新四军工作的领导骨干的配备考虑和一批老红军干部的情况，提出了对他们安排使用的意见，与叶军长取得了共识。叶挺表示，中

① 同上书，第104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64页。

③ 《文献与研究》第1986年第1期第31页。

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组建是关怀的，对新四军领导骨干调配的考虑是周到的，表示完全赞成。叶军长还介绍了他从延安回到武汉后对军部的筹备情况，以及招收专业技术干部和知识青年的情况。他们对部队、机关编组和领导骨干的配备进行了研究，认为将新四军军部先组建起来对编组部队和工作展开有利，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项英在同叶挺还就部队组织编制的原则作了研究，他根据国共合作的情况，提出基本上按照国民革命军统一的缩制，但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加强，以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教育部队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作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至于具体编制，他提出可参照八路军的做法，并根据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来定。对此，叶挺均表示同意。他们还根据长江流域文化较为发达、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较多的情况，确定将集宣传、文化、群众工作于一体的军部战地服务团编大一些，人数多一些，并请在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在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的朱克靖担任团长^①。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9页。

项英在与叶挺军长会面后，当晚又与已确定任军部参谋处长的赖传珠交谈，告诉与叶军长共同确定的问题，研究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项，请赖传珠就部队集中、编组和军部机关的编制提出具体意见。

在项英到达武汉以前，叶挺已在武汉大和街二十六号设立新四军筹备处，挂起新四军军部的招牌。

12月24日中午，叶挺军长在大和街二十六号，招待项英和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吃饭^①。项英先将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向叶军长一一作了介绍。

叶挺在讲话中，对项英和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你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必将推动新四军的壮大和发展。

项英在讲话时，对叶军长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他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谈判确定的，是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家为着抗日走到一起来了。叶军长是北伐名将，为新四军的建立作出了努力。希望大家今后要很好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团结协作，加

^① 《赖传珠日记》第104页。

快部队的编组，争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席间，叶挺和项英频频举杯，祝贺新四军这支革命的、抗日的武装的诞生，祝愿大家在抗日的疆场上多建功立业。

当天下午，项英与叶挺交流情况，商谈干部配备方案，安排了近期的工作。

12月25日下午，叶挺、项英和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包括已内定的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信科长胡立教等开会，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当前的工作任务^①。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

在这前后几天，项英除同叶挺、张云逸就部队编组和集中、展开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多次参加长江局的活动，同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一起，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及集中等问题研究了最后的意见，然后由项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

^① 《赖传珠日记》第104页。

民党当局谈判。

项英在谈判中，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在坚持国民党不得插手，坚持共产党对这个军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意在军以下编为四个支队，每个支队编两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这个方案。在隶属关系上，最后确定由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

12月27日，项英向叶挺军长介绍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并就领导骨干的配备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还确定了军部机关部分处长（部长）、科长的配备，以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这一天，项英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并就干部配备提出了建议^①。

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的配备方案^②。项英接到复电后，立即转告叶挺军长。叶挺表示，由他按规定的程序办理支队以上领导干部的任免事宜。

就在此时，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湘鄂赣边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鄂豫边区红军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65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游击队大队长周骏鸣等，先后到达武汉。项英听取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对他们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满意和慰问，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和指示精神，介绍了同国民党当局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的情况，同他们研究了其所属部队的改编、集中等问题^①。

12月29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了同高敬亭、傅秋涛交谈的情况，同时报告，他不日将转赴南昌，指导各地部队集中行动，并约陈毅等在南昌相会^②。

项英正当与叶挺考虑新四军的作战部署时，接到洛甫、康生、陈云、毛泽东12月30日给他和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发来的电报，对长江南北的作战部署提出了意见，指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③这样，新四军编组后的部署，也就大致上明确了。

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很快明确新四军军部和所属江南部队归属国民党第三战区战斗序列，位于江北的第四支队归第五战区指挥。这看出，新四军

① 同上书，第65、67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68页。

军部和大部分部队留在江南，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图，是与在南方保持战略支点的精神相一致的。

与此同时，项英对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筹建也着手进行，副书记曾山也从延安来到武汉，参与筹建工作。

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三十名干部从延安赶到武汉，一部分随即充实到军部机关各处（部）^①。

1月4日，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项英率领动身去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继续办理交涉等项工作^②。

这天上午9时半，项英在去汉口乘船前，同叶挺、张云逸、曾山、周子昆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这是项英担任新四军领导工作后的第一张照片。

888

二 编组前后

1938年1月初，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

① 《赖传珠日记》第109页。

② 同上。

被委任为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员^①。

此时，新四军编组虽大体确定，但经费困难，枪械缺乏，叶挺在武汉继续进行上层活动，于1月15日飞赴香港，筹款购买武器，因而领导部队编组和集中等工作，自然主要落在项英身上^②。

1月4日晚10时，项英和张云逸、曾山、周子昆一起，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武汉乘江裕号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于5日上午9时抵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到达南昌车站，7时驻进书院街高升巷新兴公馆^③。

随后在1月28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新四军司令部的启事，称：前在汉口大和街念六号军部已移往南昌，一切公文信电均速投南昌三眼井本部^④。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新四军军部已在武汉成立。

新四军军部进驻南昌后，部队编组和集中等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全面展开。

项英到达南昌后，立即同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70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09页。

④ 《新四军·文献》（一）第79页。

总接洽处”的陈毅会面。他向陈毅介绍了他俩自赣粤边游击区分别两个多月来的情况，着重谈及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和组织领导的决议、同国民党当局关于新四军具体编组达成的协议、领导骨干配备和军部机关组建等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他的问候，陈毅则介绍了同各游击区联络的情况。

就在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南昌的当天晚上，从福建、广东、赣南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①。项英在当时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热情地接待各地的战友，听汇报，谈问题。

1月10日下午，顾玉良陪同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叶飞等到达军部^②。这是顾玉良又一次奉博古、叶剑英之命去执行的联络任务。

项英对黄道、叶飞等的到来，表示欢迎；对顾玉良出色地完成联络任务，甚表称赞。项英见他们旅途疲劳，就安排他们先休息，而后再谈工作。

后来，顾玉良1984年在《一张照片的由来》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① 《赖传珠日记》第110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10页。

我们一行八、九人，赶到军部是下午三、四点钟。见了项英、陈毅、张云逸和曾山同志等，因一夜未睡，又是天色已晚，项英同志让大家早点休息，一切待明天再谈，并让司务工作的同志招待吃饭和休息场所。由于军部才宣布成立，设备极为简单，多来了几个容人，床铺、被褥都不易解决，经司务工作同志努力，勉强解决了黄道、叶飞同志等的卧具。因此，项英同志叫我同他睡在一个大铺上，他看我盖的被子太薄，又给我一条军毯盖上。

第二天，项英分别找黄道和叶飞同志谈了话，我亦向他报告了从11月初接受博古、叶参谋长交给我的任务和要求后，从南京出发到现在的工作情况，并根据他的指示向军部会计报销了“八办”所领的预支经费和应退余额。……^①

从顾玉良的回忆看出，项英当时工作是十分繁忙，对下面同志十分关心，反映出他那种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① 顾玉良回忆文章，刊《大江南北》1986年第3期。

第二天，项英在听取黄道、叶飞的汇报后，传达了党中央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与改编为新四军的决策，介绍了关于部队集中改编的安排，同他们研究了其所属部队编组和集中事宜。

1月14日，项英向长江局和中央报告：黄道、叶飞已到南昌，拟将黄、叶两部合编为三支队。项英还提议，黄道担任东南分局委员，以加强领导^①。这一建议，迅即得到批准^②。

项英还同来自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的代表曾昭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决策，询问他们各游击区和游击队的情况，同他们研究了部队改编和集中等事宜。

在这期间，项英召开中共东南分局成立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的指示，研究了分工和近期工作安排。会议确定，为便于展开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由黄道任办事处主任^③。会议研究了当时紧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54页。

迫的任务，主要是传达党中央的新政策，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并对赴各游击区传达、动员工作作了具体分工。

1月16日，按照东南分局的安排和部署，项英和曾山动身去湘赣边游击区^①。他对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指战员表示慰问，对他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钦佩，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的指示，动员部队迅速集中下山，并同中央湘赣省委书记谭余保和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等研究哪些人集中、哪些人留下，确定由段焕竞、刘培善率湘赣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留下一部分由谭余保领导坚持斗争^②。

项英在湘赣边游击区期间，谭余保除汇报工作情况外，还对他们不久前怀疑陈毅是“叛徒”、不是“党代表”，致使陈毅受到委屈，并险遭杀害一事，进行检讨。项英指出：在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是对的；陈毅确是作为中央分局代表来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的，搞不清楚时慎重处

① 《赖传珠日记》第111页，《新四军·文献》（一）第90页。

② 段焕竞同志1986年12月谈话记录。

理也是可以理解的；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接受经验教训，适应战略转变的形势^①。

1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行到达大余县池江，回到他领导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同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们会面^②。在那里，项英对干部们讲话时说：他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就像久别的孩子找到母亲一样，百感交集，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他讲到，党中央对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是非常关心的，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现在终于胜利解决了。接着，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阐述了当时合作抗战的形势，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及展开、发展的情况，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将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项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作了研究，确定集中主力编为一个营，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这支队伍随后于2月15日从池江出发，开赴皖南集中^③。

① 段焕竞同志 1986 年 12 月谈话记录。

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 285 页。

③ 同上。

项英在赣粤边游击区期间，同特委研究了留下坚持斗争的骨干。包括：杨尚奎仍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刘新潮任信丰县委书记，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保护游击区人民的既得利益；对于赣州、瑞金、于都、吉安等地的地下工作阵地，也作了研究和部署。

项英还到兴国等地对党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看望了同他们共度难关、有深厚情谊的父老乡亲。

项英这次重返赣南，到了那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山山水水，触景生情，感慨颇多。他对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赣南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对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党的忠诚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何叔衡和红军优秀指挥员贺昌、蔡会文以及大批革命先烈、表示深切的怀念；对那些英勇无比、万难不屈的游击队健儿、表示热烈的慰问。

在项英赴湘赣边、赣粤边的同时，根据东南分局的安排，陈毅去皖浙赣边区，张云逸去闽赣、闽东及闽西南地区，传达指示，集中部队；还请温仰春、黄道、叶飞等回去传达指示，集中部队^①。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89—90页。

项英赴各地动员部队集中过程中，由于携带着电台，随时可以和军部联络，机关也可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工作方便多了。

2月6日，项英在出行途中，接到军部参谋处来电报告：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蒋介石的命令，限新四军于2月20日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一带。军部同时电催项英迅速返部^①。

2月12日，项英和曾山从赣南回到南昌。在这前一天，叶挺军长从武汉到达军部^②。

当天晚上，军机关为欢迎叶军长和项副军长举行军人大会^③。由于张云逸参谋长下去集中部队未归，会议由周子昆副参谋长主持。他对为新四军的组建而奔波的叶军长、项副军长胜利归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

项英在叶军长讲话后，接着作了讲话。他首先说：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编组原则和组织领导，早已确定下来；编组方案已定，正在组织实施；原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游

① 《赖传珠日记》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15页。

③ 同上。

击队的下山集中，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按计划进行；领导骨干大部已经确定下来，包括军部在内的各级组织机构正逐步健全；经费、被装供应得到初步解决。所有这些，都为我们部队开赴前线杀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项英继而讲道：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来自八省，军机关的人员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地方，都是为着抗日这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的阅历不同，特点不同，但抗日的目标相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最重要的是严密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开拔工作，注视各地的动向，使部队尽快而又安全地开赴集结地区。

2月13日，项英参加叶挺军长主持召开的会议，听取副参谋长周子昆和参谋处长赖传珠汇报部队编组、集中情况，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项英介绍了去湘赣边和赣粤边游击区动员部队集中的情况，强调当时军部机关着重抓好部队集中的工作。鉴于部队集中后的驻地及增加经费等问题急待解决，叶挺决定由他率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一起去皖南屯溪，找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

① 《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涉^①。

2月14日，项英在陈毅、李一氓动身前，关照他们去皖南时，要很好地察看一下岩寺一带地形，了解当地民情，并同在三战区两个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多了解一些情况，为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地区的集结作准备^①。

从2月中旬起，项英组织军机关一面研究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的问题，规定了各支队的行进路线，下达了集中的通知；一面继续抓部队编组的落实事宜。

2月19日，项英和曾山一起，会见闽浙边游击区负责人刘英派来的代表龙跃、余龙贵^②。他们对他们在闽浙边进行三年的艰苦斗争表示慰问，听取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以及军部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由粟裕率领集中编入新四军、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的安排。项英鉴于涉及闽浙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安排，关系重大，请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军部前往浙江传达和部署。不日，曾山随龙跃、余龙贵前往浙江^③。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5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16页。

③ 《新四军·文献》（一）第90页。

2月16日，项英给中共中央长江局并党中央写信，详细报告部队动员和集中、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造谣破坏和保安团的挑衅等情况后，对当时工作提出了十点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纲要”来指导工作，加强对外的宣传^①。

到3月中旬止，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均已获得任命。除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上是政治委员）^②外，张云逸任军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3月18日，毛泽东在任命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致项英的电报中，还特别说明：“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③这看出，毛泽东对袁国平的评价很高，是很可以信赖的。

其实，项英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了解袁国平，知道他是湖南籍的一位老同志，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担任过师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有丰富的政

①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上册送审稿第95—96页，1986年印。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106页。

③ 同上书，第88页。

治工作阅历和领导经验，因而对他来新四军工作是很高兴的。

在此以前，项英曾建议中央，让军分会副书记陈毅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或参谋长，中央亦曾有此考虑，后来由于一支队要深入敌后，担负独立的、重要的任务，需要有政治上强、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人来领导，故最后还是确定将陈毅留在一支队任司令员^①。

到4月（个别的到5月），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省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又称闽南）、皖浙赣边（又称赣东北）、浙南（又称闽浙边）、闽北（又称闽浙赣边）、闽中、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高度分散于四十多个县的情况下，在当时交通困难、通信联络落后的条件下，胜利地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进展是比较顺利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正如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58、第62页。

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① 其所以能够如此，主要靠党的正确领导，靠红军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靠久经考验的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其中自然也包括项英的辛勤劳动。

各地红军和游击队在集中时，遵照党中央关于保持战略支点的精神，都留下少数武装或骨干、武器，以便就地坚持斗争，保护红军和游击队的家属。在那十年以后，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曾镜冰）、闽浙赣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魏金水）等游击武装，都是在当时为保留南方战略支点而留下坚持斗争的骨干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项英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的情况非常满意。他们集中的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红色健儿对形势认识比较好，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接受和理解。这是红军和游击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伟大胸怀，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四军的诞生作了准备。

但是，当时也有少数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接受党的教育，不愿停止土地革命，拒不下山改编。原活动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177页。

在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由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不仅拒不下山，而且还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加以杀害。原活动在赣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由刘维泗领导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并且杀害了党派去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拒绝下山的游击队，后来均被国民党军消灭^①。项英后来得知上述情况后，对这两支革命武装的损失，甚为惋惜；对少数领导人不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导致部队损失，十分气愤。同时，他从这两支游击队拒绝集中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首先应实行战略思想转变的极端重要性。

新四军的编组，原定编为四个支队八个团。根据部队集中的实际情况，编为四个支队十个团，共一万零三百余人，六千二百余支枪^②。项英感到，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编成的，就是红二十八军也属游击队性质，装备差，游击习气浓厚，这是和由原红军正规部队编成的八路军所不同的，然而，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军队，因而他又相信能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任务。

对新四军的由来、编组和集中后的任务，项英在1938年6月15日发表的《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作了简要的概括。其中讲到，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色健儿，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的；二是以原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留下的种子；三是红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新四军的编组已经完成，军部“1937年底，即先在汉口成立，到1938年1月移到南昌”，部队分为四个支队，业已在江西、江北集中完毕；在点验和稍事整顿后，已开赴敌后，打击日伪军^①。

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原来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实现的一个重大成果。它对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项英看到这些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经过浴血奋战、千锤百炼的指战员，将很快开赴抗日前线，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96—102页。

对项英在新四军编组过程中的作用，陈毅给予充分肯定。他在1940年10月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①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迅速改编和集中，为南方抗日军民赢得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为尔后挺进敌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 向敌后挺进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以一部沿长江向皖南进犯，芜湖、当涂等城镇及沿江地区很快陷于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军仓皇撤退，汉奸应运而生，土匪到处敲榨勒索。广大人民群众陷于国破家亡的痛若境地，迫切地要求真正抗日的武装早日到来^②。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一、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分别于4月初进到安徽歙县岩寺地区和舒城、庐

① 《云岭》第28期第9页。

② 《新四军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38页，安徽大学历史系1980年10月印。

江地区集结^①，第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稍后于4月18日到达岩寺^②。

项英和叶挺根据部队向岩寺开进的进展情况，组织军部机关和直属单位从3月下旬起，陆续由南昌向岩寺移动。由周子昆率军部参谋处等部门的部分人员，于3月28日乘两辆汽车赴岩寺，先行展开工作。项英随军部大部于4月4日乘汽车离开南昌，途中在景德镇停留一晚，于4月5日下午抵达岩寺^③。

项英在南昌行动前，应邀向战地服务团作报告，着重讲如何进行战区的群众工作。他指出，我们新四军所以从事群众工作，首先是由于它是一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其次是它本身纪律严明，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他要求服务团到达战区后，要加强群众工作，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新四军是抗日的人民军队。同时，他要求部队用多打胜仗和纪律严明的实际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④。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304—305页。

② 同上书，第305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20页。

④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50页，1939年出版。

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到达岩寺地区后的分布是：军机关和直属队驻岩寺，项英和叶挺等住在岩寺镇的金家大院内；一支队驻扎在潜口；二支队驻扎在琶塘、琶村；三支队驻进西溪南、砖桥^①。

当第一、二、三支队到达岩寺地区后，项英和军长叶挺、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等一起，立即赴各营地，看望来自南方十二个游击区的红色健儿，询问部队的情况，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项英在对第五团指战员讲话时强调指出：我们虽然改编为新四军，但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战术基本上还是游击战，过去大家打的是山地的游击战，将来打的可能是平原水网地区的游击战，基本原则不变，但作战的具体方法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作些改变^②。

各支队到达岩寺地区后，根据叶挺、项英的要求，在进行组建的同时，抓紧短期整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调整健全组织，开展军事训练，改善武器装备，补充物资弹药，抓紧病员治疗，为进军敌后作准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28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28页。

备。

同年4月中旬，项英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岩寺鲍家祠堂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欠江北第四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首先介绍叶军长和军的其他领导干部同大家见面后，作了长篇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胜利会师的会议。它表明在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革命的正义的力量，不仅在斗争中没有被消灭，而且是不可战胜的；它的集中，将形成铁的拳头，像八路军那样，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它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影响，必将有力地增强全国人民抗日的胜利信心。如今，我们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不再叫红军了，但我们是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这一点，大家要牢牢记住^①。

项英还讲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极为重视，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找叶军长和我去延安专门研究，确定了编组原则和组织领导机构，还给我们派来许多老红军来担任军、支队、团的领导工作。这对新四军的

^① 《大江南北》1989年第6期第14页。

成长、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接着，项英要求各单位在岩寺一带集中过程中应做好五项工作：一是，继续搞好部队组建，健全组织，特别是军事、政治机关的人员要尽快配齐，明确和履行职责。二是，充实部分装备，配发军需物资，抓紧武器的修理，提高完好率。三是，利用出征前的宝贵时机，进行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熟练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杀敌本领，同时要研究日军的战术，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四是，加强政治教育，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激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五是，大力做好群众工作，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宣传和证明新四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以取得群众的支持^①。

项英在讲话时，要求各单位特别注意三点：第一，要增强团结。不论是来自那个游击区的，还是来自红军主力的，都是红色的健儿，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要搞山头，不要搞宗派。同时，要搞好与外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28—229页。

部的关系。第二，要发扬优良传统。各单位的前身红军游击队，都有光荣传统，特别是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在新的斗争中很好地发扬光大。第三，要很好地尊重和服从叶军长的领导。叶军长是北伐名将，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治军经验，希望大家要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听取叶军长的指挥，努力地完成作战和各项任务。

叶挺军长在会上讲了话。他对中共中央派来的红军老干部，对来自各游击区的干部，对各地为抗日而参加新四军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在讲话中坦城地表示：“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惧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就折了回去。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地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支持下，坚决抗战到底！”^①

① 《大江南北》1989年第6期，第4页（张凯等回忆：《新四军军部创建时期的情况》）。

陈毅作为军分会副书记，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介绍了当时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和国共合作的进展情况。他要求大家在中共东南分局和军分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

新四军到达岩寺一带集中、整编后，国民党当局要求上报花名册，接受“点验”，然后才能发给军饷和军需物资，才能允许开赴抗日前线。第三战区派其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率领一批军官前往岩寺负责“点验”。这些官员声称：以现有员额定编，今后如超编扩编，将以“破坏国民政府领导，违背抗日纪律”论处。

项英面对“点验”这个棘手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显示威风，对付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是想通过点验来卡新四军的编制员额，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八路军在华北以开赴抗日前线为名，拒不接受“点验”可以办得到，但新四军在皖南不接受“点验”就办不到；如果矛盾扩大，就会影响到军饷和物资发放，推迟向敌后出动的时间；为了顾全大局，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机，只能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设法对付。于是，他和叶军长、军分会成员商量，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研究确定：在表

面上热情欢迎，在生活上款待好，并请叶军长着重陪同罗卓英，因他俩都是中将军衔，既是广东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称得上是“将对将”；同时，由项英作为新四军参加“点验”的代表，领导军直和各支队进行应付^①。

项英对应付“点验”作了周密安排，要求各单位把花名册编造好，人数不足的可以临时调集拼凑，负责陪同“点验”的干部对现场出现的情况要灵活处置。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就从宣传队抽调杨明等十多人专门负责造花名册的工作，每个连按一百二十人左右造名册^②。在“点验”时临时拼凑，用乙部临时补充甲部，用丙部临时补充乙部，又用甲部临时补充丙部，以凑足名册上的员额。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使“点验”的官员在现场找不出多大破绽。

“点验”结束后，罗卓英提出：新四军的士兵瘦弱的多，缺乏训练，装备差，人多枪少，应对现有编制再加压缩。叶挺和项英研究后，答复罗卓英：人员体质，通过调理可以增强；缺乏训练，可以补课；武

① 《叶挺将军传》第 291 页。

② 《皖南星火》，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 页。

器不好是事实，早已报请军委会和战区顾长官解决，希望罗副长官回去后多帮助美言几句；至于人数，可以按“点验”的要求再作调整。

本来，项英和叶挺原定要在内部作一次调整的，现趁势立即调整，将“超编”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充实到基层，一部分调到军机关（各支队宣传队先到军部服务团集中，后又返回各支队），一部分干部集中培训。鉴于军教导队培训骨干的任务重，立即改为军教导营。该营第一期学员，于4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①。

这样，项英和叶挺一起，把“点验”的事敷衍了过去。

新四军皖南部队集中后，首先面临着怎样部署的问题。2月14日，项英从赣南返回南昌两天后，和陈毅一起研究，向毛主席建议：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任务，机动地完成；到苏浙皖边广大的地区，就可以自由进退^②。这是关于

① 《赖传珠日记》第123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211页。

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确定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供了参考。

第二天，即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①毛主席的这个复示，为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在这时，传来了国民党当局划给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第一、二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镇江以西，东西不过一百余公里，南北仅约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东南不到一百公里，南北不到五十公里；第四支队，在皖中的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东西不到一百公里，南北不到五六十公里。这个狭小的地区，河川水沟纵横交错，铁路公路密如蛛网，日军据点星罗棋布，军用机场多处建立。因此，在这个地区活动，

^① 同上书，第212页。

敌人陆海空军可以随时从四面八方联合进攻，机械化部队可以任意驰驱，而新四军既无崇山峻岭可以依托，又缺茂林修竹能够隐蔽，部队行动受到许多限制。加之国民党委任反动政客和土豪劣绅担任这个地区的县长、专员，网罗特务武装组成忠义救国军，以及在敌占区相继建立的汉奸组织维持会，就使新四军进入敌后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局面^①。

项英对国民党这种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看得很清楚，然而他以抗战大局为重，还是想方设法组织部队向敌后挺进。他在4月初到达岩寺后不久，就遵照毛主席关于苏南最有利于发展的指示精神，确定派先遣支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了解与侦察前进的路线与作战的情况，以便于部队的开进”^②，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项英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复电。原文是：

项：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① 《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38—42页。

②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34页。

毛泽东

24 日^①

项英接到毛主席的复电后，立即同叶军长、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和军的其他领导人作了研究，确定从第一、二、三支队抽出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为了便于开展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又从战地服务团抽出熟悉江南民情风俗、和苏南群众语言相通的十名团员，随先遣支队前往。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司令员。

项英让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先行出动，是经过考虑后确定的。他考虑到先遣支队单独到敌后活动，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而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粟裕既有指挥主力部队作战的经验，又有在浙南领导打游击的经验。因而他一经提出，便得到叶军长和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4月26日，项英在军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对先遣支队的出动作了动员^②。他在说明当时的抗战形势，派出先遣支队的重大意义之后，列举了挺进敌后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当时日本侵略军虽然占领着城镇和交通线，但不能控制整个沦陷区，日军夜间都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15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23页。

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据点与据点之间空隙很大，少则十里八里，多则一二十里，我军可以利用这些空隙进入敌后。他要求先遣支队各级干部：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要以最坚强的意志和耐心，运用机动灵活和妥善的战术，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了解情况，为我军的展开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①。

就在这次大会上，项英还介绍新到任的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大家见面^②。他扼要地介绍了袁国平的革命斗争经历，称赞袁国平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受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和锻炼，是由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挑选后派来的。他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各级领导都要重视政治工作，积极支持政治机关开展工作。他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尽快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广泛地开展政治工作活动，动员和保证部队胜利地进行战斗。

4月28日上午，先遣支队出动，项英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在岩寺镇外，欢送先遣支队的二百多名指战员出征^③。他看到这些佩带着“抗敌”臂章的指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16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23页。

③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11页。

战员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心里十分高兴，嘱咐他们早日传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捷报。

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从接到批准的电令，到具体编组以至开动，实际上只用三天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

4月29日，项英向毛主席和长江局报告：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于28日出发，各支队不日将陆续跟进。项英在这个电报中，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报告了他提出的新四军作战方针和战术原则。他说：

……我们的方针是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团结群众，采取小部队的动作，开展胜利的作战，以求达有利条件，逐渐壮大自己，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而进到大的运动战，消灭较大的敌人。因此，在战术上目前主要原则是：

一、以小部的动作，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主要是破坏交通，截击运输。

二、在最优良的条件，集中力量消灭劣势敌人后，即迅速分散。

三、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避免硬打强攻和相等的敌人决战。

四、创造很多基点，构成游击网，进行

突击的动作。

五、取得更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配合行动。

六、求得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避免持久决战。

七、时时处在主动地位和敌人侧翼活动，避免正面冲突^①。

项英所强调的采取小部队动作，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对新四军当时的情况，无疑是符合的。

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的了。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16—217页。

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的战争。”^①

在那十天之后，即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指出：“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②

项英接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到向敌后发展是一项重大决策，也和原定的部署基本一致，于是在告知叶军长的同时，立即转发陈毅、张鼎丞、粟裕、傅秋涛等，要他们认真贯彻落实。

此时，新四军各支队正在整训，为向敌后挺进作积极的准备。项英和叶挺军长一起，向全军发出了战斗号召：“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他们向全军指明，新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15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112页。

四军素以山地游击见长，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敌人作战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弱点；但我军另一方面素能团结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是开展游击战争最基本的条件。他们要求全军：“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①。

新四军各部队广大干部战士通过学习，分析了敌情我情，既看到敌人武器装备精良的优势，又看到敌人在异国作战、情况不熟、兵力不足、民众仇恨等弱点；既看到我军的不足，又看到我军的优势和特长，加之通过整训使战术技术水平有了提高，从而鼓舞了奔赴敌后抗战的勇气，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

在部队向前移动时，项英随军部由岩寺移至太平县，后又移至南陵土塘。

5月12日，项英在军部接到第四支队的报告：进至皖中巢县抗日的第九团第二营和侦察队，于当日上午在蒋家河口设伏，毙伤日军二十余名，缴枪十余支，伏击的指战员无一伤亡。

蒋家河口首战告捷的喜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66页。

上报，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5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专门刊登了这一胜利的消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祝贺的电报，原文是：

叶、项军长吾兄：

□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中正 铣日^①

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开赴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胜仗。它戳穿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大江南北抗日军民的斗志，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6月1日，陈毅率第一支队从南陵出动，向苏南敌后进发。张鼎丞率第二支队稍后进入宁芜铁路和宁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活动。在一支队出动之前，项英赶赴潜口，看望部队，向一支队的干部讲话。他强调苏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要求一支队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深入敌后，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开苏南的抗战局面，建

^① 《党史通讯》1987年第8期第48页。

立茅山抗日根据地^①。

6月15日，项英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陈毅率领的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经在溧水的剧新桥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支队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两侧山地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三支队以一个营在芜湖至宣城的公路两侧活动，军部及三支队位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人翼侧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到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②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并未提出异议。

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面的韦岗（今丹徒县境内）设伏，毙伤日军土井少佐以下二十余名，击毁汽车四辆，缴获军用品一部。这是新四军在江南的首战，是苏南抗日游击战争的良好开端。

项英接到韦岗战斗胜利的报告后，十分高兴。他在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的基础，我们正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

① 原第一支队作战科长吴肃 1985 年 9 月 26 日提供的资料。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 219—220 页。

学习。”^①

项英在给陈毅的信中，还指出：

“一支队顺利地到达指定地区，目前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提高。建立根据地，是在执行这个任务中同时并进。因为胜利，是争取群众、创造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建立根据地是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②

“游击战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护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点和近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其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③。

“你们目前应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包括新桥之西北山地），并在镇（江）句（容）之间山地及丹阳西北山地建立基点，依靠这些基点向四周游击，特别是便于施行不断的破坏扰乱。每一基点可设置一个营，另组织几个挺进队，一向南京，一向武进、常熟、无锡间，一向武进、金坛间游击挺进。主力主

① 同上书，第 230 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 230 页。

③ 同上。

要集结于茅山、瓦屋山、新桥一带，策应各方，以及配合各地争取战斗胜利”^①。

“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②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刚进入江南，也正是日军大举进攻之时，战局发展很快。项英在给陈毅信中所讲的“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是以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中国为前提的，这和他6月15日给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电报中所讲的“在某种情况下”，其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当时急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一种预测。项英把自己对战争形势的看法通报给陈毅，也同时报告党中央领导人，这对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是很正常的。

然而项英这个部署，后来却被有人说成是搞“三山计划”，有意保存力量，不向敌后发展。这是站不住脚的。

项英在给陈毅的信中，还指出：“对于地方武装的方针，是帮助和扶植一切民众武装，使它发展扩

① 同上书，第231页。

② 同上书，第234—235页。

大。中心是争取同我们一块抗日，达到统一指挥，建立纪律，洗刷坏分子，学习和开展游击战。我们除此以外，主要加强政治教育的领导，不仅在名义上归我们指挥，……而最重要的争取在我们政治领导之下，进一步派人到里面去作领导工作，在行动上受我队指挥和共同行动，创造成为我们新的部队基础，并逐渐吸引一部编入我军，本身继续扩大。最基本的是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建立党，以树立党的领导。”^①

历史的发展表明，项英在致陈毅信中所提出的上述各项意见，基本上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也为在苏南地区战斗的一、二支队指战员的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的。

在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指挥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项英当时是认真的、积极的。从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完毕到先遣支队出动，相隔只有十多天；从毛主席发出“五四”指示到一、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前后也不过一个多月。这看出，有些人后来指责项英拒不执行毛主席的“五四”指示，滞留皖南是缺乏根据的。

6月初，叶挺根据自己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实际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31、232页。

情况，向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建议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事宜^①。毛泽东、洛甫于6月9日复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告项英：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②。

6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南陵县土塘村驻地，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各支队、各团参谋长和军部参谋工作人员约二十人参加了会议。项英到会作《指挥机关与参谋工作》的讲话时，强调：从现代战争的要求，看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从新四军参谋工作的现状，看加强参谋工作建设的迫切性。他说：参谋部门就是指挥机关，好像人的头脑一样；新四军在政治上进步的军队，但由于它是红军游击队编成的，游击习气重，要认真克服。他要求各级首长重视参谋工作，配齐配好参谋人员，建立参谋工作制度，明确参谋人员的职责和要求，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以适应作战和部队建设的要求^③。

随后，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在大江南北实施

① 同上书，第94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③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193页。

了战略展开，初步打开了苏南、皖中的抗战局面，初创了茅山、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和声威。1938年6月以前，即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很安全，驻兵很少，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经常只驻两个多联队，将其大部分兵力用于进攻徐州、合肥。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使敌人增兵防守，到1938年底，江南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三个师团，其中以芜湖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南京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有一个旅团，另外还从华北、东北调来五千多名伪军协助防守。这看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的行动，打破了日军当时集中全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同时，也打乱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稳固苏南和皖中农村阵地、反日限共的企图，为新四军深入敌后、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①。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从1938年4月起，叶挺、项英率新四军江南部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43—44页。

队进至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后，第一、二支队随即出动，军部于7月1日由南陵土塘移至泾县云岭^①，指挥第三支队军部开始了坚持皖南抗战阵地的斗争。

皖南，是当时全国抗日战争的前线，是日本侵略军长江交通的一个重要翼侧。在当时皖南众多的抗日军队中，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新四军以外，更多的是国民党军队，其第三战区总部就设在皖南的屯溪。两家军队，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积极抗日，谁是消极抗日，在当时情况下国内外都很注目。新四军从容而坚定地面对打击侵略者的考验，也关注与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关系。

当时，选择泾县云岭作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是有道理的。从政治上看，云岭一带群众条件好，过去就有党的活动，那时正值国共合作，关系还不坏。从军事角度看，这里离在苏南的一支队、在苏皖边的二支队和在皖中的四支队都较近，离担任南陵、繁昌一线防务的三支队更近，适宜作为指挥大江南北部队的中心，也适于设置后方。同时，项英作为东南分局书记，要领导长江以南东南数省党的工作，而东南分

^①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499页。

局和军部靠在一起，工作上比较方便。除此，云岭经过“大后方”与党中央及长江局联系，也较为方便。

同年7月，二支队继一支队向苏南敌后进军途中，其第三团留在芜湖、当涂地区破坏日军交通，伏击日军汽车、汽船，袭击日军据点，铲除汉奸走狗，威胁着芜湖等地日军的安全。

从9月起，日军侵占皖南沿江的繁昌、铜陵、贵池等地后，继续向皖南腹地的青阳、南陵等地“扫荡”，妄图消灭或撵走皖南新四军。

同年9月底，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新四军担负防守青弋江一带阵地的防务，限制在东西不到二十公里、南北仅十公里的地区。此地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军队，留出北面缺口让日军进攻，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当时，新四军装备差，只有步、马枪和少量机枪，是不适宜于担任阵地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当局这样安排，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在于使新四军“不覆亡于敌寇，亦难逃我法网”。叶挺和项英为了团结抗战大局，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一任务，命令三支队开赴南陵，接着又将防地延伸到繁昌地区，抗击沿江进犯的日军^①。

^① 《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42页。

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遵照叶挺、项英的命令，率领部队进到南陵、繁昌、铜陵地区后，迅速发动群众，建立猎户队、自卫队等自卫武装。其中，铜陵沙洲游击队发展到近千人，繁昌的长江游击队发展到数百人，他们在打击日伪军、铲除伪政权、保护老百姓、配合新四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游击武装后逐步升级，参加了新四军^①。

同年10月底，日伪军千余人从宣城连续多次向三支队防区南陵县马家园等地进犯。三支队指战员机智灵活地阻击敌人。谭震林指挥第五团和第六团一部，于11月初胜利地进行了马家园战斗，歼日伪军三百余名^②。这次战斗后，项英见到谭震林时，称赞马家园战斗打得好，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对保卫皖南抗战阵地，增强广大军民抗日的胜利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年12月，项英和军部其他领导人研究确定，考虑到部队实际情况，为方便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将一支队第一团从苏南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三支队第六团调往苏南，拨归一支队建制。不久，在当涂小丹阳地区活动的二支队第三团也划归军部直

① 《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42页。

②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69页。

接指挥。这样，新四军在皖南进行抗日斗争的就有第一、三、五等三个建制团了。

1939年春，项英和叶挺为巩固皖南抗日前线阵地，对皖南部队的部署作了调整，将第五团调到繁昌，第一团进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破坏交通，袭击据点，以牵制和消耗敌人。项英向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傅秋涛交待：一团的部队要尽可能地把活动地区向长江边上推，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更好地威胁和打击敌人。

同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团挺进到铜陵境内袭击敌人交通，伏击敌运输队，接连取得塌里王、谢家垄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近百名^①，加剧了日军的恐慌和不安。消息传到了新四军军部，项英非常高兴。不久，他在见到傅秋涛时，称赞一团经过短期整训以后出现新面貌，在塌里王、谢家垄等地打得好，指战员的士气高，技术、战术有明显提高。项英要求一团经常抓紧战斗间隙，继续抓好部队的战斗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敌情变化，打击敌人新的进

^①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74—75页。

犯。

日军在谢家垄等地遭到打击后，在铜陵、繁昌一带沿江据点增兵，企图“扫荡”皖南新四军，以维护其长江航运的安全。5月20日，驻繁昌荻港的日军七百余人和孙村、马厂之线合击，驻铜陵顺安的日军七百余人和黄木岭进犯。第五、三、一团等部依托有利地形予敌以猛烈打击，并派小分队袭击敌据点，迫敌撤回原防。这次反“扫荡”，毙伤日军三百余名，保卫了皖南抗日前线阵地^①。在第一、三、五团等部在铜陵、繁昌间屡获胜利后，叶挺、项英按正常渠道，向三战区报告，当年四五月间，曾经两次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嘉奖。第一次电报是：

有线

泾县新四军叶军长、项副军长：

号午恭电悉。（密）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中 ○ 敬未令——元远印^②

① 同上书，第76页。

②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374—3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第二次电报是：

有线

泾县叶军长、项副军长：

感午恭电悉。密。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运为要。

中 ○ 世申令——元琦印^①

蒋介石这两份嘉奖电，虽是一纸空文，但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新四军皖南部队这一系列胜利的影响不小。

同年 11 月，谭震林指挥三支队，采用运动防御等战法，六次进行保卫繁昌的战斗，收复繁昌城，毙伤日军四百五十余名，巩固了皖南抗日阵地^②。

对于保卫繁昌战斗的胜利，项英极为重视。他认为，保卫繁昌的作战形式，并不是当时抗日的最好作战形式，对新四军来说是不得已的，但在当时又是非进行不可的；更重要的，是三支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很不容易的，在皖南当时有特殊意义，表明新四军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真正抗日的武装，是能攻善守的队

① 同上书，第 375 页。

②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 82—83 页。

伍，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丢失大片土地形成鲜明的对照。项英为了发扬三支队浴血奋战的精神，他要求《抗敌报》很好地宣传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胜利，号召新四军各部队向他们学习，以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

1940年4月和10月，项英和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对皖南的两次大“扫荡”，胜利地保卫了皖南抗日阵地。这是他在皖南参与直接指挥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扫荡”作战。

同年4月，日军为巩固、扩大其在皖南沿江的占领区，维护其长江航运的安全，企图夺占南陵、繁昌、泾县等抗战阵地，消灭抗日力量，掠夺皖南资源，调集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于22日从芜湖、荻港、贵池等地出动“扫荡”。此时，新四军军长叶挺正在重庆（8月回到皖南军部）向蒋介石要求增加弹药、增加军饷和增加第五、六支队的编制，项英便很自然地独力担当起指挥作战的重任。

项英在反“扫荡”前，在云岭军部主持召开有三支队和一、三团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要求各部队利用南陵、繁昌一带起伏的地形，运用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法，独立地迎战进犯之敌。这是因为当时皖南

虽然驻扎着国民党军九个师近十万大军，但他们执行的是消极抗日的政策，不可能和日军打硬仗。事实正是这样，其第一〇八、五十二，一四四、一四五师和新七师等部，几乎没有抵抗就全线撤退，使南陵、繁昌等地相继失守。

在这次作战会议上，项英命令一团以营为单位，梯次配置在泾县云岭东北田坊、土塘一带，掩护军部领导机关；命令三团进至南陵西南水龙山、何家湾附近山地隐蔽待机；三支队率五团活动于繁昌以南、以西地区，采取运动防御，与敌周旋，迟滞敌人的进犯。同时，他要求皖南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拆桥断路，配合新四军进行反“扫荡”作战。

从4月24日起，日军从繁昌、南陵等地出犯，一、三、五团和军部特务营占领有利地形，在父子岭、何家湾、九朗庙等地与敌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接着又取得狮子山、汪家桥、铁门门等战斗的胜利。至5月3日，“扫荡”的敌人被迫撤退，使敌原定以快速行动一举夺占南陵、泾县、直下青阳、太平的企图化为泡影。

项英指挥新四军皖南部队4月反“扫荡”歼敌九百余名的胜利，用事实教育了当时受蒙蔽的人，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种种造谣污蔑，扩大了

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项英在4月反“扫荡”以后，在向干部讲话时，对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讲了反“扫荡”的许多经验。主要是：

第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各级指挥员要增强全局观念，坚决执行命令，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对敌情要严密组织侦察，周密作出部署。部队要熟悉预定作战地区的环境，以便更好地运用地形地物。要有随时作战的准备，加强平时的训练，抓紧武器、弹药和物资的补充。

第二，要充分运用游击战的战法。这次敌人“扫荡”的兵力，比我皖南战斗部队多好几倍。我们所以能够以弱击强、以少胜多，迅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灵活地打击敌人，就在于运用了游击战术，采取集中与分散、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办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日不安、夜不宁，被动挨打，顾此失彼。从而使我新四军在这次反“扫荡”中，仅以一百二十余人伤亡的代价，取得歼敌九百余名的重大胜利。

第三，要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经常讲清形势，激励斗志，提高广大指战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树立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中，要发挥英勇顽强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抱着与皖南民众

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在任何艰苦危急的情况下不畏缩、不退却。

第四，要充分发动群众。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和支援是不可能的。在中共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发动群众，空舍清野，断桥破路，人走粮空。敌人由于被迫自行携带粮食，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使其进攻难以持久。同时，广大人民踊跃支前，当向导，探敌情，运弹药，抬担架，积极配合新四军作战。三支队在繁昌前线十余天作战中，每天饭菜都是当地民众自动送来的。各乡抗日自卫队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捕捉敌特、汉奸，使敌特侦探无法活动，迫敌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之中。

项英的上述看法，既是对皖南4月反“扫荡”情况和经验的概括，也是对战斗在大江南北敌后其他地区新四军反“扫荡”情况的反映。

同年10月，日伪军又对皖南实行大“扫荡”。项英协同回军部不久的叶挺军长指挥了这次反“扫荡”作战。

当时，日军第十五、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再次对皖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一路五千余人，由铜陵、繁昌、南陵进犯，于10月7日向

距云岭北约七公里的汀潭进犯。由于情况危急，叶挺、项英除命令一、三团全力以赴抗击敌人外，令军部特务营和教导总队一部分人员也上了前线，为了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叶挺、项英要求指战员要具有与皖南国土共存亡的战斗决心，发扬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他们还下达命令说：“从本人起至每个士兵，哪一个退出阵地，就得受枪毙处罚”^①。这就大大激励了指战员们英勇拚搏的精神。

这次反“扫荡”作战异常激烈，指战员们依托阵地，连续打退敌人十多次冲击，以白刃格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入夜，叶挺和项英派出精干的小分队，趁夜暗从西、南及东北各方向，同时向敌实施猛烈突袭，战至午夜，毙伤日军一千余名。遭受重创之敌，惊恐万状，于10月8日晨东渡青弋江，向泾县进犯。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弃城溃逃，县城被敌侵占。新四军一面堵击，一面乘胜追击，与敌激战于南关。叶挺指挥部队继续猛攻，9日晨收复泾县城。日军向南陵逃窜途中，又屡遭打击。

与此同时，战斗在铜陵、繁昌地区的三支队向另一路进犯之敌展开反击，予敌以大量杀伤，迫敌收兵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一辑第374页。

回撤。

在反“扫荡”过程中，项英和中共皖南党组织，动员民众抬担架，搞运输，配合新四军作战。仅云岭、章家渡两地，在四小时内，就动员三千多人支援前线，对夺取反“扫荡”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至10月11日，日军对皖南的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新四军取得了歼敌二千九百余名的重大胜利。

项英和叶挺指挥新四军皖南部队，接连取得4月和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受到皖南群众的赞颂。当时，当地群众唱出歌谣：

云岭村，军部蹲，叶挺和项英，打鬼子真操心。鬼子进了汀潭村，叫兄弟把命拚，搞得鬼子过小岭。烧房子，打‘冲锋’（指鬼子），一路烧到泾县城，鬼子进了牛角洞。四面八方新四军，打得鬼子翻不得身，飞机大炮救不了他的命^①。

这首歌谣，反映出当时群众喜庆胜利、赞颂新四军的心声。

新四军在皖南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特别是

^① 《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121页。

1940年两次反“扫荡”的胜利，打出了威风，令敌人心惊胆寒，巩固了皖南的抗战阵地，对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有积极意义。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不久，项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去延安参加将于9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主要是分析抗战形势，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党在抗战中的领导责任，以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还将研究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①。

这次全会，离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中间相隔四年多时间，由于战争时期情况特殊，再没有能举行过中央全会。特别是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由于处于斗争的第一线，除1937年11月、12月间曾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外，均未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活动。

项英深感六中全会的重要，他将中央的通知告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14页。

诉叶挺军长，接着召集东南分局、军分会和新四军委员会会议，对工作作出安排，然后决定起程。

项英考虑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经过长征，在延安工作很劳累，条件很艰苦，于是叫副官处准备了少量金华火腿和白酒，带给他们品尝^①。

7月28日上午，项英由云岭动身去延安^②。此时，由于九江于当月25日失陷，由皖南去武汉的水路已经不通，只好经上饶乘火车绕道转赴武汉。

项英到武汉后，由于郑州已经失陷，去西安的火车不通，便和长江局领导成员王明、周恩来、博古一起，从武汉乘汽车去西安转赴延安。

在从武汉到西安的路上，到处充满着战争的气氛，敌机的轰炸扫射不断，防空警报不时响起，加上从前线逃出来的难民，正在转运中的伤兵，因而许多地区显得秩序混乱，人们精神紧张，心情忧郁。项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必须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雪恨。

项英到达延安后，除参加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由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

① 李一氓同志同笔者的谈话记录。

② 《赖传珠日记》第130页。

《论新阶段》的报告文稿，以及六届六中全会所要研究和确定的重要问题方案外，他抓紧时间，向党中央领导人洛甫、毛泽东汇报情况，听取他们的指示。

项英在和周恩来交谈时，还谈及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的设想和安排，并请他为即将创刊的《抗敌报》题写报头。周恩来欣然答应。

项英还将他住在皖南南陵县土塘村，利用间隙写出的本人自传，交给了中央组织部。这份长达六千字的自述性自传，是他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而撰写的，文末为“1938年6月16日，于安徽南陵前线军中”。这份自传，是他关于个人情况向党的全面汇报，在简述了家庭和本人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后，主要写自己参加革命后的重要经历、所遇到的重大事件，以及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自然涉及到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情况。因而它是研究项英，乃至对研究党的某些历史，都是有价值的。

项英还利用会议未正式开始前的时机，拜访了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来自敌后各地区的负责人，包括：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华北局书记杨尚昆，晋察冀分局书

记彭真等^①。项英和他们畅叙了友谊，交流了情况，学习了他们那里作战和建设的经验。

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十七人外，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三十八人。洛甫致开幕词，一致通过了会议主席团，项英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洛甫、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十二人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②。

第二天上午，即9月30日上午，六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博古在宣布会议开始后，项英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报告。他心里明白，大家热烈的掌声，是对战斗在大江南北敌后的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的亲切表示，它包涵着很深的情谊，有热情的鼓励，也有殷切的期望。

项英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新四军组建的经过。

第二，新四军从成立起至今经历的三个阶段：一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14—215页。

② 同上。

是在南方各地区准备集中；二是开赴抗日前线；三是参加对敌作战。

第三，新四军新近情况。

第四，新四军在江南的工作。

第五，新四军与友军（国民党军）的关系^①。

这是项英将新四军从筹备起到现时止的情况，向党的中央全会作出全面的系统的汇报。

项英说：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同党中央和相互间联系完全断绝的情况下，同“围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斗，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才取得和平，也才取得党中央的指示。“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问题才开始进行总的谈判，经过斗争，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妄图分化我们的阴谋未能实现。但在集中过程中，磨擦仍然不断，我们尽量避免武装冲突，用事实揭露其欺骗宣传，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开赴前线^②。

项英又说：“新四军军部1937年12月正式成立，部队开始定编为八个团，后来实际上编为十个团。新

①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上册送审稿第115—116页。

② 同上。

四军开始成立时，经费困难，武器短缺，我们提出“一切到前线去解决”的口号。经过数十次大小战斗，装备有了改善，部队比刚集中编组时扩大了^①。

项英的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口号，是创建第二个八路军！”^② 这表达了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对八路军的钦佩与敬仰之情，并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奋斗的目标。

9月30日下午，六届六中全会继续开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作中央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周恩来首先讲到上午听了项英报告后的感受，他说：

“新四军的成立，是很大的成功！”^③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是对新四军这一阶段工作的充分肯定。

此时，新四军成立一周年的时间已经临近，中共中央于10月1日给新四军发来贺电，肯定了新四军成立一年来的成绩，同时提出殷切的希望。贺电全文是：

叶军长、项副军长暨全体将士：

在新四军成立的一周年纪念日，中央特向

① 同上。

②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上册送审稿第115—116页。

③ 会议记录抄件。

你们致贺！

现在正当国际风云紧张，武汉形势危急的时候，中国人民抗日的神圣战争正处在新阶段的前面，我们全国需要精诚团结，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准备反攻，以求在持久战中战胜日本强盗。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巩固团结统一，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日寇的挑拨离间，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

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设了游击区域。我们相信，新四军以原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定能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成为大江两岸的一支模范军队。同时，我们相信，新四军本着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依靠着共产党的骨干，一定能够与一切抗日军队亲密团结，共同进行反对日寇的持久战争，争取持久战的胜利。

祝新四军的成功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0月1日^①

正在延安的项英，为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于9月27日，给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并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发去贺电，祝愿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夺取新的胜利。

项英在延安期间，由陈云、李富春帮助，找到失散多年、从未见过面的女儿项苏云和儿子项学成。项英的这两个孩子，是他原来的妻子张亮所生。项苏云1931年生于上海，当时项英已去中央苏区，随后张亮也去中央苏区，项苏云就留在上海，由李富春、蔡畅夫妇和林育英夫妇帮助抚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辗转来到延安，这时正在延安鲁迅小学读一年级。项学成1935年生于福建，1937年被送到延安，这时正由延安中央机关保育院抚养。项英虽然很坚强，但也不时想念孩子，不过那时战争环境，日夜奔波于革命，不允许他多想。他这次在延安同失散多年的孩子见到面，看到他们在组织上和老同志的关怀培养下茁壮成长，活泼可爱，十分高兴，尽享天伦之乐。国际友人马海德为项英和两个孩子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门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还为他和陈云、李富春合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04页。

影留念^①。项英勉励孩子，要听老师的话，听阿姨的话，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了跟着党干革命。

在那五十二年以后，在中国科协工作的项苏云谈起她与父亲见面的情景时说：“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见过父亲一面，那就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由陈云、李富春同志陪着，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见到的。当时，我刚满七岁，读小学一年级；弟弟才三四岁，在保育院。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在中组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晚上。然而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那忠厚、朴实的形象，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在那以后，父亲很快回到华中抗日前线去了，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②

当时由于华中抗战局势紧张，叶军长电催项英回部，于是，他在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的全体会议后，没有等到会议开完，经批准于10月初提前离开延安。

10月4日，项英到达西安，住进新四军驻西安办事处，即用电报告诉新四军军部，说他已于4日到达西安，不日可到武汉^③。

① 照片，存在笔者处。

② 项苏云1986—1990年期间多次与笔者谈话记录。

③ 《赖传珠日记》第136页。

那时，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还能坚持多久难以预料。项英紧赶慢赶，总算是在武汉失陷前闯过武汉，接着转乘火车绕道到达南昌。在那里，他乘坐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汽车，于10月22日下午3时半回到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①。

项英这次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从7月28日从云岭动身，到10月22日返回云岭，往返共八十七天时间。

项英回到云岭后，迅速召开会议，向东南分局和军分会委员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对新四军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的指示，同时根据武汉于10月25日失陷情况的新发展，对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讨论和安排。

10月31日，项英在新四军和东南分局机关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盛赞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他认真分析了抗战形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力量正在削弱，日本内部矛盾正在发展；反之，中国抗战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战争力量对比的变化证明，抗战将是持久性的，亡国论是没有根据地，最后

^① 同上书，第137页。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讲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迅速提高了，党员人数大大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①。

项英在传达中强调指出：在抗战进入新阶段时，党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进行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应遵守两项个基本原则：第一，统一战线，统一是基本的原则，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遵照这个原则；第二，要巩固统一，必须要斗争，但是斗争不是与统一对立起来。统一是主要的原则，斗争是辅助的，是用来巩固坚强统一的”。“要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实行三民主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信仰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彻底解放全世界全人类的。”^②

项英在传达中，强调在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对新四军领导的独立性。他说：

“我党要保持独立性，不仅为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民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17—18 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27 页。

族解放的利益。每个党员应有坚强的马列主义的信仰，不能模糊自己的意识。大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党失去了独立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没有批评友党或同盟者的自由。这一教训是我们今天值得记取的。我们军队的独立性的保持，不是在名义上的争取，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我们的政治领导、革命传统的精神、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工作的作风，都与人家是不同的。我们的军队的独立性是要保持的。新四军的环境和八路军的环境不同，所以在新四军方面保持独立性尤为必要，谁要削弱或取消我们的独立性，谁就是违抗抗战的利益。”^①

项英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在新四军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况下，保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对新四军领导应保持独立性的观点是鲜明的、坚定的。

项英在传达中讲道：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建设，“使其成为抗战的部队中最先进的部队。”^②

项英指出：必须“巩固和加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要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

① 同上书，第28—29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27页。

争取重大的胜利，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为实行党的新政策和一切决议而奋斗。提高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反对一切怠工和削弱自己力量的各种倾向。”^①

项英在传达时，是武汉失陷后的第六天。他讲道：“武汉失守后，华中、华南的沦陷区域更加扩大了，我们要在这些广大的沦陷区域里发展各种工作，发动人民武装群众，大大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抗日根据地。”^②

项英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专门讲了“党和的军队团结”。他说：“现在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仅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内的不团结也成为失败原因之一。”他接着指出：“保持同志间互相友爱、互相尊敬的精神，因说笑而闹意见而牵动感情引起同志间的纠纷，这是不应该的。新四军方面这一坏现象急待克服。同志间的友爱团结、诚恳坦白是非常必要的，有种同志当面不说背后说，公开不讲秘密讲，因而造成纠纷，这是我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二）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们坚决反对的。”^①

项英在传达中最后强调指出：“我们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再加上党内铁一般的团结，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一致为执行党的决议而斗争。”^②

项英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对统一战线的解释是有错误的。他讲到：“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反过来，工作就不能发展。”“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做什么群众工作，必须采取合法的手续、方式才能发展，否则如果像从前一样，工作就不能发展。”^③ 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项英重弹王明“一切都要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

然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错误提法的演变，在党内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项英 10 月 31 日在云岭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还正在演变过程中，项英不了解他 10 月初离开延安的重要演变，因此所作的传达也就不全面、不准确，是他的一个失误。

还在 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苏联飞来延安的王明，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

① 同上书，第 31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19 页。

战线问题给中国党的指示。参加这次会议的彭德怀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①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称：“王明等到此……此次政治局会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倾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②彭德怀的回忆还说：他“问洛甫同志（他那时是总书记，也是那次会议的主席），我回华北以后如何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洛甫同志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又过了两天，洛甫同志交给我一个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我回到华北以后，即按照那个大纲传达的。”^③在这个传达大纲中，提出了：“我们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更错误地总结了“五个月的经验和教训”，找出一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② 中央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12月28日。

③ 同①，第226页。

些“缺点”，如“强调独立自主的结果，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等等，“使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应有的开展与巩固”^①。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1月至3月，连续以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由此可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当时党公开提出的口号之一。

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期，情况有了变化。王明10月20日在发言中继续强调：“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②。毛泽东11月5日在会议作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论调，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这“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③会议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讲道：共产党员应“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

① 《六大以来》（上）第916页。

② 《六大以来》（上）92—9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540页。

一切的原则立场”^①。

由于项英 10 月初就离开延安，所以无论王明的发言，还是毛泽东的批驳，他都没有听到（他 10 月 31 日在云岭传达时，毛泽东还未作会议结论），这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因而他在传达时只讲会议前期的精神，没有讲会议后期的发展变化，就不足为奇了。

项英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时间，明明是 1938 年 10 月 31 日，可是有人在那五十年后的 1988 年，硬说项英是在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一年后，即 1939 年 10 月 31 日才传达，借以批判项英的组织观念、对党中央的态度等等，真是无稽之谈！

1938 年 11 月 6 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②。

同年 11 月 16 日，罗炳辉来到云岭^③。这位担任过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军长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等重要职务，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

① 《六大以来》（上）第 100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 528 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 140 页。

功勋卓著的战将，被中央军委分配到新四军来。项英早对罗炳辉有很好的印象，因而对罗炳辉的到来表示欢迎，当天就亲自接谈，介绍情况，听取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罗炳辉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同年11月17日，项英和军分会遵照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向北发展的方针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干部数十人和军部特务营渡江去皖中，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①。

在张云逸动身前，项英同他进行了深入、详细的交谈，要求张云逸运用同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等桂系人物熟悉、有交往的条件，到江北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多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更好地打击敌人。

赴江北的指战员四五百人在云岭出发前，项英亲自作了动员^②。他指出：我军各支队在江南、江北迅速展开，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中活动在江北的第四支队英勇奋战，接连取得蒋

① 《赖传珠日记》第140页。

②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家河口、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江北地区人民的抗日胜利信心，部队有了扩大，庐江、无为等地的人民武装有了发展，但与形势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江北地区的斗争需要加强，群众需要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需要继续壮大。大家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赴江北地区的。希望大家在张参谋长的领导下，在江北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努力开创江北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张云逸到江北后，利用其与一些国民党桂系上层军政人员有统战关系的有利条件，同在安徽的国民党桂系当局进一步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取得合法番号，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敌任务。

同年11月，项英倡议，军分会决定，新四军军部举办的第一期速记训练班开学。这是项英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时，发现中央机关有中文速记工作，觉得对高级机关很需要，就请中央组织部调了一名叫任之的来担任教员。速记班第一期有十四名学员，全都具有大中学历；鉴于毕业后从事的工作涉及到的机密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速记班，着重是学速记学，熟练掌握速记方法，也学政治理论。在为

期半年学习的后半段，边学边实践，学用结合，学以致用。项英对速记班的培训很关注，经常去检查指导。这批学员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学得很好，大部被留在军部机关工作^①。

同年12月，项英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决定将第一团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同时决定将三支队第六团调赴苏南，归一支队建制。项英于23日亲自听取六团参谋长黄元庆关于部队情况的汇报，对该团在皖南的抗战中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该团即将开赴苏南敌后提出了殷切的希望^②。

1939年元旦，项英在新四军机关及直属队举行的大会上，作了《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他在概述新四军成立后的抗战经过、战绩后，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优点和缺点，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军事技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争取在新阶段的抗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③。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73—176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42页，《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500页。

③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31—62页。

六 到苏南敌后巡视

1939年1月12日下午，项英从云岭军部动身去苏南敌后巡视^①。

这天上午，项英在新四军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了《论目前国内外情势》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国内抗战形势，要求部队认清形势，在持久抗战中争取更大的胜利^②。报告以后，他便匆匆地起程去苏南。

在那七个月以前，陈毅率一支队挺进苏南后，项英就萌发去苏南敌后巡视的念头，然而由于事情太多，难以分身，致到此时才成行。

项英这次去苏南敌后，主要为了四件事：第一，向一支队的干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转达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的关怀、慰问之意，转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对陈毅的问候。第二，检查了解一支队挺进苏南敌后的情况，看望部队，特别是看望由湘赣边、赣粤边等地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第二团。第三，对苏南的社会情况进行调

① 《赖传珠日记》第148页。

②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63页。

查，研究它对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产生的影响，为即将召开的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作准备。第四，就新四军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同军分会副书记陈毅进行商谈和研究。

项英到达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西北的陆笪里时，受到陈毅、罗炳辉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副参谋长张正坤等人的欢迎。陈毅向项英汇报了去年5月从皖南歙县潜口出动以来，一支队在作战、部队发展壮大和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陈毅对进展较为顺利的原因，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和军部的领导外，着重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指战员进军敌后的胜利信心。针对指战员对平原水网地带不熟悉、不习惯，思想顾虑比较多的特点，响亮地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口号。强调只要我们去努力，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二，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在茅山能够站住脚的关键。一方面，我们按照叶、项军长提出的“集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①，开展游击战争，接连取得胜利。这不仅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而且表明新四军真抗日、能抗日，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提高了新四军的威望；另一方面，我们进到苏南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①。同时，对那些不抗日、专门鱼肉百姓的土匪坚决打击，为民除害。从而使群众迅速消除疑虑，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

第三，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苏南各县游杂武装很多，大的一支有数百人，小的一支也有数十人，有枪有款有地盘。我们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争取他们站在抗日的方面来。对苏南有影响的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通过做工作，使他逐步转变对新四军的态度，由捐款捐物到把他的人枪全部交给新四军，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把大部分游击武装争取团结到新四军的周围来，壮大了抗日的力量^②。

项英对陈毅汇报的情况和经验很感兴趣。他指出：一支队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在京（南京）、沪、杭三角地区的中间地带，在日伪和国民党实力错综复杂的苏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成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207—208页。

绩很大，现已站稳了脚跟。这是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胜利来之不易，困难还不少。因此，要继续努力，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

项英向一支队的干部作了政治报告。他认真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还专门讲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关怀的情况。他说：我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人对新四军的情况询问得很详细，对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展开和取得的胜利表示满意。大家在思想上要很清楚，我们胜利的取得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不仅经常在政治上给我们指示方向，而且给我们派来大批干部，使新四军在组织上得到加强。就一支队来说，副司令员罗炳辉、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副参谋长张正坤、二团团长王必成等同志，都是参加过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老同志，他们在主力红军担任过军、师领导职务，对敌斗争坚决，指挥作战和领导部队建设的经验丰富，他们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项英这段话，讲到了到会干部的心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项英在陈毅等陪同下，到二团看望部队，受到团长王必成、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的欢迎。二团不愧为一支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成的老部队，在挺进苏南敌后的过程中有突出表现，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二团举行有营、团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向项英汇报了挺进苏南敌后的主要战斗情况：一营的干部着重汇报了去年7月1日夜袭新丰车站的情况。二营的干部着重汇报了去年7月10日新塘战斗的情况。三营的干部着重汇报了去年8月23日珥陵战斗的情况。团长王必成在汇报全团的作战情况时，则着重讲到去年8月12日夜袭句容城的情况。

项英对二团进入苏南后连续取得胜利，特别是他们取得了新四军第一次攻占日军盘据的句容县城，第一次袭击日军控制的火车站，第一次生俘日军，倍加称赞，讲了许多嘉勉的话。

不久，经军分会和新四军委员会研究确定，授予第二团为新四军“战斗模范团”的光荣称号^①。

项英在同二团团、营干部座谈时，特别注意了解

① 王坚 1986 年 6 月回忆记录。

该团发扬红军优良传统的情况。刘培善汇报了部队的政治思想状况，特别是发扬红军优良传统的情况。项英对汇报和发言听取得很认真。当他听到一些同志的骨干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得好，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时，喜形于色；当他听到有的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时，深表哀悼。

项英对陈毅在苏南扩大地方武装的做法很关注。一支队进到苏南后，积极扩大地方武装，争取了丹阳抗日自卫团管文蔚部的人枪一千多，还争取了吴甲寅、姜金昆、梅六（梅光迪）等部武装近千人，首先争取他们一起抗日，逐步帮助整顿改造，使他们成为人民的武装。

刘炎在向项英汇报扩大地方武装的情况时，着重讲到对管文蔚部帮助改造的情况：第一，强调部队要“党化”，即共产党对这支部队有绝对的领导权。在部队内部，不搞统一战线，不允许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①。第二，派骨干进去掌握部队。现已派去二十多名干部，除担任纵队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外，还加强了各支队的领导，使部队牢牢掌握

^①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06页。

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有助于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第三，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连队有了党支部，就能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保证上级命令、指示的正确执行，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第四，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做模范。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就会使共产党员树立好的形象，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项英对曾任过红军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的刘炎的汇报，很是满意；对一支队扩大地方武装的情况和帮助进行改造的体会，很是称赞。对此，他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了专题报告^①。

项英作为东南局书记，还听取了中共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的情况汇报。他在汇报时讲到：在一、二支队活动的掩护下，苏南地区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起九个县委或工委，“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也相继建立，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已建立起来，拥军、扩军、配合部队作战等方面作

^①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上册送审稿第 286 页。

了大量工作^①。项英对苏南特委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作了指示，强调要大力发展党员，把那些抗日积极的优秀分子迅速吸收到党内来。只有有了一定数量的党员，才能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发展、扩大抗日群众组织，才能使党的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项英在苏南期间，还会见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负责人樊玉琳，并和地方工作干部座谈，同士绅有过接触，走访群众，了解苏南的社会特点，研究这些特点对抗战以及部队建设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项英和陈毅尽管是亲密的战友，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岁月里并肩战斗，患难与共，艰苦备尝，然而那时分散时多，而这次却是朝夕相处，住在一个房间里，吃饭在一起，活动在一起，交谈时间最多^②。这是项英一生中，和陈毅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

陈毅和项英的关系很亲密，相互很尊重。一位和陈毅很亲近的干部，不久后看到陈毅在他和项英合影照片的背后，题写了“亦师亦友，恕我猖狂”的话。^③可见他们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①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3、第5页。

② 王坚1986年6月回忆记录。

③ 同上。

据接近陈毅的人士事后得知，项英这次同陈毅交谈最多的是三件事情：

一是，关于第一、六团调整部署和建制。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军部于去年12月确定将一团调回皖南整训，并归军部直接指挥；同时，将三支队第六团调至苏南，归一支队建制。项英说明了这个决定的必要性，还将六团的基本情况向陈毅作了介绍^①。

二是，关于钟期光的工作安排。当时，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身体欠佳，陈毅曾建议将一团政治处主任钟期光调任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然而迟迟没能定下来。这次陈毅又具体说明了理由，项英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表示赞同。不久，钟期光即赴一支队政治部到职工作^②。

三是，关于在江北组建新部队及罗炳辉的工作安排。项英告诉陈毅：为了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已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下一步，江北的力量将向皖东地区发展；四支队第八团的部队发展很快，拟以该团为基础组建一个新的支队，称第五支队，执行开辟皖东地区的任务，如获军委批准，准备调罗炳辉去指挥这

① 王坚 1986 年 6 月回忆记录。

② 同上。

个支队。陈毅开始不舍得放，当得知开辟皖东工作需要后，也就答应了。不久，罗炳辉到云岭军部报到，迅即转赴江北工作^①。

项英在苏南期间，还由陈毅陪同，由溧阳来到溧水的张家岗，看望了二支队第四团的部队。项英听取该团领导人的汇报后，召集各营干部座谈，还向全团干部和该团举办的党训班人员参加的大会作了报告，对他们在敌后进行英勇的斗争表示慰问，讲述了当时斗争形势，对如何坚持苏南敌后斗争作了指示。

项英因要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故在苏南敌后检查工作后，于2月5日返回云岭军部^②。

他在离开苏南前，陈毅将在战斗中缴获的一件日本军大衣，赠送给他。当项英回到云岭时，人们注意到他的变化，说：“项副军长是‘鸟枪换炮’，去苏南时穿的是棉大衣，而从苏南返回时穿的是黄呢子大衣了。”^③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1939年2月中旬，项英接到电报，中共中央政治局

① 同上。

② 《赖传珠日记》第150页。

③ 王坚1986年6月回忆记录。

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分，由重庆乘飞机至桂林，经湖南、江西、浙江，来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项英随后又得知，去广东活动的叶挺军长已到重庆，将由周恩来陪同回皖南^①。

对党中央派“大员”来皖南巡视，是项英一直所期盼的。他从新四军成立开始，就深感情况复杂，力不胜任，为减少工作失误，曾于上一年5月致信中央，希望中央领导人或派“大员”能到南方巡视，加强指导。因此，他对党中央派周恩来来皖南视察，非常高兴。于是，他立即和新四军、东南局其他领导人一起，着手准备汇报及接待事宜，并派作战科长、侦察科长专程前往金华，迎接周副主席和叶挺军长^②。

2月22日，项英得知周恩来一行到达太平县的三门时，立即安排参加欢迎的领导人、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于第二天上午到达前往通向云岭必经之地的章家渡等候^③。尽管那时天气仍然很冷，但大家

① 《赖传珠日记》第151页。

② 《安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第4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热情很高，个个翘首以望，盼望着周副主席的到来。

在此之前，项英已通知陈毅赶到云岭，稍后又通知粟裕到云岭，准备听取周副主席的指示。

2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叶挺等乘青弋江的竹筏到达章家渡，受到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曾山、李一氓等和新四军军部、东南局机关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的热烈欢迎^①。在锣鼓声、口号声和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叶挺从乘坐的竹筏上登岸，项英等领导人立即前去欢迎，他们热情握手，互致问候、周副主席、叶军长向欢迎的队伍频频挥手致意。

章家渡与云岭相距十五里。项英请周副主席骑马前往，但周恩来坚持步行。他们在一路上边走边说，谈笑风生。当周副主席得知当地的“妇教会”、“青抗会”、“农抗会”等群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已开展活动时，十分高兴^②。

当天晚上，项英在云岭设宴三桌，为周副主席和叶军长洗尘^③。项英首先致词，代表东南局、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向从数千里外长途跋涉来皖南指导工作的周副主席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周副主席的

① 《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② 《安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第5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到来，带来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新四军的盛情关怀和指示精神，对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是巨大的鼓舞，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抗战新阶段斗争的开展将有重大推动作用。他提议，为周副主席的到来和健康、为洛甫、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健康，干杯！

接着，项英对去广东为抗日斗争奔波的叶军长安全返部表示欢迎，为叶军长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副主席在讲话中，转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叶挺、项英及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指战员的问候。周恩来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新四军迅速编组、集中是满意的，对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已经取得的胜利是高兴的，对新四军在敌后斗争中的困难是理解的，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作用是寄以厚望的。他祝愿新四军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抗战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2月24日，项英向周副主席汇报了传达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部队作战和建设及正在召开的第二次政工会议的情况，陈毅、周子昆、曾山等作了简要补充；袁国平就“二七”政工会议的情况专门作了补充，并将会议讨论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交周副主席审阅修改；周恩来将六届六中全会情

况，特别是项英离开延安返回皖南后会议的发展和毛泽东同志对会议所作的结论，作了详细传达，然后一起研究了进一步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问题。

2月24日晚上，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陈家祠堂）举行欢迎周副主席的晚会^①。会场里点燃起明亮的气灯，军部、东南局机关和军直属队排以上干部列队来到会场，嘹亮的歌声迅速响起，场内显得十分活跃。叶军长在文艺演出前发表讲话，对周副主席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强调要以战斗的胜利，来回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怀。在晚会上，由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学员演出了精采的文艺节目。陈毅作为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老战友，在到会人员的热烈要求下，高兴地用法语高唱“马赛曲”，把会场的气氛引向了高潮。

项英得知周恩来返回途中将路过金华，就建议他在那里见一下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听取汇报，给予指示。周恩来表示同意后，项英请曾山立即通知刘英，要他先期到金华等候^②。

2月底至3月初，周恩来同叶挺、项英等多次进

① 《安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第5页，《赖传珠日记》第152页。

② 《中共党史人物传》（二十）第282页（刘英传）。

行交谈，深入分析了形势，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干部调整配备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商定在当时形势下，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3月6日，新四军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军部、东南局机关干部和一部分地方干部参加，听取周副主席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①。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新四军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和建设；要求新四军向敌后困难的地区发展，创建抗日根据地，作战方针主要是游击战；明确新四军的建军工作，以强大为原则，“第一要精，第二要发展。我们不能忽略精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扩充是有限制的。我们要使一个人有十个人的用处，一个干部当一百个干部用”^②；在对敌大力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要开展政治、经济斗争。

项英在周副主席报告后作了讲话，指出：周副主席的报告，对形势分析得深刻，任务提得明确，联系实际紧密，语言通俗易懂，大家应很好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决不要辜负周副主席的殷切期望，以胜

① 《赖传珠日记》第153页，《周恩来选集》（上）第101—10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106页。

利的战斗和优异的成绩，来回答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新四军的关怀。

在周恩来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前，李一氓根据项英的指示，组织速记人员认真速记。速记班的同志热情很高，分头作业，分头记录，连夜整理，第二天就将记录稿交给周副主席审阅。周副主席的报告，后来整理题为《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一文，收入到《周恩来选集》上卷之中。周恩来对记录稿非常满意，称赞速记人员培养得好，速记的质量高，记录和整理的速度使，并提出能否调一两名随他到重庆工作。项英立即答应，让李一氓挑选两名政治上可靠、独立工作能力强的速记员去。结果选派吴博、方卓芬随周副主席去了重庆^①。

同年3月9日，项英和叶挺一起，陪同周恩来副主席到一团视察部队。在途中，项英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一、六两团对调的原因及情况。在一团，听取了傅秋涛的汇报，看望了部分指战员，观看了该部在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书籍和地图等胜利品^②。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77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53页。

3月10日,叶挺、项英联名向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作了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抗战情况的报告。在1938年中,新四军战斗二百八十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二百余名,俘日、伪军六百余名(内日军三十六名),击毁敌汽车一百八十余辆。大量的事实,回答了蒋介石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①。

3月14日,新四军军部举行欢送大会,送别周副主席。叶挺、项英等领导人,军部和东南局机关的干部,战地服务团等直属单位的人员,都以惜别的心情赶来送行。周副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周恩来和新四军护送的指战员二三十人登上竹筏沿青弋江西行。叶挺、项英和欢送的人群向周副主席招手致意,祝周副主席一路平安,直到周副主席乘坐的竹筏远远西行以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岸边^②。

3月18日至24日,项英在云岭陈家祠堂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3月18日开始举行,故又称“三一八”参谋工作会议。江南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248—253页。

② 《安徽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欢送照片刊《大江南北》1985年第2期。

各支队、团参谋长及少数军事首长、军部参谋人员约五十人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新四军，对健全参谋工作作了指示^①。在这次会议上，项英作了《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他在分析各部队一年来作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要一面作战，一面建军。他说：根据当前抗战的情况，我们绝对不能不打仗先来建军，也不能说现在只能作战而不能建军。“应该是：一面建军，一面打仗；一面打仗，一面建军。”要利用战斗的间隙来进行训练建设，在斗争中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战斗力^②。

在这次参谋工作会议期间，项英同二团参谋长段焕竞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这一年前，项英到湘赣边游击区动员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时，同时任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谈过话，得知其爱人叫李珊（又名法姑），是参加革命很早的一位老同志。此时，项英问段焕竞：

“法姑现在哪里？”

① 《新四军事人物录》第194页。

② 原载《抗敌》杂志第3号，《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四）第880页。

“还在湘赣边。”段焕竞不大好意思地回答。

项英感到有些奇怪，说：“怎么没有调到前方来？”

段焕竞说：“大概那里不肯放吧！”

项英说：“还是把她调到前面来。前面也缺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啊！”

段焕竞一阵脸红，不大好意思地笑了。

四个月後，李珊调到了苏南工作。

在那四十八年以后，段焕竞谈起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时说：“1939年‘三一八’参谋工作会议期间，项英同志和我谈起李珊的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因为我老婆个人调动的问题，而且说明他作为一位领导人关心体贴干部，说明他作风深入细致，因而他在皖南时很有威信。”^①

从3月下旬起，项英对参与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贯彻，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认为，参与这个发展方针的制定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实践。

3月底至4月中旬，项英或与叶挺一起，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提出开展江北工作的建议，包括：

① 段焕竞同志 1987 年同笔者谈话记录。

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统一指挥第四支队、新建的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成立以张云逸为书记的中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委；以第八团为基础，扩建组成第五支队，调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去任五支队司令员，负责开辟皖东地区。这些建议，均迅速得到批准和执行^①。

4月下旬，叶挺军长动身去江北巡视。项英为贯彻向北发展的精神，于4月20日召开军分会再次研究，确定派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和军机关一批干部随行。随后，邓子恢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军机关随同前往的干部均成为江北指挥部机关的骨干。同时，还调第五团团长孙仲德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军直属政治处主任张树才也到江北工作，以加强江北部队的领导力量^②。

在这前后，发生了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问题。高敬亭在东进等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叶挺及张云逸、邓子恢等在江北作了处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是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三）第586、592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三）第586、592页。

重视的，但主张耐心教育、尽力挽救。他认为：“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①；“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②。项英还于5月4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拟草电文报批^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当年6月24日将高敬亭处死^④。直到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正式发出文件，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⑤。

当时，叶挺对去江北整顿四支队，曾向蒋介石报告经过情形，蒋介石很快复电，称：“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蒋介石这则电慰叶军长的消息，刊登在1939年9月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三）第598、593、59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叶挺将军传》第327页。

⑤ 《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4页，1985年印。

29日《抗敌报》（江北版）上^①。

然而历史常常有不公正之处。高敬亭被错杀一事，有人不了解真相，或弄错了情况，讲责任主要在项英；有的为了“保护”叶挺，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无端地责怪项英；更为离奇的是，有人在著述中制造谎言，说项英电请国民党当局，要求枪决高敬亭。这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使项英又多蒙受一件冤枉。

在那四十五年后的1985年，由曾任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等主持编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专门叙述了错杀高敬亭的经过情况：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府（按：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煌（即今金寨，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时为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七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

^① 《叶挺研究史料》第316页。

在那五十年后的 1989 年 9 月 5 日，李一氓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说：“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①

1939 年 7 月，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项英和陈毅约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和列席代表、该部支队长韦永义、梅嘉生，在肯定该部一年来成长进步的同时，着重讲明当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指出：要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的限制，为由苏南向苏北方向发展作准备，拟将该部上升为主力。他们均表示拥护。不久，管文蔚部便向长江边发展，夺占了扬中这

^① 《云岭》第 26 期第 6 页，李一氓同志谈话记录。

个桥头堡阵地，很快又与第六团叶飞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从而为发展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8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建议，鉴于张鼎丞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已赴延安，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②。随后于11月7日，由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战争^③。

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的相继成立，表明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开展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也表明新四军初步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任务。

8月25日，项英在新四军成立两周年前夕，发表了《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叙述了新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新四军指战员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指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④。他根据抗战进入新阶段的特点，

①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87—488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三）第624页。

③ 《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第27—28页。

④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第208—223页。

强调指出：“目前敌人既以政治进攻为主，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与敌人的斗争，是应该政治重于军事，不仅在军事上更积极的进攻，大量的消耗敌人，而且要依托政治配合军事，才能打破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①

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在这前一天，项英在《抗敌报》上，发表了《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文章。指出：“在本军成立两周年的今天，希望全军指战员更加加强我们抗敌的信心与杀敌的决心！坚持我们一贯的方针，决不受任何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坚持团结，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团结大江南北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使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汉奸以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孤立起来。我们更要努力作战，发扬我们英勇牺牲的精神，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不仅集小胜为大胜，我们还应该集无数的大胜去争取由相持阶段达到反攻的胜利，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②这篇短文，表达了项英进一步搞好抗战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10月下旬，项英接到陈毅的电报，称：挺进到上

① 同上书，第220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791页。

海近郊作战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已西移到扬中管文蔚部地区整训。10月26日，项英在向党中央报告“江抗”西移时，指出：“江抗”西移，是由于他们“无信心及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他又指出：“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我们已派何克希、赵伯华等东返主持。他在报告中还提到：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进攻，要“依自己方针，给予必要反击，不能斗争，不给反复者以打击，就难生存，也不易发展。”^①项英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向东作战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要进行斗争的基本态度。

12月2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已命令第六团及第四团、管文蔚部各一个营，由叶飞、张道庸率领，由扬中过江，向天长挺进^②。这几支部队中，由叶飞率领的六团与管文蔚部在渡江前就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张道庸（陶勇）率领的四团主力在渡江后改编为苏皖支队，展开于扬州、仪征、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战争，为尔后陈毅、粟裕率苏南主力开辟苏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毅根据苏北的政治形势，为向北发展，确定了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159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623页。

“击敌、联李、孤韩”的斗争策略，即：打击日伪，联合地方实力派、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部，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12月10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了陈毅去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会谈的绝密内容，特别指出：“最近，陈毅到泰州与李长江、李明扬等会晤，所谈甚好”；北渡部队拟“与两李部队配合，向启东、海门、如皋、东台挺进。”^① 这看出，项英对陈毅所部向北发展和向东作战是同意并支持的。

1940年1月1日，项英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而军部对江北部队指挥不便的实际情况，致电党中央，“中原局既到皖东，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统一于中原局。在目前情形，军部对江北（除苏北外）无法指挥，因情况不明。以后除某些行政上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如何，请中央及军委最后决定。”^② 中央采纳了项英的建议，1月4日复电指出：“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以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三）第375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411页。

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①

1月14日，项英在云岭召集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除请陈毅到会外，谭震林、傅秋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分析全国形势的基础上，讨论了江南的工作方针。会议认为，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新四军发展，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的配合，因此，南方在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会议认为，“皖南环境北渡较困难”，应有“江南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会议还认为，在事变正在发展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加强武装力量，充实与扩大部队，并对苏南、皖南部队的加速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要求，在苏北应加强对“两李”的统战工作，集中对付顽固派韩德勤，巩固扬中桥头堡及长江南北两岸阵地，为今后发展苏北创造条件^②。

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苏南“东路（按：

① 同上书，第414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五）第77—78页，《新四军征途纪事》第110—111页。

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及以南部分地区）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四军，伪军及散枪当地约一千支以上，又是国民党力弱地区，应乘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争发展为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应该使东路同志认识当前抗战局势的严重性，力求发展壮大，搜集枪支，筹大批款，增强南方力量，这才能应付将来事变。”项英提出，应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他还和陈毅相商，派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吴仲超先赴东路负责领导^①。

同年3月，项英派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为“江抗”东路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以加强对东路地区工作的领导。这对推动东路地区斗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谭震林赴东路前，项英在云岭同他谈了话，说明开辟苏南东路地区的重要性，要他带一批团、营干部，迅速将东路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编组，积极发展，壮大力量。谭震林（化名林俊）到达苏南东路地区后，很快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仍称“江抗”），举办教导队，发展武装，成立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斗争。至当年10月，新的“江抗”发展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三）第382页，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44页。

到三千余人^①。

此时，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在苏北不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挑衅和威胁。对此，项英于3月30日致电中共江苏省委，对苏北党当时的中心工作作了指示，指出：“苏北反对我党我军最者为韩派”，“近日，韩正积极布置消灭我江北部队，……如进攻，我当坚决消灭之，否则只能退回江南，或听其将我消灭，这是关系整个苏北与我军发展之关节”，“如能取得两李合作，东进（南）通、海（门），对我均有利，那应毫无顾虑的东进”。同时指出：“争取好转，绝无法避免磨擦，利用矛盾必须使我发展。只有求得发展，才能有力的争取局势好转，同时应当努力的团结中间力量，但不是对顽固派与反对我者争取缓和以求一时之和平安居。”项英在电报中还提出：“目前在苏北，中心是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李，来打击韩部与CC，才能争取大的发展，争取苏北。”^②这表明了项英对开辟苏北的基本态度，同时也说明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是主张针锋相对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二）第355—357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五）第95页。

的，而不是一味迁就。他提出利用矛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向韩德勤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是与陈毅的看法一致的。

4月3日，项英与叶挺、袁国平、邓子恢为声讨叛变投敌的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联名发表了《为反对汪逆政权的成立告全军将士书》。汪精卫，原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12月秘密逃出重庆，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1939年春到上海叛国投敌，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厚颜出任伪中央政府主席^①。项英等发表的文告指出：汪伪政权的出现，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工具，表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新四军作为民族自卫战场上的先锋战士，一定要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在汪伪的心脏地区宁、沪、杭一带，百倍地打击敌人，开展大江南北抗战的新局面，把汪伪政权埋葬在南京城下，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

^① 《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2—613页。

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①。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陈毅和粟裕于7月初率江南指挥部（随即改为苏北指挥部）及江南主力北渡长江。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向重庆蒋介石告状，对新四军挺进纵队等部的自卫还击极力加以诬蔑。项英于7月23日，向党中央和南方局详细报告了管文蔚、陈毅率部先后北渡，遭到顽军袭击及被迫自卫还击的经过，为党中央、南方局开展政治斗争提供了情况^②。

为加强敌后地方工作的领导力量，项英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率一批干部去苏南，后于8月转赴苏北，协助陈毅开展地方工作，9月任中共苏北区党委（后改为苏中区党委）副书记^③。

同年10月初，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出动一万五千余人，向陈毅、粟裕率领的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大举进攻。消息传到皖南军部以后，正在忙于和叶挺一起指挥皖南秋季反“扫荡”的项英，虽熟知陈毅、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4页。

②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上册送审稿第815页。

③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页。

粟裕指挥能力强，但仍心不由己地替他们担心，因为要以少胜多确实不容易，何况中间派会不会突然变卦、背后插刀呢？一句话，他担心部队遭受损失。当黄桥战役胜利的消息报到军部后，项英盛赞陈毅，立即向大家报告黄桥战役的喜讯，并布置《抗敌报》发表祝捷社论^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项英不仅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之一，而且是具体的实践者之一。

八 加强政治领导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名义上虽是副军长，但由于他是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故实际上是政治委员^②。因此，他除在叶挺军长离开皖南时也抓军事领导外，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领导上。

1938年春，当红军和游击队开始集中编组为新四军时，由于政治工作机构不健全，政治教育未很好开展，散漫松懈、自由行动、小团体观念的游击习气

① 《扬州师范学校》1986年第4期第102页。

② 《新四军·文献》（一）第106页。

比较重，致发生不少逃亡现象，甚至发生大队长拖队逃跑的现象。项英根据上述情况，同时鉴于部队集中后和国民党军队联系增多可能带来的影响，于3月16日发表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一文，指出：要很快做好参战的准备，当前首要的是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斯（按：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战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削弱自己的精神。更需最大努力，争取一切新的分子，从政治上生活中教育他们成为老战士一样。这是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最基本工作。”^①

项英在文章中针对红军和游击队长期分散、山头较多的情况，强调从政治上建军，克服山头主义，反对游击习气，增强内部团结。他指出：“为了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必须使全军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要求得全军一致，必须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一切不正确思想和意识，反对忘记了自己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反对一切腐化堕落行为，反对自高自大认为劳苦功高，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加强

^① 同上书，第85页。

马列斯主义学习，来巩固自己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全体党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来完成抗日救国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①

这篇文章，是项英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告诫部队不要由于搞统一战线，就“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这对新四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那四十九年后，时任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在《谈编纂〈新四军〉史料丛书的几个问题》中说：“新四军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成的，一下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军，需要克服山头主义，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不容易的。……新四军处理山头主义，没有伤害人。延安调来一大批干部，从团到营到连都有，这就发生一个外来干部、中央派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问题，做这个团结工作是很艰苦的”；“那时不要说一个团一个山大王，有的一个团有几个山头呢。所以说这一条项英同志起了作用，叶挺不可能起这个作用。第二条是克服游击习气，使部队正规化，他（指项英）是做

^① 同上书，第87页。

出了贡献的”^①。

项英很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他针对新四军开始编组时成员主要是农民的特点，经常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则这种农民部队不但不能循着正确路线，坚持革命，任其自流，还会变成流寇土匪。”^②这话是有道理的。他要求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中都要作模范：在新四军内部，最能团结友爱；在行动上，最能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学习中，最虚心、力求进步；对群众，最能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最能吃苦耐劳；在战场上，最坚决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怕流血牺牲。项英称赞在作战中牺牲的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第二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树林等，都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作战中伤亡的指战员，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共产党员。这是共产党员在作战中发挥模范作用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③！

① 《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8期，《云岭》第24期第89—90页。

② 《云岭》第23期第2页。

③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5册第76—77页。

项英重视政治工作。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在新四军尚未编组部队时，他先将军政治部建立起来，参与领导部队的编组，并陆续充实和健全。1938 年 6 月中旬，当部队正向敌后挺进时，他指导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检查分析新四军成立以来政治工作的成绩和弱点，研究确定了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要求各部队提高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推进政治工作建设，健全政治工作机构，保证军队政治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保证作战的胜利。在这次会上，确定新四军当时政治工作着重做好四项：一是，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二是，正确执行干部政策，选拔使用干部要以德才为标准。三是，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入开展政治教育。四是，确立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系统^①。

项英把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加强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来抓。抗战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强调要开展游击战争。项英不仅完全赞同，而且和叶挺一起领导部队认真实践。他指出：“在大江南北作战，因为地区和地形的条件，敌情的变化，与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十六）第 216—218 页。

作战的任务上，不能采取大规模的作战方式，仅仅是在游击战争的范围内，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斗”。“我们必须了解不应单以军事观点，战斗成绩，来认识游击战争的作用，还要从政治上和其他方面来认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项英和叶挺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在军事上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而且在政治上同敌人进行宣传战和对群众的争夺战等方面，也进行了种种的斗争，从而牵制了数万日军，并使日军的“扫荡”和封锁政策都遭到失败^①。

在加强政治领导过程中，项英把战地服务团作为重要力量来建设。1937年12月下旬，他从延安到武汉时，叶挺就和他商定招收进步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组成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战地服务团在南昌成立时，开始只有十余人，到岩寺时陆续增加到二百人左右，朱克靖任团长。项英经常关注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和建设，关心他们的成长，并多次去讲话、作报告。在项英和叶挺、陈毅、袁国平等关心和帮助下，战地服务团在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首先，它成为一支红专结合的文艺宣传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第211页。

队。在斗争中，培养出一大批文艺人才，成为在大江南北发展革命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其次，它是一支坚强的民运工作队。对驻地和敌后群众开展宣传，增强群众抗战救国的意识；帮助群众建立抗战组织，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以至建立抗日政权；帮助当地发展中共新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①再次，它是一支实际的干部训练队。经过这所大熔炉培养的知识青年，输送给部队、地方的军政干部和文化干部在四百名以上。他们走向各种领导岗位，在全国解放后有的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大军区、省（部）级的领导职务^②。

项英对新建立的部队更重视加强政治领导。当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时，当地新建的游击武装很多。项英强调，这些游击武装凡是愿与新四军建立联系的，首先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然后派干部进去帮助改造，使其迅速成为人民的武装。一支队对丹阳抗日自卫团的改造，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管文蔚，大革命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4页，《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9—41页。

② 同上。

失败后与党失掉联系；当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丹阳一带时，他建立起丹阳抗日自卫团，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6月，当陈毅率一支队进到苏南后，管部就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并配合进行了新丰战斗。项英和军分会根据陈毅报告的情况，批准将丹阳抗日自卫团改为丹阳游击纵队，任命管文蔚为司令员，同时批准恢复管文蔚的党籍。这样，就使这支部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很快成为新四军之一部^①。

项英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宣传阵地。1938年11月，根据项英的倡议，军分会决定，由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在云岭创刊。这是新四军的主要报纸，在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中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至全国都颇有影响。1939年2月，项英又主持研究决定创办《抗敌》杂志。这个综合性的不定期刊物，以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为主要内容，总结交流建军、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材料，为军队干部和一切热心于抗战的人士提供进一步探讨与运用的资料，由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任主编。项英对这个刊物非常重视，不仅经常亲自审阅重要稿件，而且还经常为该刊撰

①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393—405页。

写文章，仅在一至六期刊出的就有八篇之多^①。由于该刊内容广泛，公开发行，在军内外影响颇大，曾有“向着光明的灯塔”之美称。

项英在抓部队教育过程中，提出：“要以政治教育为骨干，以文化教育为基础，以科学教育为辅助”，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经过教育，部队的革命觉悟明显提高，奋勇杀敌的精神有很大加强。大规模的识字运动，成绩显著。通过科普知识的宣传，战士中迷信的现象大大减少^②。为增强教学效果，项英不仅经常给机关、部队干部讲课，而且还安排水平高的领导干部讲课。像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讲党的建设，秘书长李一氓讲联共（布）党史，宣教部长朱镜我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部科长冯定讲社会发展史^③。

1939年元旦，项英在新四军军直干部大会上，作《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时，特别强调要加强政治工作，“精神胜于物质”，“要把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把头脑武装起来，意志坚定起来，这样才能百折不回的斗争下去”；要开展游击战争，只管军队还不够，还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① 《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第473—474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四十三）第71页。

③ 《云岭》第16期第32页。

武装群众；要在斗争中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军事技术，增强部队战斗力，适应今后的作战要求^①。

同年2月7日至16日，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在云岭举行。因为会议是2月7日开始举行，又被称为“二七”政治工作会议。项英在会上作《新阶段中我们在江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时，首先引用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来说明抗战进入新阶段的特点，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江南的社会特点对作战的影响，来加强政治工作。

项英在分析江南抗战形势时，还指出：在江南，新四军是孤军作战，不可能取得其他军队直接的协同配合；而其他军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仅不能对我们配合军事，甚至会“分道扬镳”^②。这就是提醒各部队领导，在坚持江南抗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地完成作战任务。

项英在报告最后，要求新四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要保证全军执行和实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给八路军、新四军电报中的指示：“抗战形势紧急的关头，特别需要我八路军、新四军前方将士之努力，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帮助友军及民众，一致努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力度过难关，在敌后方数倍于今天的艰苦局面尚在面前，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与敌寇作殊死战，更加积极地去帮助和亲近友军，更加努力地去发动和组织民众，用互助互让团结御侮的精神，去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反对个别分子的悲观、动摇、堕落、腐化等现象，以保持和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信你们定能始终站稳自己前进战士的岗位，你们定能坚定不移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共和国之实现而奋斗。”^①

项英这个报告，由于既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又紧密联系了江南地区的特点和部队实际情况，因而给干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②。

根据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and 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视察皖南时的指示，军政治部制订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并以政治委员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命令的形式，于当年4月公布施行^③。

这次会议后，袁国平、邓子恢于1939年3月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致信毛泽东、王稼祥、谭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29页。

② 王坚回忆记录。

③ 《新四军事人物录》第193页。

政，称：“此间‘二七’举行过第二届全军政工会议。开会前，曾电请赐示方针，惜未得复。……一年来政工经过及现状，除向恩来同志作过详细口头报告托为转达外，并作有书面报告寄来，请给予指示。”希望总政治部“尽可能把八路军政工经验介绍给我们”，“带全国性的材料，如基本的政治教育材料及政工条例之类，最好仍由总政负责供给”^①。

同年2月至3月，在周恩来视察皖南期间，各支队领导同志也集聚云岭。在开会时，陈毅建议，新四军应该像八路军那样，有一支雄壮的军歌，以激励斗志。项英和大家同意陈毅的意见，委托他写词。陈毅对此抓得很紧，将新四军继承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的政治信仰、作战方针、军民关系等等，于3月30日写出初稿，取名为《十年》，4月上旬送到军部^②。经项英和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等一起讨论修改，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新四军军歌》的歌词^③。6月下旬，项英、袁国平、周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738—739页。

② 《陈毅诗词选集》第34页。

③ 《云岭》第23期第55页。

子昆等同从苏南返回云岭的陈毅就《新四军军歌》歌词研究确定后，请作曲家何士德谱曲。教导总队文化队试唱时，领导同志认为军歌必须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增强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于是，何士德在修改曲谱时，将歌词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了两遍，而且唱时一遍比一遍高。当第三次试唱时，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等比较满意，认为这样斗志坚强，很有气魄，能表现出我军坚决东进抗敌和进军敌后的精神，就这样，由陈毅原词、集体改编和由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最后确定下来，并在当年“七一”前后在部队中教唱^①，受到新四军指战员的热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历史歌曲之一。

同年7月至8月间，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云岭的石头尖村召开。来自各支队、军直单位的党员代表共二百三十余人。会议两项议程：一是，总结新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研究今后党的建设的任务；二是，总结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研究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来加强部队建设，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项英作为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和大会

^① 《云岭》第23期第55页。

主席团一起，领导大会胜利举行，并在大会开始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新四军各级党组织在东南局和军分会的领导下，在大江南北，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路线和指示，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威信，使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地位；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一年来取得大小六百余次战斗的胜利，部队本身发展了好几倍；巩固和壮大了部队的党组织，党员数量由原来占全军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干部大部分都是党员；帮助所在地区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不断提高党的质量，发挥党员在建军中的作用，保证前线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完成在大江南北抗战的任务^①。

会议在研究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评价和经验时，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7 年 12 月 13 日《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认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在于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以武装斗争为主干，充分

①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5 年第 3 期第 65 页。

运用各省边区的地形条件来灵活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当时形势和条件来运用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这对于抗战都是有实际意义的。会议要求各部队在分散、独立的环境中，更要增强党的观念，加强政治领导，防止和克服不良倾向，使部队更健康地发展壮大，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极为重视和关怀。8月1日，党中央给大会发来贺电，称：“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辟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以无数次的损失，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和‘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奋斗目标。”^①同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给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祝贺布尔什维克党创造了坚强而有战斗能力的新四军，在抗战建国过程中走着光荣模范的道路，而且正在发挥我们党与全军指战员的能力，以配合全民族的力量，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②

① 《安徽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第17页，《曲阜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85、86页。

②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3期第68页。

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新四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它对新四军党的建设，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有重要意义。这是项英在领导新四军过程中一个重要贡献。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南方局和关于新四军、东南分局及东南局的工作。正在延安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张鼎丞，于8月21—22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认为一年多来，东南局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具体表现为：保证了各地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计划的完成；新四军组建后，扩大了部队，加强了部队的建设；注意了对新四军中广大党员的教育，特别是对老干部的教育，促进了新四军中党的团结；实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肯定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的同时，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下述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

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①。这些，是对新四军、东南局成绩的肯定。

项英在加强政治领导过程中，注意从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大革命失败后，东南地区一批共产党员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纷纷来到新四军，要求恢复其组织关系。按照当时政策规定，恢复组织关系是困难的。项英考虑到历史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这类问题。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原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北伐军中推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有建树，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突围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冬找到新四军来。项英除请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对朱克靖进行考察了解外，自己亲自同他谈话，考察其历史和现实表现，考虑到他与党失掉联系的情况特殊，没有发现他在与党失掉联系后有损害党的行为，便鼓励他以实际行动来接受组织上的考察；另一方面，考虑到他受命组建战地服务团后，对党的政策认识比较好，开展抗日活动积极，执行党组织赋予的任务认

① 《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第4—5页。

真、坚决，于是提请军分会讨论，批准朱克靖重新入党，为特别党员，满足了他多年来的愿望^①。

同年12月，项英在新四军宣教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强调部队宣传教育要经常重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列主义理论；二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这三者是紧密联系着的，共产党的路线正是建筑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1940年1月25日，项英在新四军敌军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由于长期抗战的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剧了敌军的消耗，使敌军战斗力在下降，士兵情绪在低落，顽固性在减低，成为我军加强敌军工作的有利条件。他提出，对敌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以瓦解伪军为重点，对在战场上抓到的俘虏经过教育后可以放回去，对负伤的要在包扎后放回去，以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促进日伪军内部的矛盾和动摇。他要求各级敌军工作部门和干部，经常研究敌军的变化，很好地运用斗争的策略，“不懂得策略的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405—409页。

②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四）第615、621页。

人，就做不好敌军工作。”^①

随着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皖南的政治形势到1940年日益恶化，针对新四军的破坏活动不断加剧。项英根据当时的复杂斗争情况，指示保卫部门和当地中共秘密组织相配合，充分发动群众，加强驻地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任命熟悉军部驻地周围情况的殷扬（扬帆）为军法处地方科科长，以加强军部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果然，“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活动的加强，外来的人一到部队驻地，就会有人来报告；对常制造谣言或向国民党送情报的地主和青帮头子，抓住他们聚赌违法行为予以警告，使其行为收敛，不敢再公开反对新四军^②。

项英要求保卫部门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然后再作处理。扬帆在那五十年以后，在《扬帆自述》一书中写道：

“项英同志对保卫工作很关心，有时还作具体指导。记得在我开始做保卫工作时，还遇到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军部印刷厂有两个工人，都是从上海来的，因对工资待遇不满，讲了怪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四十三）第100—108页。

② 《扬帆自述》第18—19页，群众出版社1989年出版。

话，被厂领导认为是反革命分子送到军法处来处理。项英同志知道后，非常重视，亲自审问这两个人。项英向他们指出：‘新四军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你们是工人，又是越过重重险阻从上海来参加新四军的，为什么要做反革命呢？一定有什么原因使你们不满，我们是讲民主的，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项英同志的这番话，把这两个工人讲得哭起来了。于是，他们诉说了真实思想和对厂指导员的意见。项英同志在弄清情况后，决定马上释放他们，并且责成该厂解决了他们的具体待遇问题，对指导员也作了调动。后来，这两个工人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很好，主动要求发枪上前线，均英勇牺牲在战场上。”^①

项英重视部队文化工作，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军政治部于1939年2月出版了《抗敌画报》，来宣传抗战，反映部队的抗战生活，深受军内外的欢迎。不久，又在《抗敌报》上，开辟了《文艺》副刊，在《抗敌》杂志上设立了文艺栏。在这两个文艺园地上，刊登了许多介绍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斗争事迹的文章，不仅在抗日根据地有影响，就

^① 同上书，第19—20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当时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也很有影响。^①

项英重视运用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和袁国平一起，召集有聂绀弩、夏征农、黄源、冯定、彭冰山（即彭柏山）、吴强等文化人参加座谈，专门讨论了文化工作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问题^②他对图书、报刊资料的管理十分重视，有空就往拥有大量藏书의军部图书馆里去，查阅史料，研究问题，经常询问干部利用图书进行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对不爱惜书刊的行为十分憎恨，声称由他兼任军部图书馆主任^③。

项英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体会到，局势的发展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地区的政治、军事斗争，因此很重视信息的掌握。然而那时在皖南山区，因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他将自己一台五灯直流收音机搬到速记室，由他们指定专人收听新闻，并记录整理，送领导同志传阅，自己有空时我也去听。后来，又找到一名英语水平较高的同志，专门负责收听国外英语新闻。随着信息量的增加，传阅人数的增多，项英又

① 《从硝烟中走来》第34页。

② 《扬帆自述》第18页。

③ 同上。

决定油印分发，给小报定名为《广播收音》，并亲自为这张小报题写了刊头^①。

九 治军抓重点

在抗战初期，项英和叶挺等在将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为新四军后，一面指挥部队陆续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面抓紧部队建设。当时部队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项英经常关注的有六个方面：

第一、广泛吸收知识青年。

1937年冬到1938年春，正值抗战初期，在侵华日军气焰嚣张、正面战场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接着深入敌后，给南方各地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宁、沪、杭沦陷区与一些大中城市的许多知识青年和工人，怀着抗战救国的愿望，纷纷来到武汉、南昌以及随后的岩寺、云岭等地，要求参加新四军。项英对此十分高兴，认为知识青年文化水平高，接受新事物快，这将给部队建设增添活力，将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同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游击队干部战士相结合，就会提高部队的军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78—179页。

政素质和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为此，他要求各部队、各地联络机构，对凡要求参加新四军的知识青年一律欢迎。

1938年2月26日，项英在由武汉^①返回南昌的轮船上，遇到四个工人装束的青年，听出他们讲话是他所熟悉的上海口音，就使这位学徒出身而又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军人感到亲切，于是就很自然地同他们交谈起来^②。

项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呀？”

几个青年见这位军人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身边有背驳壳枪的警卫员，虽不知其姓名，但见他态度和蔼可亲，也就无拘束地回答问话。领头的吴福海说：上海失陷后，我们几个不愿当亡国奴，设法跑出来了，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来到武汉，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正在南昌集中部队，我们准备去南昌参加新四军。

项英越听越高兴，说：“我就是项英。欢迎你们参加新四军！”

① 《赖传珠日记》第116页。

②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20、25页。

顿时，几个年轻人更兴奋、更敬佩，不约而同地说：“噢，你就是项副军长！”

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一家人，交谈更亲切了。项英向他们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希望他们到新四军后好好学习、锻炼，为抗日救亡多做贡献^①。

项英一席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增强了参加新四军的光荣感，成为他们后来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勤奋工作的巨大动力。这几个青年工人没有辜负项英的期望，吴福海在战地服务团担任了队长。

在安排知识青年的问题上，项英和叶挺、军分会研究确定：一是，进战地服务团，边工作，边学习，把学习寓于工作之中。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校；二是，进教导队（后教导总队）学习，培养军政干部；三是，将医务等人才分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工作。为解决当时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军医处挑选一批男女知识青年，连续办了几期卫训班。

当时，各支队、团也安排了一批，建立宣传队，办起训练队，有的还安排到营、连担任书记、文书一类的工作。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20、25页。

新四军深入敌后，接连取得胜利，声威大振，参加新四军的人愈来愈多。在新四军中，不仅有大批知识青年，还有一批文化人，包括钱俊瑞、朱镜我、聂绀弩、林植夫、黄源、冯定等知名文人，而且还有不少从大城市来的医生、护士。项英不仅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成长，而且在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当时，新四军人员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只有四元，营连干部三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则十余元至数十元，少数的每月在一百元以上^①。在战地服务团任团员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每月三元^②。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

项英关心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1938年10月将薛暮桥由南昌带到云岭就是一例。当时，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听说有一位要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人是经济学家，他不考虑他们素不相识，而只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让薛暮桥随他乘坐汽车一起去云岭。

士为知己者用。富有学识的各类文化人和广大知识青年，经过一段时间培养和锻炼，迅速熟悉艰苦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146页。

②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25页。

的军旅生活和成长为有用人才，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和作战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抓紧培养干部。

项英知道，部队要发展，根据地要开辟和建设，都需要大批干部，除重要领导骨干请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外，其余的要靠自力更生来培养解决。

1938年1月，项英率军部机关由武汉移至南昌后，就同张云逸、周子昆等研究决定：在军直属队设立教导队，先设一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可以和抗大的基本相同，但要联系实际，学游击战不仅要讲山地的，还要讲平原的；教导队的干部，从延安抗大调来新四军的红军干部中挑选；第一期学员，从各游击区选调一部分，从新参军的知识青年中选调一部分；学制半年左右。项英请周子昆抓好落实^①

项英所以委托周子昆负责领导办教导队，因为他不但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担任过抗大训练部长，如今又将任军的副参谋长，因而由他抓干部培养是理所当然的。

同年2月15日，项英在南昌参加了军教导队第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104页。

一期开学典礼。他在讲话时，要求教导队参照抗大的办学经验，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来设置课程，培养作风；要求从抗大来的干部，很好地传授抗大的经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要求学员们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战术、技术，掌握杀敌本领，还要学习管理教育的方法，以便返回工作岗位后能带好部队、打好仗。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其中，来自湘赣边游击区的朱云谦，在那四十多年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来自赣粤边游击区的张日清，在那三十多年后，担任过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①。

同年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改编时，发现部队基层干部较多，“点验”时有的部队人数超额，项英就和叶军长、军分会研究决定，将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从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基层干部参加学习，又增加了一个学员队，学员共三百余人；将从延安抗大调来的一批红军干部派往教导营，担任领导和教学骨干。使一部分干部得以学习提高，从而为部队的发展打好基础^②。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104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105页。

同年7月，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深入敌后，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苏南、皖中等地人民的抗日斗志，许多知识青年和工人纷纷参加新四军，一些游击武装也要求新四军派干部去加强领导。项英鉴于上述情况，愈感到加强干部培养的紧迫性，就同叶军长、军分会的同志商量将教导营扩大为教导总队，随即报告中央军委，很快得到批准^①。

项英所以提出成立教导总队，而没有用抗大分校的名义，主要是从新四军军部驻地处于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内，国民党当局处处对新四军限制、刁难，从策略上考虑，不以抗大分校为名较好。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②。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教导总队于当年9月正式成立。周子昆兼总队长，袁国平兼政治委员^③。从当年10月的第二期起，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六个队，加上总队部直辖的青年队、女生队、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文化队、机炮队、工兵队等，多时

① 同上书，第105、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③ 同上。

达十三个队，一千二百多人^①。

同年11月1日，项英参加教导总队第二期开学典礼，并作了讲话^②。他要求教导总队要以抗大为榜样，很好地贯彻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运用抗大的办校经验，把教导总队办成“南方抗大”。他要求教员及时吸取前方作战的经验，详细讲解战术技术，帮助学员加深理解书本知识；要求学员在学习时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提高军政素质。此后，项英多次到教导总队讲课、作报告，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四军教导总队培训干部工作的蓬勃发展，影响不断扩大等情况，使国民党当局深为不安和更加仇视，顾祝同于1939年11月以转发蒋介石电令的形式，规定禁止举办军政大学一类的学校，说什么新四军不应有教导总队这样庞大的训练机构，应着手整编；军队中不应组训妇女，第八队应予裁撤；军队的

① 同上书，第106—107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38页。

任务是作战，不应训练唱歌演戏的文化队；等等^①。当时叶挺不在皖南，项英在主持研究后，将教导总队的名称一度改为教导队（过了一段时间又恢复为教导总队），并以他个人名义函复三战区，称新四军“仅办教导队”，把这场风波敷衍了过去^②。

在那五十年以后，洪学智等在《华中的抗日革命熔炉》一文中写道：“新四军教导总队是新四军创建时期由军部直接举办的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抗大’式的学校，从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历时整整三年。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新四军各级干部约有四千至五千人。它对新四军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③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它凝聚了当年教导总队教职员、学员的辛勤劳动，自然也包含了项英的心血。

第三、把民运工作当作部队一项重要工作。

新四军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过程中，如何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160页。

② 同上。

③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104页。

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江、浙等地是蒋介石集团起家之地，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地方，国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散布的“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等欺骗宣传曾经充斥城乡，加之宁、沪、杭等地失陷后农村秩序混乱，日伪的欺骗宣传，就使广大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有一种害怕心理。项英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开展民运工作，首要的是要取得群众的信任。他要求部队“处处以民众的利益为军队的利益，处处能够尊重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民众以军队的利益为他的利益，才能够使军队与民众在利益的关系上形成一种军民一致”，从而“取得广大民众对于我们的同情和拥护，真正实现军民合作，达到军民一体”，也就会使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①。

新四军进入敌后的部队，根据项英关于“军队的本身的实际行动，它是得到民众信仰与拥护的基本条件”的指示精神，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新四军抗日主张的同时，着重从行动上表明自己是一支人民军队^②。一是，严明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先遣支队到苏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第210页。

② 同上书（二），第127页。

南不久，就使群众认清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日伪军不一样，当第一、二支队进到苏南时，就受到许多群众的欢迎。二是，多打胜仗。开始群众对新四军装备极差有些疑虑，说“好是好，就怕没有用。”当群众看到新四军在韦岗、新丰等地打了胜仗后，才看清新四军是能抗日、真抗日的军队。三是，为民除害。当时民间自发武装很多，汉奸奴才、散兵游勇、土匪帮会混杂其间，危害群众。新四军到达苏南、苏皖边、皖中等地后，对民间自发武装进行清理、整顿，对那些为虎作伥、骚扰民众的“二鬼子”、“游吃队”坚决取消，对那些保国卫民的游击武装派人去帮助改造。新四军的上述实践，很快赢得群众的信任，树立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

项英认为，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必须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他指出：“单靠宣传不行，标语也不行，这些作用是很有限度的，一定要到民众里去，才能了解民众，才能接近民众，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动员起来。”^①“我们要做民运工作，要组织民众，要依靠民众组织才可以适合抗战的要求。”^②

当新四军各部队在驻地开始开展民运工作时，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项英根据在中央苏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经验，进一步指出：要动员农民起来抗日，“必须注意他们的生活问题，不想法子去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就不能将他们的热情提高，因为这是他们切身感觉的。”^①这就为进一步开展民运工作指明了方向。

根据项英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认真开展民运工作，对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帮助活动地区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青年、妇女、农民、工人等抗敌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活动，使各部队和当地群众同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迅速建立起军民同患难、共生死的关系。有些地区还建立了猎人队、义勇队等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作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队还帮助各地群众开展抗日活动，组织发展生产。各地生活得到改善的群众，更加热爱新四军，积极参军参战，出现了“父子同上战场，妻伴郎打东洋”的场面。大江南北地区广大群众的发动，为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严格作风纪律。

项英在抓部队建设过程中，根据新四军来自红军游击队，游击习气较多的特点，重视抓部队组织纪

^① 同上书，第128页。

律和作风的养成。他认为，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严整的军容，是难以完成各项任务的，也是难以打胜仗的；特别是时下和国民党的部队靠得很近，还有一个对外影响的问题。因此，他对部队和干部要求很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①。对此，绝大多数指战员是表示理解和赞成的。

当时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的林琳，是来自武汉的姑娘，在那五十年后，在《战地服务团在南昌》一文中，谈及这方面的情况。她写道：“项英同志平易可亲，和我们这些小青年在一起，谁也不感到拘束。可他又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当时刚穿上军服，还不习惯，常弄不整齐，项副军长看到谁不整齐，就要立即纠正。有一次，我和他迎面走过，当即立定举手敬礼。他还礼后没有走过去，用手指着我的颈项，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军风纪啊！’我摸摸衣领，原来是风纪扣没有扣上。项英同志重视军容风纪，在全军都是有名的。他本人剃光了头，腰杆挺直，上至军帽，下至绑腿、鞋袜，端正、精神，真是地道的军人风范。”^②

那时是战争环境，军机关干部也是战斗化的，不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27页。

② 《从硝烟中走来》第8页。

仅每天早上出操，而且都携带着武器。项英也和机关干部一样，坚持早上出操锻炼。有一天早上，跑步以后列队检查武器，负责带操的周子昆副参谋长逐一验枪。当军部秘书处秘书顾雪卿的步枪被验过，由周子昆推过来时，正在立正的顾雪卿接得很准、很稳。项英在场看了很高兴。当晚，他半开玩笑地对顾雪卿说：“今天早上，你接枪的动作那样准确，还不简单嘛！”^①这给顾雪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五十年后还没有忘记这件事。

项英对部属作风方面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并不都是严肃批评，而是经常用自己的行动来启发、感动对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战地服务团的吴友廉等几位女同志在云岭遇见项英，因她们只顾讲话，忘记向副军长敬礼，而项英反倒举起右手向她们敬礼，吴友廉等手忙脚乱地举手还礼。项英这次没有批评她们，却使她们受到深刻教育，胜过批评千百句。在那四十多年以后的1986年，吴友廉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参观时，项英的音容笑貌又展现在她的面前，使她又想起项英向她敬礼那件事，还觉得耳边发热呢^②！

① 1986年6月6日走访顾雪卿同志谈话记录。

② 《云岭》第16期第19页。

第五、重视部队体育运动的开展。

项英对新四军指战员的体育锻炼很重视。为了增强指战员的体质，他提出“建军必先建人”的口号。1939年5月，他在《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一文中，指出：“没有强健的身体，就不能履行或贯彻斗争的意志，更不能冲锋杀敌，决胜疆场。”他号召部队：“热烈参加体育运动，普遍地发展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成为日常生活之一部，成为建军的一种基本工作。”^①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期间，定期举行运动大会，不仅有体操、器械、田径、球类等一般项目，还有刺杀、投弹、超越障碍等军体项目，有力地推动了部队体育运动的开展，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六、关心部队妇女工作。

项英认为，新四军的女同志当时虽只有几百人，但分布面很广，从事文艺、教育、卫生、通讯等工作，有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员、女服务团员、女队长、女指导员，还有女科长、女秘书、女干事、女速记员、女会计、女文书等。她们活跃在大江南北、前线或后方，成为新四军中不可缺分的一种力量。为

^①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第160页。

此，项英经常关照有关部门，多重视对女同志的培养，多注意发挥女干部的作用，多解决她们的实际问题。

1940年，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领导对“三八”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是很隆重的。2月，项英在《抗敌》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我们的女战士》一文，高度评价了新四军的女同志为抗日救国做出的重要贡献，对她们的学习、生活、地位、恋爱等提出了希望与要求。他强调指出，妇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解放。他要求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革命工作，有知识的妇女还要与劳动人民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得到解放。“三八”妇女节那一天，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召开机关和直属单位女同志参加的纪念大会，项英在讲话中表扬了在各个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一批女干部，宣布了经反复评比出来的三对模范夫妻。他（她）们是：朱镜我与赵独步夫妇，袁国平与邱一涵夫妇，薛暮桥与罗琼夫妇。他们同甘共苦，互谅互让，情深意浓，一时成为佳话^①。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晚会上，战地服务团专门演出了表彰女同志先进

^① 《安徽妇女运动大事记》。

事迹的话剧《大时代的女性》，使大家受到很深的革命教育，扩大了妇女工作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

在项英和叶挺等军首长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展现出人民军队的风采，使它成为华中抗日的一支劲旅。

十 发扬优良传统

发扬优良传统，是项英在新四军担任领导工作过程中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1月10日，项英在南昌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开会，专门作了关于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讲话。这是他率军部机关从武汉移至南昌后的第四天，在机关工作刚刚展开、编组部队正在着手等千头万绪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时，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的命令还未公布，人们还习惯于按照他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副主席时的称谓，时任军部参谋处长的赖传珠在当天日记上写道：“项主席讲话，关于艰苦奋斗问题。”^②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64页。

② 《赖传珠日记》第110页。

项英在讲话中讲到：我们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健儿编组起来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色健儿同大于己方数十倍的敌人进行拚死的斗争中，能够坚持下来，取得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我国革命史上，有过两个第四军：一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是叶军长当时所在那支部队，曾经是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从广东打到武昌，被誉为“铁军”；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是朱德总司令、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陈毅同志曾担任过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红四军打出了威风，成为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四军的光荣传统，把新四军建成一支抗日的人民的铁的力量。

项英在讲话中还指出，现在艰苦的程度虽不像在井冈山斗争时天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也不像在长征路上和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经常忍饥挨饿，但条件还是艰苦的，部队创建要白手起家，要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作拚死的斗争，并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都需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

项英为了有利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确定将它作为部队的代字。新四军开始核定为八个团，就用“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各团对外的代字。如：一团叫“保团”，二团叫“持团”，三团叫“发团”，四团叫“扬团”，五团叫“优团”，六团叫“良团”，七团叫“传团”，八团叫“统团”^①。

项英为使部队重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几乎是逢会必讲，《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是他在这方面论述的代表作。他指出：“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因素，坚强战斗力的基础，使我军能够以最劣势武器对抗优势之敌，能够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这是革命军队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能够最终然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②从哪些方面来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项英在文章中具体讲了十个方面：

一、官兵平等友爱团结。

项英说：所谓“官兵平等”，是因为革命军队的官兵都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不以官阶分贵贱，不以生活好坏作区别，只是以能力大

① 《苏南抗日根据地》第454页。

②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83页。

小、责任不同，实行分工，以进行战斗，所以政治上是平等的。所谓“友爱团结”，是因为政治意志相同的人称同志，而同志与同志之间应当亲密友爱，团结互助。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得愈好，力量就愈坚强。战争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比。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友爱团结，使全军上下一心，同甘苦，共患难，造成一种铁的力量^①。

项英还讲到，要做到官兵平等，官与兵之间要互相尊敬，态度要诚恳和蔼，说话要坦白和气，有困难要互相帮助，上级要爱护下级，下级要尊重上级。在生活上，干部应与战士一样，而不应搞特殊。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有苦大家吃，有福大家享，不应搞特殊而脱离群众^②。

二、政治工作制度。

项英说：“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③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是进行和实现政治主张的必要工具。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

① 同上书，第 83—8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85 页。

证革命军队为实现政治任务所进行的各项工作，保证革命军队在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它像人体的血液一样，没有血液，人就会死亡；没有政治工作，革命军队就无法生存，更不能成长壮大^①。

三、军队要与民众打成一片。

项英说，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军队，力量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他指出：“一个军队，不仅要团结民众，爱护民众，而且要代表民众，保护民众。如鱼失掉了水，不单要打败仗，而且易被消灭。换句话说，军队有了民众拥护，就能生存，定能胜利；失去了民众，就要失败，要被消灭。”新四军过去和现在都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与人民群众是利害相共、痛痒相关的，因而能够在群众的帮助下，打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②。

怎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呢？项英认为，最主要的是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

因为“爱护老百姓”，是三大纪律之一。（另两条：一是坚持抗战，不妥协，不投降；二是服从命令听指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挥。)①

十项注意是：一是，上门板捆稻草；二是，房子扫干净；三是，说话要和气；四是，买卖要公平；五是，借物要送还；六是，损物要赔钱；七是，大便找厕所；八是，洗澡避女人；九是，进出要宣传；十是，优待俘虏兵。在这十项注意中，有九项是与群众有关的，他要求指战员必须人人做到，项项执行②。

四、艰苦奋斗坚持到底。

项英说，要使民族自由、独立、解放，只有坚决斗争到底，才能取得胜利。任何动摇妥协，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就会成为革命的罪人。新四军在为民族自由独立和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困难。长期的锻炼，使我们不怕任何困难，吃苦，耐劳，是我们的本领。只要能战胜敌人，任何的苦都能吃，任何的劳都能耐，艰苦奋斗，决不动摇妥协③。

五、自我牺牲英勇奋斗。

项英说，要挽救民族，解放民众，就要进行斗争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85页。

② 同上。

③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87页。

和战斗，这就难免会有牺牲。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是革命军人的光荣。新四军为了抗日救国，解放民众，过去作了英勇牺牲，现在仍在进行牺牲奋斗^①。

六、自觉地遵守纪律。

项英说，军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会被瓦解、被消灭。“谁的军队纪律好，谁的战斗力强，谁就有把握去战胜敌人。纪律的好坏，就是军队好坏的标准，所以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军人要严格地遵守纪律。”^②他所以强调“自觉地遵守纪律”，是因为旧军队靠强制来维持纪律，常常会发生阳奉阴违、瞒上不瞒下的现象，是不可能持久的；而革命军队正因为懂得纪律的重要，因而能随时随地遵守纪律，把遵守纪律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③。

七、绝对废除肉刑和打骂制度。

项英说，肉刑是封建时代统治者对付被压迫者、主子对待奴隶的残酷手段。封建军阀军队对士兵的管理，仍采取肉刑和打骂。而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从它的前身工农红军起就彻底废除肉刑，绝对禁止打人骂人。它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是对战士还是对老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③ 同上。

百姓，都不能打骂，违者要受到纪律制裁^①。

八、不断学习军事政治。

项英说，战争的基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不断学习军事，提高军事技术，以增加自己的战斗能力。同时，要学习政治，增强民族意识，学会从政治上观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鉴于新四军的干部多未进过军事学校，加之技术的飞速发展、情况的不断变化，故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不断学习，不断前进^②。

九、培养和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

项英说，新四军的战斗作风，着重包括：一是，动作敏捷。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敏捷的动作，才能在战斗时达到动作的敏捷。二是，行动机警。战士，不仅是斗力，而且要斗智。谁能巧妙地战斗，谁就能克敌制胜。谁能灵活地利用战场情况的变化，谁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减少损失，取得重大的胜利。三是，攻击勇猛。只有勇猛攻击，才能震撼敌人的精神，动摇敌人的斗志，从而取得胜利。四是，紧张活泼。紧张是战斗的精神，与其相反的散漫松懈现象会妨碍工

① 同上书，第89页。

②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90页。

作的进展，影响战斗的进行，有碍胜利的进取。活泼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把它运用于战斗中则为机动性，但活泼不是放浪，不是胡行乱闹，而是生气勃勃，有组织有秩序的自然动态^①。

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项英说，我军的武器都是在战斗中夺取的。我们现时没有兵工厂造武器，更没有钱购买武器，只有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是我们的传统本领。为了夺取敌人的武器，就要学习战斗，学习使用从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枪炮，来充实自己的装备，加强自己的火力，以便更多地夺取敌人的新式武器，把自己造就成为现代化的军队。

项英鉴于新四军的武器都是用血肉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十分强调要爱护武器。他说：“要保护自己的武器，把武器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一样。”

项英当时在这方面提出的口号是：

“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用战斗的手段缴获敌人的枪炮！”

“爱护武器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

^① 同上书，第90—91页。

“武器与生命共存亡!”^①

项英在这篇文章最后，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为保持上述优良传统、发扬这些优良传统而斗争，使新四军成为抗战中一支坚强的军队，团结最广大的民众，协同友军，在江南坚持长期抗战，准备和参加反攻，最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②。

对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项英不仅发出号召，提出要求，而且强调以身作则，重视实践。当时，在新四军从事文化工作的钱俊瑞，1941年专门写道：“新四军全体人员待遇之平等，是精诚团结的另一基础。全军上至军长、副军长，下至伙伕、马伕，除伙食由公家供给外，每月饷银均在一元五角至四元之间。如以政治部而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月薪四元，各部部长三元半，其余二元至三元不等。”^③

项英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仅提出要求，而且带头实践，还定期检查贯彻落实情况。1938年12月25日，项英在云岭专门召集在那里的红军老干部开会，讨论发扬优良传统的问题，分析情况，找出问题，批

① 《项英将军言论集》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云岭》第23期第5页。

评那些不良现象，制订措施，以推动进一步的落实^①。

项英的工作是艰苦的。他作报告，都是自己查资料、写提纲；写文章，也是自己动手。他由于工作多，又要学习，经常到深更半夜才休息。他没有副官，文电管理及生活保障，均由军部秘书处秘书顾雪卿兼管。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养成从各种报纸上找信息的习惯，一直坚持下来，对从香港、上海等地弄来的报纸都经常翻阅研究，并将有关的叫人剪辑下来。他对晚上时间的利用率颇高，除收听新闻广播、写作外，还时常到负责技术侦察的原通信科长胡立教的办公室阅看破译的情报资料。由于这个办公室设在山上，被称为“三山办公室”，后来竟被有人误解为项英搞“三山计划”的原因之一^②。

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克扣，新四军的经费异常困难。项英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廉洁奉公，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服装，吸的烟是最普通的，目的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战胜困难，去争取胜利。

那时军部为照顾叶军长和对外联系方便，办起了“小灶”。项英在叶军长处开会或商谈工作时，也

① 《赖传珠日记》第143—144页。

② 1986年6月6日走访顾雪卿同志的谈话记录。

偶而吃过几次“小灶”，但平常还是回住处吃“大灶”。有些好心的人曾劝项英去吃“小灶”，不要再吃“大灶”了。项英却认为，为照顾叶军长的身体，招待外部来访的重要客人，办“小灶”是完全应该的，但他本人身体还可以，不参加接待外部重要客人时，还是吃“大灶”好，有利于联系群众，有利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打铁需要自身硬”。如果项英只是号召别人艰苦奋斗，而本人却不带头实践，那么他的话也就没有号召力了。

项英在云岭用个人的津贴费来招待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被传为佳话。参加陪客的军部战地服务团油画家涂克，在那五十年后的1991年，在《与项副军长陪史沫特莱吃饭》一文中，写道：

“1938年秋去冬来之际，项副军长派人叫我到 he 那里，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心里嘀咕：‘军长叫我去，总是好事吧！’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到了项副军长家，只见他穿了一条打着两个补丁的裤子，他关照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三块钱，并交待说借款从他下个月的津贴费中扣除。我看到这一情景，十分赞叹：‘我们共产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的生活作风，是多么俭朴清廉

啊!’他还要炊事员去买菜，说是要请史沫特莱吃饭。项副军长调头对我说：史沫特莱想会见我军的一个文化人，所以请你来。这时，我才明白是来作陪客的。我作为有机会目睹一位美国名作家的风采，并和她一起交谈、吃饭，感到莫大的荣幸。”

“到了吃饭的时候，炊事员端上来三菜一汤，很丰盛。在席间，项副军长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和史沫特莱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如部队的生活问题啦，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怎样卡我们啦，以及我军英勇抗战的情况啦，谈得非常自然。吃完饭，项副军长派人把史沫特莱送回住处，我也向项副军长行礼告别，回战地服务团了。”^①

1938年11月底至12月初，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问，项英出面接待，给慰劳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慰劳团成员、妇女界代表姜平（即孙兰）返回上海后，写了《项英将军印象记》一文，在上海失陷后变为“孤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85—186页。

岛”时期的抗日刊物《上海妇女》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文章对项英的平易近人、艰苦朴素方面的情况，专门作了叙述：

“项英毫无军首长的架子，平易近人。他穿着朴素，一套灰军服，束一根皮带，脚下一双皮鞋，鞋头已破了，好像普通战士，不失艰苦朴素作风的本色。那时，项英一月只拿四元津贴费，吃的饭和菜跟士兵毫无差别。上海客人一去，他如同见到自己家人，几次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一天夜晚，项英同上海代表交谈到深夜两点。”^①

项英的党性观念很强。在皖南，他按照规定，每逢星期六下午总要参加党的小组会，过组织生活。一次，他在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说自己一天从早忙到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缺乏计划和系统，今后要很好改进，订出计划，抓好落实。他的发言，使大家受到很大启发，大家也分别检查了各自学习的情况^②。项英遇到重要情况，总是及时向组织上反映。1939年冬，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处得知，蓝苹（即江青）在上海政治上、生活作风上有不良表现，他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其中还讲到“此人不宜与主席

① 上海《支部生活》1987年第12期第42页。

②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20页。

结婚”^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然而电报落到与江青关系甚密的康生手里，结果可想而知。扬帆于1955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长达二十五年之久^②；项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极力丑化贬低，甚至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

项英平时看上去很严肃，实际上平易近人，能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他经常在晚饭后到附近单位转转，边散步，边了解情况。这天晚上，他来到战地服务团，正好碰上他们开联欢晚会，就被邀请参加了。不一会，到了击鼓传花的节目。主持人事先宣布，鼓停时花落在谁手，谁就要“坐飞机”，就是由别人横扛在肩上转圈。项英知道这个玩法是对着他来的，但他故意装作不知道，微笑着击掌表示同意。说着，鼓被敲得响起来，花被迅速地传递着，没传到两圈，鼓突然停止，花正落到项英的手上。全场的人欢笑、鼓掌，高呼：“项副军长，坐飞机！”“项副军长，坐飞机！”项英笑着站起来，用一口浓重的湖北地方口音说：“好嘛，坐飞机！要来个大力士驮啊！”这使晚会的情绪达到了高潮^③。

① 《扬帆自述》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从硝烟中走来》第7页。

项英由于带头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处处以身作则，因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敬和信赖。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蒋介石出于他的政治目的，对新四军的活动区域、编制数额、军饷发放和军械物资补给等方面，处处加以限制。1938年夏季，国民党当局发给新四军的军服，只能够供给军部和直属单位及一部分部队；前方部队中只能每四个战士发一套军服，医疗药品等严重缺乏。后来，国民党鉴于挺进敌后的新四军战果累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在新四军领导人一再交涉之后，才将新四军每月的军饷由开始的六万五千元，增加到八万多元，到1939年又增加到十二万多元，但这个数目还不到其嫡系部队一个丙等师的军饷（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的军饷每月十八万元）^①。在这种情况下，项英把宣传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英勇善战的情况，争取外界包括国际友人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在经济上的支援，当作一项重要责任。

1938年3月9日，项英和叶挺军长一起，在南昌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42—44页。

会见上海煤业救护队全体成员，并请他们吃饭^①。这个救护队原为上海职业界一个行业的救亡组织，当年11月西撤到南昌后，面临着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时，国民党三战区封救护队一个头头为少校军官，想把救护队带过去，而以一批秘密的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成员，倾向于跟着新四军抗日救国。这样，项英和叶挺的接见和请吃饭，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曾多年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熟悉上海情况的项英，向救护队介绍了新四军前身的光荣历史，以及准备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打算。叶挺也鼓励他们到新四军来。经过这次会见，救护队成员倾向于跟着新四军的人更多了。到4月，在改选后的救护队队长忻元锡、陈昌吉、叶进明等领导下，带着二十三辆卡车和两辆救护车，一百二十多名救护队员，到岩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②。这就使新四军增加了一批运输车辆和技术人才，称得上是雪中送炭。

同年7月，项英等在云岭会见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书记刘晓和宣传部长沙文汉时，在交谈工作之余，刘晓一再询问新四军现在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解决时，项英坦诚地说明新四军的处境和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42—44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44页。

困难，希望上海地下党在经济、干部等方面给予援助。刘晓、沙文汉当即允诺，表示一定尽力支援^①。在项英等与刘晓、沙文汉会面以后，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斗争的配合更有成效了，支援也更多了。8月，中共江苏省委将在上海难以长期埋伏的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冰山派往皖南，被分配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的科长^②。

同年8月，项英在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中，在武汉，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③。斯诺访问项英的中心内容，是新四军成立前的光荣历史。项英对新四军的前身——红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斯诺不时提问，诸如对怎样以斗争求生存，怎样和大于己方数十倍的敌军周旋，等等，项英都一一作了回答。斯诺听到这些悲壮的经历，由衷地感到敬佩，认为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项英是“由坟墓里出来”的，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希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86页。

② 《从硝烟中走来》第33页。

③ 《有朋来自天涯》，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页。

望^①

斯诺在了解新四军的光荣战斗历程后，很受鼓舞，很快整理成电讯稿和文章，向全世界作了报道^②。对于新四军的成立，斯诺在报道时作了如下的描述：

“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全苏区内迅速传播出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则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领袖的工人和木匠，……就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③

斯诺后来将他写的《项英的一支铁军》的文章，先后在《亚细亚》月刊和《良友》画报第一百四十三

① 《有朋来自天涯》，百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57 页。

② 同上。

③ 《有朋来自天涯》第 57—58 页。

期上发表^①。

同年 10 月，项英怀着对上海人民的深厚感情，和李一氓商量后，派从上海出来参加革命的、时任新四军印刷厂厂长陈昌吉回上海，了解情况，并将新四军的大批照片和文章带到上海，地下党通过《译报》和《译报周刊》，第一次向沦陷后变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介绍新四军的情况。上海人民犹如在黑暗中看到燃烧着的火把一样，顿时引起强烈的反响^②。

同年 11 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由重庆来到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访问^③。项英应邀向史沫特莱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培养干部等方面的情况。在介绍中，项英谈到教导总队第八队是个女生队，有一百多人，学员中少数是红军女同志，多数来自江南敌后，她们都是有知识的热血青年，抗日热情很高，学习刻苦努力，军事操练认真。史沫特莱听了很感兴趣，后专门去这个队采访，并将她们持枪操练的情景拍成照片，

① 《有朋来自天涯》第 57—58 页。

② 上海《支部生活》1987 年第 12 期第 42 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 139 页。

寄往国外宣传新四军女战士的风采^①。

史沫特莱在八队采访时，得知有的学员身上长疥疮，有的把身上的虱子说成“革命虫”。她认为不然，坦率地指出：“那种把虱子说成‘革命虫’的说法，我不同意。确实，这是环境艰苦造成的，越苦越累，虱子越伴着你。但是，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要知道，折磨人的疥疮没有革命性。”史沫特莱针对女学员洗澡难，特意拿出一部分稿费，并和八队的学员一起修建了浴室^②。项英得知上述情况后，对史沫特莱关心新四军指战员的友好情意表示感谢，称赞她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予的无私援助。

同年11月30日，“上海民众慰劳团”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乘竹筏到达章家渡，受到项英和新四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③。这个慰劳团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进步新闻记者顾执中为团长，职业救亡协会负责人王纪华（共产党员）为副团长，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代表姜平（即

①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85页。

② 《有朋来自天涯》第6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41页。

孙兰)、朱立波,海关代表陈琼瓚,农民代表姚惠滋等为团员组成,由新四军联络员、印刷厂厂长陈昌吉陪同来皖南的,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美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也一同前来^①。项英和来自上海的慰劳团成员一见如故,十分亲热^②。

当天晚上,项英在云岭先请慰劳团吃饭,接着一起来到陈家祠堂外的广场,参加欢迎大会。“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的横幅悬挂在主席台上,在热烈的掌声中,项英、袁国平、邓子恢、李一氓、赖传珠、傅秋涛和上海民众慰劳团的成员,一起登上主席台。项英首先致欢迎词,他代表此时去广东开展抗日活动的叶挺军长,代表新四军军部和全军指战员,向冒着危险、远道而来的上海民众慰劳团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慰劳团团长顾执中、副团长王纪华先后致慰劳词,他们代表上海人民,向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美国进步记者贝尔登用不熟练的华语讲话,对新四军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表示敬意,对新四军将士为了祖国的生存、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表示敬佩。贝尔登最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87页。

② 同上。

后讲道：“我们的人民军队作战如此勇敢，战斗力如此雄厚，就让那些龟缩在长江破舰中的敌兵发抖吧！”讲话结束后，顾执中将写有“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九个大字的锦旗献给项英，会场上的掌声经久不息，气氛达到了高潮^①。

项英同上海慰劳团成员在锦旗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代表团成员朱立波保存了十年之久，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将它献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②。

当时，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名义，也向新四军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道“民族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十四个大字，王纪华受委托将这面锦旗带到云岭，项英高兴地接下了这面锦旗^③。

上海慰劳团在云岭停留五天期间，项英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由来和发展、挺进敌后及在大江南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当时面临的困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第87页，《有朋来自天涯》第29页。

② 上海《支部生活》1987年12期第43页。

③ 《党史信息》1988年7月16日第3版，上海党委党史办编印。

难，并安排慰劳团参观部队和战地服务团、医院、教导总队、修械所等单位，使慰劳团加深了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

在上海慰劳团离开云岭的头一天晚上，项英又到慰劳团住地看望。那天气候寒冷，北风怒吼，项英和慰劳团成员围着火盆，在蜡烛的微弱灯光下，促膝谈心。他代表新四军指战员对上海提出三点希望：一是，上海各救亡组织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使日本侵略者不能很好地利用上海的经济优势，不能很好地利用上海的人力。二是，上海各救亡组织应多动员热血青年，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到农村、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为民族解放出力。三是，上海现已开展的各项救亡活动，希望再接再厉，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

慰劳团的成员们听得认真，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向各界汇报。

慰问团成员还一再询问项英：“新四军需要上海人民给些什么帮助？”项英坦诚地回答说：“在我们这里，一方面我们自己需要医疗，一方面我们还要给民众治病，所以医药是特别需要的。精神食粮最缺的是报纸。”慰劳团成员连连点头，表示理解和记住了项英提出的要求。

当上海慰劳团离开云岭时，项英热情地对他们说：“希望诸位告诉江南父老放心，我们已经决定，不管局势变化如何，我们都不会离开江南这一块土地。”^①

项英还将以叶挺和他的名义写给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和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感谢信交给慰劳团，请他们带回上海。其中，给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信写道：

“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各位同志：

上海民众慰劳团带来了你们的锦旗，给我们许多鼓励，非常感谢，非常惭愧！

上海工友的斗争精神，向来是有名的。上海失陷以后，做救国工作特别困难，可是你们仍旧努力不怠，实在钦佩极了！

我们愿意在江南敌人的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和各位同志的工作配合起来，必定要收复南京和上海。

上海全体工友和我们全体弟兄一定有大会师的一天。

现在趁代表团回上海，特地写信道谢，并致以民

^① 上海《支部生活》1987年第12期第43页。

族解放敬礼!”

上海地下党工委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在主办的秘密刊物《朋友》上全文刊出，鼓舞了上海工人的抗日热情^①。

叶挺、项英关于上海工人阶级和新四军定能“会师”的预言，在那十年以后的1949年5月27日，由新四军为主改编和发展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而兑现。

叶挺、项英给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感谢信，写道：

“远承贵会特派代表姜、朱二女士，间关绕道，辱临慰劳，并赐奖誉，感愧实深。上海失陷后，我妇女界同胞不怕挫折，再接再厉，足证贵会领导贤劳，钦慰无已。嗣后定当追随上海二百万妇女同胞之后，坚持江南抗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

叶挺、项英给上海市妇女团体的信，对当时上海妇女救亡团体是很大的鼓舞。它已成为历史文物，存入上海市档案馆^②。

上海慰劳团返回上海后，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利

① 上海《党史信息》1988年7月16日第62期第3版。

② 上海《支部生活》1987年第12期第44页。

用外商办的《译报周刊》出特刊。大力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功绩。从而使上海各界出现了一个宣传新四军、呼吁支援新四军的热潮。在那两个月以后，仅上海医药界就捐献价值一万一千元的药品和现金，秘密移送给在苏南的新四军第一支队^①。

随上海慰劳团去皖南的美国进步记者贝尔登，受史沫特莱女士的影响，留在云岭多次访问项英，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贝尔登对像项英这样没有受过任何专门军事训练的人，能够领导一支军队去抵抗日本这样凶顽的敌人而感到惊讶。为此，他专门询问过项英。

项英回答说：“革命者在他的工作中学到的战略和战术，跟军事行动所运用的战略和战术是相似的。因此，一个好的政治战略家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军事战略家。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家只能在某一限度内工作，因此不能称为真正的战略家。一个政治家可以很快学会军事战斗，而在运用步兵与炮兵的时候，他却无论如何不能不请教军事技术家。不用说，当他在学习的时候，他必须大大倚赖他的情报和他的部属。”

贝尔登对中国游击战争的问题，多次与项英讨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88页。

论。

一次，项英对贝尔登谈了自己的看法：“请告诉我们国外的友人，应当认识游击战争的真正作用，游击战争有它的限度，它不是全能的，但它是一种先导的与协助的力量。”“如果我们要国家进步，我们应当自力更生，否则胜利是空洞的，我们必须唤起民众。”

贝尔登访问项英时，提出的问题广泛，甚至无奇不有，有一次竟问起部队中性的问题。项英在回答时说：外人是了解我军这一方面情况的，“首先，我们的战士这么忙，他们没有功夫想到这类问题；其次，我们把战士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方面去了；第三，中国的习惯和风俗也使这个问题比外国容易解决。”接着，项英开玩笑似地问贝尔登：“怎么，你在这儿前线有性的问题吗？！”项英这一问，搞得贝尔登不好意思。俩人都笑了起来^①。

贝尔登通过多次访问，对项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新四军中所最敬重的人之一。贝尔登在描述项英时说：项英既有着非常巧妙的幽默的气质，又有着对待问题极其认真专一的精神。项英总是非常认真地倾听你的谈话，一点也不打断你，当你说完

① 《有朋来自天涯》第32—33页。

时，他便逐条回答你。有一次，贝尔登去战地医院采访，正巧遇上项英在看望伤员，只见项英问候了几句话，就鼓舞起伤员的信心，使伤员们得到很大的安慰。项英这种出色的思想鼓动方法，使贝尔登惊叹不已。史沫特莱称项英是一个“铁人”，贝尔登也赞同这一评价^①。

当贝尔登返回上海后，就在《大美晚报》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报道，系统介绍在新四军的所见所闻。贝尔登在文章中，称赞新四军是中国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贝尔登还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拍摄的照片，包括战士操练、演讲的场面，慰劳团活动的照片。后来，贝尔登把这十多篇文章整理改编为单行本《新四军》，由大美晚报社出版。这就实现了贝尔登的心愿，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②。

1939年2月，上海地下党又向新四军派出了第二批民众慰劳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代表吴大琨，副团长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代表扬帆。团员主要是戏剧界的知识青年约五六十人，一部分是准备参加新四军的。他们躲过日本宪兵的严格盘查，冲破国

① 同上书，第32页。

② 《有朋来自天涯》第34—36页。

民党军警的干扰破坏，翻山越岭，于4月底到达皖南军部^①。5月1日，新四军军部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项英在讲话时，代表此时赴江北的叶挺军长和军部，对上海各界民众关心支持新四军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使这批知识分子能留下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项英向他们介绍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杀敌的情况，动员他们留在新四军工作。多年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副团长、共产党员扬帆，为项英热情的谈话所感动，欣然留下参加新四军。在扬帆的带动下，大部分团员也参加了新四军。遗憾的是，当时不愿留下参加新四军的吴大琨团长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关进了上饶集中营^②。

1939年春，项英在云岭会见了由史沫特莱引见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女士。尤恩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关心，为新四军从上海弄到一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克服很多困难和险阻，运抵泾县小河口后方医院。项英对尤恩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尤恩给予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对尤恩准备帮助新四军医务人员表示称赞和鼓励。在交谈中，项英指出：新四

① 《扬帆自述》第14—17页，《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88页。

② 同上。

军在抗战中取得的胜利，是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尤恩女士和史沫特莱女士，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者；她们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帮助，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①

1940年，项英得知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陈子谷的养祖父去世，在泰国的叔叔要他回泰国分遗产。他立即和袁国平主任商量，决定批准陈子谷去泰国，一方面为其养祖父奔丧，处理养祖父的遗产；另一方面，可以顺便向旅泰爱国华侨为新四军募捐筹款。陈子谷没有辜负组织上的期望，怀着对祖国、对新四军的热爱，广泛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发动旅泰华侨捐款抗日，共募到六万多银元，连同分到的遗产二十多万银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了军部。这笔钱，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粮饷，还解决了这一年冬季棉衣的费用。对于陈子谷的革命热情和行动，项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②。

项英积极宣传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抗战业绩，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一个窗口，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对取得许多爱国志士和国际友人在政治上支持、经济上

① 《有朋来自天涯》第82页。

② 《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16页。

支援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二 项、叶之间

项英和叶挺俩人在一起工作,是从1937年12月23日开始,到1941年1月12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为止,共三年稍多一点时间。在这期间,项英于1938年7月至10月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叶挺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和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两次去广东、重庆,1939年5月至8月去江北巡视,因而项英和叶挺实际在一起共事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由于叶挺曾长期离开党,并且向毛主席表示要“在党的组织外”,以非党员身分出任军长^①,这在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当然会有种种不便。尽管如此,项英还是从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叶挺工作,以利于新四军的存在和发展,并在此前提下,从多方面来支持叶挺的工作。

项英首先注意及时交流情况。1937年12月下旬,项英从延安抵达武汉后,迅即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的编组原则、红军和游击队怎样集中以及不允许

^① 《新四军·文献》第53、57页。

国民党当局插手新四军的干部配备等要求向叶挺通报，以便统一行动。1938年2月，项英接到毛主席给他和陈毅的关于新四军集结后应前伸到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和在茅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立即告知叶挺，使叶挺同三战区研究确定新四军江南部队的部署有了依据。同年四、五月份，毛主席同意派先遣支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和发来派主力进军敌后的电报后，项英又及时转告叶挺，使叶军长不仅参与出动前的组织和动员，还得以及时向三战区报告情况，激励了江南人民的抗战热情，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多做实事，是项英支持叶挺的又一个方面。新四军组建之初是白手起家，工作千头万绪。项英与叶军长相商，由叶军长利用其与陈诚和顾祝同这两个保定军校同学的老关系，留在武汉负责对外联系，催促早日公布领导干部命令，落实经费和被装，争取多解决些实际问题；由项英和陈毅、张云逸、周子昆等一起，先到南昌安排驻地，领导军部展开工作，然后赴各游击区动员集中部队，待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后，再请叶军长于1938年2月11日到南昌军部主持领导

工作^①。后来，当叶军长两次较长时间离开新四军时，项英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把工作担当起来。

当时叶挺招收不少故旧，带来一些亲属，项英对这些非党人士都表示欢迎，并作了妥善安排，有些担任了上层干部。例如，沈其震是叶军长的老朋友，曾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到新四军后参加军医处的筹建，项英同意让他担任了首任军医处长，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津贴费每月达一百五十元，是当时皖南新四军干部津贴费最高的一个，相当于项英月津贴费的三十多倍。又如，林植夫虽参加过其他党派，由于是叶军长推荐的，日语不错，对日军宣传也需要，项英就同意让他担任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再如，叶辅平是叶军长的胞弟，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的团军需主任、师会计科长，项英同意让他担任军部军需处长的要职，而让延安派来的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任过陕甘宁边区粮食局局长的老红军宋裕和担任军需处副处长^②。对这些人员的安排，叶挺都是满意的。

1938年7月，项英接到党中央通知他去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电报后，立即告诉叶挺，说明这次会议

① 《赖传珠日记》第115页。

② 李一氓同志走访记录，《新四军人物志》。

的重要性，他应当去参加。对此，叶挺当时也表示赞成。随后，他俩对当时敌情作了分析研究，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请叶挺多操劳，还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以及李一氓、赖传珠等对叶军长多给予协助，然后于28日离开云岭^①，经南昌、武汉转赴延安。

可是，当项英参加9月29日开幕的六届六中全会才一两天，就接到叶挺于9月30日发出“汉口转项”的电报，讲道：“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力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即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视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②

其实，当年8、9月份，新四军第一、二、四支队正在苏南、苏皖边、皖中等地胜利展开，三支队在皖南的南陵一线开始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重大的情况，所谓“战局激变”和“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不好理解。项英从电报中，觉察出叶挺的情绪，考虑到叶挺即将离开军部，加之华中前线战事吃紧，

① 《赖传珠日记》第130页。

② 《叶挺将军传》第307页。

于是他立即向党中央领导人请假回华中，得到同意后迅即起程。他一路上风尘仆仆，于10月22日下午赶回云岭^①。

项英返回云岭的第二天，叶挺军长从外地回到云岭。项英当即去叶军长住处看望，简要介绍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和会议的主要精神。叶军长告诉项英，时下华南战局紧张，日军于10月12日在他的家乡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了粤东大片地区，他想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回广东去拉队伍、打游击，就近照应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希望项英及军部支持他的想法，并给予一些帮助。项英同叶军长进行了恳切的交谈，一再挽留，他对党的态度和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明四军离不开他。但叶挺坚持要去广东，很快就离开云岭^②。项英在同叶军长交谈当天，就将叶辞职意坚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③。

项英返回云岭后，从李一氓处得知：叶挺在离开前曾经给他留下一封信，表示决心离开新四军，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这看

① 《赖传珠日记》第137页。

② 《叶挺将军传》第307—309页。

③ 《周恩来传》第443页。

出他想离开新四军不像是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的^①。

不久，项英得到消息，叶挺回到广东后，已在惠阳、宝安等地拉队伍开展抗日活动，并被余汉谋委任为东江游击指挥，其指挥机关就设在宝安县的深圳^②。

此时，全国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在华南占据了广东省会广州，在华中占据了湖北省会武汉，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相持阶段。项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如果真能在广东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与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所讲的“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和在粤汉路等庞大敌后地区部署游击战争的精神是相符合的^③，更感到支持叶挺在粤东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的必要性。于是，他和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后，派人送去几百条步枪，还曾经酝酿给叶挺派一批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6页。

② 《叶挺将军传》第308—309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66、第147页。

粤籍干部^①。后由于蒋介石干预，撤销了叶挺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致使项英拟派干部去粤东的设想未能实施。而叶挺离开新四军，去广东拉队伍、打游击，自然很快传到了延安和重庆，并为国共两党所注视。

同年12月16日，项英得知叶挺难以在粤东开展抗日活动后，立即电报党中央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称：“希夷在广东既不能取得名义，最好劝他回新四军工作。因他受此刺激，若能加以解释，转变观念，如有回四军继续工作可能。如何，盼复。”^②

1939年1月，叶挺由香港到重庆，周恩来动员他仍回新四军。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报告蒋介石对叶挺离军辞职的反应时，提出“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③1月1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并复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6页。

② 项英1938年12月16日报中央并告周、叶电。

③ 《新四军·文献》（一）第106页。

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复电同意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为主任，项英为副主任；同时要求新四军在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立对叶挺的正确关系^①。

项英对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表示完全拥护。他迅即召集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李一氓、赖传珠等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指出叶军长返回军部工作的重要性，重申他多次强调的要求。包括：要利于叶军长行使领导职权；军事工作要请叶军长为主处理；政治机关要主动汇报情况；生活保障要搞好；等等。

同年2月，叶挺在周恩来陪同下回到云岭。项英对去广东为开展抗日活动奔波的叶军长安全返部表示欢迎，向叶军长介绍了当面敌情和近期部队情况，和叶军长一起陪同周恩来在皖南视察部队。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在周恩来主持下，研究和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在周恩来视察期间，项英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和交谈中，自然涉及到他与叶挺相处的情况。包括：

^① 同上书，第107页。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他对叶军长是尊重的。在军机关和部队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要求各级干部坚决服从叶军长的命令。从实际情况看，部队中没有发生对叶军长不尊重的现象。

他对叶军长的领导工作，一直是支持的。凡军事方面的重要会议，都请叶军长主持、讲话；上面来的公文，下面送来的报告，都先请叶军长批示；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是商量决定，没有发生过争执和矛盾的地方。

对新四军委员会，让叶军长担任主任、他做副主任，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认为，这有利于叶军长大胆工作，对外影响也好些。不过，原来他担任主任时，也是和叶军长一起商量决定问题的，他个人并无独断专行之处。

他对叶军长带来的亲属和故旧，都帮助安排，位置是比较好的。

他对党中央给他的政策指示方面的电报，多用口头向叶军长通报，有时也请机要人员送阅。

项英还谈到，在与叶军长相处过程中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例如，有的情况交流不够及时，有时方法简单，致可能引起误会，今后当引起注意。

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周恩来问项英在对问题

的看法和处理上，与叶军长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项英当即坦率地表示：也有，对军部原特务营营长叶道志问题的处理就是一例。他在1938年7月28日从云岭动身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二天，即7月29日，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携枪逃跑^①，其行为是非常错误的，但不是叛变投敌，而是想回八路军工作，问题的性质是违犯纪律，属于内部问题，还应考虑到叶道志曾任过红四方面军的师长、师政委，但抓回以后就仓促决定枪毙，并于8月30日执行^②，我从延安回来后得知对这件事的处理，感到太简单太重，但也无法挽救了。历史证明项英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那四十五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83年10月21日复查，认为这是一起历史错案，决定为叶道志平反，恢复名誉^③。

在交谈中，项英还向周恩来反映：在召开党内会议或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叶挺由于不能参加，不会没有想法以至猜测的；在党中央的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的名字，按机要工作规定是不便交给叶挺看的，即使给叶挺看他也会有感觉的，容易引起误会，而且

① 《赖传珠日记》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

难以解释清楚。

对于项英所谈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表示理解，特别对党中央来电中很少提到叶挺名字的问题连连点头。不久，党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来电中，提到叶挺名字的次数多起来了。

同年春夏之间，项英与叶挺就向北发展的问题商谈比较多，确定建立江北指挥部，整顿第四支队，新建第五支队，并很快得到批准和实行。4月下旬，叶挺去江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整顿第四支队，8月上旬返回云岭军部。在交流情况时，项英对叶挺在江北的辛勤工作表示慰问的同时，也委婉地表示对高敬亭不应该作那样最严厉的处理。当叶挺得知党中央对高敬亭有教育争取的指示时，也感到后悔^①。

同年9月，叶挺为解决第四、五支队编制及要求增加经费，离开云岭经桂林转赴重庆。项英在送行时，祝叶军长一路顺利和成功，并希望他早日返回军部主持工作。

同年10月，叶挺在重庆为解决新四军的经费、江北部队编制问题多方奔波，并于10月2日到南方局同董必武、叶剑英（此时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不在重

^① 《叶挺将军传》第328页。

庆) 交谈。10月3日, 南方局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 在谈及叶挺将向蒋介石提出经费及江北部队合法名义等问题后, 还讲到: 叶挺“此次情绪尚好, 政治认识较前有进步”^①, 没有提到叶挺与项英的关系。

1940年初, 项英得知叶挺已到香港、澳门, 立即派军医处长沈其震专程前往看望, 并盼望叶军长早日返回军部主持工作^②。

同年夏, 叶挺到重庆, 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刚从苏联治伤返回重庆的周恩来, 一面耐心说服叶挺改变辞职想法, 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 仍回新四军工作, 叶挺接受了; 一面致电项英, 要新四军派一名高级干部去重庆接叶挺回军部^③。项英立即请袁国平前往重庆接叶挺, 并当面向周恩来和叶军长汇报, 请叶军长早日回部主持工作^④。

后来得知, 袁国平到重庆后, 立即去看望叶挺, 向叶军长汇报了他离开军部后的部队作战和建设方面情况, 回答了叶军长询问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同时

① 《叶挺研究资料》第317页。

② 《叶挺将军传》第346—347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456—457页。

④ 同上。

向周恩来和南方局详细汇报了新四军贯彻发展方针的情况，包括：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已先后成立，新建了第五、六支队，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已经实现；由罗炳辉率领的五支队挺进皖东，已建立起皖东抗日根据地；以“江抗”名义东进的第六团虽已返回，但新“江抗”又已建立，并派谭震林去加强领导；陈毅、粟裕率领的苏南主力正向江北发展，苏皖支队和挺进纵队已进到六合、扬中、仪征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为开辟苏北创造了条件；第四、五支队在津浦路西、路东反顽，取得了大桥和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皖南部队先在去年冬多次打退日军对繁昌的进攻，又在今年4月粉碎了日军万人大“扫荡”。袁国平还汇报了新四军政治工作方面的情况，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三年来东南局在项英同志领导下是正确的。”^①同时指出，新四军实行发展方针，同中央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②。

同年8月，叶挺由袁国平陪同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项英立即赴叶军长住处探望，告知新近的情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专题讲座》第98页，1988年印。

② 《周恩来年谱》第457页。

况，帮助叶军长熟悉他离开近一年期间的发展和变化，以便叶军长从事领导工作。

同年10月上旬，日军万余人向皖南进行秋季“扫荡”，其中一路五千余人直扑云岭，妄图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项英协助叶挺军长指挥第一、三团等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并将军部特务营及教导总队一部也调往前线。经连日激战，予敌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取得了歼敌两千九百余名的重大胜利。

同年10月12日，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举行大会，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叶挺军长在会上发表了《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的演讲。他叙述了新四军成立的战斗历程，已取得的胜利，以及继续克服艰难困苦取得抗战新胜利的要求。他特别讲到：在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在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虽然，中间还不无许多折冲，周旋，别扭，但是依赖共产党中央的诚恳的决定的意见与提示，和八个省区的分散的游击部队之忠实于中共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①叶挺这番话，是符合历史情况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802页。

的，不会有违心之言。

历史事实证明，项英在与叶挺相处过程中，是从革命大局出发的，正派公道，尽管受到某些误会以至委屈，还是坚持党性原则，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与叶挺的关系并不像有的作品所描写的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特别是到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之职，如果叶挺与项英的关系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紧张，那么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而且项英也催他快去江北，但他却偏偏又要留下与项英在一起。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项英在党中央面前，没有说叶挺这不好、那不好，至少1939年和1940年两次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称叶挺在政治上对党有极大进步。这对叶挺后来能够恢复党籍是会有影响的。按照人之常情，项英在重大问题上帮助叶挺说好话，说明他与叶挺的关系还是可以的。

熟悉历史的人们知道，叶挺曾几次想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这有其复杂的情况，有人把责任都归到项英头上，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对于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

1989 年前后曾专门谈及：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另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 1940 年秋季那一次，在皖南作战计划是由他定下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分，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而在一起吃。”

“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军长或师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员身分，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

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①

李一氓与叶挺、项英相处得都很好，他对项英与叶挺关系的评述，对于了解项英与叶挺的相处情况是有帮助的。李一氓也谈到叶、项关系间有微妙之处，他说，他“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②这反映了项、叶间以往经历不同和在新四军各处地位、境遇不同而远未达到真诚无间的共事合作。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1938年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南分局在南昌正式成立，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按照组织系统，东南分局隶属于长江局^③，其开始管辖的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广东一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此外，东南分局还与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有工作关系^④。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7页。

② 同上刊，1992年第1期第6页。

③ 同上刊，1990年第4期第11页。

④ 同上。

项英在主持东南分局成立的会议上，确定了近期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分局领导成员分头到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同时，迅速同东南各省、地区的党组织建立联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恢复、建立基层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发挥党组织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分局机关，按照精干的原则编设，边组建，边展开工作，逐步健全。鉴于东南公局管辖的党组织均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采取调各地党组织领导人来讨论、检查他们工作和派人去传达、检查等方法，来实施工作指导。

这次会议后，按照分工，项英和分局其他成员立即到各游击区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编组为新四军。到3月下旬止，传达、动员任务均已顺利完成，除闽西南、闽浙边的红军游击队因相距较远稍迟到达外，其余各区红军游击队按时集中编组。3月25日，项英以东南分局名义向党中央、长江局作了报告。其中讲到：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所以能够顺利出动，主要是各游击区领导人和游击队对党中央有极大的信仰，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各地游击队在出动途中，纪律状况良

好，被沿途群众誉为“南方的模范队伍”、“第一军队”^①。

东南分局开始管辖地区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失散，仍坚持活动的组织和党员人数很少；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国民党当局虽被迫公开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地位，但其特务机关在各地继续监视和控制，“防共是第一”，各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这看出，当时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基础是薄弱的，处境是很艰难的^②。按照安排，曾山迅速查清了分局管辖范围内的组织状况，包括：赣粤边特委，湘南特委，湘赣特委，赣北特委，湘鄂赣特委，皖浙赣特委，闽赣特委，闽东特委，浙江省委，吉安中心县委。各地党组织此时的基础虽很单薄，但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项英感到是难能可贵的^③。

项英为便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接洽和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安置各游击区的伤病员，抚恤烈士家属，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并便于以合法名义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就以新四军军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89—91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 《新四军·文献》（一）第91页。

部名义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将在南昌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改为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同时在福州、武汉、温州、龙岩、吉安、上饶、赣州、景德镇及湖南平江、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等地，设立新四军办事处或留守处、通讯处。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机构，由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担任领导。各地党组织利用新四军办事处等合法身分，一面联络、帮助红军游击队集结、下山、整训、扩军、改编事宜，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在合法名义的掩护下，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①。

同年春，南昌聚集了大批来自北平、上海及津浦、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知识青年和本地的爱国青年教师、学生，群众性救亡团体不少。项英鉴于上述情况，在和曾山等研究后，确定将南昌作为东南各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重点地区来抓。首先，把大批学生吸引到抗日救亡的行列里来，便于进行教育和开展活动。这是和国民党展开争夺青年的斗争，迅速建立了“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简称：青年服务团）、“青年抗敌后援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这些热血青年，后来大部分参加了新四军或到

① 《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第123—150页。

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工作，成为革命的有用人才^①。其次，抓紧党的建设，使它成为抗日救亡团体的核心力量。“青年服务团”是当时江西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一开始就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委员会。采取办集训来培养、考察先进青年，发展新党员，所属五个大队均建立了党支部。不久，成立了中共南昌市委，领导南昌各救亡团体的基层党组织，在工厂、车站、码头、农村也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再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斗争。各抗日救亡团体，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广大群众的民族精神。从而使江西城乡的政治面貌改观，广大群众自觉地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同年3月中旬，中共闽浙临时省委书记、闽浙军区政治委员刘英来到南昌，向东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②。刘英，原为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后与粟裕在闽浙边领导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项英和刘英在中央苏区时就熟悉，在历经三年多的千难万险之后，战友重逢，自然十分亲切。刘英详细汇报了坚持闽浙边斗争的经过、谈判停战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党的组织状况和部队集中编组的

① 《江西党史通讯》第5期，1983年4月出版。

② 《赖传珠日记》第118页。

情况以及对留下坚持斗争的部署。项英向刘英转达了党中央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指战员的关怀和慰问，介绍了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的实施情况、关于坚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安排。对浙江，项英谈到：决定撤销闽浙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接着成立浙江省委），管辖浙江全省党的工作，由刘英任书记；要趁当今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扩大党的影响；新四军将在温州、丽水等地设立办事机构，要很好地利用这些机构来开展党的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此外，项英还希望浙江党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和工人到新四军来，以充实新的力量^①。

同年3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在分析了当时各地党的组织发展缓慢的状况，给各省委、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前一段组织发展缓慢有两条原因：一是，“没有充分了解共产党力量愈强大，统一战线更巩固，抗日胜利更有把握”的道理；二是，“只注意旧关系的审查”，“只限于旧有地区与周围狭小边境，不敢大胆深入到大埠（按：指面积较大的平坦地区）、城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二十卷）第280—282页。

市中去进行党的工作”，在方法上“只限于工作团及县委少数人去发展党员”，而没有依靠全党特别是支部去进行。指示信要求各地大力做好发展党的工作，方针是“细心考察，大胆发展”；同时也要重视质量，严格掌握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应该是不只赞成抗日和统一战线，而且能够接受党的主张，服从党的领导”^①。这封指示信，在当时对推动各地党组织做好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敌后各地区党的工作的发展，项英和曾山等研究确定从敌后流亡到南昌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物色先进分子，集中加以短期集训，发展为党员，然后秘密派往其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成为红色种子，由一个到一串，由一串到一片，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皖南特委在新四军进入皖南后就建立起来，随东南分局（后东南局）行动。李步新、邓振询、谭启龙先后任特委书记。在泾县、南陵、铜陵、繁昌、宣城、青阳、太平、旌德等县建立起县委，在徽州地区也建立了党组织。其中泾县地区，先后建立了九个区委，十五个中心支部，三百五十个支部，有一千三

^① 《江西党史通讯》第5期第8页，1983年4月10日出版。

百五十三名党员。项英和曾山对皖南特委的工作很关注，经常听取汇报，给予指示，要求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配合新四军作战^①。

项英还以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名义，要求新四军各部队积极参与驻区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第一、二支队进到苏南和三支队展开于皖南后，均迅速开办训练班，培养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基层组织。战地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的人员，通过在活动地区积极做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军部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吴仲超，随陈毅挺进苏南后，任苏南战地服务团团长，党内任苏南工委书记。仅用一年多时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内，已普遍建立起各级党组织^②。

同年7月，项英与曾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一起，在云岭山下的罗里村和丁家山，会见了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和沙文汉^③。项英对来自他长期从事秘密斗争的上海的战友，感

① 《安徽党史资料》1984年第8期第28—29页，《新四军在皖南抗日斗争史略》（上）第57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21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到格外亲切。刘晓向项英等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包括：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八一三”抗战后，劫后余生的党员坚持斗争的情况；上海党组织恢复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已重新建立；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上海地下党把支援新四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①。

项英在谈话中，向刘晓、沙文汉介绍了东南各省党组织恢复的概要情况，新四军在敌后展开的情况，特别是在苏南的陈毅部正在向东、向北发展，希望上海地下党组织予以配合。刘晓、沙文汉表示赞同。

在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等掩护下，东南各地的党组织恢复、发展迅速，党员数量增加很快。到1938年底，福建省委辖县委或工委五十一个，党支部五百七十九个，党员75%是在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成立后恢复或发展的^②。这看出，新四军设在各地的办事机构，在把大革命失败后留下的火种重新点燃、拨亮，投入新的战斗，发展、壮大党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

同年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变

① 同上书，第85—93页。

② 福州市鼓楼区委党史办1984年出版的《党史资料征集参考资料》第12期。

化，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曾山仍为副书记（到1940年夏，中央又派饶漱石为东南局副书记）^①。

此时，东南局直接领导的党组织，有江西、浙江、福建省委和皖南、苏南、苏皖等特委。不久，增加了苏北特委。随后，苏南、苏皖特委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在苏北特委和江北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苏北区党委^②。

同年11月上旬，刘英来到皖南泾县云岭，向东南局作工作汇报^③。他汇报了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状况、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国民党破坏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情况。项英向刘英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曾山、刘英等一起讨论了日军侵占武汉后的浙江抗战形势，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项英指出：浙江沿海和浙西的形势还会有变化，要有在敌沦陷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国民党破坏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是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的磨擦事件，局势还会恶化，党的领导机构要保持高度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2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221—222页。

③ 《赖传珠日记》第138页。

警惕，经常变换活动地点；抗日救亡活动要持续开展，从城镇向农村、山区延伸，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活动地区。

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要求新四军“调些干部给闽、浙、赣地方党，以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①这是党中央在日军侵占武汉、广州等地后，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新四军提出的新要求。

在这前后，东南局调曾镜冰来到云岭，讨论福建党的工作。曾镜冰曾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后在闽北地区领导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项英同他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在交谈中，曾镜冰向项英、曾山等汇报了福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状况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情况，项英向他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一起讨论了在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的福建抗战形势，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项英指出：福建的形势还会有变化，要有在沦陷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闽北原红色区域的工作要继续加强，可作为将来斗争的基本地区；鉴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磨擦事件增多，党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117页。

的领导机构要作预防不测的准备。后来，福建党组织在局势逆转时，在闽北武夷山等地建立起武装，恢复武装斗争，长期顽强坚持。到1949年，发展成为拥有四千六百余人的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纵队，由曾镜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配合解放军主力解放了福建大陆全境^①。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接连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的事件增多。项英根据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于当年2月要求各地党组织与新四军的办事机构分开；党组织应转入地下活动，以便保存革命力量；凡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应立即调离该地区，有的可转入新四军，有的应调换工作地区，以利于隐蔽^②。

同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平江惨案”。项英和叶挺在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严惩杀人

① 《军事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4页。

② 《江西党史通讯》第5期第13页，1983年4月10日出版。

祸首的同时，决定将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的办事处、留守处、通讯处等机构撤销，人员一部分返回新四军，一部分转入地下斗争^①。

同年10月，刘英率参加党的“七大”的浙江代表团来到东南局驻地集中。项英和曾山、袁国平等多次到他们住处看望。刘英就浙江党的情况作了汇报。在交谈时，项英希望刘英就坚持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斗争的情况写个书面材料，带到延安向“七大”汇报。于是，刘英开始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珍贵史料。不久，党中央来电指示，时局发生逆转，浙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离开浙江，并指明刘英要留在浙江^②。在刘英离开云岭前，项英在同他谈话时，向他明确提出，要提高革命警惕，作好应付局势急剧变化的准备：凡在地方或在国民党机构中暴露目标的党员，均应尽快调离，转到新四军来，或转移调换到其他地区；党的组织要加强巩固工作，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规定，严防特务混入；领导机构应注意公散，不能过于集中^③。

① 《新四军事人物录》第55页。

② 《中共党史人物传》（二十）第283—284页。

③ 同上书，第284—285页。

1940年春夏之间,根据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确定扩建部队的要求,皖南和苏皖地区及苏中等地大力扩军,至4月底,就扩军四千五百余名,并确定当年下半年再扩军五千名^①。

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发来统战政策的指示(按:即毛泽东所写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指出: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三）……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四）……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我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3页。

就愈好做。”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①

中央的“五四”指示，是根据当时局势的发展变化，同时针对项英那里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作出的，是正确的。

在当时，项英在领导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意义理解不深，贯彻不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执行不坚决，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对斗争的方面强调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59—162页。

少，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使一些部队的活动和发展受到影响。此外，项英在其他方面也有不足和失误，如对叶挺的团结和尊重不够，发挥其作用不够；对摆脱皖南部队后期的困难处境，想方设法不够，决策不果断。

项英接到党中央对东南局和新四军统战政策的指示后，认为是讲他犯了路线错误，思想不通，感到委屈，于5月9日致电中央：请求中央立即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到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在中央派人未到前，东南局拟请曾山代理书记，军分会拟请陈毅或袁国平代理；请中央将他今日前之工作作一彻底之检查^①。

项英5月9日给中央的电报刚发出，接着又收到了总政治部5月6日《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称：

“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根据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因此，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6—67页。

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二、在鼓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应当依照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目前策略路线出发，必须把阶级教育与民族解放教育正确的适当的联系起来。”

“三、在组织方面，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旧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

“四、在居民中的工作，亦应当根据党的政策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五、总之，政治工作是共产党党的工作，我们应公开说明我军的政治工作这种特殊性，对抗战是有利的、必需的。……我们政治工作的原则、内容、口号与方法都是光明正大的，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不应当有对外对内两套，不能对外迁就国民党，对内讲共产党私话。

我们的立场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①

项英作为军分会书记、军政治委员，看到总政的指示后，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与袁国平认真学习领会，一致认为总政的指示很重要，虽是答复一年多前请示的问题，却为新形势下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项英接到总政5月6日的指示，连同接到中央5月4日指示的全文，立即召集东南局、军分会常委联席会议，进行传达学习，研究贯彻办法。5月10日，东南局给苏皖区党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坚决贯彻中央5月4日指示，“彻底的纠正我们现存的缺点和错误，用工作成绩来证明我们确实执行了中央指示的精神。”“要用全副力量巩固发展敌后根据地”，要在四个月内“努力扩大军队六千人”，“新发展党员应有一万人”，发展各种群众组织（连同原有的）“应有十万人”，加强溧（阳）武（进）路以北“四县抗敌总会的领导”。东南局还派青年部长陈丕显和教导总队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64—165页。

训练处长薛暮桥率一批干部前往帮助^①。

5月12日，项英致电党中央，称：中央的指示，已由袁国平传达；对中央的路线、方针、策略，均完全同意，并无异议；他提出由曾山代理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代理军分会书记，讨论时认为需由中央决定；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公开宣布撤销他的职务^②。

项英连电中央，要求撤销他的职务，或另派人到东南局和新四军负领导之责，这在两年前就已向党中央提出。的确，那时形势变化急剧，斗争复杂尖锐，而东南局只有他和曾山二人，军部实际上只有他和周子昆二人（叶挺很少在位，张云逸已赴江北，袁国平去重庆接叶军长了），他自然就经常处于忙于应付事务、无力对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苦恼之中。因而他要求撤职，是一种苦衷流露，也是某些委屈情绪的流露。

党中央接连收到项英的电报后，于5月23日致电项英和东南局、军分会，答复了项英在电报中提出的问题。原电如下：

① 《新四军征途纪事》第1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7—68页。

1. 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

2. 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煞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

3. 项英同志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对政治上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望告中央，对中央指示仍由项英同志传达。

4. 现当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当团结一致。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①。

党中央在电报中肯定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战中的成绩，这不仅关系到项英个人，而且关系到叶挺、陈毅、曾山、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等一批人的业绩，关系到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和地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66页。

方党政干部浴血奋战所创造的业绩。

此时，紧张的形势、复杂的情况，使项英顾不上多想自己的得失，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同年夏，刘英再次来到云岭，向东南局汇报请示工作。这是刘英最后一次来皖南，也是项同他最后一次见面。项英、曾山同刘英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了浙江党的工作。项英指出，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反共政策的情况下，浙江和东南地区的党组织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此，对干部要加强应变的思想教育，增强做好应变工作的自觉性；对原已布置的应变准备，应按照党中央规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认真检查落实；讲究斗争艺术，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浙南红色区域，应注意加强工作，为尔后从事武装斗争作准备^①。

到1940年底，东南局管辖的范围，包括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党员共约五万名。他们在各地领导抗日和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这些成绩，是在党中央的

① 《中共党史人物传》（二十）第285—286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九）第107页，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保存的资料。

领导下，在东南分局、东南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东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项英作为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是付出了巨大辛劳的。

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

一 局势的逆转

1940年10月上、中旬，当叶挺、项英及新四军皖南部队喜庆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和陈毅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时，国民党顽固派却对新四军十分痛恨，由仇视、限制到阴谋消灭新四军的嘴脸就显露出来，从而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

撤到黄河以北地区^①。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进攻新四军。这是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党的地位，挥舞政令、军令的大棒，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②。

项英和叶挺接到“皓电”后，立即同东南局、军分会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

从国际上看，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于当年9月订立军事同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准备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急谋迅速结束其侵华战争，巩固其南进后方，加紧向蒋介石集团诱降。此时，英国、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它在欧洲和远东的两面作战，也积极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战，希望中国长期拖住日本^③。蒋介石集团把这一国际形势，视为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可乘之机。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周恩来年谱》第471页。

③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99页。

从国内看，顽固派 1939 年冬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国共两党的斗争焦点转而移到华中，必然会影响到皖南。

从近处看，顽固派韩德勤制造磨擦，指挥主力进攻黄桥，这是反共重点由华北转到华中的体现。而蒋介石集团对韩德勤的失败，肯定会报复的。

根据上述分析，项英希望各位领导同志密切注视形势变化，要求侦察部门注意附近国民党军的动向，特别是由胡立教领导的技术侦察单位多掌握空中信息，怎样行动和部署，待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后再作安排。

10 月 21 日，项英和叶挺接到周恩来 20 日来电，称：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新四军渡江之决定，决不会取消，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同时，向顾祝同威胁说明，如相逼过甚，竟出事端，背水之军只有向南冲出一条生路，或可使顾在执行蒋、何密令时有所顾虑，便于我转移和布置各方分散。该电同时指出，在安徽无为地区渡江甚危险，因桂军不会放松此点，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①。

这是在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以后，项英接到

^① 《周恩来年谱》第 471 页，《云岭》第 28 期第 22 页。

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的第一个电报。

10月25日，项英和叶挺接到毛主席转来周恩来24日的电报，称：当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并估计可能全面反共，建议中央考虑对“皓电”原则上不能同意，但须答复。新四军皖南部队，一是主力渡江集结应战，二是部分移苏南，部分就地打游击。毛泽东在转发周恩来的电报时，询问叶、项的意见^①。

同日，项英又接到毛泽东给周恩来并彭德怀、刘少奇和他的电报，称：要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②。

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东南局、军分会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大部北移问题的讨论情况和意见：对部队北移问题总的方针，希望中央有明确的态度；在皖南，如仅留少数部队很难坚持，易遭消灭，只有突破对方（按：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方能生存，这在政治上又不便；如必须坚

① 《周恩来年谱》第471—472页，《云岭》第28期第23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第215页。

持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目前情形，当以加强江北为主要，以求控制华中一带，要再坚持皖南，确难二者兼得，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①。这是项英对毛泽东 25 日转周恩来 24 日电报时所询叶、项意见的答复。

同日，叶军长去泾县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部，会晤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主要是探询其对有关皖南部队北移问题的态度，历时三天，于 30 日返回云岭^②。

叶挺在返回当天，在与项英交流同上官云相会晤的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称：上官询问苏北问题我方态度；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叶挺重提先移苏南方案，但未作决定。上官还谈到：顾祝同对向我进攻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将彻底消灭韩德勤。叶、项在电中请中央早日明确：是否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还是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但这又会引起与桂军的磨擦^③。

11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叶挺、项

① 《云岭》第 28 期第 2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英 10 月 30 日请示先移苏南的方案，复电称：“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① 但此方案后为顾祝同所拒绝。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项英 10 月 28 日请示的仅留少数部队在皖南不易坚持时，复电称：“（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②

11 月 3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称：对“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③

接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后，东南局、军分会即开会讨论，会后向毛泽东并周恩来报告，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 217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 218 页。

称：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对时局的意见与总方针；“我们同意放弃皖南，使我们力量集中，指挥统一，以免陷于过去各苏区分散之教训”；同时认为，“应该注意考虑暂时让步的原因与所得和缓的实际程度”，“假如太表示弱，也能使蒋得意忘形，步步进逼下更使中间分子动摇畏缩”^①。

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具体意见，由叶挺、项英等于11月初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称：“我们赞成北渡方针，并正作如此准备”，“但目前有种种客观困难，不能立即全部实现这一方针”，“军部如全移走，留皖南部队即无适当统率人员指挥，又会影响坚持游击战争之信心”，“这不仅将被迫而转移后方，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均不应如此”^②。

11月9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历陈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坚持团结抗战、抗击众多的日伪军、收复广大失地的事实，以及顽固派不断挑起磨擦和制造反共惨案的种种罪行，驳斥了何、白“皓电”的诬蔑，拒绝了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

① 《云岭》第28期第26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25页。

北移的无理要求，同时为照顾抗战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也作了一些让步，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但须宽限期^①。

然而，蒋介石集团对中共中央在“佳电”中所作出的让步，竟视为怯弱可欺，又于12月8日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齐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准备。12月9日，蒋介石给朱、彭、叶、项发出“佳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向北转移。同时，蒋介石集团又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密令顾祝同积极部署包围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关于“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②，随即密调第十二、一零八、四十、六十二、一四四、七十九师及新七师等部共约五万余人^③，作出堵截、围歼部署。这样，大规模的反共内战呈一触即发之势，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的处境更加险恶。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222页，《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3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100—101页。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247页。

二 北移的变化

从1938年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进至皖南后，皖南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一是，它成为抗战的基地，可指挥和支援各支队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是，它作为保留下来的坚持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掩护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工作，可支持东南各省的中共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三是，它与江北（皖中、皖东、苏中）以至华北各地区的行动，可作战略上的配合。由于国共两党都很重视皖南，因而当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皖南这个抗战基地是坚持还是转移？就尖锐地摆在中共中央及叶、项面前了。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事端的重点地区虽在华北，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皖南。当年12月2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称：“在将来任何情况下，是以独立开展南方局面，以与北方配合，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均应如此。江南如发生事变，江南地区不利，非转移他处不可，非战斗不能打开局面，冲破包围圈非有相当力量不可。否则

分散游击，无论政治上、军事上不能展开局面。”^① 这看出，项英已在考虑皖南应付事变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向中共中央及军委报告东南局、军分会联席会议讨论江南方针等情况时，讲到：皖南部队北渡较困难，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按战略要求，应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工作之基础^②。

第二天，即1月15日，中共中央就新四军应变方针复电项英，指出：“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③

同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作出指示，在明确新四军应向北发展的同时，又指出：“今后全国局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

① 《云岭春秋》试刊（一）第9页，安徽宣城地区党史办编印，1993年。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五）第77页。

③ 《云岭春秋》试刊（一）第9页，安徽宣城地区党史办编印，1993年。

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①中央此电明确地告诉项英，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向北，但不排除向南，届时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定。

同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任务，提出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作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对皖南，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②这就是说，项英的任务是领导巩固皖南的阵地。但在实际上，由于皖南是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后不一样，所以在那里建立政权显然不易实现，是和中央其它指示精神相抵触的。

同年4月3日，毛主席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按：指国民党顽固派，下同）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41页。

② 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十六）第181页。

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按：时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①

同年4月9日，项英收到毛主席来电，当天立即复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

“一、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可能冲出。当时混乱，但工作人员众多，损失不可免。”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152页。

“二、当受袭击时，要争取与三支队（铜陵、繁昌）会合，才能反击突围，这是重要关节，某方已注意这一点。”

“三、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

“四、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按：陈毅领导的第一支队）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五、党内准备，半年前已进行，但干部皆为苏区的及新的工作，大都随军队发展，无秘密工作经验，准备程度差。”

.....^①

项英向毛主席的报告表明，新四军在皖南应付突然事变的问题已经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了许多工作。但皖南部队是就地坚持？是北渡？或向苏南转移？还没有确定下来。

^① 同上书，第 153 页。

同年4月2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转报了陈毅、粟裕等21日联名关于放弃皖南的建议,称:“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历来同意军分会之主张。目前弱点是兵力不足、饷不够,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则可以开展局面。”“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在集中力量充分发展苏南后,再向南可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皖南仍落我手。”“军部留皖南二年来,建设三支队,深入皖南工作,掩护东南分局,对闽、浙、赣的发展具有极大成就,但目前不宜再留,目前我们只有向苏南前进。”^①

项英在转报陈毅等关于放弃皖南的建议时,认为“国方(按:指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分裂、全国反动,仅是时间问题”,表示:军部应向苏南靠拢,“集中力量在苏南发展人、枪、款。”^②这表明,此时项英是赞成军部移至苏南的。

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五)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①这就是说，党中央既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以增强发展苏南的力量；同时又要坚持皖南阵地，并且还要发展皖南。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很快派出由参谋处作战科长李志高、军法处科长殷扬率领一批干部组成“参谋旅行团”前往苏南，勘察军部转移苏南的行军路线，并且选择了军部的新驻地^②。

同年5月28日，项英、袁国平向党中央报告，称：军部将率第一、三团东移；留第五团在铜陵、繁昌地区坚持；南（陵）、泾（县）、太（平）等地，应力求以隐蔽方式保存力量^③。

后来，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以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为先决条件，为东移设置障碍，致使皖南军部和主力东移的问题被延搁下来。

同年秋，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问题又重新提起。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项等，称：“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

① 同上书，第161页。

② 《云岭》第19期第4页。

③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五）第169页。

“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① 10月12日，皖南秋季反“扫荡”刚结束，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叶、项等，指出：“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②

然而此时，正值皖南反“扫荡”获胜，项英等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的紧迫性认识不足，以军部北移困难、三支队地区狭小等为由，使北移或东移苏南问题又拖了下来，丧失了一次很好的转移时机。

同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特别是中共中央11月3日决定采取让步政策放弃皖南以后，项英和叶挺便领导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作转移的准备。

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应钦、白崇禧电（即“佳电”）中，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将移至江北。

同年11月10日，毛主席就顾祝同邀请叶军长赴上饶谈判时的方针，复电叶、项：“希夷见顾时，请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争，由彼方负责”；“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①

当月中旬，叶挺去上饶三战区交涉时，顾祝同仅允许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对汤恩伯调兵之事推说不知，因而对停止进兵为第一位问题的谈判也就未能实现^②。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去任总指挥；项英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去延安参加“七大”^③。这表明，新四军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都将要离开。

同年11月15日，项英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和他的电报，称：“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

① 同上书，第98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30页。

③ 同上刊，第28页。

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①

这看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和整个华中局势紧密联系着的。中央领导人是以皖南的让步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条件，来换取停止汤恩伯、李品仙二十万大军东进，因而又需要皖南部队在作北渡准备的同时，维持着“拖”的局面。

同年11月21日，毛主席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的指示，表示：“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不让”^②。同日，毛主席又指示叶、项，称：“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③

上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项英等人认为只认真准备但不必立即开动，无形中就丧失了撤离皖南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99—100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03页。

的有利时机。

实际上，由于蒋介石集团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决心已定，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讨价还价砝码的作用没有起到，并未能阻止汤、李大军东进。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转移时间，还与刘少奇、陈毅所领导的华中指挥部对韩德勤的行动密切有关。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嫡系，韩德勤兵败黄桥以后，顾祝同自然加紧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逼迫，但由于此时顾祝同怕刘少奇、陈毅指挥部队攻韩德勤总部所在地兴化城，故其歼击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未敢付诸行动。

同年11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项并列少奇、陈毅，告知汤恩伯、李品仙部正在集结向华中进攻，苏北部队将很快解决韩德勤，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苏南为有利，询问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①？

同日，叶、项向毛泽东、朱德报告：皖南部队北移准备正在进行，但开动需相当时间；据刘少奇、廖海涛来电，由苏南去苏北的交通安全没有保证，敌人正“扫荡”苏南，故短期内无法开动，如有战斗情况发生，不如暂留皖南为好；我们正作北移准备，输送

^① 《云岭》第28期第31页。

工作人员先行，待前面交通恢复后，叶挺率一批人员经苏南到苏北^①。

同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项，要求：皖南部队立即分批移动，在 12 月底开动完毕；希夷率一部分需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在二十天内处理完毕^②。

同年 11 月 26 日，叶、项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北移正加紧准备，工作人员及资材先行北上；部队随后集结，视交通情况，大部经苏南、小部由皖南直接渡江去皖北。他们在电报中提出：假如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开皖南原驻地，在半路上如战斗则颇不利。他们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③。

同年 11 月 29 日，叶、项致电毛泽东、朱德，报告叶挺与顾祝同交涉北移问题情况，称：顾祝同已下令，明确北移经苏南转苏北；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大部密渡皖北；对北移已作了具体部署。他们同时询问打韩德勤的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以后^④。

① 《云岭》第 28 期第 31 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第 228 页。

③ 《云岭》第 28 期第 32 页。

④ 《云岭》第 28 期第 33 页。

同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项：“（一）你们 29 日的布置很对。”“（二）苏北动作不得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德勤）、霍（守义，即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三）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①

华中指挥部所属部队对韩德勤部盘踞的曹甸，于 11 月 29 日开始攻击。韩德勤便驰电重庆国民党当局求援。蒋介石在令汤恩伯大军东进的同时，又着顾祝同下令新四军皖南部队不得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与对韩德勤部的攻击。然而由于苏北方面对曹甸久攻不克，使韩德勤得以暂时苟安，这就使新四军皖南部队不仅降低了用北移作为“交换条件”的价值，而且它的险恶处境大为加剧。国民党当局可以暂时不必顾虑韩德勤的安全，而加速实施其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了。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105 页。

同年12月9日，蒋介石给朱德、彭德怀和叶挺、项英发出“佳电”，规定：“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① 蒋介石这道电令，就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时间限死了。

同年12月12日，叶、项就顽军调兵企图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报告，并告刘少奇、陈毅，称：据密报，顾祝同已电各进攻部队，新四军主力于12月底过繁昌、铜陵，勿谈再过苏南，如该军故意不动，予以彻底解决。同时，叶、项还报告了顽军调动和部署的情况^②。这个电报表明，项英和叶挺已经注意到国民党顽固派调兵企图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问题。

顾祝同对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是根据蒋介石12月10日的密令作出的。这个“密令”称：“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新四军皖南部队限期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③。这

① 《毛泽东年谱》第237—238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36页。

③ 同上。

个“密令”中，还把新四军视为“匪伪”，清楚地表明了蒋介石集团对新四军的仇恨程度和阴谋“解决”新四军的狰狞面目。

同年12月13日，项英就北移消息泄露、难以迅速北移问题，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并告刘少奇、陈毅，称：由于国民党到处散布我军北移，已引起敌注意，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到皖北道路，敌、顽均在沿江增兵筑工事，大部队渡江困难，仅可偷渡一部还要等待时机。苏南情况更紧张，如封锁线均增加日军，穿插甚不易。目前因行动已定，消息已泄露，无法保守秘密与突然行动，则应再延一时，待敌戒备稍弛，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现三战区仍以我军先行北渡再发各种费用，对子弹置之不理，还在交涉中。我们的态度不发饷弹即不开动。电报最后询问他和叶军长如何行动^①。

第二天，即12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叶、项，就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问题作了指示。原文是：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有，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

^① 同上刊，第37页。

（二）移动时间蒋限 12 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

（四）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

（五）关于小姚（按：指饶漱石）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

（六）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转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挥^①。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部署给叶、项的指示，清楚地表明：第一，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国民党当局是不会阻碍的；第二，对北移的时限又松了口；第三，抓紧领取饷、弹；第四，叶、项均应随主力行动。

在 12 月 14 日这一天，项英接到刘少奇、陈毅给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第 109 页。

他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称：“由于国民党故意在各方宣布和宣传我军北移，使日寇近日在江南各据点及封锁线增加大批日军，并进行“扫荡”，“在丹（阳）、武（进）间我指挥部受包围，损失甚大。路北情形尚不明，但我军大批资材及人员已到路南，有被扫荡危险。江南敌人已在三支队附近据点增兵，最近飞机在我地区不断侦察”，“桂军已在对岸之一口岸筑工事，抢夺我收集之一部分船只。故此种情形如继续发展，实有碍我军之转移”^①。刘少奇、陈毅这个电报所述的情况，说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已变得更加困难，自然也加重了项英他们对转移安全的顾虑。

同年12月16日，曹甸战斗因无法取胜而结束，歼顽军八千余名，新四军和八路军参战部队伤亡共约二千名，损耗甚大^②。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叶、项，称：“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

^① 《云岭》第28期第37页。

^② 同上刊，第38页。

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①

同年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项，称：“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②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陈毅：“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③

同年12月21日，叶、项就北移准备情况，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叶剑英报告，并告陈毅、刘少奇：“顾（祝同）至今仅批开拔费五万元，子弹一粒不发，要我改道铜、繁北渡。”“苏南日寇已将溧武路与铁路严密封锁，在路北不断大扫荡，我军人员与物资均停在路南无法通过。”桂军“准备攻无为东乡我军。”“自希夷从上饶回来，国民党即故意贴标语及口头大放空气，使敌伪知道来阻我，同时既要我从铜、繁北渡，而大批桂军突然向无为进攻，占领沿江口岸以堵我，显系故意使我不能北渡，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④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241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4页。

③ 同上书，第115页。

④ 《云岭》第28期第39页。

同年12月25日，叶、项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及请示行动方针，称：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第一〇八师和第五十二师已集中泾县。据此，请指示行动方针，以免仓促误事^①。

同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在报告北移准备情况后，又讲道：“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铜、繁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②

第二天，即12月26日，中共中央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发出指示，要求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

① 同上刊，第41—42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9页。

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己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①

党中央“严责电”给项英等以极大震动和深刻教育。至此，新四军皖南部队是迅速北移还是再拖一段时间？北移是否还加要开拔费、饷弹等附加条件？北移是否作为阻止汤、李大军东进的交换条件？等等，上述问题讨论都已过去。此时摆在项英面前的，就是立即向北转移！

三 北移路线的波折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在驳斥国民党当局

^① 《毛泽东年谱》（中）第246页。

“皓电”污蔑的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至江北。于是，就出现了北移路线的问题。

在此之前或在此期间，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在给叶、项的指示中，只是概略地讲到可从铜陵、繁昌间渡江，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11月1日还指出“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①，但均未规定具体的北移路线。

当时可供叶挺、项英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繁地区渡江到无为。它是沟通皖南军部和江北指挥部及第四、五支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赴江北加强那里抗日斗争的领导，叶挺率一大批干部赴江北，并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都是走的这条路线。其优点是直径的，路线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为第三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要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行动，而且对岸是桂系盘踞的地区，并已奉令防堵新四军皖南部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0页。

队渡江。

第二条，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新四军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它是皖南军部与苏南第一、二支队经常来往的路线。其优点是去苏南路程较短，沿途有兵站，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苏南有部队接应；不利的是需经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一〇八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新四军非武装人员沿此路线北移，而不同意战斗部队沿此路线北移。

第三条，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再渡江去苏北。这大致上是后来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较远，又是偏往国民党后方的方向移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新四军均不利。

但当时国民党在那一带没有驻扎军队，如国民党方面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沿此路线北移，以及顽军尚未合围的情况下，只要行动迅速、坚决，绕道沿此路线到苏南伺机北移也是有可能的。

项英和叶挺对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最早安排是走经铜、繁地区渡江到无为地区的，并派人去作准

备。然而，由于国民党故意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引起敌伪注意，并在江上增加舰艇巡逻，加之又令桂顽在江北堵截，使皖南部队难以走直接北渡的路线，于是主要考虑走东进苏南渡江去苏北的路线。

同年11月11日，叶挺去上饶和顾祝同交涉皖南部队的北移路线。项英当日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讲到：叶军长带去给顾祝同的呈文，包括：关于皖南部队北移路线，请准经苏南北渡，皖南部队先移至苏南之溧阳、溧水、宜兴、金坛四县作为暂驻区，由此逐步进入敌后，三四个个月内北渡完毕；同时提出，在我皖南部队转移期间，要求三战区一切军事部署保持10月份原状，以保证皖南部队转移苏南期间的安全^①。这可看出，叶、项对皖南部队转移途中的安全是有担心的。

同年11月18日，项英就叶挺与顾祝同交涉的情况，报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并致刘少奇的电中，称：“希夷已于18日回军部，见顾谈（上官参加）无具体解决，仅要我军北移允经苏南，不批准驻地。……对移动安全则说以政治人格担保”^②。

经过多方努力，军部从云岭东进苏南的兵站线

① 《云岭》第28期第28页。

② 同上刊，第30页。

于12月1日恢复，非战斗人员近二千人及资材一千三百担，从12月3日至9日，分批移至苏南，一般是五六日行程，9日出发的那一批于14日到达水西。这些人员，后因日伪军“扫荡”苏南，不得不采取多种途径，包括化装持日伪的“良民证”，分散通过敌占区，陆续到达苏北，少数人员经上海转赴苏北，而资材则基本损失^①。

这时日伪军“扫荡”苏南，增设据点，使大部队难以行动。在那四十七年以后的1987年，江渭清在《新四军第六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一文中写道：1940年秋，“当国民党第三战区以大军包围我准备北撤过江的皖南部队时，日军默契配合，于11月起加强了宁沪铁路南京至常州两侧的兵力，构筑据点、碉堡，密如梅花桩，封锁水陆交通要道，并调集四千余人连续对丹北、茅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以切断茅山地区通往苏北、淮南的交通线，形势十分紧急。”^②这看出，此时苏南的敌情是不允许大部队经那里渡江赴苏北的。

当然，新四军皖南部队不能走由云岭东进去苏

① 《云岭》第28期第34页。

② 《新四军·回忆史料》（二）第3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

南的路线，还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四军战斗部队通过，硬要走，就会发生冲突。此时东进苏南路线沿途有国民党军两个师，其第五十二师以反共著称，早在沿线筑有坚固工事，是防范新四军的重点地段，而且沿途有江河阻隔，按照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的武器装备是不易闯过的。

同年11月下旬，项英和叶挺根据东进经苏南北移困难颇多的情况，曾确定“明走苏南、暗走皖北”的方案。正如他们11月27日报毛泽东、朱德电中所说的：“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可化装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①这个“明走苏南、暗走皖北”的方案，带有“声东击西”的方式，是对付日伪“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夹击”而采取的，是个很好的北移方案，后因情况变化也未能实现。

同年11月29日起，华中指挥部的部队为反击韩德勤而攻打曹甸，战斗甚为激烈^②。国民党当局担心

^① 《云岭》第28期第32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38页。

新四军皖南部队赴苏北后会直接参与对韩德勤部的攻击力量,于是又在12月10日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渡江去苏北,只准由原地经铜、繁北渡^①。

顾祝同所谓要新四军皖南部队“改道铜、繁北渡”,实际上是蒋介石集团的新阴谋。这时,由于国民党当局一再广播新四军要北渡,等于公开通知日伪加强江中巡逻和阻拦,同时又密令皖北桂军堵击,而皖南的国民党军将会尾随新四军之后“驱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新四军皖南部队通过这条直接北移的路线,采取“南驱”、“北堵”,并与日伪在长江上的阻拦相配合,来实现其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于北移途中的目的。

对于国民党当局这个新阴谋,叶挺、项英是有察觉的。12月21日,叶、项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叶剑英并告陈毅、刘少奇电中称:国民党方面“既要我从铜、繁北渡,而大批桂军突然向无为进攻,占领沿江口岸以堵我,显系故意使我不能北渡,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②12月25日,刘少奇、陈毅就顽军堵击皖南部队渡江,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周恩来、叶剑英,称:“我江南部队准备即日

① 同上刊,第36页。

② 同上刊,第39页。

北移，因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致敌已增兵封锁、‘扫荡’，渡江困难。而李品仙又派三个师进至桐城、合肥、无为地区，控制长江北岸渡口，扣留船只，并向我无为部队进攻，声言要消灭新四军于江北，致我军无法北渡。望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令李品仙让路，撤兵至无为、庐江以西”^①。这看出，此时如沿铜、繁渡江的路线北移，将会遭到敌顽的夹击，腹背受敌，那是异常危险，难以采取的。

同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并请叶挺军长参加，根据中共中央12月26日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的指示精神，以及当时情况，讨论了北移事宜，确定于1941年1月4日夜出发，经茂林、星潭向东沿天目山麓至溧阳待机北渡^②。30日，毛泽东、朱德给叶挺、项英转来周恩来29日的电报：“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李品仙已布置袭击之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③。

这样，几经波折，新四军皖南部队最后还是确定“绕道”经苏南渡江去苏北。

① 同上刊，第41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43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481页。

项英和叶挺最后确定绕道经苏南北移的路线，是在“北渡”、“东进”路线被迫放弃后，不得已而采取的。他们当时所以采取走“绕道”的路线，是想通过茂林迅速接近天目山，沿天目山麓行动，地形较为有利，同时该线顽军力量较弱，认为有可能越过。

走绕道北移的路线，党中央是知道的。1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给叶、项电中称：“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①这表明，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他们绕道茂林、宁国到苏南这条路线的。

为什么要走绕道北移的路线？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后，于当年3月20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周恩来的报告中，讲到：（1）“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2）“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3）“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8页。

余”；(4)“故决定走第三条路”^①。李一氓当时掌管新四军军部所有电报、文件，列席军分会，平时与军领导人接触多，了解领导决策过程，他所述的情况对人们了解为什么选择“绕道”的路线是会有帮助的。

后来，有人说走“绕道”的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是为了实现其“南进政策”，搞“三山计划”。这是没有根据的。

从多种回忆资料来看，这条“绕道”路线是叶挺根据党中央关于“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②的指示，曾与顾祝同商量过的。这大概也是事实，自然项英也是同意的。

据时任新四军军部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人、和叶军长关系甚密的钱俊瑞在《皖南惨变记》一文中回忆说：1940年“11月9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一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其中商定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③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269—270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0页。

③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87—88页。

值得提出的是钱俊瑞这篇回忆，是1941年2月2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仅一个多月就写出的，称得上是最早写出的有关皖南事变的回忆，其可信性自然是很高的。

原新四军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原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殷扬在回忆中，都说北移路线是由叶军长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傅秋涛在《新一支队皖南突围》一文中写道：“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①殷扬在《皖南突围记》一文中写道：新四军“从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北上”的路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商谈北移问题时，“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②。他们都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经历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他们对于北移路线的回忆是一致的，应当是可信的。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5页，上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36页，上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一文中讲到，当时商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路线，是从云岭驻地“先向南开，经过旌德，转向东开，再经宁国以南和广德附近”及“金坛、句容间地带，并从镇江以东渡江。”^①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曾参与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计划的制订和布置。他的回忆，又和傅秋涛等回忆相吻合，因而应当也是可信的。

弄清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路线确定的波折过程，对于研究皖南事变这段历史，对于研究项英，都是有意义的。

四 北移的准备

叶挺、项英率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虽在 1940 年夏开始酝酿，而真正具体的行动准备，是在当年 11 月初党中央作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决策后才开始的。

此时，由于新四军军部进到皖南已两年多时间，后方医院、修械所、印刷厂等设施建设已有相当规模，各种机构（军机关、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总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 40 辑第 112、第 97 页。

兵站、后方留守处等)逐渐庞大,皖南籍的干部战士已达数千名,加之情况变化急剧,环境愈来愈恶劣,因而北移的准备是复杂的、艰巨的。项英和叶挺对北移准备进行了大量工作,主要的有:

一、进行北移教育,增强指战员贯彻执行北移方针的自觉性。

项英把进行北移动员教育,作为北移准备的重要工作。他反复强调,党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决定是正确的,是从战略全局来考虑的;让皖南部队移至江北,是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实际行动,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粉碎日伪和反共顽固派的挑拨离间,是为了深入敌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伪^①。

根据项英的指示,由袁国平亲自起草的《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于12月1日由军政治部作为部队政治教育材料正式下发。当时连队对战士进行识字教育,也改用根据宣传大纲所编写的《东进歌》(先向苏南敌后进军,故称东进)作为教材。这首由袁国平作词、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曲的《东进歌》,在皖南部队中广为传唱。其歌词是:

① 《云岭》第23期第7页,《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93页。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新道。
那个来拦路，那个被打倒！
穿过重重叠叠的封锁，
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
我们一定达到目标^①。

这首歌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是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进江南的号角，北上抗日的誓言，对激励部队士气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亲身经历皖南事变的干部战士后来终生难忘。项英对这首歌十分称赞，并带头歌唱。

为了搞好动员教育，项英和叶挺一起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讲清形势，讲明北移的困难，要求各单位做好充分准备。项英在讲话时强调：这次北移，是为了东进敌后、北上抗敌，是为了粉碎敌伪和投降派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 215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制造分裂内战的阴谋。他还特别指出，这次北移，是在严重敌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日伪军已加强沿江的戒备和巡逻，并在苏南进行“扫荡”；顽固派军队也在秘密调动，沿我向北、向东的行动路线进行部署，堵截的迹象日趋明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作最坏的准备，严密组织北移，防止敌人的袭击^①。

项英还亲自修改审定了《抗敌报》于11月16日就北移发表的社论，题目是《我们的呼吁，立即起来，制止反共内战》，阐述新四军在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紧急关头时对形势的看法，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它对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和制止投降危机的态度。

广大指战员得知北移是为了到敌后打击日伪军，都是很高兴的，拥护党中央的决策。

随着形势的紧张，项英和叶挺已就转移中可能遭敌袭击的危险性逐渐看清，并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拟制北移方案，具体组织北移事宜。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从1940年夏季起，就开始围绕着直接渡江去皖东和东进经苏南渡江去苏北两个方案，反复进行研究，分别拟制了北渡和东进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具体准备。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94页。

围绕着实施直接北渡的方案，项英和叶挺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主要的有：（1）建立前进基地。当年7月，以第五团一部为基础，组建挺进团，由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从铜陵、繁昌地区渡江进到皖中，在以三官山为中心的开展抗日斗争，为皖南部队北移在江北建立基地。当年秋又增派两个连加强该地的力量^①。（2）筹集船只。当年11月中、下旬，军部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率参谋人员、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前往江边侦察，筹集船只，因被日伪军和顽军发现，使筹集到的一百多条船只大部损失。11月底，叶、项在确定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决策后，又在无为的临江坝成立渡江指挥部，在沿江筹集船只和筹款，准备大军渡江^②。（3）构筑掩护工事。第三支队在繁昌的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构筑许多工事，准备掩护大部队渡江^③。

这些事实，说明北渡的准备已进行到相当程度。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密谋在江北和江南前堵、后驱，并

① 安徽贵池党史办1985年编印《贵池抗日资料汇编》第26页；《云岭》第28期第40页。

② 《皖南事变本末》第98、10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云岭》第28期第40页。

③ 《皖南事变本末》第100页。

通过广播透露消息，日伪军在江中布置拦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在苏北的刘少奇等及时向叶、项通报敌伪和顽方的阴谋情况，这就使已做好准备的北渡路线不能立即使用。到当年12月上旬，国民党当局以曹甸战斗在进行，防止皖南部队去苏北增援为借口，又不准皖南部队走“东进”苏南去江北的路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才确定走“绕道”去苏南再北渡的路线。

然而走“绕道”的路线，确定得仓促，事前没有很好侦察，对顽军的部署情况不明，加之平时对那一带没有注意了解，致成为后来失利的隐患之一。

尽快撤离非战斗人员，是项英和叶挺组织北移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决定北移后，他们确定将教导总队学员、教职员的大部，战地服务团的全部，军医处和医院技术人员以及修械所人员的大部，军部机关干部的一部，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夫人在内的家属子女，等等，在12月上、中旬，由组织部副部长兼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军需处长宋裕和、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等率领，分批由云岭东进到苏南，陆续用多种形式转赴苏北^①。

^① 《云岭》第28期第34页。

在撤离非战斗人员时，项英和叶挺将他们一向重视的军医处系统著名技术人员，包括军医处长沈其震，副处长戴济民、王聿先，小河口医院院长李振湘，等等，分批撤离。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医学专家，活跃在全国、全军的卫生战线上^①。

这些撤至苏北的非战斗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为新四军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叶、项很心爱的原皖南军部军械修理所三十多人到达盐城后，成为新军部军工部修械厂的基础，原所长朱遵三任修械厂厂长，吴运铎先为车间主任，后为第二师子弹厂厂长^②。他们都为新四军军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实，项英为应付突然事变，根据形势变化，当年春起就注意将非战斗人员有计划地向敌后转移。当年3月，皖南形势逐渐紧张，民运工作难以开展，项英和袁国平商量，着民运部科长彭柏山带一个民运工作小分队，前往苏南，不久彭柏山被陈毅任命为江南指挥部政治部民运科长^③。

① 《新四军·回忆史料》（一）第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② 同上书，第63、65页。

③ 《从硝烟中走来》第35、36页。

项英和叶挺在领导北移准备过程中，将皖南部队进行了战斗编组，编为三个支队，出发前又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新一支队改称，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第二纵队，由原新二支队改称，辖老三团、新三团，约两千多人；第三纵队，由原第三支队改称，辖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约两千多人。加上军部机关、直属队和教导总队约一千多人，总计九千多人^①。在上述部队中，新一团、新三团是从老一团、老三团中抽出一部分作骨干，新近扩编而成的；第一、二两个纵队的机关没有专门建立，分别由老一团、老三团的机关兼，军部特务团系由特务营新近扩编而成。

三、组织地方党转变斗争方式，转入隐蔽斗争。

中共中央东南局的工作范围，是长江以南的闽浙赣和皖南等地的国民党统治区。项英作为东南局书记，在组织新四军皖南部队进行北移准备的同时，对东南局系统如何适应转移的新形势进行了反复研究。当年11月，东南局多次致电中央，讲到：军部离开皖南后，项英、袁国平势均北渡，东南局难以建立统一领导，建议将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华中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68页。

(包括长江南北各沦陷区)地方党,而在闽浙赣边建立分局,领导闽、浙、赣、皖南等地的地方党^①。11月17日,中央致电东南局、中原局,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的建议,由“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在闽浙赣边可建立一中央局或分局,并同意饶漱石去闽浙赣边、曾山去苏南^②。12月13日,曾山离开皖南去苏南,然后经上海转赴苏北^③。

同年夏,项英根据国民党反共活动日趋明显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浙江、福建等地的地下党怎样应付事变,怎样开展和坚持斗争,分别作出专门的部署。

项英对于中共皖南特委转变斗争方式的部署,安排更具体,进行得更早。从当年夏季起,就将常出头露面、较为公开的党员干部分批撤走,重新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皖南特委,由黄跃南任书记,胡明任副书记,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原皖南特委书记谭启龙,项英本拟派他携带电台去浙江,以加强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力量,因金华的联络处被破坏,没有去成,后

① 《云岭》第28期第26、29页。

② 同上刊,第30页。

③ 同上刊,第36、40页。

鉴于谭启龙患病，随队行动困难，在皖南事变前夕，决定他经芜湖转道上海治疗^①。

为保证皖南地方工作干部的安全，项英还决定将泾县地方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工抗会主任、农抗会主任、自卫队队长等全部撤离，共集中一百三十余人，编为一个地方干部队，在教导总队临时集训后，作为新四军非战斗人员，一起经苏南分批转赴苏北。

在皖南事变后，皖南的革命星火迅速蔓延，武装斗争迅速开展和发展，并在1949年配合渡江大军迎来了皖南的解放，都与东南局组织的这个秘密皖南特委的坚强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不断同国民党第三战区交涉，配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由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在序列上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所以国共两党中央决定皖南部队北移后，北移路线、移动时间和移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中共代表团等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而一些具体事情也需要新四军军部同第三战区交涉。在这期间，项英不断参与研究，叶挺军长不辞辛苦，奔波于云岭和上饶之间，或云岭和泾县之间，同顾祝

^① 谭启龙回忆文章，载《大江南北》1987年第3期第21页。

同、上官云相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袁国平主任在北撤前夕也两次去上饶交涉。此外，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同三战区的联络参谋进行商谈。他们通过交涉，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向，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正当要求，驳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诬蔑和无理要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交涉谈及最多的问题，包括：北移的路线；要求延缓北移时间；要求保证北移途中的安全；要求发开拔费和补给弹药；等等^①。

这些交涉的问题，有一些是中央指示所要求的，有一些是叶、项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的。通过交涉，尽管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多，但它对配合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的谈判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掩护皖南地方党工作的转变，以及非战斗人员的转移等，都是有帮助的。

在北移准备期间，项英与叶挺共同分析形势，研究同顾祝同交涉的内容和斗争策略，确定行动路线，安排具体准备。他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多次催促叶挺军长先行渡江，到江北去指挥大部队作战，但叶挺谦让，没有先走。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的李一

^① 《云岭》第38期第26页。

氓，在那四十多年后的1982年至1989年期间，多次在谈及皖南事变时，专门谈及叶、项谁先过江的问题，讲道：

“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军部和大部分部队，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时机再转移到皖北或苏北。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系李品仙不致惊恐。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项英认为叶以军长的名义，指挥军部机关和大部队过江较为适合，项自己率少量人员活动方便，留下较适合。但叶挺则认为项应先带领军部去江北，留下的人员较少，他以军长名义应付第三战区更为方便。项说中央要叶先过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适。两人互相让来让去，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①

在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准备的关键时刻，叶挺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7页；《云岭》第26期第5页。

军长又两次提出辞职，项英又努力地做他的说服工作。

第一次是1940年11月28日，叶挺以“因为上级故与为难”为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辞职，但未能获准，顾祝同于12月1日来电挽留，说：“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依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项英同叶挺作了交谈，说明此时最重要的是做好北移的准备，提出辞职既没有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劝他不要提出辞职的问题了^①。

第二次是12月29日（或30日，中央收到电报时间为31日），叶挺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在看到党中央26日“严责电”以后发生的。项英听说叶挺要给毛泽东、朱德发电辞职，立即着机要部门停发此电，并即同叶挺进行恳切交谈，说明“严责电”与叶无关，劝他和大家一起做好北移工作。

当日，项英在报毛泽东、朱德并告刘少奇、陈毅电中，称：今晨希夷突致电毛、朱，坚决提出辞职，要求派人来负责，本人留队负次要工作，以免贻误事机，阻滞本军发展等语。我即将电停发，立即与他恳切劝解，说明斗争的严重关系，经半日之久始将其辞

^① 《云岭》第28期第33页。

意暂时打消。我考察原因，当与中央 26 日电有关。当我接到此电后曾再三考虑，如不给他看，则不能讨论问题，又恐以后他知道误会，认为怀疑不信任他。叶此次回来后特别积极努力，坚决拥护与执行党的一切指示，同时我们对于党的指示均吸收他参加研究，与他共同讨论如何执行。此次会议中心仅谈不顾一切实施北移，丝毫未谈及他事。在谈话中，叶表示绝非逃避责任与斗争，以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却无能力负起全军重责，不要等到负不下来时已来不及了。我极力解释党对他的信任，在今天斗争中他的作用，并请他提出解决北移任务的意见。对中央任何指斥和处罚我都接受，只求能解决问题保存基本力量，打破国民党阴谋而不致自待失败。目前到江北困难是突过封锁与长江，目前对国民党应有一种对策，这是叶与我们均有此意见。我认为应顾及许多事实，绝非怕困难无办法，目的是能保持这一力量的大部，这是整个斗争的要求，乃是我们的责任。对中央的 26 日电，我只申明了几点，目前只求解决问题，我有任何错

误，愿受任何处罚，绝不坚持意见，而绝对服从于党^①。

这看出，项英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作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治委员），在自己处于困难的时刻，仍能以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利益，努力从事工作，并继续坦诚地向党中央反映北渡的情况和困难。

1941年1月1日，项英和叶挺以新四军名义，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告刘少奇、陈毅的电中，报告了同顾祝同交涉情况、当面敌情以后，讲到：“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这看出，项英和叶挺此时对北移已作了最坏的打算^②。

同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电复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③

① 《云岭》第28期第44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45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7页。

至此，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五 北移途中

1941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共九千余人，冒着蒙蒙的细雨，顶着凛冽的寒风，怀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在“三年的皖南，别了”的悲壮歌声中，踏上了奉命东进北移的征途。

在开拔之前，军部机关向当地群众、统战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告别活动，并把军部医院送给了当地红十字会^①。

在开拔之日，在《抗敌报》告别专号上发表了经项英审定的《临别之言》的社论和由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临别之言》和《告皖南同胞书》，概述了新四军三年来进军敌后、保卫苏皖的丰功伟绩，揭露了反共分子在各地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新四军人员的惨案、事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投降、制止内战的主张和为团结抗日而采取的忍让政策，表明了对皖南同胞和抗日军

^①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19页。

人家属的深切关怀^①。它指出：“离开皖南是为顾全大局，珍重这个缔造非易的统一团结的抗战局面。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遵照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的团结抗战的政策出发愿意离开皖南，实行进军敌后，加强敌后抗战的‘佳电’而来的。”^②“我军离开皖南进军敌后，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而不是消极的转移。为了坚持团结抗战，为了粉碎敌寇和投降派挑拨内战的无耻阴谋，为了尽力避免亡国惨祸，不得不毅然决然离开三年久守屡战的皖南，不得不离开皖南同胞。”^③

《临别之言》和《告皖南同胞书》，是新四军挺进敌后三年英勇奋战光辉胜利的总结！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言！也是顾全大局、遵命北移、委屈求全的郑重的通告！这两个文告广为张贴和散发，以表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撤离皖南是正大光明之举。

按照叶、项确定的行动计划，新四军皖南各部队于1月4日晚同时行动。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通过球岭，

① 《皖南事变本末》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③ 《皖南事变本末》第104页。

向榔桥河地区前进；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4日晚上到达茂林地区，准备5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4日晚到达茂林、铜山地区集中，拟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从云岭出动，在二纵队后面行动，教导总队为后卫。这样的态势，目的是想迅速控制沿途各重要据点，造成敌人的错觉，以为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然后向星潭、旌德进发。只要通过星潭、旌德，就能突破顽军的包围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①。

在出动之前，叶、项又通过电台向党中央、中原局及三战区发报，报告部队立即开动^②。

当1月4日晚，叶、项率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时，许多群众涌到大路两旁，含着热泪挥手送行。

在夜幕中，项英和叶挺、袁国平、周子昆、饶漱石等一起，随军机关队伍的行列中前进。

当时天不作美，雨下个不停，而干部战士又没有雨具，棉衣、背包都湿了，在漆黑的路上前进。军部机关带队的干部以为对云岭那一带地形道路熟悉，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页，《皖南事变本末》第106页。

②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22页。

就没有请向导带路，不巧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之天地漆黑成为一体，仅走了十多里，就把叶、项和军部机关引到前去无路的稻田地里，不得不折回来，耽误了时间^①。

当天夜里部队要通过章家渡青弋江时，又发生了故障。由于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架设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在桥两头各接的一段，又因部队过江时过于拥挤，仅过了千把人，浮桥就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在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涉足而过，秩序混乱，行军速度自然非常缓慢^②。

第一天行军就这样走得很不顺利。军部从云岭到茂林只有四十华里，但到达茂林南面一里多路的潘村宿营时，已是1月5日天明以后。各部队行军掉队人数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位置^③。

1月6日下午，叶、项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四个营出丕岭、两个营出薄刀岭，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第五团）出高岭、第五团为全军后卫，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①。

叶、项觉察到参谋部门需要加强，就在茂林宣布由张元寿任军部参谋处处长^②。

叶、项鉴于部队非常疲劳，决定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息一天。这虽可使指战员消除疲劳，但确又给蒋介石集团实施围剿计划增加了一天准备时间，也就增加了前进的困难^③。

后来查明，此时在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前进路上，蒋介石集团不仅部署第四十师拦截，而且将第一〇八师从宣城调来，从浙江抗日前线调来的第七十九师和第六十二师一部也已到位，跟踪而来的第一四四师和新七师已经占领云岭、汀潭、中村等地，在茂林周围地区布置了袋形阵地，密令上官云相负责“解决”新四军^④。

1月6日晚，各部队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遭到顽军第四十师、五十二师的拦击。皖南事变的枪声就从这时开始打响了！蒋介石集团蓄谋已久的大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③ 《皖南事变本末》第107—108页。

④ 同上。

规模屠杀新四军皖南部队将士的暴行开始了^①！

各纵队按规定计划继续前进，英勇冲杀，到1月7日上午：一纵队打掉了球岭的敌人，通过了球岭；位居中路的二纵队消灭了在丕岭阻拦的敌人大部，通过了丕岭；军部紧随二纵队的后面行动，也通过了丕岭，在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休息；二纵前面的部队向星潭方向边打边前进，当打到距星潭只有三里的檀皮庄时，遭到星潭后山及山口两侧高峰顽军的火力封锁，几次都冲不过那三华里的开阔地，形成对峙。^②

这是突破顽军合围的重要战斗。顽第四十师于1月3日、4日派部队进驻榔桥、星潭一带，连日构筑工事，堵住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的缺口。事后得知，当1月7日那天顽第四十师在山口阻住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纵队前进时，上官云相在电话中对四十师师长方日英说：“要把叶挺的主力吸住，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已到达预定位置，合围的态势已成，只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围，他再想跑也跑不了。”^③正因为如此，顽第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08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386页。

四十师在山口一线拚死挡住皖南部队的去路。二纵队虽多次猛攻，均未能奏效。左路第一纵队在突破丕岭后，遭敌截击，兵力大为分散；右路第三纵队只有军部特务团，当打到距星潭十五华里处为敌所阻。至此，三路纵队未能按时到达榔桥、星潭地区会合，掩护军部突围。

1月7日近午，周子昆和叶挺先后来到了二纵队的前沿，观察地形，询问情况，但未当机立断下如何打的决心。周子昆提议回到后面研究一下怎么办，叶军长同意，就一起回到百户坑。在一个棚子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和二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及一些团的干部、军部参谋人员等，围着中间一块大石头，上面放着马灯，地下铺着军用地图，开会研究起来。饶漱石是会议中途参加的。会议由军分会书记项英主持。首先由周子昆汇报了到前面了解的情况，接着进行讨论。在研究过程中，周子昆和作战科长李志高等分别又到前面了解情况，山口迟迟未能突破，部队伤亡很大，继续僵持下去很不利^①。在讨论中，出现了几种意见：

一是，立即后撤沿来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393、394页。

太平、洋溪、石埭、青阳，甚至南出祁门、景德镇，认为求生存是第一，政治上说得过去与否是其次。项英反对这个意见，认为在政治上说不过去。结果这个意见被否定。

二是，翻过百户坑右侧山梁，由另一坑口打出去。但没有路，要翻越悬崖峭壁，而且右侧坑口是否为敌所封锁也不清楚，须待侦察敌情后才能出发。此时天已黄昏，又无把握，这个意见也被否定。

三是，继续攻击当面之敌，不惜一切牺牲，从山口突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均不同意这个方案。项英强调，我们部队历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拚恐怕不行，伤员多了不好办，即使攻下星潭，敌人如凭徽水河固守，也不易突破。

这时，前面的形势严重，敌增援部队已赶到，情况不断传到百户坑军部会议室里。叶挺坚决主张从星潭打过去，甚至动用总预备队（即第五团）的兵力。项英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叶挺请项英下决心，怎样决定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不打星潭，大部队于7日午夜回撤到丕岭以西，另寻突破口，并要第五团控制高岭。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立即率第五团连夜

赶去高岭^①。

百户坑会议本是个紧急会议，由于会议期间对问题争论很大，纠缠不清，与会人员进进出出，项英举棋不定，使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时间长达数小时，丧失了时间，贻误了战机，最后下了回撤的错误决心，致打乱了整个部署，挫伤了部队的士气，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1月7日深夜，即1月8日凌晨两三点时，叶、项随新四军军部返回丕岭以西的里潭仓宿营。这是山谷中的小村，只有几间茅草屋，大部分人员都在山坡的树林里露营^②。

1月8日中午，叶、项率新四军军部向南开动，向已为第五团攻占的高岭前进。又由于向导带错了路，没有向右边的小路上去，而误向濂岭走去，大约走了三小时，离濂岭还有一段距离时，得到前面部队情报，特务团已撤回濂岭，正与敌第七十九师对峙。可是，当军部的队伍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手臂受伤的三纵队司令张正坤从高岭下来报告，敌第七十九师另一部正向高岭攻击前进，双方对峙，第五团冲不出去。不得已，军部又折回里潭仓宿营，准备休息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394、395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第10页。

一夜后，改向茂林方向突围，仍从铜陵、繁昌渡江^①。

大部队如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转进，加之当时通信联络手段落后，部队在山谷里折腾，打乱了行动部署，致使部队十分疲劳。

1月8日晚九十点钟时，新四军军部得到情报：上官云相下令紧缩包围圈，第一四四师已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山区。叶、项等当即研究决定，马上集合部队出发，抢先于敌，经高坦向茂林方向突围。

到顽敌合围已成时，才下突围的决心，就显得迟了！

由于时间紧急，决定仓促，部队在两边都是高山的狭谷里无法调整，就由后卫变前卫，前卫变后卫，教导总队就由后卫变成前卫。周子昆鉴于前面没有战斗部队，急忙派参谋到后面将新三团的队伍调上去。因山区道路狭窄，就叫沿途的机关部队靠一边让路，让战斗部队赶到前面，迅速击退顽敌，进占了高坦^②。

① 《皖南事变回忆》第10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1页，《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23页。

当军部冒雨到达高坦时，已是1月9日凌晨。天时、地形对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都不利。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和大家站在路边淋着。因非常疲劳，人一坐下来就会睡着了。这时，茂林方向枪声密集，是新三团的部队和敌第一四四师在战斗。怎么办？此时叶军长与其他军首长不在一起，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一起研究一下，周子昆让他去请叶军长。叶超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见到叶军长正和副官、侄儿、警卫员在里面烤火，叶超汇报了一下情况，建议首长们研究一下怎么办，但未讲其他军首长在等他去。叶军长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叶超见叶军长对百户坑会议的决策不满意，不敢再讲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又过了好一阵子，叶超才以查看情况为由出去，到项、袁、周原来站的地方却没有找见他们，便回徐家祠堂将未见项、袁、周的情况向叶军长作了报告^①。

叶挺发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不见了，马上找饶漱石商量，于1月9日向党中央和中原局发电报告：项英等“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向不明。”^②当天就收到刘少奇的复电，称：军事上由叶挺负责，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1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8页。

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要他们积极支持，挽救危局，并建议中央撤项英的职^①。随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也来电要求全军服从叶、饶指挥，执行北移任务，“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②

1月9日，上官云相下达了总攻命令，要求迅速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于是，当日从拂晓到下午，叶军长指挥部队与茂林顽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敌以重大杀伤，追敌退守茂林的东陈岗。高坦离茂林十多华里，这就造成突围的间隙。当晚，因强攻东陈岗未克，叶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率新三团、老三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属队撤离高坦，向东北方向的石井坑、大康王转移，准备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青戈江向北突围。从高坦到石井坑，虽只有十多华里，但由于道路狭窄泥泞，走走停停，到10日早晨才到达^③。

1月10日上午，建制较为完整的第五团来到石井坑，第一团、特务团的部分队伍也来到石井坑，加上新三团、老三团、教导总队、军直属队的共约五千人左右。军部驻大园村。叶军长决定休整部队，整顿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9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4页。

组织，在石井坑构筑工事坚守，并开会作了具体部署^①。

1月10日近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回到了军部。他们是1月9日凌晨在高坦离开大队的。当时他们在路旁久等叶军长未遇，又见去找叶军长的参谋也迟迟没回来，加之顽军第七十九师四三二团逼近（该团于8日下午3时进抵南容附近），枪声密集，人员散乱，以为形势严重，局面失控，于是在黑暗中从外潭仓到里潭仓间的竹林里向北面的山坡上爬去。那天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大雨下个不停，寒风呼啸，他们在山上转来转去，到天亮才发现里潭仓就在脚下。此时附近山头枪声不断，此起彼伏，大雾弥漫，难以行动，于是他们走进一间烧炭的破茅草屋里，警卫员生了一堆火烤衣服。他们边烤火，边商量如何突围及突围路线。不知不觉天黑了，疲劳不堪的他们靠在火堆旁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10日早晨。这时，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吹号，懂得号谱的周子昆高兴地说：“是我们的号声，是调五团一营一连的。”他们往山下一看，见五团一营一连的队伍正从里潭仓经过。周子昆说：“我们还有这么多队伍，我

^① 同上书，第15页。

们下去吧!”项英也高兴地说:“好,我们下去吧!”就这样,他们一行十多个人的小队伍,离开大队虽不到一天半时间,没有吃上饭,没有喝上水,就跟着五团的队伍到了石井坑^①。

当项英同叶军长、饶漱石见面时,后悔莫及,十分内疚,感到千条万条理由都说不清他离队出走的问题,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离队出走所带来的污泥,真可谓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当项英得知叶、饶已将他们离队出走的情况报告中央后,便立即起草电稿向党中央报告。原电是: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在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

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6页,《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51、52页。

队共存亡。”^①

项英把进到高坦时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仓忙率小队出走，时间虽不到一天半，但影响极坏。这是他在军部及皖南部队转移问题上犹豫不决、处置失当诸错之后，又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应该的，其形象和声誉自然受到很大影响。正如当年在军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所说的：项英短暂的离队之举，使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或多或少被蒙上了一层阴影^②。

对项英的离队出走怎样看法？时任军部机要科机要员的邱静，在那五十二年后的1993年，在《为叶、项首长当机要员》一文中写道：项英的离队之举，“固然是一大错，从他的一贯作风来看，还不能认为是偷生怕死，临阵脱逃。我觉得，究其近因，在于他过高估计8日夜间上官云相下达紧缩包围圈、发动总攻击的敌情，过早采取了分股突围的应急措施。记得那晚四周一片漆黑，童士杰（按：军部秘书处科长）给机要员发钱，我拿到三百元法币。他对我说：‘刚才获得一个敌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前面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如被打散，就用这些钱依靠老百姓，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1页。

②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24页，《人物》1993年第5期。

自己设法突围出去，然后设法归队。’……以后的事实表明，根据敌我态势，虽然已陷重围，但我方尚未到非采取这种措施不可的境地。出发前，项英既未能排除各种‘干扰’，当机立断，延误了军部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造成战局的被动。在高坦时，如果他能找到叶挺，一起来商量，也许未必铸成这一错再错的失误。所以李一氓说，‘项英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指的就是项英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中曾采取过的那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做法。”^① 这些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项英回到石井坑的当天，叶挺仍以叶、项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称：“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② 同时，以叶、项、饶的名义电告刘少奇、陈毅：“请中央设法以全面分裂胁蒋，或能挽救”，“二支队应即向

①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23页，《人物》1993年第5期。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2页。

苏皖边积极行动，苏北能同样行动以为声援更佳。”^①显然，这时叶挺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还寄予一线希望。

在这期间，党中央也曾多次电告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严正交涉，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撤围或停战，稍后又布置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同时电告叶、饶“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②但事态的发展迅速，党中央的措施已经远水救不了近火！

此时此刻，蒋介石集团对已被包围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看作是“囊中之物”，那里肯放虎归山，因而对来自延安的抗议、交涉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下达加紧围歼的命令。

1月11日，顽军向石井坑发动进攻，被击退。当天，叶挺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表示“只好固守一拚，……以赎其过。”^③

1月12日，党中央作出决定：“一切军事、政治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2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6页。

③ 同上书，第134页。

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①项英拥护党中央的决定^②。从这时起，项英就不再参与决策了。

1月12日这一天，坚守石井坑的战斗甚为激烈。顽军按照上官云相下达的全面攻击命令，在下午发动总攻。坚守东流山、长龙山一线的特务团、第五团等部打得英勇顽强，反复冲杀，多次进行白刃格斗，同敌争夺每一块阵地。五团三个营的六名营长、副营长（即教导员），有两名牺牲，三名负伤，用鲜血染红了东流山、长龙山的岩石^③。东流山高八百三十六米^④，是石井坑的制高点。敌攻占东流山后，火力就覆盖了石井坑。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叶挺于12日晚向延安发出关于情况万分紧急、弹尽粮绝、再难坚守的电报后，决定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是苏南，一是经铜、繁到皖中^⑤。

① 同上书，第135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175—176页。

④ 见总参测绘局印的军用地图。

⑤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25页，《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6页。

按照叶军长关于分散突围的命令，在石井坑守备的部队和人员于12日夜^①全线向外冲去，枪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军首长分两批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另一批^②。但他们很快就走散了，分别消失在夜幕中。

到这时止，蒋介石集团制造的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即告结束。

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出动时的九千余名抗日志士，除两千余名前后分别突出重围，陆续到达苏南、皖中、苏北外，其余六千余名均壮烈牺牲、失散或被俘，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惨的一页^③。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利用其最高统帅的地位，有计划地布置陷井、消灭异己、残杀抗日有功将士的一大阴谋。

然而国民党当局竟以恶人先告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声称将叶挺军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第5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6页。

③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皖南事变”条目。

长交“军法审判”，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中共中央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除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随时准备在军事上进行坚决自卫外，在政治上展开了猛烈反击。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①，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集团被迫收敛其反共活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这以后，新四军九万健儿在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的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领导下，继续驰骋大江南北，保卫华中抗战阵地，将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六 最后两个月

1941年1月12日夜，在叶挺宣布突围以后，项英带着警卫连的排长李德和、副排长郑德胜、警卫员夏冬青（即包子），随着军机关突围的人群，从石井

^① 《周恩来年谱》第487页。

坑出发，翻越海拔八百一十一一点七公尺的陡峭的火云尖，于13日晨来到西坑的山谷中^①。

这里山高林密，杂草丛生，各个山头的制高点已被顽军控制，出口处已被顽军封锁。项英和警卫人员就隐蔽在密林草丛中。此时，四周山上小规模战斗还未完全停止，零星的枪声更是不断，甚至人被打死了还不知道子弹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顽军还不敢到西坑来搜剿，只是在远处山头上喊叫。

1月14日晚，叶军长下山谈判被扣后，顽军便向西坑发起进攻。项英凭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认为顽军在北面的大康王等地必然封锁甚严，难以突过去，不如向南转到敌合围圈外暂时隐蔽。于是，他率随行人员由西坑向南、顽军后面的螺丝坑方向转移。他要求警卫人员：随时准备战斗，但不能随意开枪；只要顽军没有发现，那怕踩着脚也不要理睬；如果被发现，便先向顽军开枪。

后来的情况表明，此时向有顽军重兵堵截的北面突围，是难上加难的，袁国平就是在向北突围时牺牲的；而向南，绕到顽军包围圈外暂时隐蔽，则是较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09—210页。火云尖高度见军用地图。

为安全的。

在向螺丝坑方向转移途中，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突然出现在项英面前，主动要求留在项英身边^①。刘厚总平时表现虽不怎么样，但却在湘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打过游击，个头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项英自然对刘厚总很感兴趣，便答应把他留下来。当晚，项英为安全起见，和大家换了一个地方隐蔽。

1月16日，搜山的顽军在山上高喊：“你们叶军长下山了，项副军长也下山了，你们还躲在那里干什么呢？你们赶快出来吧！”项英听后气愤地说：“他妈的！顽军造谣啊！这是顽军欺骗我们突围的同志，我不是还在这里吆！”^②

当晚月光明亮。项英带着几个警卫员和刘厚总，在转移途中意外地遇到了周子昆及其警卫员黄诚^③。

项英和周子昆两位老战友热烈握手，相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那股亲热劲，真像多年不见一样，实际上他们分离只有三天时间。

项英拉着周子昆的手，噙着眼泪，说：“我们部

① 同上书，第210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0页。

③ 同上书，第217页。

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到中央，要作检查，请求处分。”^①

周子昆也流下了眼泪，立即表示说：“我也有责任。”

他们各自叙述了分离以后几天来的遭遇。

在交谈中，项英语气坚定地说：“只要不死，我们一定能够突围出去。”

项英和周子昆会合以后，便一直在一起活动，直到他们牺牲时为止，没有再分开过。

他们继续赶路，这天夜里来到螺丝坑。那里只有两三户人家。他们搞到了一些油菜和细糠充饥。

又过了一两天，项英在观察时发现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冒烟，估计那里有自己的人，便和周子昆商量后派夏冬青去联系。

果然不出所料，那里有个炭棚子，夏冬青在那找到了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原侦察科长谢忠良、老一团第二营营长李元、侦察连的排长张益平等一批同志。李志高和谢忠良听说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还健在，很高兴，便很快随夏冬青来到螺丝坑，看望项英、周子昆。

^① 同上书，第 59 页。

当项英看到李志高、谢忠良时，激动而又惭愧地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①

周子昆在一旁忙着插话，说：“我也有责任。”

项英还对李志高、谢忠良说：“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②

他们在那交谈了突围的经过和观察到的情况以后，项英、周子昆决定在天黑以后移至李志高、谢忠良所在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个烧炭棚子和一些木炭，在寒冬腊月的严寒时节，这个条件是很难得的。

他们会合以后，首先面临着吃饭的问题。李志高、谢忠良根据白天的观察，了解到赵家佬有房子。当晚，他们去那里找到了老百姓。那里的群众很好，对新四军非常同情，他们看到抗日有功的新四军人员竟被顽固派害成这个样子，淌着眼泪，忙着烧饭、做菜招待，直到下半夜。这是项英、周子昆他们几天来第一次吃上的热饭热菜^③。

在这以后几天，他们跑了许多地方都买不到粮食，只搞到一二百斤红枣，他们便每天抓一把红枣充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饥，上午喝点枣子汤，下午吃掉枣子后早点睡觉。他们没有东西吃，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只好通过少活动来减少能量的消耗^①。

项英和李志高等会合以后，人员渐渐多了，觉得越是环境困难，条件艰苦，越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很有必要建立临时党的支部，就指定李志高为临时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项英还强调：“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②

项英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以后，得知顽军在春节（1月27日）要搜山。他们便匆忙离开，向东北方向的濂坑转移。

项英、周子昆和李志高、谢忠良一行来到濂坑的纸棚村后的一天，通过群众，又和教导总队的工兵连长、原军部参谋刘奎联系上了。刘奎是在1月12日东流山阵地失守以后，辗转突围到濂坑一带的。通过刘奎，又同军部政治协理员杨汉林联系上了。通过杨汉林，又同军部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等联系上了。就这样，像滚雪球一

① 同上书，第211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9页。

样，集合失散的人员越来越多，达四十多人^①。

这时，同情新四军的当地群众也帮助他们打听消息。2月中旬的一天，群众告诉项英他们：“对面山沟里有人，肯定也是新四军。”当天晚上，项英、周子昆派五团第一营的连长彭司宝、二营第五连指导员吴生茂、原任项英的警卫员康东北等前往调查了解，隐蔽在那里的原来是五团第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所率领的战士共二十多人，真是巧遇^②！

原来，陈仁洪、马长炎俩人1月12日在石井坑的长龙山（按：东流山的一段）保卫战中负重伤，不能随队突围，经领导批准让二营营部侦察班、通信班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们离开战场，就地潜伏养伤，尔后待机突围。他们运用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风餐露宿，用生米、糠麸充饥，后辗转来到这里隐蔽，此时伤口逐渐好转。那天晚上，陈仁洪、马长炎见形势有所和缓，搜山的顽军已经撤走，便带着战士们来到石板坑凤木匠家里做饭吃。当他们正在吃饭时，外面狗叫，负责警戒的战士查到三个陌生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0页，《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67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9页，《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66页。

人，带进凤木匠家里，陈仁洪、马长炎一看便认出来，原来都是一些熟识的老同志，就立即让他们一起吃饭。在边吃边叙谈中，他们悄悄地告诉陈仁洪、马长炎：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就在对面山上隐蔽，已断炊多日，没有吃的，也没有盖的，如有可能，有吃的东西能顺便带点去。

陈仁洪、马长炎听说项英、周子昆健在，非常高兴，立即在凤木匠家找纸给项副军长写了一封信：

“您好！听说您安全隐蔽，我们很高兴。我们二人是五团二营正副营长，在长龙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二十多人潜伏养伤，现已基本痊愈，能活动。如果首长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愿随首长一起突围，因为我们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①

陈仁洪、马长炎考虑到项英那边的食物短缺，立即将凤木匠替他们买回的食物分出一大半，还有一包烟叶，让彭司宝他们连信一起带回去。

彭司宝、吴生茂、康东北带着陈仁洪、马长炎的信和送给的食物，连夜返回濂坑，并在第二天一早就去见项英。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66页。

项英看了陈仁洪、马长炎的信和送给的食物，听取了找到陈仁洪、马长炎一行经过的汇报，心情很是激动。因为在那字里行间，在那食物的背后，都充满着阶级情、战友爱，使他受到鼓舞。于是，他立即给陈仁洪、马长炎写了一封信。

“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谢谢！希望你们很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生茂同志原是你们营里的指导员，如需要的话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你们如健康允许，望来我处一趟。”^①

当天晚上，项英又派吴生茂、彭司宝持信去找陈仁洪、马长炎，在指定的地点交给了他们。

陈仁洪、马长炎在接到信的第二天晚上，把人员、事情安归排好以后，带着他们仅有的一条毡毯和油布，由吴生茂、彭司宝带路，去见项英。他们两处隐蔽点相距虽不太远，白天可以望见，可因为两山之间是马鞍形，不能直走，只能绕行，结果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项英的隐蔽地点。

项英在同陈仁洪、马长炎会面时很是亲切，简要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关切地询问了他们伤口的恢复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66页。

情况，对他们的隐蔽和伤口恢复情况甚为满意。在交谈中，项英心情沉重地谈及自己的错误，讲了搞好团结、搞好隐蔽、为什么不宜马上突围、应尽快与地下党取得联系等问题。其中讲道：“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的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还在搜山，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以求共同突围出去。皖南事变中剩下来的人，我们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项英还对有人讲在突围时要把周子昆丢下的说法不满，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天天吵着要突围，说还要把周副参谋长丢下，只带我一个人走，那怎么行呢？周副参谋长虽然腿部残废，但还是可以突围出去的。老周平时对他们要求严，批评多一些，有意见就要把他丢掉那怎么能行呢？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周一起带出去。”^①

陈仁洪、马长炎十分理解项英的心情，对项英身着破烂的军棉袄、须发很长、人很憔悴、眼里布满血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7—68页。

丝的情景，很是同情和难过；对项英在危难之时，仍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抓紧对失散人员做思想工作，甚为敬佩；表示一定要保护好首长，跟随首长突围出去。

这次会面，给陈仁洪、马长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五十年后的1991年，在《忆项英在被害前与我们的一次谈话》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述。

项英鉴于集中的失散人员已达七十多名，决定加强党的组织，成立了临时总支部，由杨汉林任临时总支书记，李文英任宣传委员，马长炎任组织委员^①。

2月下旬的一天，同项英一起隐蔽的人员由于提前做饭冒烟，顽军发现后准备第二天搜山。老乡闻讯当即连夜告诉地下党。项英得知后，率领在濂坑隐蔽的人员转移的同时，派人给陈仁洪、马长炎送去一封信，称：我们隐蔽的地点被顽军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之；你们尚未暴露，要不要转移请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陈仁洪、马长炎接信后，从安全考虑，也立即转移到不远的另一处隐蔽^②。

项英和周子昆等离开濂坑，转移到东南的赤坑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84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184页。

山。这是石牛窝的地下党员姜其贵向刘奎介绍推荐的。为慎重起见，项英又派李志高和刘奎去侦察，他们回来后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赤坑山地处泾县与旌德县的交界处，海拔一千零一十七公尺^①，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都好。这里山势绵亘峻峭，森林茂密；敌人大部队不易攀登，小部队又起不了作用；十几里长的山沟没有几户人家，而且都是外乡人。特别是靠近山顶西侧有一个洞，叫蜜蜂洞，可住三四人，很隐蔽。蜜蜂洞下面六七十米处有一悬崖，能搭棚住人。对于这个新选的隐蔽地点，项英十分满意，决定搬到那里再隐蔽一段时间。

项英他们于2月底移至赤坑山以后，为避免暴露目标，便于解决吃的问题，决定分在几处隐蔽。项英和周子昆、黄诚、刘厚总四人住在上面的小洞，即蜜蜂洞；谢忠良、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十多人住在下面靠悬崖搭的棚子里；刘奎住在石牛窝村子里；李志高、罗湘涛、杨汉林、李元等二三十人在铜山、水岭一带活动；陈仁洪、马长炎等二十多人在纸棚村后面的金毛山隐蔽^②。

项英在蜜蜂洞隐蔽期间，时刻不忘突围到江北

① 见军用地图。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2页。

去，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最主要的有：

一是，统一突围的思想。项英认为，一些同志想早些突围出去的愿望是好的，但要先把敌情侦察清楚，决不能盲目蛮干。在顽军搜剿正紧、关卡盘查甚严的情况下，小部队是难以突围出去的。他说服大家切实搞好隐蔽，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对少数平时在思想上不够融洽的同志，注意个别谈心，疏通关系，消除隔阂，共同做好突围的准备^①。

二是，研究和确定向北突围的路线。项英、周子昆同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等研究后，派郑德胜、张益平到沿途侦察。他们化装成卖柴的，挑着担子，经茂林、溪口、中村，再经北贡里到南陵的何家湾、繁昌的铁门门，直到江边，沿途同地下党组织作了联系，观察了中村等地顽军警戒、盘查的情况。郑德胜、张益平顺利返回赤坑山以后，向项英、周子昆等作了汇报，项英很是高兴，确定按侦察的这条路线突围^②。

三是，为每人做一套便服。当时失散人员穿着多是原来的旧军服，破烂不堪，很容易被顽军发现。项英决定用他们随身携带的经费，由杨汉林与地下党联系买了一大批布，由濂坑做裁缝的地下党员负责，

① 《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第68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2页。

给每个人做一套便衣。项英、周子昆做的衣服是蓝褐色的长袍^①。

四是，安排准备干粮。项英考虑到，几十号人的队伍在突围去江北途中，临时搞饭吃既耽误时间，又容易暴露目标，故在行动前要分头备足既易携带、又易储存的炒米、炒黄豆等干粮^②。

在这期间，项英又和党的临时总支部成员杨汉林等交谈，要他们注意做好思想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要求大家隐蔽好，保重身体，不暴露目标，争取突围去江北的胜利成功。

项英所以要等到与秘密的中共皖南特委取得联系以后才突围，除想了解一下情况、取得地方党组织对突围的配合以外，再就是想同他们研究一下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他感觉到，皖南的地形、群众条件都好，对开展武装斗争来说是难得的。他和周子昆、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等酝酿，要给皖南特委留下组织打游击的骨干和一部分武器、经费^③。

3月13日，是项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像往

① 同上书，第212—213页。

② 同上书，第215页。

③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3页。

常一样，仍然在为革命操劳，为突围做准备。当天，他布置刘奎带着郑德胜、张益平、何继生去水岭李志高那里挑粮食，顺便再买点菜和油、盐回来，他们已在当夜运到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又安排刘厚总、李德和在第二天一早去找秘密的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联系请地下党组织配合突围的事，并通过洪林同皖南特委委员胡明、孙宗溶联系^①。

这天晚上下起雨来，到夜里越下越大，雨骤风狂，雷电交加，松涛怒吼，而项英的心情比往日轻松，因为同皖南秘密特委很快就可取得联系，突围去江北指日可待。到晚上十点多钟时，项英和周子昆在微弱的腊烛灯光照耀下，边下棋边交谈，刘厚总在旁观看。黄诚见时候不早了，便提醒首长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回答说：“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会就睡。”黄诚躺在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他们下面一些话：

“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

“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

“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②

① 同上书，第213、218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8—219页。

过了一会，项英、周子昆也都睡下了。当晚睡的位置，由里向外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由于头天外出走了一夜，大家很疲劳，倒下便睡着，很快进入了梦乡^①。

可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寂静的山洞里，一个卑鄙的阴谋在实施，一个罪恶的黑手在挥舞。叛徒刘厚总以雨声、雷声、风声作掩护，向项英、周子昆下了毒手。

当深夜三四点钟，也就是3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时，刘厚总悄悄爬起来，掏出驳壳枪，朝着项英的头部连放两枪，周子昆正想坐起来，胸口中了一枪，他们俩人当场就牺牲了；睡得正熟的黄诚被枪声惊醒，意识到出事了，便抬手去摸枪，刘厚总就朝他连开三枪，分别打在他的左臂、右臂和后脖子，他立刻昏倒过去^②。刘厚总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看到项英、周子昆死了，以为黄诚也死了，便将项英、周子昆身上携带的黄金、钞票都搜出来，又摸走了项英和黄诚的手枪（周子昆没有带枪），便匆匆下山逃走。

按照惯例一清早就去蜜蜂洞看望并照应首长的夏冬青，到洞里一看现场便呆住了，随即赶紧往下面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8—219页。

② 同上。

跑，悲痛地对谢忠良、李德和、康东北等说：“不好了！项、周首长被打死，黄诚被打伤。”大家便一起往上面的洞里跑。当时运粮刚赶回石牛窝的刘奎、郑德胜、张益平、何继生，看到下山找地下党联系的刘厚总神态有些慌张，预感到大事不好，也立即往山上跑，很快赶到蜜蜂洞。大家对项英、周子昆两位首长的遇害感到万分悲愤，对叛徒刘厚总无比痛恨^①。

谢忠良当即同大家作了研究，判定刘厚总杀害项、周首长后会很快投敌，把敌人引来。他对大家说：“我们先把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的遗体埋葬好，做上记号，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来取出去重新安葬。请大家记住，项副军长穿的是布鞋，容易腐烂，周副参谋长穿的皮鞋，三五年不会烂，以后我们来取时要注意这个区别。”^②于是，大家在离蜜蜂洞一百多公尺处的石崖下面，用原来向老百姓借来平整洞里地坪的锄头扒开碎石，挖了两个坑，怀着悲痛的心情，将项英、周子昆的遗体用仅有的两条毯子包着，分别放在坑里埋葬。为了区别，将项英的遗体埋在稍上一点的坑里，头朝东；将周子昆的遗体埋在稍下一点的坑里，头朝西。谢忠良提醒在场的同志，要牢记

① 同上书，第214、62页。

②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4、62页。

这个地方和项、周遗体埋葬的区别^①。

这天黄昏，谢忠良在将黄诚安排在石牛窝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养伤后，便率领大家离开赤坑山，向铜山转移，去同李志高、罗湘涛、杨汉林、李元等会合^②。

到这时，项英从1月12日夜石井坑突围起，到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时止，准备待机突围共为两个月的时间。

在项英、周子昆牺牲一个多月以后，新四军失散人员六七十人在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李元、陈仁洪、马长炎等率领下，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胜利突围，经铜陵、繁昌去江北，而刘奎则被留在皖南坚持斗争，实现了项英的愿望^③。特别可以告慰项英的是，这批返回江北的新四军干部战士都成为第七师的重要骨干；而留在皖南担任游击队队长的刘奎，在那里打击日伪军，惩办汉奸、叛徒，挫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清剿”，成为闻名的“打不死的刘奎”，为皖南的胜利和解放做出了贡献^④。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214、6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15页。

④ 《新四军事事件人物录》、《新四军人物志》。

项英从1920年参加工人运动起，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七 沉痛的教训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暗算，受到重大损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理应了解军部及皖南部队所处的逆境，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紧密联系实际情况，坚决果断地采取有力措施，但他既未能及早将军部及皖南部队迁出于前，又未能率军部及皖南部队安全突围于后，因而他对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教训极为深刻。其主要教训是：

一，对北移迟疑犹豫，丧失了转移时机。

古语云：“用兵之害，犹豫最大。”^①

1940年11月初，党中央决定放弃皖南后，项英虽表示同意，但在执行中央指示时，缺乏破釜沉舟的气魄，又无当机立断的决心，致迟迟定不下来。有时

^① 见《解放军报》1990年11月3日第三版。

想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皖东，有时又想经苏南转赴苏北；有时顾虑部队受损失，有时又担心丢失家当。如此犹豫不决，时间被拖下来，有利的转移时机被丧失。

项英对北移迟疑犹豫，主要是他对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而在组织北移时没有作出对付最险恶局面的具体安排。

项英对北移迟疑犹豫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敌情顾虑重重。直接北渡吧，担心在途中遭顽军袭击，在江上遭日军拦截，在江北遭桂军堵击；东进苏南再转苏北吧，担心途中既要遭到顽军第五十二师、一〇八师的堵截，进入敌占区又要受日寇和冷欣部队的夹击。当然，敌情确是存在的，只要痛下决心，组织严密，有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项英丧失转移的有利时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当年5月，已定军部率第一、三团移苏南，并已派人勘察了行军路线和新驻地，却未能抓紧行动，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致未能实现。第二次，当年10月，在皖南秋季反“扫荡”正在进行和刚结束时，毛泽东等曾电告叶、项，要“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①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页。

去皖东。当时叶军长指挥部队从日军手里夺占泾县城后，打开了原为顽军封锁的由云岭东进苏南的门户，这是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乘机转移苏南的最佳时机。然而，项英等事先未作准备，而以军部转移困难、准备不及为由，又一次丧失了转移的时机。第三次，当年12月上旬，准备率主力经铜、繁北移皖东，对渡江做了相当准备，由于敌情变化，项英等更加迟疑而延搁了。至12月中旬，由于蒋介石集团围歼计划付诸实施，转移越来越困难了。

二，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转移看作是大搬家。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处境险恶，项英虽早有所感，但如何尽快摆脱这种险恶处境，则又缺乏紧迫感。当年11月22日，项英和叶挺向中央报告，说皖南部队在短期内无法开动，并列举了五条困难：地方工作的转变，残废伤病之安插，本地籍战士的教育和巩固工作，均需要时间；由苏南北移的交通安全无保障；苏南地区狭小，地形不利，不能机动作战；非战斗人员多，必须先将他们分批转移；各种资材、设施需要处理，非数日或半月能解决^①。这看出，项英把

^① 《云岭》第28期第31页。

放弃皖南看成是大搬家，等待万事齐备。

实际上，放弃皖南是战略性的转移，是在有严重敌情威胁的情况下实施的。当时，从云岭到江北，不论走哪条路线，都要越过日军的封锁线，还要冲破顽军的阻截、包围。特别是12月10日蒋介石下达“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密令后，形势更加严峻。而项英对形势发展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有想方设法尽快脱离险境，作应付最坏情况的打算。

由于认为是搬家式的转移，因而队伍就显得不精干。非战斗人员虽已分批走了近两千，但随队的仍不少。他们既不能直接参加作战，又还需别人照顾，如下决心早些让他们先转移，既有利于保留人才，又可使队伍精干，有利于战斗行动。如果当时队伍很精干，丢掉那些坛坛罐罐，只带枪支弹药，就不会出现像第一天行动混乱不堪的状况。

三，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

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时，最后确定走“绕道”的路线，主要认为该线顽军力量较薄弱，用皖南部队的六个团打顽军第四十师的三个团，力量有余，如发生战斗，很快能将敌消灭或击溃。这种估计是轻敌的。

在确定走“绕道”路线时，旌德方向是顽军合围

圈的一个缺口。项英他们总以为在顽军还未赶到时，就能突过去。结果相反，皖南部队的行动迟缓，行军能力低，突击力有限，而顽军却抢先占领了星潭一线，堵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又是由于轻敌所致。

其实，当时新四军皖南部队虽号称九千余人，但战斗部队半数是新扩编的，有些人不愿离开家乡，需要进行教育，且后方人员多，装备差。原新二支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在回忆中讲道：“皖南事变中，我军九千多人的部队，装备很差，机枪很少，不过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人没有枪。”^①加之在运动途中，又受到地形限制，就难以施展英勇善战的本领，也就难以以寡敌众。

四，对谈判、交涉寄希望过大，耽误了移动时间。

项英对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重庆的谈判和叶军长去上饶的交涉，寄予希望过大，总想通过谈判、交涉，能使他们北移途中安全有保证，总想不用战斗来摆脱险境。特别是在要开拔费和要补发弹药的交涉毫无结果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这对尽快移动也是有影响的。

五，途中指挥失当，一再贻误战机。

^① 新华出版社：《老战士诗文集》（二）第276页。

这次战略性的转移，缺乏在非常情况下行动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指挥上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开始这告别、那移交，延缓了行动时间，违背了兵贵神速的原则，丧失了突出包围圈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走几天，就有可能突过旌德方向那个缺口。按照当时当地的地形，组织三路行进不是不可以，但军部直接掌握的突击力量少，以致发生情况时则缺乏突击力量，而陷于被动。对行辞的具体组织，很不严密，多次发生向导带错路，增加了部队的疲劳，贻误了时间。到茂林后，应组织部队克服困难继续向前突进，分秒必争，不该姑息部队疲劳而决定在那里休息一天，给敌人达成合围增加了一天时间。当部队在星潭受阻时，应考虑到已接近敌包围圈的外沿，当机立断，不惜牺牲，迅速集中兵力打开出路，任何的延搁都对突围不利。由于对行进途中未作最坏打算，在百户坑开会再研究突围方案，这件事本身就是违反作战原则的，决定大部队回撤更是失策，导致思想上、行动上的混乱，搞得越来越不可收拾。这些指挥上的失误，正如李一氓所指出的那样：“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①。如果考虑到敌援已到、合围态势已经形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274页。

成，及时采取分散突围方针，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 1941 年 1 月 9 日凌晨到达高坦时，项英在枪声密集、人员散乱的紧急情况下，虽曾按事先方案作了一些处理，如给干部发钱币，以备在被冲散时使用，但最重要的应该尽快找到叶军长研究对策，可是他未等找到叶军长商量，未能对机关作出全面应急部署，就和袁国平、周子昆率小队人员出走，脱离指挥岗位。有人说这是为了缩小目标，分散游击，但这种行动，正如他向中央报告中所说的是对突围信心“动摇”的表现，这对军心是很有影响的。对项英来说，这是他终生遗憾之事。

六，突围后在山区逗留时间过长，导致大错。

项英从 1941 年 1 月 12 日夜从石井坑突围，到 3 月 14 日在蜜蜂洞遇害，在茂林一带山区逗留共两个月时间。开始，躲避敌人搜捕、堵截是对的，但停留时间过长，以致内部人员在那极端艰苦情况下思想起变化，发生意外。如果在派人侦察突围路线回来后，加紧准备，迅速行动，时间提前几天，也有可能避免遇害事件的发生。

说项英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把主观责任都归于项英一人也是

不合适的。因为延安还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制约和影响，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有些不当之处，导致工作指导上有所失误，因此也有教训应当吸取。荷兰学者本顿（中文名班国瑞）1984年8月发表的《论皖南事变》文章指出：皖南事变前数月，新四军军部因迟疑不决而延误北移时机，不能只归咎于项英，中共中央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迟至1940年11月21日，中央还告诉他可以延缓行期一两个月^①。文章在分析北移犹豫不决的原因时指出：“延安领导人由于头脑里有一个框框，认为蒋介石受到种种制约，所以没有充分地估计到时局的危险性，并曾一度采用边缘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项英等人在云岭的拖延。”^②

从目前已见到的资料来看，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和决策的主要教训是：

第一，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对形势有些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形势和整个华中形势，有很多精辟的分析和正确的指示。然而在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即当年夏秋之际，当英、美、苏为了各

① 《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第41页。

② 同上刊，第42页。

自利益加紧援华，使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国共两党关系骤然恶化之初，党中央、毛泽东没有把握住形势的全貌，过高估计中苏关系改善对解决国共危机的作用，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对形势过于乐观，对时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对蒋介石集团反共策略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开始，当10月19日何白发出“皓电”，国共关系紧张时，毛泽东倾向于在军事上采用进攻的策略来对付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11月3日，毛泽东等致彭德怀电中称：“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以此来“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①。同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讲到：“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认为：“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等^②。毛泽东对此认为事关重大，又向共产国际请示。11月4日，毛泽东致信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二）第570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第220页，《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3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说明了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必要性。他说：“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反共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取退让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闹到蒋介石与我最后大破裂”，但我们“最后决心还没有下”“请求你们给以指示”^①。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计划持反对态度。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方针，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作防御的自卫战的准备^②。斯大林明确认为：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一边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3页。

②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4页。

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①。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并改变了自己的形势估计和军事对策。

11月6日，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致李克农、项英、董必武并告周恩来电中，要求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表示“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的态度，来从政治上谋求缓和^②。

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中，相信“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③

11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中称：“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④。看得出，毛泽东此时只重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而对其反共阴谋估计不足。

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叶挺、项英等电中称：“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

① 同上刊，第123—124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集）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④ 同上书，第101页。

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任潮（即李济深）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按：指1939年底至1940年春在华北的国共磨擦）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按：指蒋介石）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①

同日，毛泽东关于日汪合流后形势的分析致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电，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27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他们似已开始发慌，不久还要大发慌的，吓人政策已经破产。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当然不是停止反共），我们要准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3—104页。

备政治新攻势了。”^①

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称：“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亦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②

11月底，日汪协定签字。党中央和毛泽东由于对当时形势过于乐观，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让叶、项对北移作最坏的准备。11月30日，毛泽东等电告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皖南部队北移，“蒋、顾是不会为难”的^③。12月14日，党中央又电告叶、项：北移，蒋介石“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④。

特别是在何应钦、白崇禧12月8日齐电再提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蒋介石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当年12月31日前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于次年1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的手令以后，毛泽东对时

① 《云岭》第28期第34—35页；《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5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集）第116—117页。

③ 同上书，第105页。

④ 同上书，第109页。

局的危险性仍然估计不足。12月13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政策问题的报告中，讲“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①。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局势致胡、陈并告叶、项电中，仍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②。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之形势致彭左、叶项等电中，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③。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中，还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攻势防御”，相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④。

后来的事态表明，冯玉祥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毛泽东对当时形势判断和斗争策略的掌握上却出了偏差，蒋介石不久发动了皖南事变。当时毛泽东最担心的汤恩伯大军东调会影响苏北战局，实际上那时部署在豫西南阳的汤恩伯部，在日蒋决裂的情况下，要到达苏北兴化、宝应一带救援韩德勤部，路程达一千五百华里以上，要越过京汉、津浦两条铁路，要越过日伪多条封锁线，还有高山、河湖相阻，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117页。

决非短时间所能办到的。

第二，对北移的态度变化大，要求走的决心下得太迟。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想以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带来了北移的时限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电（即《佳电》）中，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江北，同时提出“宽以限期”^①。就是说，没有答应具体移动的时间。

11月21日，中共中央致叶、项电中，称：“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②。据此理解，可以拖到1941年1月中旬。

11月24日，毛泽东等致电叶、项，要求在“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③。

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④。就是说，可能展限到1941年1月中旬。

① 同上书，第84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3页。

③ 同上书，第115页。

④ 同上书，第109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国民党谈判代表刘为章电中，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①。就是说，时间可望展限到1941年2月中旬。

从上述过程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走一步看一步，曾经是想“拖”的。直到12月25日，毛泽东仍表示“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②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③这种“拖”的态度，自然对赢得北移的有利时机是很不利的。

12月26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态度，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同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报告25日他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向蒋提出经毛泽东24日同意的与蒋谈判时皖南部队北移的条件（即：速给新四军发补充；停止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但蒋根本不让步。蒋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

① 同上书，第111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③ 同上书，第119页。

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周在电中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①。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电后，预感到蒋介石这次谈话背后隐藏着阴谋，看到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砝码的价值已不复存在，交换已无望，因此采取“拖”的办法已不可行了。

恰在这时，叶、项25日致毛泽东电中，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请示行动方针^②就在26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严厉批评他们犹豫动摇，指出：“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否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③

“严责电”的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显得晚了一些。如能早些有这样明确的态度，中间不一变再变，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赢得有利时机会有好处的。

第三，低估了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对新四军

① 《周恩来年谱》第480页。

② 《云岭》第28期第41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0页。

苏北与皖南部队的行动协调不够。

苏北和皖南的新四军是一个整体，其行动会相互牵扯和制约。而蒋介石集团既然要反共，就必然会伺机寻衅，加剧磨擦。韩德勤是国民党军的嫡系，韩部在黄桥失利后，蒋介石集团声称要“复仇”10月19日发表《皓电》，调动军队，加紧了争夺华中的军事部署，着手布置皖南事变。11月下旬，华中指挥部为巩固苏北，解决韩德勤部，经毛泽东批准实施曹甸战斗。

叶挺、项英顾虑曹甸战斗会给新四军皖南部队带来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①第二天，毛泽东等电复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②

曹甸战斗打响后，韩德勤向蒋介石紧急求援。蒋介石先于12月8日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表《齐电》，再次限期八路军、新四军移至黄河以北^③。接着，蒋又于12月10日给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

① 《云岭》第28期第33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5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9页。

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①。顾祝同接电后，立即拟定了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计划。同时，国民党又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要北渡，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巡逻和阻拦。这样，皖南部队经铜陵、繁昌北渡和东进苏南北渡的路线都被卡住了，就加剧了他们北移的困难。

如果说曹甸战斗前，蒋介石还担心在皖南对新四军动手时、苏北韩德勤部要被消灭的话，那么曹甸战斗于12月16日结束^②，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国民党当局就可不必担心韩德勤部的安全，而肆无忌惮地发动皖南事变。然而，此时毛泽东尚未察觉到曹甸战斗后皖南部队处境的险恶，在12月25日还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③，因而也就没有在协调行动上多采取措施。

第四，在合围态势已成时可否暂缓转移，固守等待时机。

当蒋介石集团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迹象已很明显，北移取不得安全保证时，项英等曾多次提出暂

① 《云岭》第28期第36页。

② 同上刊，第38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页。

缓转移，固守阵地，等待时机。从地理条件来说，云岭一带周围山头均筑有坚固工事，又有良好的群众条件，皖南部队又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坚持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间是有可能的。从最坏的情况看，也不会比后来的损失大，而且顽军进攻所付的代价肯定要大得多。同时，由于顽方来攻，必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影响，会出面干预，在取得安全保证后，那时再伺机北渡。然而暂缓北移的建议未被重视。

时任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奚如在突围后向周恩来报称：“如事先侦察突围不易，为挽救危局计，即在原地与敌人作战，亦不致完全被歼灭。”^①

第五，在转移前变动两个主要指挥员，在做法上似不合适。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11月初，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而到中旬，又调叶挺任华中总指挥部指挥，要项英赴延安参加“七大”。但他们的工作交给谁，却没有明确。同时变动两个主要指挥员，似与对北移的艰难程度认识不足有关，在做法上是值得研究的。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265页。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党中央、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在对待蒋介石抗日和反共的问题上，在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在指导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的问题上，失误是明显的。它有力地说明，那种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一人身上是不实事求是的。

当然，抗战前期局势经常变化，情况异常复杂，要求任何领导人对尚未发生的情况估计和决策那样准确，是办不到的。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某些局势分析不当和决策有失误，这无损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也不是为了减轻项英的责任，而是为了尊重历史，反映历史真相，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吸取经验教训。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只有历史地、全面地、冷静地分析事变的时代背景及各种有关因素，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实事求是地分析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失败的教训，丝毫不是为减轻项英的错误，但如果把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责任推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512 页。

到项英一人身上，进而否定项英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则是不公正的。

八 仓促的决定

1941年1月15日，蒋介石集团以重兵围歼奉命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战斗结束只一两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其内容包括：

(1) 对项英在新四军三年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否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①

(2) 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指出：“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6页。

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①

(3) 对项英个人品德和工作作风进行严厉批评。指出：“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②

(4) 把项英和张国焘并列起来。指出：虽然说“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但又说“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③

《决定》下达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对项英个人评价由原来很高变得很低，反差如此之大，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罕见的。

① 同上书，第 267 页。

② 同上书，第 266—267 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 268 页。

从《决定》的字里行间看出，这是毛泽东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的损失非常痛心，在感情上对项英非常不满的情况下形成的，因而不可能冷静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使用了“从来就没有”、“一贯的阳奉阴违”等一类绝对化的语言，也就在所难免了。^①

同时，由于当时党中央与新四军皖南部队既无电话联系，无线电联络也已中断，又不可能派人前往调查了解，甚至连项英、袁国平是否冲出包围圈、是否牺牲、是否被俘等基本情况均毫无所知，因而仓促作出的《决定》所述事实不准确、不实事求是，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个《决定》有些话并未说死：一是，“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②二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③

由于“七大”至“十四大”的历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均未讨论有关项、袁错误的问题，因而《决定》就

① 同上书，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

被搁置起来，很自然地影响到对项英的评价。

特别是《决定》通过许多渠道流传出来，在报刊中出现。这样，在那以后，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除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列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外，其余的叙述包括党史书刊、讲义都是按《决定》作基调，对项英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使项英的革命业绩在无形中被抹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项英竟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被说得无一是处，其亲属也横遭迫害。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时在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工作，受审查，遭歧视。项英的儿子项学成，时任海军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的领航主任，被赶至农村劳动数年，1974年1月得肝癌而死^①。

在那时，学术界由于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少，又受组织原则的限制，加之受“左”的影响，即使对《决定》有不同看法也难以反映出来。直至1980年，学术界才陆续发表强调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项英功过的文章。接着，对《决定》也陆续提出不同看法。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通

① 《光明日报》《情况反映》第1127期，1980年4月30日。

讯》上，发表了王秀鑫所写的《关于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的功过问题》的文章，肯定项英在新四军工作中贡献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同时指出《决定》对项英“指责过分”，“上纲过高”，“不够实事求是”^①。这在中央一级的党史研究刊物中，第一次出现对《决定》的不同看法。这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很难得的。

在那以后，学术界和许多新四军老同志，特别是皖南事变的一些亲历者，对《决定》提出不同看法的多起来了，要求重新评价项英功过的呼声也多起来了。

1984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

“有些历史问题，中央还未作最后结论，其中包括对皖南事变及对项英同志的看法。”^②

“项英同志总还是一个革命家吧，总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是个烈士。他是牺牲在敌人（叛徒）屠刀之下的，否则怎么会埋葬在雨花台呢？”^③

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

① 《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第7页。

②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

③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

氓，在谈及项英及《决定》时，讲道：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①

“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②

①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1期第3页。

② 同上。

从已经看到的资料，学术界和皖南事变的一些亲历者认为《决定》不实事求是，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把项英和张国焘并列是混淆了两类矛盾。

《决定》硬把项英和张国焘拉扯在一起，是很不合适的。道理很简单，张国焘是叛徒，属于敌我矛盾；项英是烈士，即使犯有错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两者的性质不一样。把两个性质不同的人硬摆在一起，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硬往敌我矛盾方面推，是不符合革命利益的。

第二，说新四军皖南部队“绕道”北移是“自寻绝路”的观点不能成立。

当时，新四军皖南部队直接经铜陵、繁昌北渡和东进苏南转苏北的两条路线已被封死，只有走经茂林、旌德、宁国去苏南再转苏北的“绕道”路线。因为这条“绕道”的路线，如能迅速接近天目山，地形有利，而顽军只有第四十师的三个团，且该师 1940 年 12 月 31 日才到达宁国的胡乐司，1941 年 1 月 2 日才到达旌德的三溪。如果他们行动再早几天，指挥

得当，是有可能冲过去的^①走“绕道”的路线，中央是知道的。1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电告叶、项，要他们在茂林不要久留，乘顽军未布置好就突过包围线。^②如果说走“绕道”的路线是“自寻绝路”，自投罗网，那中央应当立即制止，为何还要他们快些走呢！如果是1月7日限令他们改道北进或分散突围，那结局就会不同。因此，说走“绕道”的路线是“自寻绝路”的观点不能成立。

第三，说项英在抗战开始就同中央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有分歧的说法不实事求是。

从已公布的史料看，还找不出项英在抗战开始就同中央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有明显分歧。

1937年9月29日，项英在南昌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后，给各游击队发出一封信，指出：要“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政府指挥之下，效命杀敌。”^③这和毛泽东当年5月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所讲

① 《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第22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8页。

③ 上海《新闻报》1937年9月30日第四版。

的“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①，同周恩来当年7月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说的“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②，基调都是一致的，谈得上什么分歧呢？！

1937年9月27日，项英曾应邀到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提到“中国有了历史上从未有之精诚团结”、“蒋委员长领导抗战”^③。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说项英“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因为当时国共合作，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既是一定事实，又是斗争策略，鼓励蒋介石继续这样做。否则，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所讲“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④，和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77页。

③ 上海《大公报》1937年9月28日第二版。

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64、第153页。

1938年11月30日发表《拥护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社论，又作何解释呢？”

奇怪的是，在同一时间、同一问题的提法上，别的领导人讲是正确的，而项英讲则被说成是错误的，这就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实事求是了。

在红军游击队集中问题上，项英讲的和中共中央当时要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讲法虽有不同，但很快就说清楚了。1937年10月初，中央书记处曾在两电中，强调保持南方战略支点^①，批评项英不应答应游击队集中改编^②。而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在了解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真实情况后，提出集中改编的意见与项英的主张大体相似。10月8日，博、叶、董向中央报告：“现在各地区之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因为各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多数系流动之部队，大多数现极分散，一集结则给养无法，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游击队（区）问题再难拖延，因接济给养大抵都是临时的，天寒棉衣均成问题。”^③实际上，当时红军游击队不集中就难以生存下去。赣东北和赣北两支游击队拒不集中，以后被国民党当

① 《新四军·文献》（一）第36、37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新四军·文献》（一）第46页。

局消灭就是例证^①。这看出，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正确的。反之，如果当时项英的看法和做法有问题，那中央政治局 1937 年 12 月 13 日《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项英的评价也就不可能那样高了。

第四，说项英三年来对中央一贵阳奉阴违、反对向北和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讲法不符合实际情况。

从 1937 年 12 月起至 1940 年 12 月，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分局、东南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示，在三年期间做了大量工作。1938 年 4 月，把分散在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为新四军，派先遣支队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接着组织部队开赴苏南、皖中敌后和皖南前线。1938 年 11 月，派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北渡皖东，加强皖东抗日斗争的领导。1939 年 4 月，叶挺率邓子恢、赖传珠等一批干部和第四团第一营前往江北，成立江北指挥部，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支队，开展皖东的抗日局面；同年 12 月，派部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天长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第 21 页。

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春，派谭震林、何克希去开辟苏南东路。这看出，项英是执行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活动方针的。在新四军建设上，他强调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工作，重视发展壮大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同时大力培养干部，仅教导总队就培养出干部达四千名。从而使新四军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近九万人，增加了七倍多，在苏南、皖东、苏中等地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并使东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取得恢复和发展。这些成绩，都是客观存在的，当然这不是项英一个人所能做成的，但其中有他一份，而且他还是一个主要的领导人。在这期间，党中央也是多次肯定项英的工作，如果说项英“一贯的阳奉阴违”^①，那么党中央为什么在《决定》发表前七个多月还要让他“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②呢？

在要项英向北发展的同时，如何让他履行东南局书记的职责？如何执行中央赋予的“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之产婆”^①和“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②等项任务？这也是应当考虑到的。

第五，党中央、毛主席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的失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项英在皖南工作期间和在皖南事变中有错误，中央对他批评是可以的，但把新四军皖南部队损失的责任都归之于项英一人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党中央、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责任。1941年3月26日，即《决定》发出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也已初步谈及。他说：“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③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将会成为公正评价项英功过的基础。

第六、把项英和王明扯在一起是不对的。

《决定》发出以后，有些人按《决定》的调子，有意无意地把项英和王明硬拉扯在一起。有的说项英受王明的影响深，他没有利用沪、宁失守特别是徐州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二）第117。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十六）第181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第285页。

失守后，从前线败退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丢弃枪弹、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溃散等有利时机，在长江南北不断扩大游击区域，而且迟迟没有贯彻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活动方针。其实，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是，上海是1937年11月12日失陷的，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而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是12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才讨论确定的。在沪、宁失守时，新四军的编组原则还未讨论，高度分散的红军和游击队尚未集中编组，就要求项英在大江南北领导开展游击战争，这怎么可能呢？！

二是，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前，即4月下旬，新四军由第一、二、三支队抽组的先遣支队已由皖南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进到皖中的第四支队已在开展游击战争，并于5月12日取得了蒋家河口战斗的胜利，揭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三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和向北发展的活动方针，是周恩来1939年2月23日至3月15日视察皖南期间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的，而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在这三个月以前，即1938年11月初就撤销了，怎么能把贯彻这个方针同王明拉扯在一起呢？！

有人还讲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这一时期，大

别山以东地区受王明影响的时间长，主要是项英受王明的影响较深。这话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从1938年1月徐州会战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期间，项英与叶挺、陈毅等已把高度分散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派往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至10月下旬止，先后取得了数以百计战斗的胜利。况且，大别山以东首先是指安徽地区，当时党的工作归长江局直接领导，第四支队的作战指挥也不归新四军军部，如果说那里有问题，也不应责怪当时在皖南指挥抗日斗争的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啊！

第七，说项英脱离群众、搞家长制有失偏颇。

《决定》对项英作风方面的批评，新四军原在皖南工作的老同志感到过份。1941年5月17日，原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批判项英的情况下，还称“项是东南最有威望的领袖”^①。与项英经常有接触的干部，更感到他能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原新四军军部机要员邱静，1993年在《为叶、项首长当机要员》一文中，回忆了当年项英的情况，写道：项英“公余之暇，有时和我们拉家常，开玩笑，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1940年切，我看到毛泽东把他写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332页。

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送给项英，还用铅笔在封面上写着‘德隆同志，请指正。’这时，我才知道‘德隆’就是项英的原名。”“总之，我对项英的印象是：平凡、朴实、正直而又令人崇敬。”^①这篇回忆，反映了原在皖南工作的许多老同志的看法。

当然，不是说项英那时没有缺点、错误，问题在于要切合实际，实事求是，不要无限上纲，不应否定一切。

在《决定》发表五十年后的1991年，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项英在新四军和在皖南事变中的情况及问题作了评述，写道：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

^① 《云岭春秋》试刊（二）第23、24页，《人物》1993年第5期。

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①

对项英的这段评述，同《决定》对项英的评价有根本的区别。

1991年11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暨军部分会，邀请北京、南京、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代表、历史工作者和皖南事变的亲身经历者共五十多人，举行皖南事变历史研讨会，就皖南事变的性质和对项英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决定》提及的问题和项英的实际有较大出入，与这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涉及对皖南事变和项英的评述也有较大的出入，希望中央对项英的问题能及早作出切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使长达五十多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人们相信，对项英的公正评价最终能得到解决。

九 殉难之后

项英不幸牺牲后，他从事的革命事业仍在继续

^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3页。

发展，革命车轮滚滚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改编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又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对统治，于1949年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和儿子袁振威，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和女儿周民、儿子周林，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儿子项学成，分别向组织上反映，要求寻找烈士遗骸，正式予以安葬；原在皖南随同烈士从事战斗的新四军老同志，也表示有同样的愿望和要求。这些愿望和要求，当年与三烈士并肩战斗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领导机关均表同情和支持。恰在这时，当年参加掩埋烈士遗体的原新四军军部参谋、后任皖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奎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反映了掩埋烈士遗体的情况，要求参加寻找，得到三烈士的老战友、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的赞同。于是，寻找三烈士遗骸、移葬南京、正式举行安葬仪式的安排于1952年7月23日报到北京^①。军委总政治部于当月29日批复同意^②。

1952年8月14日，由刘奎率领，带着项英的儿

① 电报抄件。

② 同上。

子项学成，加上当时了解情况的其他人员，专程去皖南泾县项英、周子昆遇害地点和袁国平牺牲地点，找寻三烈士的遗骸。寻找人员怀着对烈士的深厚革命感情，冒着酷暑，汗流浹背，翻山越岭，在当地人民政府和群众协助下，很快在蜜蜂洞附近，找到项英、周子昆的遗骸，并按照当时记号区分了两位烈士的遗骸。袁国平的遗骸，也在当时掩埋的地点找到。寻找工作十分认真，三烈士的遗骸分别包装，于8月26日运到南京^①。

对三烈士安葬地点，华东军区领导机关与南京市有关部门多方商量、勘察，并分别征询烈士遗属意见，到1954年秋最后确定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以南一点五公里处。墓的形式，尊重烈士家属意见，考虑到中国是文明古国，以用中式为好。经过准备后，于当年11月正式动工，用石块和水泥砌成坟包式，将并排的三个墓（中为项英墓，右为袁国平墓，左为周子昆墓）和墓道公路、墓碑等全部建成，并在墓后和两侧植松柏，形成三面环绕。对三烈士遗骸寻找、墓地修建和准备安葬的安排，由华东军区政治部改称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于1955年4月28日向总政

^① 电报抄件。

治部作了报告^①，总政于5月18日批复同意这些做法和安排^②。

安葬原定于1955年6月15日举行，故墓碑上刻有“公元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的字样。由于袁国平夫人邱一涵提出进入袁墓穴的后门太小，她逝世后合葬不方便，要求把袁墓穴内的后门再开大一些。当时南京军区和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体贴邱一涵的心情，考虑到她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同志，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工程返工不大，于是采纳了她的意见，又将进到袁墓穴的后门拆开，由小改大，故实际安葬时间向后推了四天^③。

1955年6月18日下午，举行三烈士入殓仪式。将三烈士的遗骸按人体结构整理包扎，穿着军服，分别装入棺木内。第二天，即18日上午，三烈士正式安葬，南京军区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党政机关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代表，驻宁军事院校代表，共数百人，同烈士遗属一起，参加了庄严、

① 电报抄件。

② 同上。

③ 走访主持建墓办公室负责人刘瑞的谈话记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152页。

隆重的安葬仪式^①。从此，三烈士便长眠在这里。对于他们的安葬，烈士的遗属是满意的。

为项英等建立烈士墓，并正式安葬，这是组织上肯定他们业绩的体现。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内对外均未作报道。

这个墓地当时曾名“三将军墓”，到1981年全国地名普查时改称为“三烈士墓”。建墓后，每逢清明和重大节日，烈士遗属和南京群众自动前往三烈士墓扫墓、瞻仰、凭吊，寄托哀思和表达崇敬心情。

然而，项英在牺牲以后的四十多年中，由于受《决定》的影响，他创造的业绩在党的历史上、人民军队的历史上被悄悄抹去，在史书上难以看到他的名字，该提到他名字的地方被故意删掉，而与他毫无相干的错事却推到他的头上。直到八十年代以来，项英直接参与的事情而名字被删掉的现象仍经常出现。

例一，项英是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一些地方在纪念“二七”大罢工时，却不提项英的名字。

例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

① 南京军区政治部1955年7月7日关于安葬三烈士的情况报告。

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十二个代表，包括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项英也是其中之一。而1983年出版的中共事件人物录一书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词条，提到十二个代表，却只点出陈独秀、张国焘等十一个名字，就是不提项英。

例三，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名义发布命令（刊在《红色中华》报第九十三期上），决定从当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明确规定“八一”建军节，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许多史书提及这件事情时，却只讲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而不提中革军委的命令，显然是故意回避出现项英的名字。

例四，1933年10月24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时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刊在当年10月27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但在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一书叙述此事时，只讲“毛泽东、张国焘”发表，却故意删掉项英的名字。

例五，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留在中央苏区领导坚持游击战争，中央政治局对项英曾给予高度评价。然而1986年7月18日关于《杨尚奎遗体告别仪式在南昌举行》的电讯中，讲到杨尚奎“参加了由陈毅等同志领导的赣南游击战争”，而把在赣南领导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项英的名字“等”掉了^①。

例六，1938年至1940年，项英作为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先后在江西南昌、安徽泾县云岭领导抗日斗争。而中国名胜词典的南昌、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两个词条所列领导人名单中，提到军分会副书记陈毅、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却没有书记项英的名字。

例七，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党的地区领导机构作了调整。某战史在叙述此事时，写道：“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其实，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东南分局改为东

^① 《人民日报》1986年7月19日第四版。

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但编写人员为不提项英的名字，就故意不提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这一内容。

例八，199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介绍《李一氓同志生平》一文中，提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一氓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却故意不提真正领导组建新四军的项英的名字。

这类不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事例实在太多，其实质就是有意无意地贬低项英，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历史真相。特别使人感到不解的是，有些书刊宁肯提到大叛徒张国焘的名字，却不提项英的名字。这是很不合适的。

在报刊书籍中，有关项英的记述以讹传讹的事例很多，许多与他毫无相干的错事被推到他的头上。例如，1937年7月16日，发生了何鸣事件（又称樟浦事件），闽西南红三团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这与当年9月下旬项英去南昌同国民党当局就停止武装冲突共同抗日举行谈判毫无联系，而且发生在前两个多月，但有的小说却故意将7月16日改为10月，列在项英去南昌谈判之后，其用意就是将樟浦事件的损失移接到项英头上。这同诬陷还有什么两样！

由于项英得不到公正评价，该出现他名字的地

方得不到出现，该提到他业绩的地方未能提及，致使项英的名字不仅青年人，就是中年人也很少知道，对他的业绩就更不清楚了。1986年10月，笔者去北京参加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会时，和江西大学历史系一位副教授交谈研究项英的情况，他听说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有很高的评价甚为惊讶。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看到的都是有关攻击项英的资料，听到的都是对项英的批判之词。

对于长时间不能公正评价项英功过的情况，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很有意见。1982年，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李一氓，先到南京项英墓凭吊，接着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参观，很有感慨，曾为该馆题词：

秣陵秋染浅丹霜
犹有荒愤卧望江
麦饭篮空惭展奠
祠弦调走笑雌黄
临危受命原无忝
到死乃休亦可伤
四十年间云岭怨

皖南山色自苍苍

南京望江矶吊项英同志墓

1982 年清明为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书^①

李一氓这首词，表达了他当时对项英不能公正评价的感慨之情，也反映了许多老同志的心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档案资料的开放，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价逐步起了变化。其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判断项英功过不再以《决定》为主要依据，而是坚持实事求是，运用两分法。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人物条目。其中有关他在皖南和在皖南事变中的表述，虽只有几行字，但很费周折。笔者数易其稿后，于 1983 年两次征求各方面意见，得到许多党史研究部门和老同志的赞成或支持，最后写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

^① 题词照片存笔者处。

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①主编单位总政治部百科编审室在将送审稿送请许多领导同志审阅的同时，于1984年12月17日送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审稿。胡耀邦接到当天就仔细审阅，作了多处批语，其中对项英在皖南和皖南事变中一段的旁批是：“这个评语看来可以了。”^②胡耀邦很慎重，又批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再仔细斟酌一下。”^③胡绳召集党史研究室的专家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④就这样，对项英这一段的评价，在费了很大周折之后，总算得到认可。

1986年，当纪念皖南事变四十五周年时，项英条目正式发表后，使原来按《决定》的习惯说法开始在悄悄改变。在这以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辞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军事大辞典》、《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等重要书籍和工具书，对《决定》均采取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印给的批件，存笔者处。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回避态度，没有再提及那件事了。

1990年，项英的家乡湖北省武昌县人民要求为项英立铜像作纪念。中共武昌县委、县人民政府迅速上报，武汉市、湖北省党政机关转报，很快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写下了“项英同志浩气长存”的题字。对湖北方面起草的《项英同志生平》，项英的战友、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陈丕显、李一氓亲自组织修改，笔者曾有幸参加研究修改，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这个生平的原文是：

项英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0年4月成功地组织了武汉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受党的派遣到江岸建立铁路工人俱乐部。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曾任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1923年2月，项英参加与领导了（北）京汉

(口)铁路工人大罢工。1926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他是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三至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28年秋,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

1930年12月,项英奉调赴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红军的壮大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陈毅等一起,在同党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重兵持续“清剿”的情况下,转战赣粤边,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保持了南方战略支点。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

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①

在抗日战争中，项英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职。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敌后挺进，发动群众，扩建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为提高部队素质作出了贡献。

1941年1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项英在率少数人转移、隐蔽于泾县茂林蜜蜂洞时，被叛徒于3月14日杀害。

项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②。

这个生平，实际上是党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情况下，对项英一生所作的客观评价。

① 《六大以来》（上）第896页。

② 中共武昌县委文件复印件，存笔者处。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项英的革命实践表明，他在长期的白色恐怖和革命战争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证明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贞不渝的。项英的名字，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已镌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项英如能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1995 年 2 月修改稿

后 记

《项英传》，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和鼓舞下，在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在即将出版之前，对一些情况有必要作些说明。

第一、研究和撰写过程。

《项英传》，是在研究项英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过去虽曾接触过有关项英的史料，但真正对他的研究是1982年在领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撰写项英人物条目开始的。当时，我知道要写好这个有争议的人物的条目，难度很大，有人还提醒我不要因此犯政治性的错误。但考虑到撰写任务是解放军人物学科的主编单位——总政治部干部部赋予的，不便推辞，就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在熟悉和掌握史料上下功夫。在这期间，我组织编撰、编审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有关新四军的条

目，主编了《新四军事人物录》，还在参与《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大辞典》一些条目的编撰和编审过程中，注意熟悉与项英有关的情况，掌握资料。

在熟悉和掌握与项英有关的资料时，我特别注意了两方面：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前形成的资料；二是最近几年形成的资料。鉴于皖南事变后至“文革”期间形成与项英有关的资料，基调多是批判的，因此，在参阅时注意了对比、分析、鉴别，并不照抄照搬。

《项英传》，在1984年接受约稿后，就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人物条目为基调，开始搭设框架，排大事记，拟制纲目，汇集资料，于1987年开始撰写。由于当时行政领导工作和编审任务繁重，只是利用节假日和晚间等业余时间进行。1989年，鉴于不能公正对待项英的个别人攻击项英条目和攻击介绍项英业绩的文章是“为项英翻案”，于是我放慢了对《项英传》的写作，一面参加学术探讨，先后发表了《论项英》、《项英传略》、《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等文章；一面结合编撰、编审工作，继续查阅史料，向熟悉项英情况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李一氓、陈丕显同志和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段焕竞同志等请教，走访了项英的女儿项

苏云和熟悉项英情况的顾玉良、顾雪卿、何子友等同志，对项英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我又开始了《项英传》的撰写工作。就这样，《项英传》从着手到成书，前后历时十年，不少章节数易其稿之后，终于写成。

第二、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对项英的功过评述，史学界争议的问题颇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公正地加以评述，是澄清争议的关键所在。笔者在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包括：

(1) 项英 1930 年 12 月到中央苏区，不是王明派去的，而是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去的。那时，六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开，王明还未上台。

(2) 在主力红军长征初期，项英指挥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掩护、策应红军长征，牵制了大量敌人，是符合革命全局利益的。

(3) 有人说新四军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初期上海、南京失陷时没能进入敌后，致错过了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时机。这种说法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那时党中央连新四军的编组原则还没有确定下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还处于分散状态，新四军还没有

组建。

(4) 1938年4月18日，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才集结编组完，在那十天之后，先遣支队就已出动，主力也陆续进入敌后，其速度不是慢而是快的，那种批评项英在党中央、毛主席一再督促之后才被迫进入敌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5) 有人批评项英1939年反对东进，却查不出第一手的文电资料，而看到的却是当年项英认为“江抗”不应西返的电报。稍后他又派谭震林去加强苏南东路的领导。这足以说明项英对向东作战是赞成并支持的。

(6) 有人说项英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说法是受王明的影响。据查，这一年1月至3月，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就达十四次之多。同年，在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报告中，都有类似或相近的提法。这看出，这与当时的斗争策略有关，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有关，并非项英个人的独创。

(7) 有人怀疑高敬亭被错杀是项英搞的。这使项英又蒙受了一大冤枉。其实，陈毅早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大

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①。陈毅这番话，当时是表扬叶挺的，但从另一方面却证明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8）有人说项英将新四军第一团调回皖南，是故意减弱苏南敌后的力量。这与事实不符，是属于调整建制的正常情况。军部在将第一团调至皖南整训的同时，又将第六团调到苏南。并拨归第一支队，指挥。

（9）有人把叶挺几次辞职说成是与项英的关系引起，以此百般指责项英。其实，叶挺多次辞职的情况复杂，都归到项英的头上是不公正的，叶、项关系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紧张。

（10）有人说项英想搞“三山计划”，并以此来佐证他反对“向北发展”。史学军遍查史料，至今也未查出“三山计划”。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胡立教同志，1990年曾经指出：“我也算是当时皖南军部的知情人之一，但我就不知道项英同志有个什么‘三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法。”^②

澄清对项英非议的过程，是正视听、明是非的过程，也就是澄清历史事实，它为正确地反映项英面貌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八）第329页。

② 胡立教1990年2月给李一氓的信。

打下了基础。

第三、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应提到的是，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等重要史书出版，对项英各个时期有了较为公正的评价；陈毅关于《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等史料的征集和披露，南北、董之曦《山雨欲来风满楼——皖南事变前夕纪事》和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等研究成果的发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暨军部分会组织对皖南事变历史的研讨及与合新四军老同志给予的期望，都成为我近年来加快《项英传》撰写的重要条件。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李一氓、陈丕显同志多次同我交谈，回答我请教的问题，并赠给有关史料。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给予了热情支持，不断交流情况，提供资料。杨明、南北、周祖羲、王秀鑫、杨刚、周之同、李维民、伊增垠、阎景堂、周世昌、蒋凤波、佟英明等老同志或学者，就项英评价的有关学术问题同我交换过看法，有的帮助审阅书稿，帮助核对史料；徐立群、徐合群、何硕丰、杨文玉、薛文浩、刘达、王顺才、张耀明、李秀登、陆

井夫、田华洲等同志，从北京、广州、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帮助查阅过史料；李鹏贵同志帮助翻译过外刊评述项英的资料；奚原、钟愷、孙华民、罗友琳、汤少云、何念选、张服膺、陈锦胜、马宏才、赵焕文、朱清泽、史明星、王承友、卞庸中、王军、陈晓萍、王静、赵南阳、王晓江、李洪等同志，对我的研究和写作给予过鼓励、支持和帮助；还有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等地的一些同志，对我研究项英和《项英传》的写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提到的，我的老伴曲雅彬同志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大支持，给常鼓励我抓紧写出书稿，后期她因病重不能参与具体事情，就动员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帮助我校对，称得上是“全家上阵”。而书稿的最后修改加工，是在老伴病情危重，白天要去医院或在家中帮助护理、夜间在灯下修改的困难境遇中完成的。

最后还要讲到，对历史人物总免不了有不同看法，特别对长期有争议的项英总会有不同看法的。但我认为，只要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认识还是容易解决的。我的拙作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水平和占有史料所限，可能有偏颇之处，欢迎批评和指

正。

作 者

1995 年 2 月 13 日于南京